习近平在正定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习近平在正定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习近平在正定/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3
ISBN 978-7-5035-6539-7

Ⅰ.①习… Ⅱ.①中… Ⅲ.①习近平-生平事迹
Ⅳ.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7095号

习近平在正定

责任编辑 唐 晓
责任印制 王洪霞
责任校对 马 晶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6号
电 话 （010）68929580（办公室） （010）68929899（发行部）
（010）68922815（总编室） （010）68929342（网络销售）
传 真 （010）689228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253千字
印 张 23.75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6.00元

网 址： www.dxcbs.net **邮 箱：** zydxcbs2018@163.com
微 信 ID：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新浪微博：** @党校出版社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程宝怀

001

“正定确实是近平同志从政起步的地方”

在正定工作三年多，尤其是当县委书记之后，近平同志把一个几百平方公里、几十万人口的县治理得很有起色、井井有条、蒸蒸日上，这对他的领导能力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考验。他后来很多思想，都可以在正定工作中找到源头。他曾饱含深情地说，“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这是他由衷的话。

王幼辉

025

“近平一向都严格自律”

近平时时处处都在为群众谋利，他自己的生活却特别简朴。我到省里工作以后，他到石家庄来看我，我们从来没有上过一次饭店。快到中午的时候，十一点半左右，他就走了。正定离石家庄也就半个小时的路程，他回到正定正好吃午饭。

王玉廷 047 “近平是正定永不卸任的县委书记”

近平离开正定这么多年，一直到今天，正定的老百姓一提起他，还和三十多年前一样，称呼他“习书记”。他几次回正定，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农民，见到他都叫他“习书记”。干部记着他，老百姓记着他，在正定人民的心目中，他一直都是我们正定的县委书记，是永不卸任的县委书记。

张五普 065 “为自己考虑多了，就会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越来越远”

习书记对群众的感情很深，他经常说，我们共产党人天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联系群众是我们的本分，必须和人民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这是我们搞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础。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江 山 089 “他说话做事做人都踏踏实实、诚诚恳恳”

他讲话不是很多，不像有些人那样滔滔不绝、长篇大论、侃侃而谈、慷慨激昂。反而，他讲话的特点是很实在，把事实讲得很透彻，把道理说到点子上，有啥说啥，不喊口号，不说套话。他说话，就如同他做事、做人一样，不摆花架子，不搞虚的东西，踏踏实实、诚诚恳恳。

何 载 105 “习近平同志当县委书记时就被认为是栋梁之材”

现在大家常说：习近平同志当县委书记时就被认为是栋梁之材。这个栋梁之材，在当时可是得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和中组部认可的。

赵德润 121 “近平同志把人民看得很重，人民也把他看得很重”

我与习近平同志进行了深入交流。我们从县情谈到国情，从经济发展战略谈到切实改善人民生活，从人才培养谈到借助专家学者的智慧。话题虽然广泛，却始终围绕着如何改变“高产穷县”的面貌，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周伟思 139 “近平把战略眼光和务实精神结合起来，很了不起”

习近平跟我谈他为什么离开北京到基层来工作的初衷。在当时，我认为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身体力行地做实事、影响人，能改变一点是一点，能起多大作用起多大作用。

李乃毅 167
“习书记制定‘人才九条’的过程，也是正定解放思想、促进改革的过程”

高培琦 181
“习书记对人民群众有一颗赤子之心”

李亚平 205
“习书记三十多年前就做好以身许国的思想准备了”

习书记这种为了党的事业敢于担当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回想34年前，习书记招贤纳士博揽群才、焕发正定勃勃生机的这段历史，至今令人难以忘怀。是他，打开了正定改革开放的大门，吹响了富民强县奔小康的号角，这浓彩重笔的光辉一页，将永载正定发展史册！

从1982年我与习书记结识之初，我就感到他这个人对不正之风有着天生的免疫力，与歪门邪道水火不容。可以这样说，习书记就是毛主席所说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种评价，实事求是，绝没有一点高估，他就是这样的人。

习书记就要求下到县里，为基层的老百姓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虽然辛苦，却也心甘情愿。讲到这里，他对我说：“只想着过舒适的生活，是平庸的追求。我是准备入‘苦海’的。”

张银耀
219
“近平同志办公室挂着一幅书法作品‘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这是近平同志非常欣赏的一条格言，也将其视为做人处事的原则。这也确实是一位领导干部必须要有的胸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做不了大官，也做不了好官。“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虽然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是相当不简单的一件事。

石文生
239
“近平同志对正定的历史文化传承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近平同志对正定的文物特别关心，有一次在隆兴寺院西侧，他看到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撰写的名碑“本命长生祝延碑”上沾满泥土，缺乏保护，他平时看书很多，对历史很有兴趣，知道这是一个珍贵文物，当即找到主管领导，并提出严肃批评。近平同志说：“我们对文物保管不好，就是罪人，就会愧对后人。”

朱博华 王志敏 253 “近平同志在生活上‘习以为苦’，工作上‘勤以为常’”

刘成君 275 “习书记既抓大事，又重细节”

贾俊华 283 “习书记那几年县委班子空前团结”

大院的晚上，最后灭灯的总是他那扇窗户。要下乡了，一辆半旧的二八自行车，就成了他使用率最高的交通工具。下村里调研，和群众聊天谈话，往往就在田间地头进行，没有那种繁文缛节和刻意安排。县委常委会议事，很多时候都是选择大家下基层调研回来后的晚上时间。

习书记干工作，大事要抓，细节也要抓，宏观上有大的谋略，微观上也很注意细节。有一次，习书记和我一起散步，发现了一块石碑，外面有个栅栏拦着，但是因为栅栏缝隙比较大，小孩都能钻过去玩。习书记仔细看了这块石碑，发现这是唐代遗留下来的文物。他立即指示办公室，把这块石碑保护起来。

以习书记为代表的几位县委班子“干将”，都非常利落，非常果断。他们几个人头脑敏锐，做事踏实，同时他们也很“单纯”，脑子里想的就是工作。可以说，习书记他们那个时候的县委班子，是空前的团结，凝聚力很强，战斗力很强。他们没有别的想法，就是一门心思干劲十足地抓工作、上经济，为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崔时欣 293 “习书记在生活上跟基层干部没啥区别”

有一年，县委和县政府联合搞了一个“小灶”，其实就是腾出一间空房，摆上桌子椅子，让领导们在屋里吃饭，让服务员把饭菜给他们端过来。习书记去了一次，吃了一顿，后来就再也没去，以后还都在食堂吃，拿饭票和大家一起排队。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小灶”吃了，他也没说啥“不搞特殊化”之类的道理，只是淡淡地说：“咱们都是一起工作的同志，我为什么非要到那儿去吃。”

王勋涛 305 “习书记讲话特别能打动青年干部”

我们这一批年轻干部，受到习书记很深刻的影响。从我个人讲，当时作为团干部，从心里受到习书记一言一行的感召，可以说对我一生的影响特别深刻。

王庆广 313 “习书记鼓动我把体校搬到县城”

回想起来，习书记确实很有眼光。我们还是小小的村体校的时候，他就看到了我们未来的前景，推动我们搬到县城来办学。当初搬家确实是搬对了，是我们基地能够取得今天成绩的决定性环节。不搬就没有今天的基地，更没有国际培训中心。

张新立
陆树棠
323

“习书记帮了我们春光电器厂的大忙”

习书记这个人很有“长性”，他不像有些领导，到厂子转一圈，听听汇报，就完成任务了。习书记不仅来我们厂里几次，帮助我们，指导我们，而且一直关注和关心着我们厂子的发展。这样的领导，这样认真做工作，我们群众对他就是一个字——服！

尹小平
赵桂林
333

“习书记关心塔元庄村的发展变化”

习近平同志还讲到，他原来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到了一个村党支部办公室，发现办公室很脏很乱，桌子上面一层灰尘，村支书就用大棉袄的袖子把桌子一抹。现在，咱们村的办公室环境很好、很干净，他看了很欣慰。

西兆通
干部群众
347

“习书记多次到西兆通调研”

我们找了个技术员领习书记去农场，他也没让任何干部陪同。他到试验田，问了技术员很多问题，问种植技术，问田间管护，问疾病防治，问水肥施用，问棉花产量，方方面面问了个“底儿掉”，考察得特别细致。考察完，他自己骑车就走了，也没在我们这里喝一口水，吃一口饭。

『正定确实是近平同志从政起步的地方』

在正定工作三年多，尤其是当县委书记之后，近平同志把一个几百平方公里、几十万人口的县治理得很有起色、井井有条、蒸蒸日上，这对他的领导能力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考验。他后来很多思想，都可以在正定工作中找到源头。他曾饱含深情地说，『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这是他由衷的话。

采访对象：程宝怀，1936 年生，河北博野人。1981 年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后任县长，1984 年任石家庄地区行署副专员。1997 年退休。

采 访 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 年 2 月 28 日

采访地点：石家庄市翠屏山迎宾馆

采访组：程宝怀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上世纪80年代初期来正定工作时，正是社会逐渐变革、人们思想观念慢慢扭转的历史时期。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他初来乍到，对正定县情是怎么认识的？

程宝怀：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正在深入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这是全国全党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大变革时期。近平同志来正定的时候，正定曾发生了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当中，正定县把1200户城镇居民下放农村，他们在农村吃住没有着落，子女上不了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批人天天上访，有时堵县委、县政府大门，要求回城安置。近平同志就是在这样一个既混乱又酝酿着巨大变革的历史转折点来到正定的。

近平同志思想解放、意识超前、博览群书、善于学习，做事沉稳、干练，胆大心细，政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到正定以后，他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走访了不少群众，召开了有公社干部、社员等参加的不同类型座谈会，了解到很多实际情况，对当时正定农村的现状、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有了深入了解，对确定正定的战略定位和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思路。

近平同志来后时间不长，根据正定正好处在省会石家庄市和广大农村之间，提出正定应该走“半城郊型”经济的发展路子。

当时，我对这个名词不太理解，就问他：“‘半城郊型’的内

1983年春，习近平在正定县委办公。

涵是什么？”

近平同志解释说，“半城郊型”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城市经济，是一个介于城市经济和一般农村经济之间的中间型经济。正定老城正好位于距离石家庄市15公里的位置上，正定的北方是广大的农村，正定的南方就是石家庄市。我们处在城市和农村中间过渡的位置上，就应该走城市和农村中间型的经济发展之路。

从此，正定就确立了“依托城市、服务城市、打入石市、挤进京津、咬住晋蒙、冲向全国”的经济发展思路。为了让这个发展思路表达得更加形象和具体，近平同志又提出了“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的二十字经济发展方针。他提出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之后，正定县大力开展多种经营，大搞农工商，很快出现了党风正、硕果丰的大好局面。近平同志把正定经济带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近平同志离开正定30多年了，但正定一直在沿着这条路子走，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这说明当时近平同志提出的发展路子是正确的，是符合实际的。这是近平同志对正定的一大贡献。

采访组：当时的正定主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到正定上任伊始，做了哪些工作来解决问题？

程宝怀：近平同志首先解决的是正定县征购负担过重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全县人民温饱的大问题。

高征购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农业学大

寨”先进县的一个重要条件，没人敢提出异议，但近平同志做事实在，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敢于大胆提出和解决问题。

近平同志到正定以后，开了不少座谈会，对正定的情况进行了解，再加上他经常下乡调研，所以在短时间内就对正定的情况了解得比较详细了。

一天晚上，近平同志到我办公室来。他说：“程县长，最初省委让我到‘好县’工作，依你看，‘好县’的标准是什么？”我说：“咱正定就是‘好县’，标准很简单：第一，咱们对国家的贡献大，每年粮食征购7600万斤，是河北省的老大，老书记冯国强说明年咱们还要争取交一个亿。第二，正定的领导班子很团结，老中青结合，你20多岁，我40多岁，冯书记50多岁，是个团结战斗的班子。第三，正定是‘农业学大寨’先进县，咱们的三角村是先进典型，全国各地都来参观学习。”

听后，近平同志笑了，他说：“老程同志，是不是‘好县’，应该以综合指标来衡量。咱们县去年农村人均收入是148元，你刚才说到的学大寨先进的三角村，亩产过千斤，可农民还吃不饱，他们偷着到外县换山药干吃，回来交征购。这些事，你了解不？”我说：“我了解。”

近平同志点点头，继续说：“咱们正定县在经济上是农业单打一，在农业上是粮食单打一。咱们为了交征购，年年扩大粮食面积，压缩经济作物面积。现在咱们全县的经济作物，棉花还剩一万亩。我们现在的粮价30年一贯制，小麦一斤1毛2，玉米一

斤8分钱。咱们粮食交得越多，群众收入水平就越低。依我看，咱们正定县实际是个‘高产穷县’！”

听到近平同志这么说，我“激灵”一下子，当时有点儿接受不了。我说：“‘农业学大寨’的红旗就在办公室挂着呢，哪能说咱们不是‘好县’呢？”

近平同志说：“咱们的‘贡献’越大，农民的收入就越低。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一下。我想给中央写个信，反映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把高征购减下来。”

当时我吃了一惊，连忙说：“这可不行，这可是政治问题，我得先跟老书记冯国强汇报一下。”

果然，我一跟冯书记说近平同志要向中央反映减征购的事，冯书记就急了，说：“这个可不能让近平反映！这事，要反映就你反映，出了问题你兜着！”

我回来又找近平同志谈，我说：“冯书记不让你反映，怕你犯错误。他说让我反映。”

近平同志说：“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怎么会犯错误？我去跟冯书记谈谈。”

他那次跟冯书记怎么谈的，我不得而知。后来听说近平同志和县委副书记吕玉兰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正定高征购使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时间不长，中央、省委、地委联合调查组来到了正定，对正定征购是否负担过重问题开展调研，召开了几个座谈会，调查组一致认为近平同志反映的情况属实。之后上级决定把每年正定征购7600万斤核减到4800万斤，减了2800万

斤。这一减，可了不得了。1983年，我们召开三级干部会（县、乡、村三级干部会），对种植结构进行调整，适当压缩粮食作物面积，上经济作物，当年种植“中棉十号”17万亩，一年农业产值就翻了一番，农民人均收入从148元涨到了400多元，翻了一番半，一年就彻底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那年，看到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我就对近平同志说：“你为正定人民办了一件大事，正定人民永远忘不了你。”

采访组：上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还没有广泛推开，人们的思想还比较保守。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那时在正定是怎样积极推行农村改革的？

程宝怀：1982年，近平同志到正定工作后，经常骑车下乡搞调研，走访群众，了解到生产队长不好当。当时农村的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社员下地干活的情况是：队长一打钟，干活一窝蜂，社员出工不出力。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干不干，八分半”，农民干活没有什么积极性。

有一天，近平同志找到我说：“程县长，最近你注意报纸没有？安徽和四川正在酝酿搞‘大包干’，咱们县能不能选个经济落后的公社搞个‘大包干’试点呢？”

我说：“老书记冯国强给我说过，‘大包干’我们正定目前不能搞，中央没文件，河北省没精神，石家庄地委领导没讲话，咱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冒尖，犯方向路线错误。”

近平同志说：“我觉得‘大包干’不错，是调动农民种田积

极性的最好办法。我去跟老书记说说，你跟玉兰同志说说。”

近平同志跟冯书记怎么谈的，我不了解。我跟玉兰同志一说，她很高兴，说：“‘大包干’是个好东西，迟早都要搞，这是个大方向。早搞比晚搞好，它分配简单，上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农民容易接受。”

在近平同志和玉兰同志影响下，我逐渐扭转了看法，对“大包干”有了新的认识，开始积极推动。

根据近平同志意见，我当时选择了离县城远、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里双店公社搞“大包干”试点。我把公社党委书记王香文、主任张士文叫到医院（我当时因胃病住院），先询问了他们对“大包干”的认识，说：“你们对‘大包干’是怎么看的？如果在你们公社搞个‘大包干’试点，你们意见怎么样？”

他们说：“我们早就想搞，但是冯书记不让现在就搞。”

我对他们说：“搞‘大包干’咱县领导认识不一致，但允许你们公社先搞个试点。我讲三条原则和三个‘不’。三条原则：一是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多数社员愿意就搞，多数人不同意就不搞；二是在分配土地时，远近搭配，好次搭配；三是不能跨队分配地。三个‘不’就是不汇报、不宣传、不上报。你们两个记住了吗？”

他们说：“记住了！”

我说：“记住了，回去就搞。”

结果一年就成功了，公社农业产值翻了一番半，社员年人均收入分配从210多元涨到了400多元。

1982年冬，习近平为正定县劳模颁奖。

无巧不成书。有一天，我和冯书记骑车下乡到里双店，我们两个还没坐稳，还没说让公社干部汇报什么工作，公社书记王香文就按捺不住，眉飞色舞地讲起了“大包干”的好处。还没说完，冯书记就拍了桌子：“是谁叫你们搞的！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

他们摸不着头脑，就老看我。我汗珠子一下子就下来了。冯书记转过头问我：“程县长，这个事你知道吗？”

我当时有点儿懵了，不敢说不知道，也不敢说知道，就含含糊糊地说：“我好像知道点儿，忘了跟你汇报这个事，我做得不对。”

冯书记啥也没说，骑上车就往外走，40里地我们俩没说一句话。走到县委门口，我把车子撂下，三步并两步到了近平同志办公室。我对近平同志说：“不好了，老书记知道搞‘大包干’了。”近平同志说：“程县长，你紧张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包干’搞成功了，应该受到表扬，不应该受到批评。”

我说：“那你赶紧跟冯书记解释解释吧。”

不知道后来近平同志是怎么跟冯书记解释的，反正这场风波很快也就过去了。正定开了全省“大包干”的先河，近平同志在推行“大包干”上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后来，他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实行科技兴县、工业兴县、人才兴县、旅游兴县，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奠定了正定经济起飞的基础。

采访组：为了正定发展，习近平同志那时大刀阔斧革新人才制度，收到很好的效果，在全省乃至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请您谈

谈这方面情况。

程宝怀：近平同志到正定后非常重视人才，大念“人才经”。他讲，人才是发展经济、翻番致富的根本。在招聘人才上，他做得十分突出，亲自向全国各地发了100多封联系信，聘请有关专家、学者给正定当顾问，组成了有50多人参加的县顾问团，应邀的有顶级专家，如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人。近平同志还让组织部和人事局制定了一个表，把全县中专以上人才进行拉网式统计，逐人登记造册，建立“人才账”，该提拔的提拔，该调动的调动，专业不对口的适当调整，做到人得其所，才适其用。

1983年，近平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一个广招人才的《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加快我县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当时反响很大。这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正定“人才九条”。文件提出，凡是来正定的科技人员，每搞成一个项目，利润按比例分成或付一次性总报酬；树立新时期用人观点，凡有技术专长的一律接收，包括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过去犯过错误已经改正的；工作调动由县委组织部和人事部门负责办理，一时办不齐手续可先来后办，原工资照发，粮食定量不变，全部吃细粮；允许研究项目失败，不追究责任，工资报酬、往返车费照付；为调入人才建“人才楼”“招贤馆”；凡到正定来讲学的专家、学者、教授，车接车送，并发津贴费等。

这些政策对人才的吸引力相当大。近平同志让我将“人才九条”印了两千张宣传单，发到各生产队，广泛张贴，并让我送到

石家庄地区的《建设日报》发表。我拿着“人才九条”到《建设日报》找到了总编辑。我跟他说：“我们制定了一个招揽人才‘九条’，你给我们登登吧。”他一看这九条，就说：“程县长，你还让我当这总编吗？”

我说：“怎么了？”

他说：“你这九条，违反现行政策，我敢登啊？我一登，地委准把我职务给撤了！”

我回来以后，跟近平同志说了这事，他说：“你去找找《河北日报》。”

第二天，我到《河北日报》找到了总编林放同志。他一看“人才九条”非常高兴，说正定县委班子思想解放，胆子大，就把“人才九条”登在1983年3月29日《河北日报》头版头条上。这篇报道一下子震动了全省甚至全国，要求来正定的人才络绎不绝，正定县委短时间内就收到1000多封书信，当年接收人才374人。当时，我们就成立了人才开发总公司，我任总经理，并且成立了接待办，负责人才的接待和安置事宜。

采访组：在引进人才过程中，有没有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典型事例？

程宝怀：当然有啊。我举两个例子吧。

第一件事，是找石家庄车床附件厂的工程师武宝信。他发明了“三露”，也就是粉刺露、亮肤露、增白露，当时已在全国畅销。

当时武宝信和厂领导在利润分配上发生了矛盾，他见到了

“人才九条”，就给近平同志捎信，表示愿意到正定工作。近平同志收到他的信时，天已晚了，就到我办公室来找我。

他说：“程县长，走，咱们今天夜访武宝信！”

我说：“今天晚了，咱们明天再去吧？”

近平同志说：“今天必须找到武宝信。”

于是，我们到了武宝信住的石家庄市桥东区谈固小区，谈固小区有几十栋楼，不知他住哪个楼，于是就挨个打听，问谁谁都不知道，当时已经晚上10点多了，我说：“算了吧，今天找不着，明天再说吧！”

近平同志坚定地说：“不行，今天必须找到武宝信，我从南往北喊，你从东往西喊。”

我们俩在小区里就扯开嗓子喊“武宝信”，功夫不负有心人，武宝信总算听到了，连忙从楼里出来，紧紧握着近平同志的手，非常感动。我们到了他家里，谈了一个多钟头，谈得非常投机。武宝信当即表示：“就冲你们书记、县长来找我这一条，我把新研制的爽脚粉配方给正定。”1983年4月4日，近平同志亲自主持爽脚粉项目技术转让会，项目落地在新城铺乡。投产不到一年，我们就赚了纯利润30万元。

第二件事，是近平同志到无锡引进人才的故事。正定有个油泵油嘴厂，原属省管，一年赔了27万元。后放给石家庄地区管，一年赔了9万元。

有一天，地区专员冀剑波找到我说：“你们正定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油泵油嘴厂就在你们正定，就给你们县里管吧！”

我说："我们不要！"

冀专员说："你不要，那你想要什么？"

我说："我要电视机厂。"

冀专员说："电视机厂能给你啊？那是咱们地区的骨干企业，不能给你们。"

我说："不给我们电视机厂，我们也不要油泵油嘴厂，要了就背上个包袱。"

冀专员说："你们把这厂子搞好了，包袱里装的就是金子！要了吧！"

我回来把这事跟近平同志说了，近平同志说："地区要给，那就要吧！"

结果，我们管这个厂子，一年就赔了7万元。

为了能让县里的经济发展快些，进一步解放思想，1984年五六月间，近平同志带领县经济考察团到江苏考察乡镇企业发展，先后走访了无锡、常熟、南通等地。在无锡，近平同志约见了给他写信、愿意到正定工作的无锡机械局农机供销公司原经理邱斌昌。邱斌昌懂经营、善管理，是个能人。听了近平同志对县里企业情况的介绍，邱斌昌当即表示可以到油泵油嘴厂工作。他还特别提到，自己可以带一个成熟的柴油发电机项目到正定，马上就能出产品。

近平同志问邱斌昌："你从大城市去我们偏僻的县城，有什么条件吗？"

他回答说："没有条件。"

近平同志就把“人才九条”的内容给他说了说。他说：“我不需要这个。”

近平同志就笑了，说：“你不提条件我们不好请呀。”

邱斌昌说：“你要非让我说，那我就提两条吧。我现在是17级工资，我一踏上正定的土地，县里就给我涨1级工资。我保证在一年之内，油泵油嘴厂的产值翻一番，到时候你再给我涨2级工资，达到14级。这样，我从正定再回到无锡，就是高干了，重要文件得让我看，重要会议必须让我参加。”

近平同志当时就打电话跟我商量，问我：“邱斌昌提的这两条行不行？”

我说：“这是最低条件。工资级差不大，搞不好，一年也就是多付两三百块钱，可以答应他！”

邱斌昌这个人积极性很高，当年8月就到正定报到了。他找到我，说：“你是程县长？你知道我的事情了？”

我说：“你的工资已经从17级涨到16级了。我们说一是一，说到做到，这就是正定精神！明天我领你到大会上宣布，你就是县油泵油嘴厂的厂长。”

邱斌昌很感动，当时眼睛就湿润了。第二天，我就到油泵油嘴厂召开职工大会，宣布邱斌昌为厂长，行政16级。

宣布完后，厂里有个副书记，给我提意见说：“程县长，你做得不对。县里给我们请厂长我们能接受，但宣布他的级别就不对了。”

我说：“这是习书记给你们请的人才。级别是邱斌昌来正定

工作的条件，你们就不要提意见了，下月按16级给他发工资。”

邱斌昌这个人本事太大了，上任没几天，就把油泵油嘴厂积压的产品全部卖了出去，随后就开始组织生产，当年产值实现翻番，成为正定县四大骨干企业之一。他带来的柴油发电机项目，成为企业的一个增长点。后来，他在正定工作了十几年，一直干到退休，为正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和离开正定以后，都对他非常关心，曾经给我来过3次信，让我注意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后来县里把他提为正定的政协副主席，药费按月报销。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刚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的时候，分管精神文明建设和教育工作，在他任县委书记之后，对这些工作仍然十分重视。请您具体谈一谈这方面的工作。

程宝怀：近平同志对精神文明建设确实十分重视。首先是从群众的卫生习惯抓起。正定虽然是历史古城，但刚刚经历“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恢复元气，到处是残垣断壁、碎砖烂瓦，污水横流，街道没人打扫，生活垃圾到处都是，很脏很乱。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两个文明”必须一起抓，在全县开展了“文明礼貌月”活动。他反复讲，不能摘了“高产穷县”的帽子，再戴上“高产脏县”的帽子。近平同志组织成立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在县城里修建了37个垃圾池、11个公共厕所，在全县建立了13个乡镇文化站和45个村俱乐部，为71个村安装了自来水。

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文明大院建设，开展了

"五好家庭""模范党员""红花少年"评选活动，制定了乡规民约。全县评出"五好家庭"3592户，成立青年服务队3500个。县直部门实行了"门前三包"，划分了卫生区，县城面貌大为改观，多次受到地区文明办表扬。

再说说近平同志对教育工作的重视。他来正定不久，就对全县的教育工作进行了改革，对教师实行聘任制，提高教师工作积极性，落实教师待遇，发放拖欠的教师工资，提高教学质量。当时，正定的小学有3500多平方米危房，校舍陈旧简陋，学生大多趴在土台子、水泥板上上课。他多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反复强调教育是立国之本。1983年10月13日，他听说南牛公社南永固村小学因校舍漏雨，学生已停课一周，立即作了批示，要求南牛公社党委应从南永固村小学办学条件问题中看到与党的要求的差距，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改善该小学的办学条件，不然就是失职。同时，还马上派县委宣传部长陈守东和主管副县长何玉前去现场帮助解决问题。

里双店公社傅家村小学房子露天，窗户没玻璃。近平同志把公社书记王香文叫到办公室进行批评，他说："里双店搞'大包干'不错，但不能一俊遮百丑，教育抓不上去，改善办学条件不力，那你也不是一个好书记。"

后来，全县筹集187万元，用于改善小学办学条件，修缮房屋1020间，共15000平方米，新置办桌椅板凳3000套。有16个村还盖起了新的教学楼，大大改善了小学办学条件。

采访组：请您谈一谈习近平同志那时在党建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程宝怀：近平同志对党建工作非常重视，多次讲要摆正党的建设和四化建设的关系。他说，如果忽视党建工作，就会给我们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对党员违法乱纪和工作作风问题，必须下大力气解决。

他非常注重加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要求各级党组织开展好“三会一课”，解决好领导班子自身组织生活不正常、涣散软弱等问题；要求党员对照党章要求，对照先进党员、英雄模范，对照入党誓词，反思自己思想上和行动上有哪些差距；强调对党员干部进行三种教育，即纲领教育、方针路线教育、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教育。

同时，他还要求解决好领导班子的四个问题：一是政治路线、政治立场问题，二是为人民服务问题，三是政治生活不健全问题，四是领导班子涣散问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贯重视和关心老干部，请您讲一讲他在正定做老干部工作的情况。

程宝怀：近平同志曾经在多个场合说过，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没有他们过去的奋斗和无私奉献，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老干部工作中，小事也是大事，一定要怀着深厚感情对待老干部。他对当时的老干部局局长王保奇说，关心老同志就要少讲空话、多办实事，多给他们送温暖、送方便，让他们过个舒

适、幸福的晚年。

他把县委仅有的一辆212吉普车让给老干部坐，把县委、县政府合用的会议室腾出来做老干部娱乐室。县委曾经下文，让医院开办老干部病房，开设老干部挂号窗口，规定老干部的医疗费按月报销，不得拖欠。

正定的老干部工作引起上级关注，河北省委、石家庄地委曾专门通报表扬。《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建设日报》《石家庄日报》专门刊登了近平同志尊老敬贤的事迹。他调走以后，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离退休干部以及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平时书信来往，逢年过节慰问，寄挂历、寄贺年卡。一有工作变动，就主动把新地址告知我们。

1994年，在全国劳动模范吕玉兰同志病逝一周年之际，近平同志特意写了《高风昭日月　亮节启后人》的悼念文章，以“痛心伤永逝，挥泪忆深情”表达了对玉兰同志的怀念。1998年，为纪念县文化局局长贾大山逝世一周年，他专门写了文章《忆大山》，刊登在河北省文联的杂志《当代人》上。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大力挖掘正定的历史文化，实施旅游兴县。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故事。

程宝怀：正定是文化古城，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楼”之说。近平同志对文化非常重视，提出来要挖掘潜力、发展旅游业。他把发展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在正定扎扎实实办了几件实事。一是修建常山公园。当时县里没有钱，就号召各部

1984 年 9 月 27 日，习近平（左二）与大家欢送正定县长程宝怀到石家庄地区工作时在正定县隆兴寺合影。

门和个人集资49万元，用了半年的时间把公园建起来了。二是修缮、彩绘大佛寺。三是组建乘飞机旅游观光的公司。四是兴建荣国府。

我详细讲讲建荣国府的事。本来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要拍《红楼梦》，需要40亩地搭建一个临时的摄影棚。近平同志当时正在酝酿发展旅游业，计划把正定建成距石家庄市最近的旅游窗口，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敏锐意识到正定的机会来了，就派人和他们联系，说正定愿意提供40亩地，希望把《红楼梦》的假景建在正定。制作中心到正定后，他们原计划投资49万元，让县里投资27万元，搭建一个2200平方米的《红楼梦》假景。近平同志考虑《红楼梦》拍完以后，三合板搭建的假景经不起风吹雨打，正定什么也落不着，就提议建一个“真实”的荣国府。这个想法提出来以后，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很高兴，立即同意。于是正定县就投资350多万元建了个“真实”的荣国府。1986年建成开放以后，第一年门票收入达221万元，旅游总收入达1761万元。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共事3年多，您如何评价他?

程宝怀：近平同志做人做事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他能做到严以修身，言行一致。为了振兴正定，他带头苦干，亲力亲为，他在正定经常讲：“表态不如表率，身教胜于言教。”

他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非常简朴，总是轻车简从，骑自行车下乡。他经常对大家说：“骑自行车有三个好处：一是锻炼身体，二是接近群众，三是节约汽油。”

近平同志做事，始终能够做到一个“实”字，从不讲套话，也从不“穿靴戴帽”，说话很干脆，干事很利索，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说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他强调，不能说了不做、言而无信，不能有始无终、虎头蛇尾，更不能华而不实、弄虚作假。决定了要做的事，就要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出成效。

近平同志心里时刻装着人民，始终坚持一切工作都要为人民的切身利益着想。他既是“三严三实”的倡导者，更是模范践行者。他无时无刻不把人民装在心里，人民在他心里重于泰山。他把人民关心的热点问题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工作的出发点。

他不仅注重调查研究，而且善于调查研究。他的调研工作有三个特点：一是召开不同类型的座谈会，接触的人特别广，听到的声音也特别全面；二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多，比如外出参观学习、走大街小巷、走村串户等多种形式；三是认真听取不同意见。他总是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考虑问题和认识问题。

通过和近平同志3年多的共事，朝夕相处，我发现他身上有四种优良作风值得学习：一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二是艰苦奋斗的勤俭作风，三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四是勇于改革、大胆创新的务实作风。

在正定工作3年多，尤其是当县委书记之后，近平同志把一个几百平方公里、几十万人口的县治理得很有起色、井井有条、蒸蒸日上，这对他的领导能力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考验。他后来很多思想，都可以在正定工作中找到源头。他曾饱含深情地说，

"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这是他由衷的话。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以后，您和他还有哪些接触？

程宝怀：他离开正定以后，我到他工作的厦门、福州、杭州去看望过他。我去了以后，主要是跟他一起叙叙旧，给他介绍介绍正定的发展情况。近平同志对老干部和一起共过事的同志特别关心，在我回来的时候，他让我给正定的老干部带些茶叶和食品，叫我代他向大家致以问候。近平同志前后回过正定6次，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老程，正定是我们一起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有我们的心血和汗水，你要多关心正定，让正定发展得更快些。"

他在正定工作时曾讲过："改革必然海阔天空，守旧未必风平浪静。"他有一个座右铭：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这两句话，就是近平同志作风的突出体现。

『近平一向都严格自律』

近平时时处处都在为群众谋利，他自己的生活却特别简朴。我到省里工作以后，他到石家庄来看我，我们从来没有上过一次饭店。快到中午的时候，十一点半左右，他就走了。正定离石家庄也就半个小时的路程，他回到正定正好吃午饭。

采访对象：王幼辉，1934 年 11 月生，江苏丹阳人，九三学社成员。1981 年任正定县副县长。1983 年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任河北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2003 年退休。

采 访 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 年 2 月 27 日

采访地点：石家庄市王幼辉家中

采访组：王幼辉同志，您好！您大学毕业后就在正定县工作了，习近平同志1982年来正定工作的时候，您任副县长，应该是正定最早接触并与他相识的同志之一吧？

王幼辉：是的，我1957年大学毕业后来正定县工作。近平1982年初来到正定的时候，我是分管农业的副县长，确实算是和他认识比较早的同事。到现在，我还记得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情景。

那一天，我正在石家庄地区英语学习班学习，县里给我打来电话，叫我马上回去开会。回去以后，我们县领导和地区的领导都坐在一个会议室，谈一个技术引进的事情。进了会议室，我就发现有一个“当兵的”坐在我对面。他年纪不大，一身旧军装，穿得很土，脚上穿个大头鞋，活像个部队炊事班的班长。我很奇怪，怎么有个当兵的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我就问坐在我旁边的地区徐副专员：“那个当兵的是谁呀？”

徐副专员说：“这是习仲勋同志的儿子习近平，到你们县来当副书记。”我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个“当兵的”就是习近平。

近平当时任县委副书记，在工作上受县委冯国强书记的领导。我们县领导班子的同志知道近平是大干部的儿子后，当时有一位副县长就说：“中央大官的子弟，我们怎么相处？”

近平自己很注意，他不希望因为这个和大家产生隔阂。在正定，那时候领导干部和普通干部共用一个食堂，我们在食堂打饭，不管职务大小，都按照先来后到排队，打完饭以后，大家就在院里的大石灰板上吃饭，蹲着吃，边吃边聊，哪个干部都不搞

特殊。近平从中央军委办公厅到正定来，“入乡随俗”，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

从那次见面以后，我们在一起工作，很快也就熟悉了。近平刚到正定的时候不满29岁，我比他大十几岁。虽然年纪相差很大，但我们思想上比较一致，平时很谈得来。

1983年，我到省里以后，冯书记也调到地区工作，近平担任县委书记。他是正定县的第十任县委书记，也是最年轻、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任县委书记。

虽然年纪轻轻就当了这么重要的官，但我从来没有见他发过火，也从来没有见他跟谁拍过桌子、瞪过眼睛，他一向都非常和气，平易近人，这让同志们都感到很亲切。他本来就是这么一个人，从来就是这个样子。跟他在一起相处，我从不觉得拘束。

有一次开会，我跟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同志聊天，他跟我讲，习近平刚决定从中央机关到正定来的时候，本来想从基层干起，当个公社党委书记，但当时省委组织部考虑到，从中央下来的干部安排得太低也不行，就让他当正定县委副书记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刚来正定的时候，分管哪些工作？请谈一谈他刚接手工作时，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王幼辉：近平到正定以后，精神文明建设是他分管的工作内容之一。在这方面，他干了很多实事，其中之一就是公路治理问题。

正定县是个交通四通八达的地方，从这里到无极、石家庄、沧州，公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多，但是那时的公路非常脏乱差。社

1983 年 12 月 23 日，习近平在
正定县城东门里与军民一起打扫卫生。

员经常在公路上占地堆粪、晒麦子，汽车就只好绕着走。还有人为了铺设管子浇地，就在公路上挖沟。路边的私搭乱建也很严重，有很多破破烂烂的小棚子、小店，缺乏管理。还有，路边的树木也被人盗伐了不少。公路疏于治理，长期处于这种乱象，由此导致的交通事故很多。

近平为了抓好公路治理，动员各个部门，包括农业、商业、公安等系统，督促四大班子齐抓共管。他持续抓了一年多，公路上的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一直持续很多年脏乱差的公路，近平一来总算给弄干净了。

采访组：您当时是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对于农业大县正定来说，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应该是县里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同志当年和您一起配合工作的时候一定很多吧?

王幼辉：是的，我们两个工作上配合很多，经常在一起谈工作，也经常一起下乡。正定县当时有25个公社、220多个大队，近平对我说：“你在正定待了那么长时间，又是学农的，肯定跑遍全县了。”我确实对情况比较熟悉，所以近平下乡，就经常和我结伴同行。

县委当时有吉普车，但近平跟我讲：“咱们还是骑自行车下去好，这样可以多看看。”

这样，我们平时基本都是骑自行车下乡。出发前，近平嘱咐我说：“咱们下去，你还是不要提我父亲的名字，就说我是复员军人，来当副书记就行了。”

近平当时考虑到，工作是工作，和个人背景是两码事。实实在在干好手头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如果工作做得不咋样，别人知道自己是高干子弟，反而会看低自己。

我们骑自行车下乡，随走随看，主要是看庄稼长势。到了公社，就向公社抓生产的主任了解情况；到了大队，就向大队抓生产的干部了解情况。近平在乡下调查的时候，除了问生产以外，还经常问社员家里的情况。他很喜欢和老百姓聊一些家常话，大家都觉得他这个人很随和，很亲切。后来，据当时县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闫书章告诉我，近平在正定短短3年内，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县所有公社、所有大队。

我们一般在公社吃饭。近平很自律，到了大队，他都会吃“派饭”，吃完之后抹抹嘴，说声“谢谢”，按照规定交半斤粮票，再交1毛5分钱。下午继续走乡串村工作。

有一次，我们到东权城公社下乡，吃饭时，有5个公社书记，还有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那天的菜也很简单，有一盘猪耳朵、一盘拌豆腐，这么多人吃这两个菜。主食就是一人一碗面条。东权城公社书记还拿出一瓶酒来给大家喝，近平一口也没喝。吃完饭以后，近平自掏腰包请客，拿出10块钱给了那位公社书记。公社书记笑笑说：“这些饭哪里用得着10块钱？我还倒赚几块钱。”

采访者：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同志当年是怎样摘掉正定“高产穷县”帽子的？

王幼辉：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我们全县的领导干部以及20多个公社书记都抓农业工作，“单打一”。至少我参加的多数会议，主题就是农业。我本人是专抓农业的，在正定县工作了26年。值得自豪的是，我们正定的农业，在全省都是出了名的。

我们正定县有45万人，种了30万亩粮食。那个时候，省里提出“500斤过黄河，800斤跨长江”。我们是全省第一个“跨长江”的县，还写了一本《渡江记》的小册子。

那时候正定在全省是非常有名的高产县，大家都到我们这里来学习。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人们生活水平并没有什么提高。永安公社的三角村是正定县“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村干部给我说：“幼辉，你别看我们高产，村里有的户还要到无极县买山药干吃。”

我听后大吃一惊：“还要到无极县买山药干吃？咱们的粮食不够吃啊？”

他说：“都上交了，上交的太多了。”

我们30万亩的土地种粮食，总产量是2.4亿斤，亩产是800斤。这2.4亿的产量，要上交7600万斤，剩下1亿6400万斤再分给老百姓，每人不到400斤。这些粮食，还是原粮，是带壳称的，而且就这些粮食，除了人吃还要喂马，还要留下一年的种子，社员的口粮的确不多。近平说，正定是“高产穷县”。这话虽然不好听，但说的却是实情。他很直接地提出来，这个上交数量不合理，老百姓负担太重。

1983 年 4 月，习近平（前排右二）陪同河北省委领导在正定调研。

他向省里领导提意见说：“我们是‘跨长江’的第一个县，但是我们老百姓吃饭还成问题呢！”后来，上级领导经过调查研究，感到正定确实是上交太多了。考虑到正定的实际情况，决定给减掉2800万斤。这样，我们人均一下子多了不少，老百姓吃饭问题就比过去好了不少。

群众拍手称快，夸赞说：“到底是北京来的干部，近平这小伙子魄力真大！”其实，农民负担过重的情况，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并不是不知道，但别的干部没有这个胆量向上级反映，近平就敢，这就表现了他实事求是和敢于为群众担当的精神。

采访组：刚才您讲到，初次见到习近平同志的时候，他穿着一身旧军装，很“土”，那么他平时的生活都是这样简朴吗？

王幼辉：近平时时处处都在为群众谋利，他自己的生活却特别简朴。我到省里工作以后，他到石家庄来看我，我们从来没有上过一次饭店。快到中午的时候，11点半左右，他就走了。正定离石家庄也就半个小时的路程，他回到正定正好吃午饭。

其实我完全可以领他在省政府招待所吃饭，但他到点准走，不愿意给我添麻烦，我也从不留他，老朋友之间没必要那么客气。但我到正定去，他就留我吃饭了。有一次，我到正定去看他，快到中午了，他说：“你今天在这里吃饭吧。”

当时，近平已经是县委书记，我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但他没有给我们开小灶。他自己掏钱买了一个鱼罐头、一个牛肉罐头，又抓了两把米，放在一个很小的铝锅里，用煤油炉蒸米饭。

那个锅很小，最后蒸出来就是每人一碗饭。他对我说：“就这些啊，多了就没有了。”没有汤，我们就一人倒了一杯白开水喝。不过，这顿饭我们还是吃得很开心。其实，他是县委书记，完全可以叫伙房给我们做个饭，但他不愿意搞特殊化。

县里的生活确实很艰苦。1983年，近平有一次到石家庄办事，办完事来找我，他发现我房间里有个卫生间，卫生间里还有个澡盆子（因为我这个住处本来就是招待所改建的）。他就对我说：“我想洗个澡。”

我当时有点为难，因为这里不是天天有热水，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五才有热水，但这天恰好不是。后来，我就想了个办法，先把澡盆洗干净，然后用脸盆到隔壁的茶炉房去端热水，连端了6盆热水，把茶炉里的热水全放完了，然后再兑些凉水。

搞好了洗澡水，我对近平说：“你当心不要把塞子踢掉，要不水都放走了，你可就洗不成澡了。”

接下来，近平就“舒舒服服”洗了个澡，洗完以后说：“真舒服啊！”

那个时候，正定的条件很艰苦，县委、县政府都没有洗澡的地方。近平是县委书记，完全可以到招待所去洗澡，但他不搞这种特殊化，他一向都很严格自律。他说，天热了，就在办公室里用热水擦擦身。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那次到石家庄是办什么事？找您又是因为什么？

王幼辉：他那次到石家庄来，是为正定县建造荣国府的事，找我也是商量这件事。通过抓旅游建设促进正定发展的思路，在近平当县委副书记时就已经成型了。当时别的人并没有这种想法，只有他站得高看得远。实际上，正定县的旅游资源相当丰富，我还在正定工作时，近平就跟我谈过，正定有那么多古寺，还有那么多宝塔，为什么不利用起来发展旅游呢？

有了这个思路，近平首先考虑的是把这些文物古迹保护好，其次才是旅游收入的问题。如果这两者有冲突，他首先还是侧重于文物保护工作。

有一次，我们到隆兴寺去，他看见一块碑，上面刻有朱熹题写的“容膝”两字，拓一次碑收5块钱。旁边还有一块隋碑，因为年头太长了，很多地方已经风化了。近平说：“以后不能拓碑了，要把朱熹的题字碑封存起来保护好，那块隋碑也封存起来，可以刻一个仿制的碑。”现在立在大殿右边的那块隋碑，就是按近平的指示仿制的。

1983年，他任县委书记后，正好来了一个机会——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要拍摄《红楼梦》连续剧。近平通过做工作，争取到剧组的很大一部分镜头在正定县拍摄。剧组原计划搭建一个临时拍摄基地，拍完了戏一拆了事。后来，近平决定建一个永久性的荣国府，还要建荣宁一条街，这样正定以后就可以借此发展旅游事业。

近平就和我讨论，荣国府建好了，《红楼梦》拍完之后，如何再利用这些房子的问题。当时他跟我说了一个方案，就是把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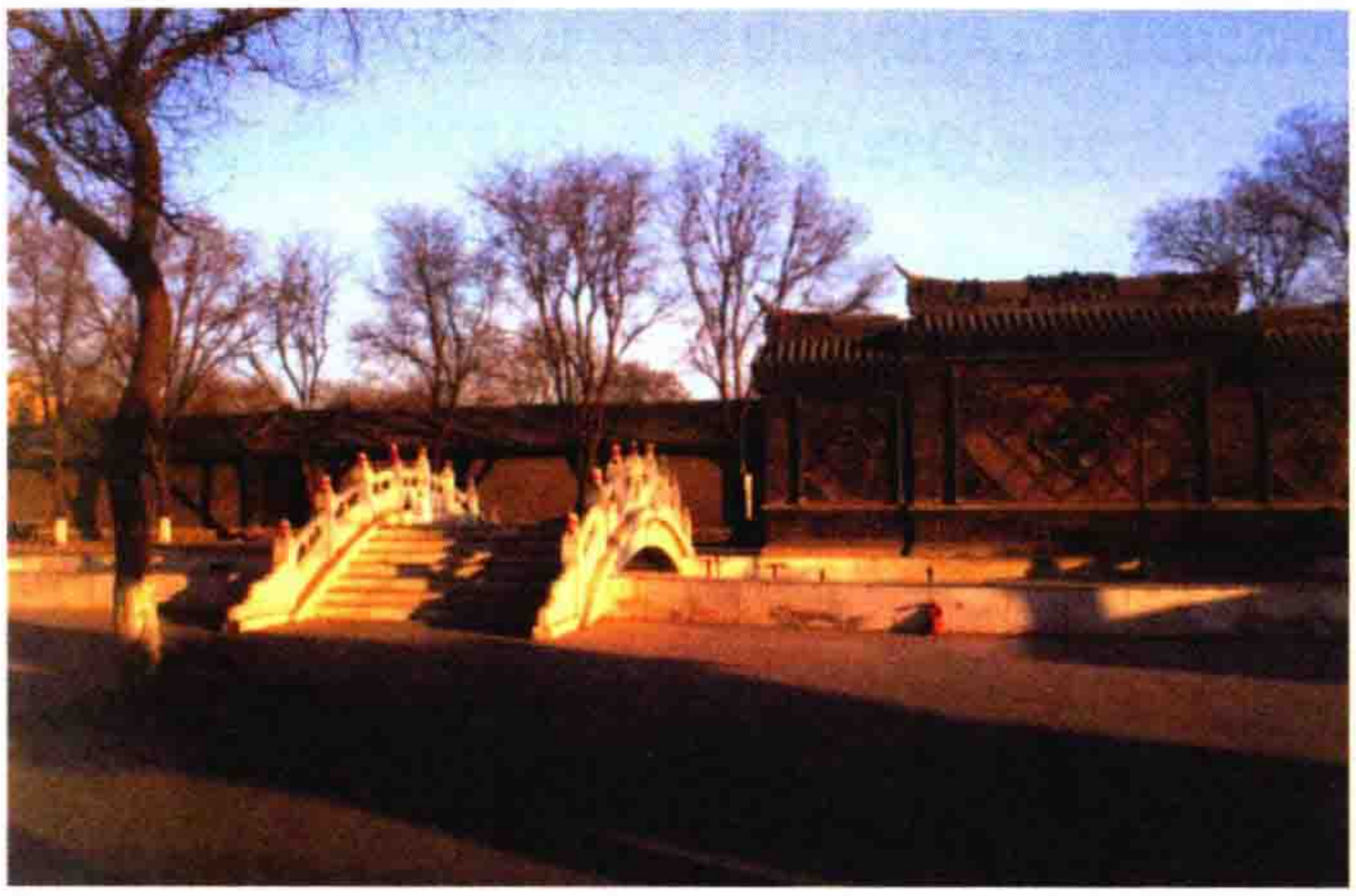
国府变成仿古形式的招待所。他说："我们把荣国府建成永久的建筑，拍完电视剧以后，不仅可以当成旅游景点，也可以变成招待所，比如尤二小姐的房间多少钱一天，王熙凤的房间多少钱一天，林黛玉的房间多少钱一天……这是一个思路，如果这条路走不通的话，我们就搞旅游，把荣国府作为旅游景点来开放。"他还给我算了一笔账："不仅仅是荣国府卖门票的问题，也不是为了让游客来看一会儿就走。游客不仅在荣国府参观，还可以在荣宁街吃饭、买纪念品。如果我们正定县只有一个隆兴寺的话，游客一上午就走了，只在此留半天。如果我们再加上荣国府和荣宁一条街，游客最少能留一天。这一天之内，他要吃喝，要住宿，要消费，这样他就把钱留在正定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近平就下定了建设荣国府的决心。

1986年，荣国府竣工。那时近平已经离开正定到厦门工作了，我去参加了竣工仪式。荣国府对游客开放以后，门票销售异常火爆，有力拉动了正定的旅游、餐饮等相关产业，对繁荣正定经济发挥了极大作用。

近平的眼光独到，很有远见，发展旅游业不算计一时一处的收入，而是纵观全局来策划。他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时，把西湖的门票一律免除，一开始有些人不理解，后来发现门票免了以后游客更多了，杭州的旅游收入反而大幅提高了。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您那时为帮助习近平同志建设荣国府，筹措了不少资金。是这样的吧？

荣国府掠影。



荣国府掠影。

王幼辉：是的。建设荣国府，当时的主要困难就是资金问题。盖这么大一座建筑群，如果没有一定的投资渠道来支持，单凭正定县的财政肯定是负担不了的。我本人不是抓旅游的，但我跟近平经常谈这些事，我们很谈得来。近平和我统计了一个数字，大概需要300多万元，正定肯定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俩就开始动脑筋了。

我们商量着是不是可以从省里要些钱来。后来，近平从石家庄市委书记贾然同志那里要来了20万块钱。

那时，河北省成立了一个文艺基金会，有一点钱。我跟原省委书记（当时省委设有第一书记）高占祥同志商量："能不能从基金会拿10万块钱，借给正定县建荣国府？"他当省委书记时是抓文化的，很能理解近平做事的初衷，痛快地说："好！"

我趁热打铁说："这10万块钱还远远不够，应该集点资，让大家都来支持建荣国府。"

有一天晚上，近平和我准备到高占祥同志家去商量这件事。我在电话里说："高书记，我和近平想到您家里去谈一谈荣国府的事，您看可以吗？"

他说："你们可以来，但是我家里吃饭吃不好，我们家没保姆。"

那天，近平买了十几个罐头，带到高占祥同志家里去，我们一边吃"罐头宴"，一边谈事情。

后来，高占祥同志就和我协调省财政厅、文化厅等10多个单位开了个会，叫大家出一点钱，最后决定向正定拨出专用款172

万元。这样，加上之前七拼八凑的钱，总算把建设荣国府的事情定下来了。

采访组：您到省里工作以后，在很多工作上还和习近平同志保持着密切联系。你们作为老朋友，生活上的交往也很多吧?

王幼辉：那还是很多的。有一件事情让我至今难忘，就是他请我到北京他的家里吃饭，一家吃得真简单啊。那是在1983年，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召开，我到北京开会，住在京丰宾馆。那天，近平也正好在北京，我就想去他家看看，我自己也有个好奇心，想看看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同志的家究竟是个什么样。

于是，我就给他通了电话，说："我今天不开会，去你家看看，行不行？"

近平说："欢迎啊，你来吧！"

随后，他告诉了我地址，我挺高兴，就借了一辆破自行车，一直骑到他家。到了他家，我把自行车放在外面，警卫已经得到了通知，就请我进去了。一进屋，就看见他已经坐在客厅等我了。我和近平打了招呼，又环顾客厅的陈设，当时可以说是大吃一惊，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家的客厅，没有电视机，就有几张旧沙发，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这叫我懂得了什么叫俭朴。这就是国家领导人家的客厅啊！

我们坐在客厅聊天，近平的姐姐桥桥那天在家，齐心阿姨也在家，她就坐在我们对过，说："我喜欢听你们之间的谈话。"

聊到11点半，快中午了，近平说："你在我们家吃饭吧！"

听到近平说这句话，我正求之不得呢，因为我肚子已经饿了，骑车回去吃饭也来不及了，而且我身上也没有带钱，这顿饭就指望在近平家吃了。我心想：我倒想尝尝副总理家的饭是什么味道。

近平就对服务员说："告诉厨房，今天有客人来了，多加……"近平说到这儿，我心里潜意识地就想，肯定是吩咐多加两个菜，结果近平说的是："……多加一副碗筷。"

我问近平："你爸爸回来不回来？"

近平回答说："回来。"这一下，我又紧张了。

开饭前，我听见一辆汽车进院来了，近平说："我爸爸回来了。"

话音未落，精神矍铄的习仲勋同志就走进客厅来了，我连忙起身，壮着胆子说："习叔叔！您好！"

习老走过来跟我握手，近平在旁边介绍我："他叫王幼辉，过去在正定工作，是我的好朋友，现在在省里工作。"

习老一边跟我握手，一边热情地说："欢迎！欢迎！"

到了吃饭时间，大家都在饭厅落座了。我一看，长方形的桌子上，没有菜。我坐在一边，近平就坐在我旁边，习老、齐心阿姨、桥桥也都落座了。一会儿，饭上来了，是陕西的米粉面，吃起来酸溜溜的，这个饭要比我在京丰宾馆吃的政协会议餐差老鼻子了。

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习老的左手边放了一个大盘子，里面有

一摞切片面包，我一边吃米粉面，一边用眼睛看着面包片，特别想拿，但是要拿，我就得站起来绕过习老，我觉得太失礼了，也不敢，所以就决定算了，忍住不吃了。

吃了一阵，我说："我吃饱了。"

近平说："你舀一碗汤喝。"

我一看那个锅里，是鸡汤，但是汤炖得非常淡，所谓的鸡汤，没什么味道。大概是一只鸡炖了一大锅水的缘故。

吃完饭以后，习老问我："我们家的饭好吃吗？"

我违心地回答说："好吃！好吃！"心想，这顿饭吃得可真简单啊！

我们简单聊了几句。习老说："个人、家庭都要勤俭节约，这样社会上就会形成好风气，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还不富裕。"这是他对我和近平两个人讲的。

随后，习老对我说："要不我们俩聊聊？"

我心里想：我跟国家领导人有什么话聊聊？但是我也不好说"不聊"。当时，我看习老的眼睛有点发红，就说："您忙了一上午了，眼睛都红了，中午还是休息一下吧。"

习老说："好吧，那我就不陪你了，我下午还有个外事活动。"

他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心了。其实我也怕自己跟国家领导人讲话讲不了什么。

习老上楼休息之前，又对我讲了一句："下次到北京来，还来我家玩啊。"

我估计他们家人中午也得休息，就赶快告辞走了。后来我写

了一篇文章，叫《难忘的习家午宴》。在那篇文章里，我说：“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不是像人们所说的、电影里所讲的住豪华别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1985年年初，有一次机会，我在北京又见到了习仲勋同志。那段时间，近平正在忙正定的事情，大概很久没回家了。习老就跟我打听：“近平在正定那边什么情况？”

我说：“近平现在干得生龙活虎，正在建造荣国府，这个大项目能给正定的发展带来巨大好处，把单打一的农业县搞成多种经营的旅游县。”

习老说：“你回去转告他，他做的事情是应该的，要埋头苦干，不要骄傲自满。”

我说：“好，我一定带到。”

这就是我和习老的第二次见面。一晃，很多年过去了，2002年5月的一天，我接到近平秘书的电话：习仲勋同志去世了。

第二天，我就开车赶到了八宝山。遗体告别仪式上，来宾绕遗体一周，再和家属握手，当时齐心阿姨因为悲痛过度，体力不支，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和来宾握手。我当时没有见到近平。我想，这么大的事情，近平怎么不在呢？

当我要走出门的时候，猛地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高处朝我喊：“幼辉！”

我回头一看，近平在台阶上面朝我招手，他大声朝我说：“你要保重身体！”

我说：“你也保重身体！”近平点点头。

我说："我走了啊。"近平同我招手告别，我就转身走了。

那一天，我的心情很悲痛，近平失去了一位慈父，我失去了一位非常敬重的长辈，人民失去了一位好领导，这也是国家的巨大损失。

虽然我与习老只见过两次，但是通过这两次，我就意识到了，近平品格的形成，和习老的言传身教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这就是"家风如春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后，您和他还保持联系吗？

王幼辉：1987年，近平在厦门工作的时候，我到福州参加校庆。虽然我在福建读了几年书，但没去过厦门。校庆结束之后，我就到厦门去，一方面是带我爱人走走，另一方面是去看看近平生活得怎么样。到了厦门，我就打电话给他，说："近平！我来厦门了！"

近平很快就到我住的招待所来看我。那天，我出去办点事，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到了，正在跟我爱人谈天呢，还给我们带了一些水果。我问他，彭丽媛同志现在在哪里演出？他说："她去中央音乐学院读硕士研究生了。"我这才知道，彭丽媛同志是我国第一位民族声乐硕士。

后来，近平在浙江和上海工作的时候，我们有几次见面的机会，但不是他太忙，就是我错不开时间，所以那几次都没能见上面。虽然没有经常见面，但我们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

到了2008年，我突然接到省委办公厅一个电话，说："近平

同志要到你家去看你。”那次见面，近平问了我的家庭情况。

谈话当中，我说：“我送你一套书吧，你不是分管香港工作吗？我送你一套《大公报名记者丛书》，一共7本。”

近平说：“好！你送我书，我就要。”

从我家离开的时候，近平说：“幼辉，你多大了？”

我说：“75岁啦！”

近平感慨地说：“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

2013年，因为爱人生病，我住在北京照顾她。我们省委副书记给我打电话说：“后天，你必须赶到石家庄，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找你。”

我答应了，心里却有种预感：我退休那么多年了，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找我？会不会是近平来了？

我赶到石家庄，一看，果然是近平来了。当时有好些老同志都在，大家一起合影，前面一排坐着，后面一排站着。

近平一看见我，就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精神！”

我说：“不精神了，现在精神不了了！”

当时，我旁边有位姓熊的老同志，曾任省委顾问委员会秘书长，是石家庄地区的老干部，大概已经80多岁了，走路不方便，拿着一个拐棍站在我旁边。近平看见了他，就说：“这么大年纪，还站在后面？来，加个椅子，让老同志坐在前面！”

近平对老同事的这份情谊，让我很感念。他对老干部的这份尊重，也让人很感动。

『近平是正定永不卸任的县委书记』

近平离开正定这么多年，一直到今天，正定的老百姓一提起他，还和三十多年前一样，称呼他『习书记』。他几次回正定，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农民，见到他都叫他『习书记』。干部记着他，老百姓记着他，在正定人民的心目中，他一直都是我们正定的县委书记，是永不卸任的县委书记。

采访对象：王玉廷，1938 年生，河北行唐人。1983 年 9 月任正定县委组织部长。1984 年 8 月任正定县委副书记。1988 年任正定县委书记。2000 年退休。

采 访 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 年 4 月 4 日

采访地点：石家庄市王玉廷同志家中

采访组：王玉廷同志，您好！您是1983年9月到县委工作的，之前您在县直机关工作。您到县委工作之前认识习近平同志吗？你们初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王玉廷：近平是1982年春天到正定来的。当时我还在县农机局任局长，单位在火车站那边，离县委大院比较远。那时我还有一个职务，就是正定县科委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的副理事长、委员，偶尔也到县委去办事。有一次，评定技术职称的时候，我骑自行车到县委去找县科委主任李德祥同志。

那天，近平恰好在李德祥同志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穿绿军装的小伙子，个头高高的，带着一股子精气神。

李德祥给我介绍说："这是咱们新来的县委副书记——习书记。"

我跟他握了握手，聊了几句。

他问我："王局长，你任职多长时间了？"

我说："有几年了。"

他说："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说："我是西北农学院毕业的。"

他说："你在西北上的大学？你老家是哪儿的？"

我说："我老家就在这边——石家庄地区行唐县。习书记，你的老家是哪儿的？"

他说："我是陕西富平县的。"

我说：“陕西富平啊，我到你们那个县收过麦子，有十几次呢。”

近平一听，笑了笑说：“是吗？你在那边工作过？”

我说：“是啊，我毕业以后，在宁夏农机管理局工作了七八年，那时候西北地区的联合收割机很少，我经常调动联合收割机到陕西渭南地区去，给富平县收割麦子的次数可多了。”

我们两个聊了一会儿，我发现，这位年轻的习书记待人很亲切、很随和，言谈举止很沉稳，但是因为他太年轻了，我感觉他还有点学生味儿呢。聊了一会儿，他就起身告辞。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很简单。

我和近平的第二次见面，是我有一次到县里去汇报工作，碰到近平，跟他打招呼，聊了几句。后来，我们就没怎么见过面，直到我调到县委工作。

1983年9月，我任县委组织部长。从那以后，我在近平直接领导下工作，接触就比较多了。

1984年8月，我任县委副书记，主管党群工作，我和近平的办公室挨着。那个时候，我们干部实行粮食定量，食堂伙食也不好。再一个，我们经常开常委会，有时候开到很晚，散会后食堂早就“打烊”了。近平因为家不在这里，吃饭都在食堂，所以一旦赶不上饭点，就要饿肚子。我一看，这样也不行啊，就请近平来我家吃过几次饭。近平很随和，我爱人做什么他就吃什么，从来不挑剔。

采访组：您从1983年到县委工作就和习近平同志搭班子了。那个时候，您对他的工作有什么印象？

王玉廷：在和近平一起搭班子工作期间，他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体会比较深的有四个方面：一是他用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组织制定了正定繁荣发展的目标和战略；二是他高效组织人才队伍，组织动员起正定繁荣发展的力量；三是他着力创造繁荣发展的环境，为正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四是他扎实开展了正定繁荣发展的实践，给正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是近平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会见中外记者的时候讲出来的，而早在30多年前，他就本着这个信条来做工作，为正定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实事。

那个时候，国家以粮为纲，正定县又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县委、县政府始终把这个荣誉放在第一位，所以征购指标相当高，导致老百姓的粮食不够吃，副业也发展不起来。老百姓没办法，要到周围县里买山药干、红薯干才能填饱肚子，生活很苦。近平为了给正定减轻粮食征购压力，做了关键性的工作，大幅减轻了农民负担。

在近平的努力下，正定成为石家庄第一个通公共汽车的县。上世纪80年代初，离石家庄市区15公里的正定县，没有专门的公共汽车往返，火车也没有几趟，运力不足，很不方便。长途汽车在正定火车站设了一个停车点，县城里的人要想去石家庄，都

中国共产党河北省正定县委员会公用笺

王玉廷 同志：

最近，我听取了有关部门的汇报，看了几个地方，觉得我县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工作发展是健康的。文件的基本精神和县委实现经济起飞的战略决策，已初步为干部群众所接受。想定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商品生产，疏理流通渠道等项工作，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初见成效。不少地方出现了“项目热”、“投资热”和“科技热”，所以，我认为从总体讲，全县形势不错。但是，用一号文件精神来衡量，同全国、全省飞速发展的形势比较，有几个问题需提出来和你们通个气，议一议，以便统一思想，把工作做得更好。

要进一步端正发展商品生产的指导思想。目前，同志们正在全力以赴抓发展商品生产，这是很对的，必须继续抓下去。但是，在指导思想上一部分同志有偏面性，表现为“四重四轻”，即，在发展路子上“重集体，轻两户”；在新上项目上“重工业，轻种养”；在生产经营上“重生产，轻流通”；在资金筹集上“重贷款，轻集资”。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我们一些同志对一号文件精神还未正确理解，思想还不够解放，比如在发展路子上和“重集体，轻两户”，实质上是一些同志还未冲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框框的束缚，认为发展商品生产只能走发展集体工副业的路子，发展商品生产就是发

（C.40.82.1.21）

1984年3月21日，习近平写给王玉廷的一封信（之一）。

眼镜体企业，至今也。还有先对不能划等号了。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发展
集体企业对不重视。我们工副业收入是发展的，作为领导在感情上一定要明
确，发展商品生产两条腿走路，个人一起上。在我县尤其要把"两户"发展商品
生产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对"两户"经济的支持，虽然做了一些工作，
但是很不够。我们各级领导千万不能只眼一只脚，必须把工作重点自觉地转
移到支持"两户"经济上来。从而使我县的"两户"经济也具有个长足
的发展。又比如在如何让农民发展经济这个问题上。我们一些同志两眼只盯在银
行、信用社上。就手续不见时间的灵活性。看不见我县农户存款的潜力。不
知道利用这个"财神爷"。在农村调动发展商品生产的一切积极性，关键
是你如何去做工作，用什么政策去调动农民资金的积极性和如何组织农民集
资，等等，不一一而谈了。总之，这"四重四轻"是目前影响商品生产发展
必须迅速而认真解决的问题，不然，我县发展商品生产还是走弯路，我们的
工作必然导致新的失误。

当前有几件具体工作也必须认真抓好。

关于延长土地承包期问题，①各乡要在原承包年限的基础上延长到十五
年以上，不要等到承包期满再延长。②各乡必须在三月底前把土地使用证全
部发到承包农民手中。③做好承包合同修订和一些合同的公证处理的准备。

（C.40.82.1.21）

（之二）

中国共产党河北省正定县委员会公用笺

关于取消生产队干部问题，如确实无法留必要的生产队干部，必须下决心取消。一些乡以刚刚安排不久为理由保留不动，这个想法要改过来。取消生产队长这不单单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而是为了从体制上彻底改变人们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有观念，以便为发展新的合作经济开通道路。当然，少数确实需要保留的，经乡批准也可暂时保留。精简工作可选择有利时机进行。

一些地方请示要在责任田搞棉粮间作，我认为应该允许的。但必须由乡或村统一规划，并制定出必要的规定，在统一规划下，有树苗的可以先种，无树苗的可以晚种。但不管先种后种，均不得影响左邻右舍，也不能树种杂化，不能在一个方田里有种这种树，有种那种树的现象出现。

要做好财务整顿的准备。根据农牧局的汇报，我县财务问题非常严重，必须下大力量搞一次财务清理。目前，各乡可以先摸清底数，掌握重点，做好准备，待种起棉花后，再作为一个中心工作，集中力量打一个战役，以便把我县的财务混乱问题认真解决一下。

当前工作较多，春耕生产，精神文明建设等也要抓好。

以上几点意见，请你们统筹安排，认真落实。

此　致

敬　礼

习 近 平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C.40.82.1.21）

（之三）

要走5里地去火车站坐长途客车，并且班次少，很拥挤，开车时间也不固定，有时候等半天不走，有时候赶过来，车已经满员，就坐不上了。无奈之下，有的人就选择骑自行车去石家庄，但自行车在那个年代算是“大件”，也要凭票购买，很多老百姓买不起。这种情况下，近平与石家庄市委书记积极沟通，开通了石家庄市至正定的201路公共汽车，每15分钟就发一趟，不仅大大方便了正定老百姓的出行，也为石家庄市里的人到正定参观旅游提供了方便。这是近平为正定做的一件惠民生、顺民意的实事，在老百姓当中反响特别好。

80年代初，城乡普遍都用蜂窝煤当燃料，用来取暖和做饭，不仅污染大，而且很费事。近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跟石家庄市要了一批煤气罐的“户口”。当时，石家庄能用上煤气的家庭还不多，他就给我们正定要来了一批煤气罐，方便了老百姓的生活。

近平刚到正定时，有一段时间由他来主抓改造“连茅圈”，把农村的厕所和猪圈分开。县里的主张是“一刀切”，快刀斩乱麻，到农民家里直接强制性地改造，改完就完成任务了。但近平并没有这么做，他首先在两个村搞试点。

近平觉得，这个事，直接铺开搞，突击搞，肯定会有反复，强制性地把老百姓家的猪圈和厕所隔离开，人家肯定反感，人一走，老百姓马上就可以拆掉——拆几块砖头还不容易吗？这个事要想办好，首先是让大家在思想观念上接受才行。所以，应该先搞两个试点，让大家都能看到好的效果，然后再全面推开。

后来，我们在吴兴和塔元庄这两个村搞了试点，效果都很

好。接下来，我们就以这两个村为标杆，进行宣传和推广，让各个村的群众慢慢接受。

过了一段时间，地区开汇报会，我和近平去了，也把实际情况说了一下。地委领导因为我们没有大刀阔斧地改造“连茅圈”，点了正定的名，要求我们加紧搞。从会上下来，我跟近平说：“你看，上面催得紧了，咱们开始弄呗。”近平摇摇头说：“那种‘运动式’的弄法，肯定劳民伤财，推广越大，损失越大，群众也不会满意的。咱们国家在这方面吃的亏还少吗？”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没关系，我去跟地委领导汇报，把情况讲清楚。”近平后来具体怎么跟地委领导谈的，我不是很清楚。但我们正定后来就是按照近平主张的这种方式，通过试点稳步推进，后来县里各村“连茅圈”改得都很好，反复也很小，而那些“一刀切”改造的县，后来都有很大反复，老百姓的意见也很大。

近平所做的这些大事小事，都是为群众着想，解决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问题。每天，他脑子里想的都是县里的事，想的都是老百姓的事，他自己的生活则是能简单就简单，能凑合就凑合。

近平作风朴实，平易近人，经常骑自行车下乡，吃百姓饭，穿平常衣，他常穿的衣服就是绿军装，冬天穿一件军大衣，很简朴。他的办公室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放满了书的小书架。生活上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

采访组：您觉得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上有什么突出特点？

王玉廷：近平虽然年轻，但他站得高，看得远，善于学习，知识丰富，也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把握新形势新政策。

到正定以后，近平常到老干部家里串门，一方面是关心他们，表达对他们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通过他们了解正定更多的情况。他不带县委办公室的人，常常一个人直接骑着自行车就去老干部家里拜访了。

他也经常走访北京的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每到一处都会得到不少最新的信息。深圳那边刚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近平在正定也马上就提出来了，他希望我们能够跟上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思想，并迅速转化为行动。

事实证明，近平所做的这些扎实、细致的工作，确实让正定这个传统的农业县在很多工作上越来越超前，干部群众的思想也越来越解放，各方面工作的开展也越来越顺利。

在县委书记任上，近平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过去，县委都是搞年度计划，近平当县委书记后，县里面很快就制定了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相继制定了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工业兴县、旅游兴城、繁荣振兴正定县城等等思路明确的战略，并且迅速上马一批项目，开始做针对性的工作。

近平认为，正定是传统农业县，这个原本的长处不能丢，而且还要大力发展种植、养殖等副业。在近平主政时期，正定发展了一批种植、养殖和试验相结合的农业基地，先后被评为“小麦种植基地县”“瘦肉型猪基地县”“果品基地县”，这些荣誉的背

后，是近平带领我们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所做的大量的工作。

近平为正定制定的发展战略，不是临时性的，而是长期性的，是看准了我们正定今后长远的发展道路的。过去没有人搞过战略，没有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制定过正定的发展计划。30多年过去了，近平当年为正定制定的发展路子，现在也还在对正定的发展起着指导作用。

正定这个地方，文化比较发达，地理位置优越，滹沱河从县里穿过。近平看到了正定历史文化的优势，推动修缮了大佛寺，筹资建造了荣国府。可以说，这两个项目，后来成为正定旅游业发展的奠基性工程。在此基础上，正定又建成了好多旅游景点，封神演义宫、西游记宫、军事俱乐部、旅游机场等等。旅游机场在当时是个不错的创意，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没坐过飞机，旅游机场可以拉着游客飞一圈，体验一下坐飞机的感觉。这些项目中，虽然有很多是在近平离开以后才正式建成，但策划、筹建和推动，都是他做的。

采访组：实施人才战略是习近平同志当时的一个重要举措。您曾在县委组织部工作，请您谈谈正定当时都引进了哪些人才？

王玉廷：先讲讲用干部。拿我本人来讲，我是县里提拔知识分子的重要例子之一。1983年9月，我任县委组织部长，1984年8月任县委副书记。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干部，都是近平在县委书记任上，响应党中央号召，大力推行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四

1985 年 3 月 26 日，习近平在
正定县人大八届二次会议上讲话。

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而提拔起来的。

近平主政时期，为正定各方面发展，从全国各地请了很多顾问来给正定出谋划策，也请了很多专业人才来为正定管理企业。那时候，人才来了，是由县里直接分配。

邱斌昌，就是由县里直接招过来，担任油泵油嘴厂厂长的。他来正定以后，关系直接挂到我们乡镇企业局和工业局。我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他还在这里干，后来他就在正定县退休了。

郝月普，是个“土专家”。近平不拘一格，把他直接邀请到我们县里办化工厂。

梁士冲，这是经我手引进的一位同志，他原来在北京炼油厂工作，来到正定以后，挂靠到乡镇企业局，在正定办了诸福屯编织袋厂，后来也是在正定退休的。

以这些同志为代表的一批人才，在近平的感召下，很多人在正定扎了根，一直工作和生活下来，为正定的繁荣发展奉献了半辈子，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采访组：您曾与习近平同志搭班子工作，他离开正定以后，您也担任过正定县委书记。请谈谈他的工作对您本人的影响。

王玉廷：1988年，我担任正定县委书记。我上任以后，主持正定县全面工作，基本上还是按照近平的思路搞。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受益很大。

在班子建设方面，我向近平学了很多经验。我当县委书记的时候，河北省在1989年和1990年，连续两年在省委党校办全省

的县委书记学习班。这两年，我们都介绍了正定的先进经验，一次是基层组织建设的经验，一次是学习型县委领导班子的经验。这些，其实都是近平留下的经验或是在他启发下形成的经验。

荣国府的建造、大佛寺的重修、正定乒乓球基地的建设，这些都是近平任上主抓的项目，在他走了以后才正式完成。

近平在正定的时候，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是地区和省里的先进典型。1990年，正定县被评为河北省经济“十强县”，我当时是县委书记，感到很光荣。但实话实说，我完全是按照近平过去定的工业兴县、旅游兴城、农业特色基地等等这些路子走下来的，所凭借的工业、农业等各方面基础，都是近平打下的。

近平留下的东西，有的我能学到，有的我怎么学也不如他。比如，团结人方面，我不如他。要协调一个班子所有的工作，我觉得很艰难。一个班子里面，各种性格的人都有，近平能把大家都团结在他周围，每个人都服他，都跟他很“铁”。老百姓支持他，干部支持他，都付出最大的努力来配合他。他在正定的时候，也是我们班子最顺当的时期，是全县干部心气儿最高的时候，大家一心一意干工作、搞建设，没有半点儿歪门邪道，都是一呼百应，没有一个搞派系的，没有一个背后嘀嘀咕咕的——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心底无私天地宽”。近平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热情都用在了工作上、用在了正定的发展上，一身正气，没有半点私心杂念，和他一起做事的人，自然也就受他的影响，不想也不敢搞什么旁门左道的事。

再比如，掌控全局方面，我也不如他。他能把各项工作安排得很顺畅，做得很顺利。近平一直能把全局的情况考虑在内：有多少人，有多少事；什么样的人，在做什么样的事；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关于这些，他头脑很清晰，都有一个预判。很多事情，近平都能做到未雨绸缪。在常委会上，每次都是他主动提议题，而不是等着问题来了再被动地去处理。这一条，我比不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之后，您是与他保持联系比较多的一位老朋友。请您介绍一下你们以后的交往。

王玉廷：1985年，近平参加了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玉米加工考察团，到美国艾奥瓦州考察学习农业生产和玉米加工技术。他在美国访问期间，中组部就决定调他到厦门任市委常委、副市长。他回到正定后的第二天，我没有找到他，他那天可能到省里和地区去临行告别，或者办一些手续。

那天晚上，我问吕玉兰书记：“怎么找不见近平？”

吕玉兰说：“是啊，咱们应该和他照几张相。”

我说：“他晚上肯定回来，咱们三个在我家吃饭吧。”

我回家就动手做了几个菜，还包了酸菜馅的饺子。我家房子很小，那时候老房子结构也不合理，客厅很狭窄，中间放一个桌子，再放上凳子，两边就过不去人了。近平回来后，我们三个人就挤挤巴巴地坐着吃了一顿晚饭，虽然环境不好，但是饭菜挺可口，聊得也很高兴。

近平离开正定6年之后的1991年，我已经任县委书记3年

1985 年 5 月 20 日，习近平（左三）赴福建省厦门市工作前与大家在三里屯乡机关大院合影。

了，那时我估计，1992年就要换届了，这样的话，我在正定也不会再待多长时间。那一年春节之前，我就跟我老伴说：“近平走这么长时间，咱们是不是邀请近平回来一趟？在家里招待他吃饭。”我老伴掌勺，我肯定得问问她同不同意。我老伴痛快地答应了。

腊月二十五六的样子，我往福建打了电话。我说：“近平，你在福建过年还是回北京过年？”他说：“玉廷，我今年回北京过年。”我说：“你走了好几年了，没回来过，你这次是不是回正定来看看？”他很痛快地回答说：“行！我回去看看大家，我也很想念同志们！”

大年初一的中午，近平和彭丽媛就到正定来了。我召集了四大班子的同志，还有一些离退休老干部，一起开了个座谈会。后来，我们还看了看正定在近平走后竣工的旅游景点，近平边走、边看、边聊，非常高兴。

那次，近平看望了卧病在床的吕玉兰同志，还到地区看望了老同志。大年初二，近平在市里又看望了一些老同志，照了不少合影。

有一段时间，过年时兴送挂历，近平每年过年就都给我寄挂历；后来又有一段时间时兴寄贺年卡，他又年年给我寄贺年卡。这么多年，他一直记着我，这也让我挺感动的。

2005年，近平还回到正定一趟。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市里住了，专门回到正定来见他。那天，我们见到了他，寒暄了很久。近平见到我们很高兴，还跟我老伴说：“嫂子，在正定的时

候，我可没少在你家吃饭啊。”我那时候心里很感慨：是啊，时间过得真快，20多年前的事，就像在昨天发生的一样。

现在，这一晃，又是10多年过去了。近平刚来正定时，不满29岁，还是一个血气方刚、朝气蓬勃的小伙子。他在正定工作了3年，他的真诚、务实、简朴，他一心为老百姓的情怀，他开拓进取的精神，勇于改革的气魄胆识，重情重义的人格魅力，科学的工作思路，高超的领导艺术，都深深扎根在我们全县干部群众心中，给正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为我们正定这30多年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近平离开正定这么多年，一直到今天，正定的老百姓一提起他，还和30多年前一样，称呼他“习书记”。他几次回正定，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农民，见到他都叫他“习书记”。干部记着他，老百姓记着他，在正定人民的心目中，他一直都是我们正定的县委书记，是永不卸任的县委书记。

『为自己考虑多了，就会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越来越远』

习书记对群众的感情很深，他经常说，我们共产党人天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必须和人民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联系群众是我们的本分，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这是我们搞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础。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采访对象：张五普，1941 年生。1982 年至 1985 年，先后任正定县西兆通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常委、纪检委书记，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2001 年退休。

采 访 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 年 2 月 24 日

采访地点：正定县张五普家中

采访组：张五普同志，您好！您和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见面，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请您讲讲当时的情况。

张五普：我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是1982年4月6日。那时候，我在西兆通公社当书记。头一天，县里通知我说："北京调到咱正定来一个新的副书记叫习近平，明天要到你们公社去听你汇报，了解情况，明天上午就到了。"我说："行，明天我到大门口等着。"

上午8点多一点儿，习书记就到公社了。我当时在大门口等着，他从西边过来，高高的个子，骑辆旧自行车，穿着一身旧军装，穿着旧帆布鞋。我一看，没错，这就是习近平，跟县里同志给我描述的完全一样。

我向他问好，说："习书记，欢迎你来！"

习书记微笑着跟我握手，说："你好！"

我说："你怎么自己一个人来？你认识道儿[①]啊？你自己来，恐怕是绕远了吧？"

他说："没绕远，这边人多，碰见人就打听道儿。"

我说："过那个大沙窝，你自行车可不好走。"

他说："那一段路，我是扛着自行车过来的。"

我说："习书记，你辛苦了。走吧，咱上公社里头去。"

进了公社，我跟习书记谈工作，汇报生产情况。聊着聊着，一上午时间就过去了。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领着他到公社门口

① 方言，路。

一个小饭店去吃饭。这个小饭店，是我们公社唯一的一个饭店，是供销社办的，卖一些馒头、炒饼、烧饼，还有简单的小菜，没有肉。说是饭店，其实就是个小吃部。

我领习书记往小饭店走的时候，他问我：“咱们上哪儿去？”

我说：“吃饭去。”

他说：“你们食堂在哪儿？”

我说：“在后边。”

他说：“出去吃饭，我可不去。”

我说：“咱们这食堂，条件不行，你来了，我们一点儿准备也没有。咱们就到门口小饭店去吃，也很简单。”

习书记说：“不行，不行，不行，我到你们食堂吃，咱们一边吃一边说话。”

我当时就有点儿着急了，因为我们公社的食堂特别简陋，伙食做得也不好。我们食堂有个炊事员，就是我们从农村找的一个农民，人干净利索，老实可靠，会做个家常饭菜，但手艺不行，蒸馒头要看运气，有时候硬得跟砖头一样。习书记既然这么坚持要到食堂吃，我没办法，就硬着头皮领着他到了公社食堂。不过，那天也算凑巧，蒸的馒头还可以，不是太硬。炊事员用棉花籽油炒了个白菜，午饭总共就吃了这些东西。

我们吃饭的“桌子”，是公社院里的一块水泥瓦，下面支着几块砖头。没有椅子，我们就蹲在那儿吃，一边吃一边喝白开水。

我很不好意思，对他说：“习书记，你是从首都北京来的，我这么招待你，太不像话了。”

习近平同志
给四机关领导的一封信

各位同事：

大家上任半年多了。人们还习惯称我们“新班子”。我体味。其中不无期盼之意。上上下下都希望我们有一个新作风。初任伊始。县委作出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提出反对官衙作风。注重调查研究。以每年三分之一时间深入基层而自律。由于实行不力。尚未成风气。现今全年工作已基本部署就绪。大量工作转向落实。我们要脱身冗务。着眼于基层。着力于实际。大家分包各线。联系乡镇。要多下去走一走。看一看。实实在在地调查研究一番。多一些真情实况。长一些真知灼见。更有效地指导工作。解决问题。

凡事务求贯彻。到基层调查。要一下到底。亲自摸情况。直接听反映。寻求“源头活水”。可以登门入户。四月份每人了解10个典型。除本人联系户外。顾及到两户一体、知识分子、老干部诸方面。调查可围绕各阶段中心工作和突出问题进行。失误不足。要求愿望。意见建议。都可列入调查范围。调查所得。要整理加工。形成自己的意见。直接告我。

深居简出。习之已久。愿能以此为开端。兴起调查研究之风。

祝

工作顺利

习　近　平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1984年3月28日、习近平写给四机关领导的一封信。

习书记说：“这挺好啊！还能吃到新鲜的白菜，我在陕北的时候，想吃口酸菜都很难呢！”

吃完饭，习书记说：“我把饭钱交了。”

我说：“习书记，这小事你就别管了。不占公家便宜，记我账上。”

习书记说：“这可不行，饭钱得交。”

馒头是4分钱一个，两个馒头是8分钱，炒白菜是1毛钱，一共1毛8分钱。习书记如数交了饭钱。

吃完午饭，我们就下到村里去调研。我俩骑自行车到了田边，当时的小麦长得还不到一尺高。社员们正在整地，准备播种棉花。

习书记看了看麦苗，说：“长得不错。”他又抓起一把土，说：“这个土真好，是典型的‘壤土地’。”

在植物学里，壤土地就是那种一半沙、一半黏，既透气、不板结，又不是太松散的土壤。我一看，习书记确实有农村工作经验，对土壤和农作物都很熟悉。

习书记对我说：“你们这个好地，夏季的生产一定要搞好。土质这么好，主要应该种粮食和棉花。争取创高产，绝对不能放松。”

我说：“你提得很好，我们一定认真落实。现在是一年种两茬粮食，上茬种小麦，六月收获，下茬种玉米，八月十五左右收获。棉花是一茬，在谷雨前后种，八月份收获。收完了棉花，又开始种冬小麦，头年种上，在地里过冬，第二年春天再长出来。”

习书记又问我：“河滩地你们现在利用得怎么样？”

我说："现在河滩地主要是种瓜、种菜，种点儿花生、豆类、黄黏米之类的小杂粮，但产量比较低，河滩地种这些东西总是长不好，所以老百姓不太重视。"

习书记说："还是要进一步重视，可别拿这不当回事儿。"

我说："对于河滩地，有的老百姓还真有这个想法，用我们正定话来说，就是'腊月三十拾个跑儿[①]——有它也过年，没它也过年'。意思就是不缺这一口，有和没有都无所谓。"

习书记说："可别这样。只要科学种植，请科研人员来指导，河滩地也能充分利用好。"

接下来，习书记还调研了我们社办企业的情况。我们公社有一家修配厂，小到修配农具，大到维修拖拉机，都可以搞，但经济效益一直不好。这个厂子的技术含量也不高，空气锤的气压经常维持不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个修配厂有时候也为外边代加工一些东西，但有一搭没一搭的，也不怎么拿这当回事，思想意识还没有转过来。

针对这种情况，习书记对我说："办乡镇企业，你们应该提高技术含量。你们离市区很近，可以到石家庄请技术人员过来指导，帮助你们提高技术。"

习书记把田间地头和企业都看了一遍，又回到公社听我汇报。我谈到以后整体的工作思路，说："以后，我们要'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十几名公社干部，下到各个村里面，每个村一两名干部。这些干部下去后'一把抓'，生产、计划生育什

① 方言，兔子。

么事情都要管。公社每个星期开会，大家碰碰头。回来以后再分家，各自按照分管的工作，再向县里汇报。”

习书记听了我的思路以后说：“这样不行，工作还是要分专业去抓。那些上岗好地，要想提高产量，你就要找懂农业的去专抓，创高产。那些河滩地，就要发展多种经营，让擅长这方面的同志去抓。公社要把企业管起来，管好，专门抓，专门研究企业经营的事。你们村里的修配厂，村里生产自来水管配件、小农具的企业，可以给城市做一些加工螺丝、钢筋的活儿，同时应该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他又重复那句话说：“千万别拿这些事不当事儿。”

我们村有个生产玛钢的小企业。玛钢属于特种钢，硬度很高，又很有韧性，生产这种产品，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在原料配比等方面需要比较高的技术。我们农村小厂，技术不够高，生产的玛钢有的过关，有的不过关。因为质量不行，这个企业也不怎么挣钱。

习书记了解了这个厂子的情况后，对我说：“你要向石家庄市学习。请市里玛钢厂的技术工人，来给你们指导技术欠缺的地方，严格你们的技术指标、参数测定，把技术水平搞上来，提高产品质量。”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这次调研中，给你们提出了不少建议。你们根据这些建议，具体做了哪些改进？取得什么样的效果？

张五普：我们按照习书记的建议，到市玛钢厂请了技术员，

果然立竿见影，我们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一下子就提高了。以前我们生产的玛钢，有时候脆，一砸就坏；有时候软，硬度不够。那个时候，玛钢很缺，房屋建筑用的暖气、自来水设施，都需要用玛钢。我们技术改进以后，质量提高了，产量也增加了，一个月能够生产一吨多玛钢配件，从那以后，企业的效益就越来越好了。

我们加强了专业化管理，依托石家庄，为城市服务，在搞小加工业的同时，为城市建设提供劳动力。那个时期，正好赶上石家庄发展城市建设，建筑需要的劳动力比较多，我们各村都组织壮劳力到石家庄去打工。但是我们农民到了城里，因为技术不行，当不上“把式”[①]，砌墙、瓦工等，大部分都干不了。一开始，就干技术含量低的活儿，边干边学，后来也出了“把式”，浇筑钢筋、砌砖、抹墙等等，这些活儿都可以干了。

在农业方面，我们根据习书记建议，到石家庄的农科所请了一些农技专家过来给我们指导科学种田。我们请来种子专家，帮助改良小麦、玉米、棉花品种；请来植物保护专家，帮助给农作物治病、治虫；还请来施肥专家指导合理施肥，让社员能够少花钱，提高产量。

最初，老百姓对这些专家还挺抵触，认为农民种了多少辈子地了，啥都懂，啥都会，城里人会啥？光看书本，到了村里，连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但事实并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这些专家确实在科学种田方面比我们懂得多，经过他们指导，粮食增产很

① 方言，技术工。

明显，比如小麦原来一亩地收五六百斤，后来增产到七八百斤。棉花由过去亩产六七十斤，经过改良以后，超过了一百斤。好多农民觉得弄不成的事，专家一来，都给弄成了。农作物有一种很常见的病叫立枯病，是由一种真菌引起的。如果日常没有管理好，水和肥跟不上去，农作物就容易得这种病。专家来了以后，诊断症状，合理施治，很快就让农作物康复了。从那以后，老百姓对科学种田算是彻底服劲儿了[①]。

我们原来在河滩地种西瓜，请了个瓜把式[②]，但他总是留一手，种瓜技术不教给我们。后来，我们就按照习书记说的，请市里农科所的西瓜专家来指导、培训瓜农。专家毫无保留地把技术教给我们，让农民掌握了种瓜技术。

那时候，一般的事情，我们自己能解决就不去麻烦习书记。可是有一件事，不给他说还真办不成。我们公社有两个村养了五六十头奶牛，号称“奶牛村”，但养牛的农民卖奶却是个难题。那时候村里没有机动车，老百姓骑着自行车，后边驮着桶，一直骑到石家庄送到奶粉厂。这一路不但累，耽误时间也太多。早上去，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回来。我说，这不行啊，太耽误时间，经济效益也不行。我就找到石家庄这个奶粉厂，跟他们商量，说：“你们能不能弄个收奶站？”他们说：“我们弄个收奶站，你们倒是方便了，可对我们又没什么好处。”因为这件事，我就去找习书记了，他跟石家庄市的贾然书记讲了这个事，由市

① 方言，服气。
② 方言，种瓜的行家。

里给这个奶粉厂做工作，后来就在村子里建了收奶站，奶粉厂每天用汽车把牛奶拉走，给村民卖奶带来极大方便。

我经常到县里找习书记，给他汇报公社的事，他每次见到我都非常热情。公社的发展越来越好，我经常给他写报告，他看了以后挺高兴。到了1982年底，我们公社的生产指标在全县排第一。习书记对我说："很好！你们就这样干。"他还嘱咐我说，咱们县里发展"半城郊型"经济，为城市服务，多种经营，供应城市，但是农业这一块也不能丢，同时还要发展好牧副业。习书记对正定"半城郊型"经济这个定位很准确，非常切合实际，这是他充分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在他的正确思路引导下，全县都发展得很好。

采访组：您从西兆通公社调到县上，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的工作作风是不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张五普：是的。1983年，我从公社调到县上工作，和习书记朝夕相处，接触机会更多了。在习书记身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都有充分体现，有很多方面都值得我好好学习。

习书记对群众的感情很深，他经常说，我们共产党人天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联系群众是我们的本分，必须和人民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这是我们搞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础。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一直艰苦朴素，夏天就穿个白衬衫，秋天就穿个旧军装，有时候穿一套蓝色中山装。跟他一起工作的3年时间，我没有见

他穿过新衣服。习书记白天的工作，往往是下乡了解情况，晚上就在办公室处理机关事务，接待群众来访。晚上10点以前，他都在忙公务。10点之后，他就开始拿起书本学习，一直学到12点。过了12点，他就洗洗衣服，洗完衣服再睡觉。习书记睡的是一个铺板和两个板凳架起来的简易床，铺板是用一块一块的小板拼成的，宽一米二三，长两米多，下面用两个板凳一架。

习书记的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书和文件。他博览群书，过目不忘，记忆力非常强。我到他办公室谈话，他有时会跟我谈起他学习的情况，谈到读书。他读了什么书，内容都记得很清楚。

习书记热爱学习，但他并不拘泥于书本。他很注重向实践学习，通过调查研究来获取更多的知识和经验。他和老农谈，和干部谈，平易近人，我从没见他发过脾气。他态度很温和，很有礼貌，说话很容易让人接受。同志们都非常愿意和他接触，跟他谈心。我们春夏秋冬，都在县委院里一个洋灰板上吃饭，吃饭时大伙有说有笑，经常和习书记开玩笑，他也和大家说说笑笑的，很高兴，很随和。

习书记时刻关心着党风廉政建设。他廉洁奉公的思想很牢固，工作也抓得很紧，他当县委书记不久，就出台了不少关于党风党纪方面的文件。我理了一下，他在1983年和1984年一共出台了11个文件。首先出台的是从县委常委会成员自身做起的《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针对性很强。习书记讲，打铁还需自身硬，先从县委领导班子做起。这个规定有六条。第一条是

总揽全局，抓大事。第二条是反对官衙作风，注重工作实效。第三条是搞好“一班人”团结，维护县委领导的统一。第四条是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第五条是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第六条是树立雄心壮志，为四化争先创优。这六条规定出来以后，大大振奋了全县人民的精神，振奋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县委常委都吃住在机关，昼夜工作，看文件，抓落实，广大干部也都一心一意比着干工作。

习书记还提议出台《关于整顿机关大院作风的安排意见》，提出实现党风好转，进入全省先进行列。他把党风廉政建设时刻挂在心上，可以说是天天想着。

我举个例子，就是关于刹住公款吃喝的问题。当时在全国还没有先例，正定搞的这项工作有开创性。如何刹住公款吃喝？习书记做出规定，机关干部、事业单位干部不准用公款吃喝，单位之间也不准互相宴请。执行一段时间以后，习书记发现了新问题：正定要改革开放、要招商引资，客商要来正定投资、置业，来了总是要吃饭的，怎么办？针对新问题，他提出：客商来了可以招待一顿饭，标准四菜一汤，上正定小吃，不准上高档菜，不准上烟酒。这样的规定执行了一段时间，习书记又发现了问题。人家客商来一两个人、两三个人，单位的陪客七八个、十来个。他认为这样不行，要解决。所以又做了补充规定，规定陪客人数不准多于来客人数。经过一段时间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正定在习书记的领导下，各项事业都有了长足发展，创造了很多好经验，这些经验通过媒体在全国得到传播，影响很大，全国各地来正定

取经学习的人很多。考察学习团少的有三五个人、十来个人，多的有二三十个人，这样一来，之前规定的陪客人数又不合适了。习书记又做出规定，陪客人数最多不能超过5个，一般两三个人。这项规定出来以后，再由纪检委认真检查各单位执行情况，招待工作就越来越规范了。

按照习书记的办法，公款吃喝的问题一抓就灵。老百姓也敢反映，真有干部不守规矩，老百姓肯定就反映上来了。那时候，包括县委常委会在内，批评和自我批评都很认真，敢于批评别人，也敢于批评自己。习书记反复强调，一定要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如果从改革角度讲，正像他现在说的，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现在习书记是党的总书记，他在中央抓党风廉政建设也是这样，不是抓一下子就完了，而是坚持不懈抓下去，严肃认真抓下去，"老虎苍蝇一起打"，这和他在正定的作风是一脉相承的。

采访组：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注重抓精神文明建设。请讲讲您了解的情况。

张五普：大力抓精神文明建设，是习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一以贯之的。从全国来说，这方面在当时是领风气之先的。当时好多人有片面认识，认为经济建设是中心，精神文明抓不抓不要紧；经济上去了，精神文明自然就好了。习书记不这么看，他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得很紧。

有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1984年春天，习书记提出搞一

场全县全民运动会，在正定一中操场举行。提出后，好多人不理解，认为体育运动多年不搞了，1958年以来全民体育运动就停了，学生运动会都很少开，现在搞经济建设，弄这个运动会干啥？没有多大必要。习书记不这样认为，他反复讲，我们必须“两个文明”一起抓，老百姓“钱袋子”要鼓起来，精神也要丰富起来，身体也要健康起来，让老百姓感到幸福，搞全民运动会这件事情意义重大。习书记说，咱总得有个开头，开始可能不太完善，也不会尽善尽美，没关系。咱们开个头，以后逐步搞，会越搞越好。

全县运动会如期在正定一中操场举行，有1300多人参加，当时我协助习书记做这项工作，石家庄地区体委还来了个同志出席，因为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习书记讲话，当时也没个主席台，就站着讲。他说，咱们这是第一次全县运动会，一定要开好，要“两个文明”一起抓，老百姓既要富起来，也要健康起来、幸福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好这个头，通过比赛达到促进团结、广交朋友的目的。要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对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非常重要，大家共同努力把这次运动会搞好。习书记讲话时间不长，讲得很好。

运动会一共有10个项目，包括田径、体操，还有健身、舞蹈这一类的。比赛中大家都挺高兴，跑步的、打篮球的、拔河的都有，习书记一看大家很高兴，他也很高兴，笑着说：“运动会促进团结，这很好。”

运动会上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小故事。拔河队长跑到习书记

姓名	李桂花		
性别	女	年龄	16
单位	河北巨中		
职务	学生		
主要事迹	八四年参加省少年田径运动会，获1500米和3000米跑冠军		

授予何种奖励	优秀运动员奖
批准人	刘树章印 习近平印
	1985年1月20日

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重视体育事业的发展，图为1985年1月颁发的“优秀运动员奖”。

跟前说："习书记，拔河不公平。"他问："怎么不公平了？"队长说："对方穿解放鞋，俺们穿着塑料底鞋打滑，不能算。"习书记笑着说："看这事儿，下回你不要穿塑料底鞋了。"大家说着笑着，很高兴。

那天的运动会确实开得很好。后来正定能够成为全国体育先进县，与习书记搞的这次全县运动会开了个好头有直接关系。大家一想起这件事，就觉得习书记有超前意识，这项工作抓得早、起步早，为我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从那以后，正定的群众体育活动就逐渐蓬勃开展起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平时是怎么接触普通群众的？

张五普：习书记对信访工作很重视。他待在办公室的时候，特别是晚上，都是开着门，群众可以随时找他谈事。群众的来信来访，他都认真对待，认真看材料，认真解决。

有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1984年夏天，正定籍在校大学生回来过暑假。之前大学生联名给习书记写信，要和他座谈正定县发展问题。家长知道了以后坚决反对，说："别胡闹，你们毛孩子能提出什么好建议？安生会儿吧！[①]全县都知道，习书记12点以前没睡过觉，你们这是在给习书记添乱。"

习书记收到大学生的联名信后，很快给他们回了信，邀请他们到县委常委会议室座谈。记得那个会是1984年8月5日开的。习书记跟大学生们坐在一起，一点架子也没有，说话很随和。他

① 方言，老老实实待着吧。

先向大家介绍了正定工农业发展、"两个文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等情况。大学生们听得都挺带劲儿。正定发展这么快、搞得这么好，上学的时候听说正定在习书记领导下搞得很好，今天一听确实如此。他们假期回来也感觉家乡变化很大，发展很好，都愿意回来工作，希望习书记支持。习书记说，你们回来，县里一定支持你们，各方面都支持你们。你们作为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毕业以后一定要服从国家分配，回正定来工作很好。国家分配你们到艰苦的地方去，你们也要服从国家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发光发热、健康成长，这样才是好学生，是新时代的好青年。

参加座谈的大学生都很高兴，纷纷表示一定服从分配，向习书记学习，到基层、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为国家发光发热。后来，那一届毕业生没有不服从国家分配的，都很愉快地到基层去，干得很好。

习书记工作那么忙，还抽出半天时间和大学生们座谈，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确实难得，令人感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向尊重和关心老干部，在正定同样如此。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故事。

张五普：习书记对老干部一直非常关心。他经常给我们讲："咱们一定要尊重老干部，重视老干部。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没有他们打天下，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他们的崇高思想境界、精神境界，咱们一生也学不完。"

习近平同志给河北农大正定籍同学的信

河北农大全体正定籍的同学们：

你们好！

玉兰同志曾同我谈过你们的情况。我作为在你们家乡任职的县委书记，过去对你们一直关心未及，深感抱谦，望得到谅解。

我想，当同学们课余饭后，晨明夜静之时，一定是非常挂念家乡的。这里我想高兴地向大家报告，今年以来，在党的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经过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经济建设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初步测算，今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可达一亿八千二百万元，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工业总产值可达八千七百五十五万元，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五点七。以同学们最关心也是联系最密切的农村而言，可以说是全面大发展。今年粮食亩产一千三百斤，总产可达四亿二千七百万斤，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十六；棉花予计亩产一百六十斤，总产可达二千二百四十万斤，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八十一点八；社队企业两级纯收入可达二千二百万元，增收百分之十一；社员家庭副业纯收入可达六千四百万元，增收百分之十二；全县分配总收入可达一亿七千三百万元，增长百分之四十二；社员人均收入（含集体分配和家庭副业）可达三百八十元，增长百分之二十五；上述各项指标均将创历史最好水平。目前，我县的经济工作已经逐步纳入商品生产的轨道。精神文

1983年，习近平写给河北农大全体正定籍学生的信（之一）。

明建设以及机构改革等其它各项工作都在顺利进展。可以说，依靠着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个政通人和、百业欣欣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

当然，我们的工作还有困难，有阻力，有缺陷，不可能尽随人意。特别是在农村，文化落后、科技落后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陈旧的小生产经营方式的束缚并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而要改变这一切，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大农业，靠什么？很关键的一条就是靠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就是靠掌握这些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虽然“科技热”的浪潮正在广大农村蓬勃兴起，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人才更不足啊！农村迫切需要农大学生，农大学生同样也离不开农村。可以说，家乡的四十多万父老乡亲都在翘首以待，盼望着你们早日以优异成绩成就学业，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挑梁扛柱，竭智尽才。

古人讲：“十年寒窗”，是为了金榜题名，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这一套陈腐的观念当然为我们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大学生所不齿，相信同学们都有着明确的学习目的，都有着奋发图强、献身四化的远大志向，一定是不会辜负这“黄金时代”的宝贵时光的。

祝同学们学业顺利！

你们的同志　习近平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之二）

当时，正定县有几个1938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叫作“三八式”干部。习书记对这些老同志评价很高，他说：“这些老同志，咱们比得了人家吗？咱们一辈子都要向人家学习。日本鬼子大举侵略中国，这些老同志在那个时候参加共产党，反抗日本侵略者，为中华民族求解放出生入死。他们入党干革命，是九死一生，这能是为当官发财吗？他们这种无私为人民的精神，咱们应该用一生来学习。”

正定原来有一个县委副书记，叫宋联捷，就是一位“三八式”干部，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地方武装。习书记经常到家里去看望他，对他说：“你有啥事，就尽管跟我说。如果你要上石家庄看病，咱们有一辆吉普车，优先给你用。”宋联捷当时已经70多岁了，家住得比较远，习书记就把他的家搬到县委门口的马路南边，方便县委的同志们照顾他。宋联捷一直非常感激习书记，对习书记评价很高。他说：“像习近平这样，革命的好后生，人民的好干部，难找！”

习书记离开正定以后，宋联捷有一次生病，住在石家庄第四医院。我们县委的同志每次去病房看他，他都说：“每次你们一来，我就回想起习书记对我的照顾，我真感谢习书记，真想习书记啊！”

习书记在正定工作3年多，正定的各项工作全面进步，达到了1947年解放以来的最高峰。全县老百姓对习书记的工作成绩非常认可，这是很了不起的事。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领导编写的《正定古今》这本书，您也参与了吗？他为什么要编写这本书？编写的过程是怎样的？

张五普：这本书编写之初我并没有参与，我是后期参与的。

关于正定的历史书籍，习书记都认真地读。他经常说，正定在历史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值得发扬光大。1984年3月，习书记提议我们编一本涵盖正定古代、近代、现代各阶段历史的普及读物。他提议，编这本书，是出于这样几点考虑：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要贯彻中央精神，实事求是地对历史有个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定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认真地加以总结，对统一干部群众思想很有好处。第二，正定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历史上有很多名人，也有很多历史文物，我们以史为鉴，可以对正定有更深入的了解，可以让读者有很多收获。

县委常委会开会研究以后，同意从办公室抽调几个人来做这个事。书稿完成以后，反复进行了几次修改，习书记都参与了，每一次修改他都提出意见，并且邀请正定文化界知名人士给这本书提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反复修改。

习书记用了很大精力组织编写这本书，编得很细致、很全面，一直到他离开正定去福建工作的时候，这本书还没编完。到了1987年，我又组织人再次进行修改，之后把书稿寄到厦门去，他又对书稿进行第三次修改。改完之后，他给这本书写了个序。到了1987年5月，他改完的书稿送回正定，我们按照这个最终稿正式出版。

读了习书记为这本书写的序，我感触非常深，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在序中，他第一句话就写道“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以前他在正定多次提到，“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这句话见诸文字还是第一次。接着他写道：“我爱自己的故乡，更想了解这里的一切，《正定古今》的出版，使我如愿以偿。”他的话说得很动情、很真切，只有对正定、对正定人民有深厚感情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在他心目中，正定人民是可爱的人民，他们自强不息，勇敢奋斗，百折不挠，可歌可泣。他对正定人民的深情比海还深。我读了这些文字以后，感受到习书记的心在为正定激动，他对正定寄予殷切期望。他写道：“正定，有一个值得自豪的历史。正定，将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正定古今》的书名也是习书记定的。我们当时有三个备选书名让他选择，一个是“正定古今”，一个是“三国雄镇”，还有一个是“北方重镇”，他选择了第一个，这个名字也确实是最朴实、最合适的，让人一看就懂。我找到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黄绮，请他题写书名。黄绮曾是习书记聘请的顾问。他一听，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他说：“既然是习书记交代的事，我赶紧写！”

《正定古今》封面的三幅画也是习书记审定的。上面一幅是大佛寺大悲阁的大佛、观世音菩萨画像；底下两幅，一幅是正定地图，一幅是正定工业发展图，预示着正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前进，发展得更快更好。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以后，他和正定以及您本人还有哪些联系？

张五普：习书记离开正定以后，长期关心编写《正定古今》的事情，对正定一直念念不忘。他走了以后还经常在不同场合讲到正定。我印象中，他有一次在河南看小麦的时候讲到了正定，还有一次在北戴河开会时也提到了正定。

他离开正定以后，同在正定共事过的很多同志都一直保持着联系。我跟他也一直有联系，他给我寄过书，寄过贺年卡，还寄过鼓浪屿风光的明信片。2004年春节，他还给我寄来了一本他的著作《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考》。这本书内容很扎实，写作风格也很好，对理论有深入探讨和认识，而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和当前实际联系很密切。我读了这本书，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受到很大启发。我深深感到，习书记真正是继承和发展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优良思想、优良作风。

『他说话做事做人都踏踏实实、诚诚恳恳』

他讲话不是很多，不像有些人那样滔滔不绝、长篇大论、侃侃而谈、慷慨激昂。反而，他讲话的特点是很实在，把事实讲得很透彻，把道理说到点子上，有啥说啥，不喊口号，不说套话。他说话，就如同他做事、做人一样，不摆花架子，不搞虚的东西，踏踏实实、诚诚恳恳。

采访对象：江山，1946 年生，江苏武进人。新华社高级记者，河北省作协会员。1974 年与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的吕玉兰同志结婚。2006 年退休。

采 访 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 年 3 月 24 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江山同志，您好！您的爱人吕玉兰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来的优秀领导干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她和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县委班子共事。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吕玉兰同志。

江山：好的。我的爱人吕玉兰是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下堡寺镇东留善固村人，1940年出生。1955年高小毕业的时候，她面临很多选择，可以到城里当工人或继续上学。当时，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回乡务农。她响应毛主席号召回到家乡，立志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东留善固村风沙很大，她带领群众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治理了村北上千亩沙荒地，还到家家户户宣传农业合作化道路。由于工作努力，成绩突出，她很快就成了群众心目中的好带头人，担任了村里的“新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年仅15岁的吕玉兰，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农村合作社社长。

吕玉兰1958年入党，1960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1966年6月，她在《河北日报》头版发表人生体会文章《十个为什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都转载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年，她受邀到北京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还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1969年，她当选中共中央委员，1970年任临西县委书记，提出著名的“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口号，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随后在全国推广。1971年，她任河北省委副书记，1974年兼任河北省农委副主任，1977年任河北省

委书记（当时省委设有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81年9月任正定县委副书记。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您第一次听吕玉兰同志聊起习近平同志是什么时候?

江山：1982年3月，习近平同志到正定来工作，和吕玉兰在一个县委班子。那个时候，我们的家在石家庄，吕玉兰因为工作忙，路途稍远，只有周末才回家。我的工作单位离家近一些，就由我负责在家带两个孩子。她每次回家来，我们都会聊一聊工作上的事。

有一天，她对我说："北京调来了一位同志，到正定县委任副书记，是习仲勋同志的儿子，叫习近平。"

我就说："哦！习仲勋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儿子干得怎么样？"

吕玉兰说："小伙子来的时间还不长，不过大家都发现他挺能干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曾在纪念吕玉兰同志的文章《高风昭日月　亮节启后人》中写道："我在正定与玉兰同志一起工作了3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姐弟情谊。"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吕玉兰同志是否经常跟您谈起他?

江山：是的。他们一起工作的时间长了，特别是习近平同志担任县委书记以后，吕玉兰回到家就常常跟我谈起来。我记得她

曾经说过："习近平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非常有文化，工作能力强，不但年轻，而且特别能干，大家对他的印象都很好。"

吕玉兰跟我谈到的她对习近平同志的印象，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习近平同志出身高干家庭，又是从中央机关下来的，却对农村基层工作很熟悉，对老百姓的感情非常深。他经常深入群众，特别关心群众的生活。

来到正定以后，习近平同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询问、调查、走访，想办法了解正定的群众生活怎么样、老百姓的收入怎么样。在这方面，吕玉兰给他介绍了一些当时的情况，她对习近平同志说："正定是粮食高产县，也是中国北方第一个粮食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县，但是群众的生活还不富裕，主要是粮食征购任务太重了。甚至，有的农民完不成征购任务，只好拿着钱去别的村买粮食，回来交征购粮，农民的口粮普遍不够吃。"

其实，习近平同志到正定来之前，吕玉兰就发现这个问题了，也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比较保守，难以摆脱追求"政绩"的思想束缚，减征购的事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习近平同志到正定以后，开始大力抓这个问题，最终减了征购，让老百姓减轻了征购负担，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第二个方面，习近平同志很有远见，也很有魄力，他为正定的经济发展出了很多好点子。举个例子来说吧。当时要拍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他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在北京多方了解这件事

1985 年 5 月，习近平（前排右二）与 3 名劳动模范和 3 名结对帮扶户在正定县委办公楼前合影。前排右一为吕玉兰。

情，努力寻求制片方的合作，计划把电视剧外景地争取到正定来，按照《红楼梦》的布景盖房子，并在电视剧拍摄结束后，给正定增加一个旅游景点。习近平同志在北京把意向和制片方谈得差不多了，回到正定就征求大家的意见。

当时，县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办，我们正定县本身就是文化古城，增加一个景点，就增加一个正定的旅游项目，确实对拉动经济大有益处；另一种意见是认为这件事不能办，一个项目就要花三百多万，这可不得了，风险太大了，万一收不回投资，县里担不起这个责任，况且当时县里也没有那么多钱，还需要募集资金。

县委领导班子对这个荣国府项目的争议很大。习近平同志跟吕玉兰交换过意见，当时吕玉兰全力支持他。吕玉兰经常到北京和省里开会和参加活动，眼界比较开阔，她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应该放手去搞。

有一次回家，吕玉兰跟我聊起这件事，说起县里面的不同意见，我感到很奇怪，说："习近平考察得这么周密了，他的意见还有人反对？"

吕玉兰说："唉，这你还不知道？正定有些干部思想保守，想法一时半会儿很难扭过来。得想办法给他们做一下思想工作，无论如何，正定还是要引进项目才能致富。"

后来，习近平同志多方筹措资金，做通了大家的思想工作，荣国府项目顺利搞起来了。开放第一年就收回大部分投资，还给正定旅游增加了一千多万的收入。如果算大账的话，荣国府项目

在第一年就赚了两倍还不止，而且从那以后，每年都给正定县带来巨大效益，直到今天还在大量接待游客、创造利润。这真是一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项目。

第三个方面，习近平同志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对自己严格要求。吕玉兰对我讲，习近平同志的家在北京，人在正定工作，到北京开会、办公事，他每年都要来回往返五六趟，但他一趟车费都没有报销过，都是自己拿钱买车票。吕玉兰曾经劝他说："你回家探亲的路费可以不报销，但你到北京办事和开会的路费还是应该报销的。"习近平同志说："我到北京办事和开会也会回家，这样是分不清楚的，我就都不报销了。"

习近平同志一贯很简朴，对吃穿都不讲究。他下去调研或者开会，经常赶不上机关食堂的饭点。有时候忙起来工作忘记吃饭，等忙完了赶到食堂却没饭了。那时候，经济不发达，街上没有饭店，他就只能凑合吃一些食堂剩下的凉馒头和咸菜。吕玉兰很关心习近平同志，常从家里拿些鸡蛋、挂面、点心送给他吃。

她还劝习近平同志说："你长期这样不行啊，早晚会吃坏肠胃的。"

习近平同志却毫不在乎地说："没事！"

由于长期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还总吃凉饭，习近平同志后来吃坏了肠胃，住进了医院。吕玉兰看不下去了，就找食堂的负责人商量，每次过了饭点以后，还是要留一个人，等习近平同志来了，给他热热饭，让他吃口热饭。吕玉兰很关心习近平同志，确实就像姐姐一样照顾他，还帮他洗被子、洗床单。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追忆文章中写道：“玉兰同志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也使我永远难忘。”“我到石家庄出差开会，还常在她家里吃饭。”您能说说他到您家做客的故事吗？

江山：习近平同志先后到我们家里来过几次。

他第一次到我们家来，是1982年夏天。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是一个礼拜天，他穿着一件很普通的衣服，在我家和我们聊了一会儿，主要是聊正定的情况，了解一些当地的事情。吕玉兰年纪比他大一些，又在这个地区工作了多年，对情况比较熟悉。她跟习近平同志谈了很多，此外也给他介绍了全国农业先进地区的情况，什么地方有什么好经验、好典型、好做法等等。吕玉兰讲了一个多小时，习近平同志很认真地听，还拿着笔记本做记录。我当时就觉得他工作特别认真，还善于听取别人的想法和意见。

后来，有一年秋天，习近平同志刚从美国考察回来，就到我家中来看望吕玉兰。他给我们讲了很多美国的见闻。

他还说：“玉兰，你的名气可大了，在美国都有名了！”

吕玉兰不懂，问：“我在美国怎么有名了？”

习近平同志笑笑说：“我们到美国的图书馆去参观，看到了很多中国的报纸杂志，我还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你的报道。”

原来，美国一向很注重收集和储存中国的资料，他们的图书馆和高校，都订阅了大量的中国报纸和杂志。吕玉兰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刊物上都有多次报道。恰好，习近平同志访美

1985 年，习近平（右四）到美国艾奥瓦州马斯卡廷市访问，在一个家庭农场受到热情欢迎。

期间，在图书馆看到了关于吕玉兰的文章。所以他回来就对吕玉兰说："你的资料，美国都掌握着呢。"

还有一次是吕玉兰在河北农大学习期间，习近平来我家看望过她。1982年9月，吕玉兰听说农大面向工农干部和劳动模范招生，决定去旁听，旁听生可以参加考试，学校也给打分，区别只是最后颁发的是结业证，不是正式的毕业证。习近平和其他同志当时考虑到她的身体不太好，年龄又偏大，家务负担也比较重，都劝她不要去了。但她决心已定，说："社会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我们没有科学文化知识，怎么能干好工作呢？"她还说："我只要能在那里学习就行了，不在乎有没有毕业证。"

习近平和其他同志拗不过她，只好同意了。正定这边的工作，她也没有完全放下。后来，她基本上是在农大学习半年，在正定工作半年，不是完全脱产。这期间，习近平同志来我们家看望她，她谈了自己在农大学习的情况。

大概是1983年4月，吕玉兰到习近平同志的家里做过客，还有幸见到了习仲勋同志。她回来后很高兴地向我描述："我们这次到北京去出差，近平还领着我到他家去做客了，我还见到习老。"我说："你见到了习老，那好啊！习老跟你都聊什么了？"

玉兰说："习老很随和，他对我说：'玉兰同志，你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了。你干得非常好。'"

玉兰还说，习老对她非常热情，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还问了很多家庭、工作的情况。

1993年，习近平同志带着彭丽媛老师到我家看望吕玉兰，

时任福建省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左二）偕夫人彭丽媛在石家庄看望病中的吕玉兰并与她全家合影。

是程宝怀同志陪同来的。那个时候，玉兰已经病得很重了，她是坐在沙发上迎接的习近平同志。进门以后，习近平同志首先跟玉兰说：“玉兰，我因为忙，一直也没能抽出时间来看望你，这次特意从福建来看你们。”玉兰因为病得很严重，说话也说不清楚了。她很高兴，但只能简单地说几个字：“好！好！欢迎！欢迎！”

好多年不见了，我们唠的时间比较长。我给习近平同志讲了玉兰得病的起因：大概两年前，玉兰坐车到邢台某县农村去视察工作，她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后排坐着《河北日报》的两位记者。上午去的时候，路况还很好，但下午返回的时候，那条路上挖了一个水沟，司机开得挺快，没有发现那个水沟，车的前轮一下掉进水沟里去，然后又重重地弹起来。玉兰的头部一下就撞在挡风玻璃上，这一下非常重，把玻璃都撞碎了。玉兰当时就因为脑震荡昏迷了十几分钟。后来，我们到河北二院去给她做CT检查，当时没有查出脑子有什么损伤。但医生跟我说，CT查不出来，不代表完全没问题。不幸的是，事情被医生言中了。玉兰脑部过了不久就出现了问题，开始持续头痛，无法忍受。我们带她到省医院检查和治疗，但当时省医院医疗水平不够高，一时无法确诊是出现了脑血栓还是脑溢血，耽误了整整一晚上没有抢救，第二天早上，玉兰就倒下了。从那以后，玉兰就一直卧床不起。

我给习近平同志汇报玉兰得病的前因后果时，他的表情非常凝重，为玉兰的病担心。程宝怀同志说：“唉，这几年，为了照顾玉兰，江山同志可是费了心了，很不容易呀。”

照顾妻子是我的分内之事。我说："这是应该做的！现在就盼着玉兰早点儿好起来。"

我们都坐在沙发上，习近平同志十分关心玉兰，想跟玉兰多说几句话，还向她介绍了彭丽媛老师。他说："玉兰同志，我们是特意来看你的，这位是我的爱人——彭丽媛同志。"玉兰当时口齿已经不太清楚了，只能简单地说："知道，谢谢，谢谢。"

玉兰去世以后，我给习近平同志打电话，告诉他这个不幸的消息。他吃了一惊："玉兰同志是怎么去世的？前一段时间，我去看你们，她情况还可以呀。"

我说："确实她这段时间恢复得不错了，这次我们带她到医院输液，她还是自己开门下的车。但到了医院，当天晚上就突发脑血栓，没抢救过来。"

他听后长叹一声："唉！可惜了，太可惜了。"后来，他还在纪念吕玉兰的那篇文章里写了这样一句话："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痛心伤永逝，挥泪忆深情。"这句话一方面肯定了吕玉兰这一生为人民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写出了他对吕玉兰的深深怀念之情。

采访组：您跟习近平同志也很熟悉，请您谈一谈您本人与他的交往和联系的故事。

江山：好的。吕玉兰跟习近平同志是好同事、好朋友，所以这么多年，我跟习近平同志也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吕玉兰去世后，我就开始采访、收集资料，撰写她的传记。

我把这件事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了。他在电话上说："好，太好了！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吕玉兰同志是很优秀的劳动模范，也是我们党非常优秀的领导干部，你一定要好好写一写。"

我整理吕玉兰的书信时，发现1983年她在农大学习期间，习近平同志给她写过信。信里面大致的内容是：玉兰同志，你在农大上学，学习顺利不顺利？最近正定的工作一直比较忙，我也没有抽出时间给你汇报，你有什么事需要办，你就说话。

在信的后半部分，习近平同志把县里当时正在做的工作简单讲了讲。这封信写得很诚恳，既有交流的意思，也有问候的意思。

写完吕玉兰的传记以后，我把打印稿给习近平同志寄过去一份。他看完以后，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江山同志，你的书稿我看了，总的感觉很好，关于正定那一段也写得很好，我没有什么改动，同意出版。"书出版以后，我又专门给近平同志寄过去两本，给他留作纪念。

我是2006年退休的。退休前，我和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上没有什么交集，反而在退休以后，却和他有了工作上的联系。当时，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我退休后开始搞"红色旅游网"，需要找他做一个"红色旅游"主题的采访。我写好采访提纲，交给他的秘书，很快他就答应了采访。我在杭州采访了他整整一个上午。习近平同志透彻地谈了浙江省如何认识红色旅游，如何领导、推动红色旅游的深入发展，谈得非常好。后来，新华社内参采用了这篇采访稿。很多年过去了，现在这篇采访稿的内容很多网站也有了转载。

在这几十年的交往中，习近平同志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正定，乃至后来对我们国家所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我就不多说了。我采访过习近平同志，也采访过很多领导同志，我就从一名记者的角度谈一谈他的特点：他讲话不是很多，不像有些人那样滔滔不绝、长篇大论、侃侃而谈、慷慨激昂。反而，他讲话的特点是很实在，把事实讲得很透彻，把道理说到点子上，有啥说啥，不喊口号，不说套话。他说话，就如同他做事、做人一样，不摆花架子，不搞虚的东西，踏踏实实、诚诚恳恳。

『习近平同志当县委书记时就被认为是栋梁之材』

现在大家常说：习近平同志当县委书记时就被认为是栋梁之材。这个栋梁之材，在当时可是得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和中组部认可的。

采访对象：何载，1919年生于甘肃成县，祖籍陕西宝鸡，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办公室主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室秘书，中办秘书室副主任、主任，中南海党总支书记。1979年起，任中组部干审局局长、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2015年经中央批准享受正部级待遇。

采 访 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3月21日

采访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何载家中

采访组：何老，您好！您曾任中组部秘书长，考察地方干部是您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年，您曾到河北正定考察习近平同志的工作情况，请您讲讲当时考察他留下的印象。

何载：我1982年去河北省的主要目的，不是考察地方干部，而是作为中央几家部门临时组建的工作组组长，驻石家庄调查处理“肥乡事件”，前前后后大约有半年时间。

这期间，有省委的同志对我说，有个大学生、干部子弟习近平，在正定当县委书记，干得不错，干部和群众反响很好。

我以前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间，习仲勋同志是我的上级领导，我对他的优良工作作风了解得比较多，但对习近平同志并不了解。习近平同志是否真像省委同志所说的那样“干得不错”，干部和群众是不是真的对他满意，我作为中组部的干部，觉得可以抽时间去实地了解一下。

正定县距石家庄比较近，我抽时间就去了，而且去了不止一次。结果，这几次赴正定的考察，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因为我是做干部工作的，对干部和人才的事很敏感，习近平同志打动我的，首先是他在正定县实施的人才战略，是他大念“人才经”，大力推动人才建设。用他自己的话说，福建念“山海经”，青海念“草木经”，我们正定可以念“人才经”。人才战略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以内用、外招、上请、下挖、近补、远育等多种形式，打开人才开发工作的新局面。

我当时对他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做了调查：他先后调整了220个基层领导班子，提拔了570名优秀青年充实基层领导岗位；还把160名专家学者型干部充实到县里各级班子，很多有专长的干部在他任职期间得到了提拔。

他还大力支持和鼓励民间办学，当年正定县民间办了32所学校，涉及的培训项目有无线电、钟表、建材、缝纫、木工、美术等多种专业。他还组织了电大、函大、刊大，仅在他任职期间，就有多达760人参加这些高等教育课程。此外，习近平同志还选派了20名优秀人才到西北大学深造，培养人才后备力量。

作为县委书记，他为了招揽人才，采取了很多特殊办法，其中有些办法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少有的、很少能做到的。比如，他在县里设立了招贤馆、人才楼、人才技术开发公司，用专门机构来管理人才，给人才提供强大的硬件支持。

在当时那个思想比较保守和“左”的流毒仍然严重的年代，习近平同志大胆使用了很多当时社会上有非议或不认可的人才。比如，有些家庭成分高的、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才，还有很多社会关系复杂的、以前犯过错误没人敢用的人才，他看准了就大胆使用。即使是那些犯过错误的人，只要改正了，他就给人家机会，给他们发挥作用的空间。事实证明，这些不同背景的人才表现都不错，后来都不同程度地为正定发展作出了贡献。

习近平同志“上请”人才，也花了大力气，他自己执笔给全国的知名专家、学者写了100多封信，有些信我在调查过程中看到了，写得很诚恳。比如有一封给学者的信中写道：

建设日报
JIANSHE RIBAO
《闽浙赣统一战线文选》《闽浙赣教育文选》分别出版
一颗诚心，引来八方人才
——记正定县县委书记习近平
习近平和他的“人才经”
学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发展大好形势
正定县为发展“两户一体”大力发展商品生产
正确对待先富裕起来的农民
柳暗花明
——记河北正定县由“亏损县”到“富产富县”的变迁
观象台

《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建设日报》等报道了习近平和他的“人才经”及由此带来的正定发展。

“我们地处基层，人才短缺，科技落后，视野狭窄，孤陋寡闻，起步之难您是可以想见的……经过慎重考虑，我想求助于您……聘请您为我县顾问。我想，您一定不会拒绝正定县委、县政府及全县45万人民的一片诚挚之心的。”

很多专家学者被习近平同志的诚意所打动，欣然前往正定担任顾问，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做工作。这些专家当中，有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教育学家潘承孝、食品专家杜子端等人。其中，华罗庚和于光远两位先生我在正定都见过。习近平同志作为一个县委书记，能把这样的大专家请到正定来，为正定发展出谋划策、贡献力量，是非常不简单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的“人才经”，确实给正定发展带来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您如何看待他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作为?

何载：习近平同志主政正定期间，为搞活经济、发展生产采取了两大政策。

首先是确立正定县的定位。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与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讨论请教，把正定的经济模式定位为“半城郊型”经济，这里既有城市的味道，也有农村的味道。因此，不能光打粮食，也不能只搞城市经济，而是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针对石家庄等大城市的需求，习近平同志总结了这样一个二十字方针：“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当时中国北方，相对于南方，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对

于商品经济的认识也没有南方那么开放，甚至还有很多人反对搞商品经济，认为它是洪水猛兽，放开搞活会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弄垮了。那个时候，中央对沿海开放城市以外的地区发展商品经济还没做出明确决定。但是习近平同志已经先行一步，他所总结的二十字方针，完全就是根据商品经济规律提出来的：城市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生产什么，不能盲目生产。

其次是全面规划发展商品经济。正定这座古城，与石家庄、唐山、北京等城市在地理位置上，正好形成一个北斗七星的模样。习近平同志认为，正定不仅仅要依托石家庄，而且要使正定的农、工、商为包括正定在内的七座城市服务，紧紧跟上大城市的供应需求。这样，生产就得讲科学。在普及科学生产方面，很多具体事情他都亲自抓。我在正定调查期间，正好遇到他亲自监督整改农村“猪圈连茅厕”，把猪圈和厕所隔离开，使养殖更加科学和卫生。那正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习近平同志穿着军大衣，走村串户去督促检查。

关于城乡关系，习近平同志提出四条原则，就是：农村要为城市服务，城市要带动农村；农村要供应城市，城市要帮助农村；农村要支援城市，城市要发展农村；农村要依托城市，但是不能完全依靠城市，也不能把农村完全拴到城市上。

为了让正定的副食品供应大城市，他没少去推销。那个时候，北京严格限制外地汽车进京，也不让农民随便进城卖东西。他跑了不少地方，促成一些单位与正定形成长期的供应合作关系，正定的货车也由此取得了进京证。这样，正定的猪肉、鸡

蛋、生鸡、水果等等，就可以直接用卡车拉进北京，带动了正定农副业发展。

习近平同志当时其他很多思路、举措和具体做的事情，我是通过调查和了解得知的，而上述这两件事情，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采访组：何老，据我们了解，习近平同志在正定非常注意抓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您对他的考察也一定包括这些方面吧?

何载：考察干部当然是全面的。习近平同志作为县委书记，对正定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端正作风教育一直紧紧抓在手上。为了规范正定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他提出六项规定，要求干部必须遵守。这就是：总揽全局，抓大事；反对官衙作风，注重工作实效；搞好“一班人”团结，维护县委领导的统一；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树立雄心壮志，为四化争先创优。

习近平同志在1984年1月召开的正定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各位同志都应当有敢于创新、开拓前进的劲头，以虎虎生气在思想、作风等方面给群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他还提出注意正确处理六个方面的关系，就是：当前和长远的关系，优势和劣势的关系，积极性和科学性的关系，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关系，内涵与外延的关系，生产与服务的关系。

1982年到1984年，正定的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农民的人均收入由148元增长到400多元，也翻了一番多。在他的努

力下，正定由一个“高产穷县”发展成了全面发展的先进县。

经过3年多努力，在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的时候，正定县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贫困问题相对得到解决，全县有了一股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干部群众都觉得有奔头、有信心、有希望。

采访组：您很关注青年干部的锻炼、成长，曾多次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汇报干部工作情况和工作建议，其中也曾提到过习近平同志，请您回顾一下这些信的内容。

何载：去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书《我的八十年：难忘岁月》，收入了我给中央领导同志写的一些信。今天我稍微展开讲一下。

1982年12月28日，我给胡耀邦同志写的那封信，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中央为干部‘四化’特别是‘知识化’采取了重大措施，已为广大干部称道，但直接提拔仍只能限于极少数，只有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干预才有可能。”

我给胡耀邦同志举了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我举的就是习近平同志。我写道，他“今年春天被派到河北省正定县当县委副书记。经过半年多工作，由于能吃苦耐劳，深入群众，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不但获得干部和群众的赞扬，组织部门还准备考察其表现，适时给予再提拔”。

“他们半年以前还在机关默默无闻，刚下去时又有争议，但

仅仅多半年，引起了强烈反响，特别是一些曾对知识分子有偏见或有不满的同志迅即改变了看法，认为是‘好苗子’、‘信得过’、‘放得下心了’。”

“据调查，全国1700万干部，有大学程度的284万，约占16.7%，其中以上海、天津比例最大，分别为27%、25%，新疆、云南最少（均为10%）。如果能抽2%的人下去，有56800人，将是一支强大的后备力量。”“我们要较快度过青黄不接的局面，不但需要长远规划，也需要这种‘投资’和‘基本建设’。”

两天以后，胡耀邦同志就批示了这封信，并抄送几位领导同志：“大专院校刚刚毕业的学生使用、锻炼问题和提拔知识分子的问题，具体怎么样配备，怎么样提拔，应该系统地研究一下。”“请你们研究清楚以后，提出一个大致可行的政策，不要把事情设计得太繁琐、太死，而要提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由此可见胡耀邦同志对此事的重视。我没有想到，我写给胡耀邦同志的这封信，经过他批示，就形成了中央的一个文件。

1983年2月5日，我又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一些工作。“春节期间，我到河北省邢台和石家庄住了几天，接触了一些群众和干部，亲身感受到党的政策所发挥的巨大威力。大家说‘翻身多亏毛主席，致富要靠邓小平’，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干部问题，要向你反映。”

我向胡耀邦同志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三个是这样的：我们党在培养使用年轻干部问题上采取的“‘扶上马，走一程’的做法，开头很好，但时间不宜太长，应以班子基本就绪为限。”“例

如正定县县委书记习近平等年轻干部都是省、市、区认定的‘好苗子’、‘信得过的优秀干部’。一些同志建议，对他们应放手使用。他们虽是大学生出身，但都各在基层摔打了七八年，夯实了群众工作的基本功，都能埋头苦干，忠党爱国，勤于学习，善于团结干部。有些同志反映，他们虽被扶上了马，但缰绳还没给他们。”

第二天，胡耀邦同志就对这封信作出了批示并抄送几位老同志，认为“建议很有见地，请考虑如何成为全党的观念”。这个评价很高了。

后来，我又给胡耀邦同志写了第三封信，这是一次汇报会的简报，而这个汇报会则源于胡耀邦同志对中组部的一个指示：“你们这些人没工夫下去，可以请一些县委书记来组织部汇报，打通上下级的联系。”

1984年9月22日，中组部根据胡耀邦同志指示召开了一个汇报会。我是中组部秘书长，汇报会的具体工作由我来做。我找了十多个县委书记到中组部来汇报，河北一次就来了四个。

汇报当中，其他的县委书记谈得比较常规：是怎么做的，怎么发展的，优缺点是什么，还有自我批评等内容。习近平同志的汇报则与别人明显不同，他在谈正定县的发展思路时，体现出的是一种大局观，一种深远的战略眼光。他从一个小县城的发展，谈到中国的人才战略、资源战略，包括对未来的展望——人口不断增加、自然资源越来越少等问题，这些都是国家兴亡的关键。而且，他还谈到，北方传统农业地区，要重点促进农工商的协

调发展，因为“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活”，只有三者并举，均衡发展，才能全方位适应发展的需求。再一个，习近平同志还提到了地区发展要有长远规划，提到了工业与农业的结合，提到了要有“工农联盟”的思想等等，他所谈到的这些问题，让与会人员有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家明显感觉到，这个年轻人思路很清晰，很有创造力，很有思想。

散会以后，我和尉健行副部长交换意见，我说：“习近平这个人不简单，一个县委书记，居然有这么长远的战略眼光，这可是一个栋梁之材！”

尉健行同志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说：“那你就写个简报吧。”

我在给胡耀邦同志的简报中写道：“我们召集了十多个县委书记，大家都谈得比较具体，特别是其中有一个讲得很好，有战略眼光，有‘工农联盟’的思想。我们感觉到他是个栋梁之材。”胡耀邦看了简报之后，在“栋梁之材”下面画了三条横线，这是胡耀邦同志的秘书后来向我透露的。

现在大家常说：习近平同志当县委书记时就被认为是栋梁之材。这个栋梁之材，在当时可是得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和中组部认可的。

后来，中央决定把习近平同志调到福建厦门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去锻炼。临行那天，我送他上飞机。在机场，我作为中组部的同志，和他谈了话，希望他到了福建厦门，要多注意调查研究，工作要扎实，等等。

习近平同志说：“感谢组织的信任和培养。”

我说："这主要还是靠你自己的努力，组织上只是给你创造工作的条件。"

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我也去看过他。后来，他调到宁德以后，我和福建的两个同志也一起去看过他。

采访组：请您就当时的考察和这么多年对习近平同志的了解，谈一谈他的工作特点、工作方法，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素质和品格。

何载：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勤学加实干。我去过正定好几次，每次去他办公室，都看到桌子上摆着大量书籍、报刊，有马列主义著作，有毛泽东思想著作，有中国的，还有外国的，总是堆得满满的。他平日里都是博览群书，一有时间就抽空加紧学习。

习近平同志也非常善于向老同志学习，我认识的很多老同志和他都是好朋友，无论北京的，还是地方上的，习近平同志都经常和他们谈心，向他们请教一些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的工作提供参考，从不自以为是。此外，青年干部们对他也都很熟悉，反映他非常善于和大家交流，从同志们身上取长补短，开拓思路。

通过不断学习，习近平同志处理工作上的问题越来越得心应手。他工作上踏踏实实，也注意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认识。他自己写的书，题目都是他自己出的。无论他到哪一个地方工作，那里的历史、文化、经济，他都了解得非常细致。

比如《摆脱贫困》这本书，我看了以后就很感动。这本书是他在福建宁德的调查，里面绝大多数文章都是他自己写的，其中还有一两篇记者的采访稿。没有学问，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没有丰富的工作实践，更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善于学习，是干好工作的前提条件之一，领导干部需要具有综合素质，对一个地区的各行各业、各项工作，都要熟悉和掌握。而习近平同志不仅是熟悉和掌握，关键是他“干一行，学一行，成功一行”。他在正定先抓农业，农业上去了；抓工业，工业上去了；抓文化教育，文化教育也上去了；管党建和干部，干部的积极性有效地调动起来了。

还有，习近平同志勇于担当，有高度的责任心，这是他做好工作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也是现在领导干部都应该具备的品质。

我在中组部工作期间，接触过的各个层次的领导干部很多，个别地方上的“一把手”没有什么责任担当，他们不是干工作，而是应付工作，上面怎么说，他们就照猫画虎，很多工作流于形式。极个别干部品质更恶劣，不仅平日里“懒政”，有了重大突发事件，他们不能挺身而出站在老百姓前面，而是自己先跑了。我在湖南某地待过一段时间，那个地方发了水灾，当地“一把手”和纪委书记竟然第一时间跑掉了。这样的官员，即使不贪污、不受贿，吃老百姓的粮食也是一种浪费。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这个地区有一次遭受了强台风侵袭，他不仅没有躲闪，而且在第一时间冲到前线去指挥战斗，

和救灾的人民子弟兵、受灾的老百姓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那一次，我正好在福建调研，这件事是我亲眼所见。

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后，见了很多过去一起共事的人、熟悉的人，都向他们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我能走到今天，既是党组织对我的培养，也是你们大家对我的帮助。但是，今后任何人都不能以我的名义、打我的旗号干私事。同时，他给家里人“约法三章”，明确提出不能以跟他的关系为借口，来办自己的事。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他的父亲——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同志对他的严格要求。您对习老比较熟悉，请您讲讲家庭对习近平同志的影响。

何载：家庭对习近平同志的影响，肯定是有的，而且是很大的。但家庭教育具体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我虽然当年在西北局工作过，但毕竟不是习仲勋同志身边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不那么直接，不好去推测。我倒可以从习近平同志和他父亲习仲勋同志有什么共同之处这样一个角度来简单谈一谈。

第一点，他们都热爱人民，注重走群众路线。

习仲勋同志曾经教导我说：“一定要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到人民群众这边，没有人民就没有你们，要老老实实地做人民的勤务员。”在习老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他是这么说的，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习近平同志也曾说过这样的话：“信访工作的首义，在于时刻把自己看成人民中的一员，把心贴近人民。在新形势下，各

级领导必须放下架子，打掉官气，主动上门，把信访工作做到基层，把党的关怀和政府的济助送进普通群众的家庭。”1988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提出干部“四下基层”制度——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直到现在，当地还在坚持这一做法，并推广到全省。在浙江省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多次到信访工作任务重的市县接访，亲自协调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十八大以后，我们党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个活动的重点，就是把走群众路线落到实处、形成常态。

第二点，他们都注重调查研究。

举个例子：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工作的时候，他把那个地区十几个民族的具体情况，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调查研究，这为西北的解放和稳定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同志也是这样的，他在正定、厦门、宁德、福州等地任职期间，都是把调查研究作为工作的基础来看待的。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来积累资料、发现问题、收集民意，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得实、抓得牢。

第三点，他们都尊重老同志。

习仲勋同志年轻有为，十几岁就参加革命，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时只有21岁，是著名的“娃娃主席”。他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时，年仅39岁；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年仅46岁。所以，在习老的革命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和比自己年纪大的同志搭班工作，而他直接和间接领导的同志，大多年纪也比他

大。但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年轻、能力强、职务高，就轻视这些老同志，反而一直非常谦虚谨慎，尊重老同志的意见。

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时，自己经常骑自行车，却把县委仅有的一辆吉普车安排给老干部使用。他还常常利用节假日去老干部家中走访、看望，拉家常、谈问题。他要离开正定时，老干部都舍不得他走，有的老干部和他告别的时候，眼圈都红了。习近平同志的秘书还跟我谈起过这样一件事：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后，有一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老同志春节团拜会上，他有一个不长的讲话稿，自己认真修改了四次。其实，这样的团拜会内容无非是拜年、慰问、祝福。他对讲话如此重视，充分体现了他对老同志的尊重，这是很不简单的。

『近平同志把人民看得很重，人民也把他看得很重』

我与习近平同志进行了深入交流。我们从县情谈到国情，从经济发展战略谈到切实改善人民生活，从人才培养谈到借助专家学者的智慧。话题虽然广泛，却始终围绕着如何改变『高产穷县』的面貌，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采访对象：赵德润，1946 年生。担任新华社记者期间，曾采访习近平同志写成通讯《正定翻身记》，发表在 1984 年 6 月 17 日《人民日报》上。2009 年退休。

采 访 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 年 3 月 23 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赵德润同志，您1984年采访习近平同志的报道《正定翻身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也是他的名字第一次在《人民日报》出现。可以说，这篇报道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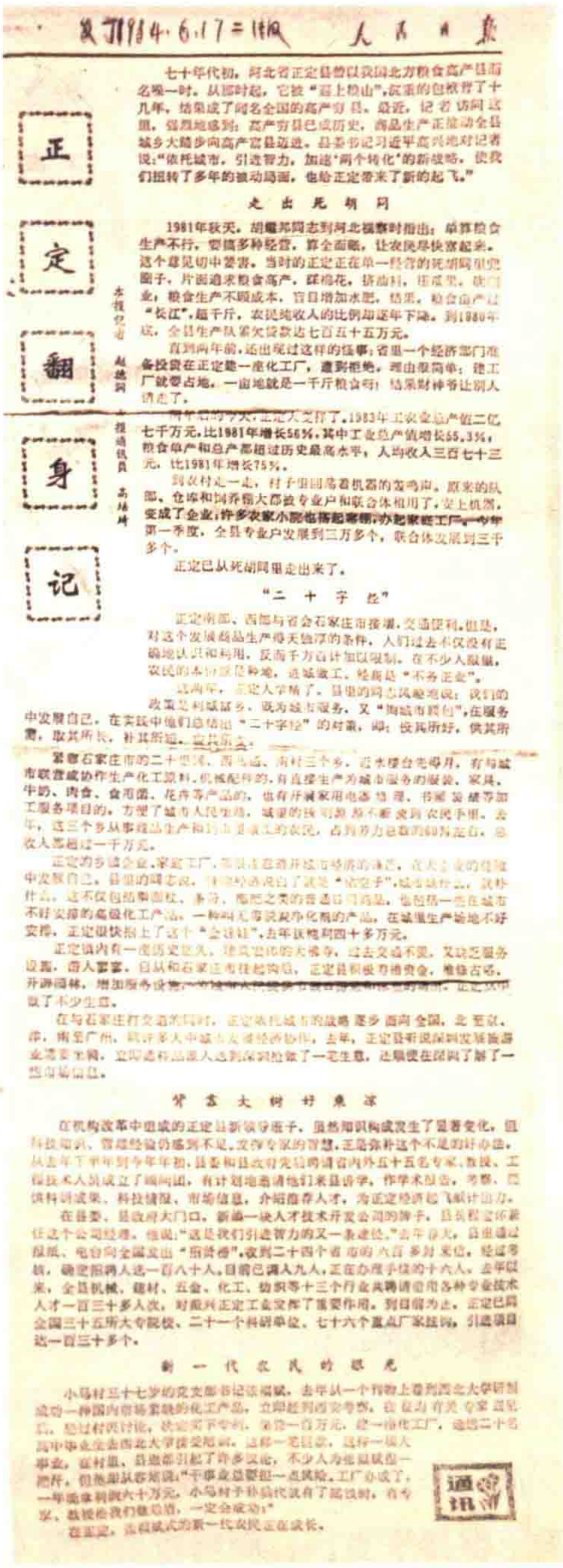
赵德润：改革开放初期，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带领人民改写了“高产穷县”的历史，我有幸见证并记录了这段历史。我一直不知道这篇报道是“第一次”。十八大之后，《人民日报》推出一个重点报道——《七常委与〈人民日报〉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这个报道把每一位常委第一次被《人民日报》报道和署名文章第一次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情况做了梳理。我后来得知，发表在1984年6月17日《人民日报》二版的通讯《正定翻身记》，是习近平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而习近平同志署名文章《中青年干部要尊老》同年12月7日也发表在《人民日报》上。1984年这一年，习近平同志两次上《人民日报》，这也正是他在正定干得风生水起的一年。

采访组：1984年您到正定采访，是上级派给您的任务吗？

赵德润：不是。一般说来，记者采写文章，有“规定动作”，也有“自选动作”。《正定翻身记》这一篇不是“规定动作”，不是谁派的任务，而是我的“自选动作”。

1984年，我在新华社河北分社工作。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的经济模式也正处于变革和争议的初期。石家庄地区是我国北方的粮食高产区，而正定县特别突出，是河北省第

《正定翻身记》发表于
1984年6月17日《人民日报》
二版。



1984.6.17 人民日报

正定翻身记

本报记者 赵炳阳
报通讯员 高培坤

七十年代初，河北省正定县曾以我国北方粮食高产县而名噪一时。从那时起，它被“戴上粮山”，沉重的包袱背了十几年，结果成了闻名全国的高产穷县。最近，记者访问这里，强烈地感到：高产穷县已成历史，商品生产正推动全县城乡大踏步向高产富县迈进。县委书记习近平高兴地对记者说：“依托城市，引进智力，加速‘两个转化’的新战略，使我们扭转了多年的被动局面，也给正定带来了新的起飞。”

走出死胡同

1981年秋天，胡耀邦同志到河北视察时指出：单算粮食生产不行，要搞多种经营，算全面账，让农民尽快富起来。这个意见切中要害。当时的正定正在单一经营的死胡同里兜圈子，片面追求粮食高产，棉花、猪油料、蚕桑里，就上粮食；粮食生产不顾成本，盲目增加水肥。结果，粮食亩产过“长江”，超千斤，农民纯收入的比例却逐年下降。到1980年底，全县生产队累欠贷款达七百五十五万元。

直到两年前，还出现过这样的怪事：省里一个经济部门准备投资在正定建一座化工厂，遭到拒绝。理由很简单：建工厂就要占地，一亩地就是一千斤粮食呀！结果财神爷让别人请走了。

两年后的今天，正定大变样了。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二亿七千万元，比1981年增长56%，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55.3%；粮食单产和总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人均收入三百七十三元，比1981年增长75%。

到农村走一走，村子里回荡着机器的轰鸣声。原来的队部、仓库和饲养棚大都被专业户和联合体租用了，安上机器，变成了企业；许多农家小院也搭起高棚，办起家庭工厂。今年第一季度，全县专业户发展到三万多个，联合体发展到三千多个。

正定已从死胡同里走出来了。

“二十字经”

正定南部、西部与省会石家庄市接壤，交通便利。但是，对这个发展商品生产得天独厚的条件，人们过去不仅没有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反而千方百计加以限制。在不少人眼睛，农民的本份就是种地，进城做工，经商是“不务正业”。

这两年，正定人学精了。县里的同志风趣地说：我们的政策是利城富乡，既为城市服务，又“淘城市的包”，在服务中发展自己。在实践中他们总结出“二十字经”的对策，即：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急。

紧靠石家庄市的二十里铺、西马通、南村三个乡，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与城市联营或协作生产化工原料、机械配件的，有直接生产为城市服务的服装、家具、牛奶、肉食、食用菌、花卉等产品的，也有开展家用电器维修、书画装裱等加工服务项目的，方便了城市人民生活，城里的钱可源源不断流到农民手里。去年，这三个乡从事商品生产和为城里服务的农民，占到劳力总数的80%左右，总收入都超过一千万元。

正定为乡镇企业、家庭工厂、专业户迎着开放城市经济的浪花，在夹缝的环境中发展自己。县里的同志说，“农副产品变成了‘宠儿子’，城市缺什么，就补什么，还不仅包括粮面粉、茶酒、瓶肥之类的普通日用商品，也包括一些在城市不好安排的高级化工产品，一种叫无毒说起净化瓶的产品，在城里生产场地不好安排，正定很快招上了这个“金娃娃”，去年获利四十多万元。

正定镇内有一道历史悠久、建筑宏伟的天桥券，过去交通不便，又缺乏服务设施，商人裹足。自从和石家庄市接起商品、正定县积极开辟货源，维修店铺，开辟园林，增加服务设施，[illegible]做了不少生意。

在与石家庄打交道的同时，正定依托城市的战略逐步面向全国，北至京、津，南至广州，同许多大中城市发展经济协作。去年，正定县听说深圳发展商业需要宝钢，立即选样品派人远到深圳抢做了一笔生意，还顺便在深圳了解了一些有关信息。

智囊大树好乘凉

在机构改革中组成的正定县新领导班子，虽然知识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但科技知识、管理经验仍感到不足。发挥专家的智慧，正是弥补这个不足的好办法。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初，县委和县政府先后聘请省内外五十五名专家、教授、工程技术人员成立了顾问团，有计划地邀请他们来县讲学，作学术报告，考察、提供科研成果、科技情报、市场信息，介绍推荐人才，为正定经济起飞献计出力。

在县委、县政府大门口，新添一块人才技术开发公司的牌子，县长程宏毅兼任这个公司经理。他说：“这是我们引进智力的又一条途径。”去年春天，县里通过报纸、电台向全国发出“招贤榜”，收到二十四个省市的六百多封来信，经过考核，确定招聘人选一百八十人，目前已调入九人，正在办理手续的十六人。去年以来，全县机械、建材、五金、化工、纺织等十三个行业共聘请使用各种专业技术人才一百三十多人次，对振兴正定工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到目前为止，正定已同全国三十五所大专院校、二十一个科研单位、七十六个重点厂家挂钩，引进项目达一百三十多个。

新一代农民的形象

小马村三十七岁的党支部书记张福斌，去年从一个报刊上看到西北大学研制成功一种国内市场紧缺的化工产品，立即赶到西安考察，在征求有关专家意见后，经过村民讨论，决定买下专利，筹资一百万元，建一座化工厂，选拔二十名高中毕业生去西北大学培训技术。这样一笔巨款，这样一项大事业，在村里、县里都引起了许多议论，不少人为他捏一把汗。但他却从容地说：“干事业总要担一点风险。工厂办成了，一年能拿利润六十万元。小马村手扶拖代就有了着落啦，有专家，教授给我们做后盾，一定会成功！”

在正定，走这样式的新一代农民正在成长。

通讯

一个粮食亩产“过黄河”“跨长江”的县，也是有名的“高产穷县”。粮食产量很高，老百姓却很贫困，甚至吃不饱肚子。实际上，整个石家庄地区都是这样的情况，只是正定更具代表性。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是当时农村经济受“以粮为纲”的束缚。那个时候，新华社发过《从“极左”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等文章，主要报道冲破“左”的思想束缚，给农民更多自主权，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些报道有些是我参与的，有些是分社其他记者写的，在当时比较有影响。人们由此更加了解“以粮为纲”的禁锢，导致农村多种经营发展不起来、群众生活贫困等问题。例如，有很多地方不允许农民种棉花和瓜果蔬菜，为了保持“粮食高产县”的桂冠，粮食种植面积说什么也不能降下来；甚至有些地方，农民自己种了瓜，大队干部还要给犁掉，重新种上粮食。有一篇文章《毁瓜的风波说明了什么？》专门批评了这件事。

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化变迁、新旧思想交锋、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意识亟待转变的时代，我自己对农村经济有了一定的认识，因此就一直寻找农村变革的典型。有一次，我参加河北省委一个会议，时任石家庄市委书记贾然同志向我介绍了正定县的变化，说来了一位年轻的县委书记，思想解放，工作干得不错，很快改变了正定县的面貌。会后，我专门收集了正定县的相关材料，发现这个县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工副业生产，群众收入显著提高，粮食产量却没有掉下来。也就是说，这个典型的“高产穷县”保持了高产，同时也摘掉了“穷县”的帽子，发展工副业对

粮食产量并没有产生不利影响。我眼前一亮，决定抽时间到正定一探究竟。于是，通过正定县通讯组长高培琦与习近平同志约好时间，就直接跑到正定去了。

采访组：您到正定的这次采访，是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吧？初次见面，他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赵德润：那天是1984年4月17日，正定离石家庄很近，路上没用多少时间，我很快就到了县里，见到了习近平同志。我们第一次见面谈话时间不长，习近平同志介绍了正定“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城乡经济发展概况，他建议我先下去看一看。正定所有的乡镇、村庄、农户随便看，想看哪里就看哪里，好的差的都看看。看的过程中，可以随机找人谈话，了解真实情况，回来再细谈。

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他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那年31岁，身材修长，年轻老成，讲话不紧不慢，有板有眼。我采访过很多县委书记，而他的那种从容、自信和坦率，却让我刮目相看。相当多的地方对上级考察和记者采访，多半都是捂着差的，给你看好的；留着劣的，给你说优的；领你去看的，大都是精心挑选的。上级满不满意，关系重大，自不必说了。新闻记者的报道影响广泛，写出来的东西，同样也关系着干部的政绩和前途。习近平同志让我自己去看，随便看，随便找人谈，足见他对整个正定县的发展有充分的自信，而且不避讳存在的问题。

当时，正定县委只有一部草绿色的吉普车，习近平同志就把

这部车派给我了，让高培琦陪我采访调研，当天我们就下去了。一连3天，我们跑了正定城乡很多地方，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典型。在乡镇、企业、学校和农民庭院里，广泛接触乡村干部和从事不同职业的普通百姓。

采访组：有了您这3天的考察，再和习近平同志谈话就更加深入了吧?

赵德润：第二次谈话非常关键，我对习近平同志的印象更加深刻了。4月19日，记得是在县委会议室里，我与习近平同志进行了深入交流。我们从县情谈到国情，从经济发展战略谈到切实改善人民生活，从人才培养谈到借助专家学者的智慧。话题虽然广泛，却始终围绕着如何改变“高产穷县”的面貌，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我昨晚查阅了当年采访习近平同志的笔记，上面详细记录着他那天的谈话。1985年春天我从河北分社调到河南分社，留下了这份采访笔记，否则记忆力再好，也难以记住33年前的谈话细节。重温当年的谈话，我感到，习近平同志在县委书记的岗位上就善于从大处着眼思考发展战略问题，他的谈话富有远见卓识，体现了一种大格局。

谈话的开场白，习近平同志说：“一个县的工作要想做好，首先要有一个思想基础。如果思想不解放，思路不清，精神不振，就什么都干不成。”

习近平同志接着讲到规划问题，他说：“正定要发展，首先

要研究正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结合正定实际，制定一个10到15年的发展规划，然后再考虑当前需要干什么。有了清晰的思路，才能使工作稳步推进。要下决心改变过去那种‘盲人骑瞎马’的状况。正定县的规划，经过充分研究、讨论、取舍，成熟以后，再通过人大的立法固定下来，不能朝令夕改。”

谈到正定“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新战略形成的过程，习近平同志说，除了他和县委、县政府的调查研究，专家顾问团的作用举足轻重。“背靠大树好乘凉。”正定县在全国聘请了几十位有名的专家学者做顾问，其中就包括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教育学家潘承孝等人，全县的每一个乡镇也都“对口”请来专家当顾问。

习近平同志说：“我们当然要培养自己的人才，但是现在我们的人才还没培养起来，就像自己栽的小树没长起来，要借一借大树的荫凉，大树就是这些专家，他们对正定的科学决策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和我们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十分吻合。“半城郊型”经济就是习近平同志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和经济学家于光远反复讨论提出来的。他把“半城郊型”经济解释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城吃城”，概括为“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20字方针，这个解释和概括准确而生动，放在今天看都很精彩。

习近平同志说：“我们正定，南面、西部毗邻石家庄，县城

离市区15公里，离得多么近。而且，有2条铁路和4条公路与城市相连，交界线长达29公里，这是很独特的条件。如果靠城不会吃城，那就是傻瓜！”

其实，“半城郊型”经济“靠城吃城”，就有“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意思在里面。这和聘请专家顾问一样，都是“借助外力，发展自己”的思路。

习近平同志还谈到正定县对古建筑和文物的保护工作。正定县城里有一座隋代建的寺院叫隆兴寺，人称“大佛寺”，已经年久失修。正定还有一个临济寺，比隆兴寺还早46年，是佛教临济宗祖庭，但寺庙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座佛塔。习近平同志及时拨款、筹款，修复隆兴寺，恢复了临济寺。

当时，县财政的钱不多，县委、县政府办公条件都很简陋。习近平同志拨款修缮农村小学，发展生产，没人有异议。拨款修复寺庙，这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却是有一些争议的。那个时候，毁庙砸佛像的十年浩劫才刚刚结束没几年，许多人还把宗教文化当成是迷信、“四旧”来看待。

习近平同志说：“这些可都是国宝啊！一旦消失，就永远看不到了。我们保护和修复文物，既是对祖先负责，也是对后人负责。况且，这些文物古迹修复好了，将来可以发展正定的旅游事业，给正定增加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30多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位年轻县委书记的远见卓识。现在，隆兴寺、临济寺等文物古迹，不仅拉动正定旅游经济的发展，也成为正定这座千年古城的标识和文化名片。

采访组：这次谈话后，您在正定采访还有哪些新发现？

赵德润：采访中，我看了一些和石家庄毗邻的模范乡镇，也看了一些相对落后的乡镇，可以说发展快的和慢的地方，我都走到、看到了。我不仅到各个乡镇，还到村里，到农民家里去看，看得比较深入，前后持续了半个多月。

我印象中，发展比较快的有二十里铺、西兆通、南村。这些地方依托城市，靠城吃城，对习近平同志提出的20字方针贯彻得很好，对具体如何“投其所好，供其所需”也了解得比较清楚。

我发现正定农民的素质和精神面貌正悄悄发生着变化。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城里人穿西装的都不多，农村穿西装的更是罕见。我到南石家庄村去看一个养殖公司，这是五户农民合资办的公司，公司在当时就很先进，有实验室，还有科研项目，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比我们穿得还带劲，西装革履，打着领带，还向我咨询哪一款高档照相机性价比更好。我发现正定农民嘴里流行词很多，意识挺超前，思维也很新潮，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简直忘记了他们是农民。

为提高农民素质，习近平同志组织编了一本小册子叫《新素质分子一百例》。这本书里主要介绍农民的变化，选了100个典型写在册子里，让大家学习。

小马村37岁的党支部书记张福斌带领群众搞工副业生产的事迹，一时传为佳话。他从报纸和刊物上研究市场紧缺的商品，并且去实地考察，还和习近平同志请来的专家顾问一起研究，请

他们帮助出主意。专家论证之后认为可行，他就跟村民一起集资100万元办了一个生产化工产品的企业，把20名工人送到西北大学去培训。很多人看到100万元这么大的数字，都替他捏了一把汗。这位村支书却很自信地说："习书记请来的这些专家，帮我拿定了主意。我相信他们的科学论证不是随便拍脑瓜。一旦办成了，一年就能挣60万元，第二年就可以收回投资开始盈利，这可是棵摇钱树。"后来，这个企业果然成功地办起来了，效益超出了预期。

正定采访，使我深刻感受到，农民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从内到外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素质提高了，懂得了商品经济，懂得了怎样去致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比什么都重要。

习近平同志当年培养的一些典型，现在都成气候了。比如，他一直关注和支持的留村乒乓球学校，在他建议下搬到县城建分校，现在已经发展为国内外闻名的乒乓球训练基地，被誉为"世界冠军、奥运冠军的摇篮"。

我在调研时认识的一位农民企业家，现已成为金河集团董事长。他一开始开拖拉机，而拖拉机维修经常需要配件，他觉得这是一个赚钱的门路，就开了一个配件厂。他用赚的钱买一辆汽车跑运输，于是又扩大经营，搞汽车配件；汽车需要汽油，他又搞起了油库。他的油库在华北地区都很有名气，铁路专用线能通到他的油库里。他还搞房地产和投资业务，成了正定有名的大企业家。而在他起步的那几年，正是习近平同志细致具体的富民政策

让他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在采访的时候，习近平同志曾经对我说：“正定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要超过正定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一点，他说到做到了。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81年增长56%，人均收入增长75%，正定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正定经济发展的速度。

采访组：在您看来，正定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赵德润：通过调查，我认为第一个因素是为农民减负。过去，正定的征购任务高达7000多万斤，平均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就有将近200斤的负担。农村大队和社员只能靠增加投入，加大水肥，才能保持住高产量和高征购，这样种粮食的成本就高。有些地方交了征购，农民就没了口粮，只好到别的县买高价粮当口粮。这样一来，不可能不穷。

据我所知，习近平同志到正定县之后，不想在逐年加码的征购任务上再出什么“政绩”，他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摘掉“桂冠”，让人民喘一口气。他和县委副书记吕玉兰商量，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经过反映和调查，国家征购减少2800万斤，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谈到这一点的时候，习近平同志说：“我们正定宁可不要‘全国高产县’这个桂冠，也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从他平和的语气里，我感觉到他对忽视群众利益追求政绩是坚决反对的。

听到他这么说，我心里很感动。我感觉他给正定百姓做了一

件大好事。要知道，在绝大多数时候，考量一个官员能不能升迁，往往不是老百姓，而是他的政绩。习近平同志在可以表现政绩的时候却不要政绩，而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这一条，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

农民收入快速提高的第二个因素，也是以后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就是依托城市发展经济、发展多种经营。在习近平同志主导下，农民养鸡、养牛、养羊、种植瓜果蔬菜，给城市供应肉蛋奶、充实“菜篮子”。正定紧挨石家庄，供应链短，运输快，各种副食品源源不断输入城市，正定老百姓的腰包很快就鼓了起来。这个情况证明，只要有了好的环境、好的政策，农民勤劳致富是非常快的。

与此同时，正定还发展编织业、机械配件、化工原料、服装、家具、食用菌、花卉、家用电器修理等产业，为城市服务。另外，正定的农村还有大量劳动力为城市建设服务，农民成群结队到石家庄打工。

类似这样的措施全面铺开以后，农民收入迅速增加。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我们常说国富民强、藏富于民，习近平同志在正定首先做到了藏富于民。

采访组：您讲了采访和考察的过程，请您再讲讲《正定翻身记》写作和发表的过程吧。

赵德润：我和习近平同志在4月19日那天谈的比较多，也比较深入，由此奠定了这篇文章的基础。之后20多天的采访，是

不断充实内容的过程。正定离石家庄15公里，我那些天就待在正定，不回石家庄了。考察之余，就和近平同志聊天，了解情况，进行讨论。我们有时候在招待所讨论，有时候到他办公室讨论。那时候，近平同志也是一个人生活，除了工作以外，他晚上还会去招待所给我送些吃的，一进屋就说：“别辛苦了！休息会儿，休息会儿。”

我们一边品尝他带来的小食品，一边抽烟，一边聊工作。他抽的烟是“荷花”牌，和普通农民抽的一样。当时一些县乡干部抽的烟也比他的好。其实，他完全有条件抽好烟，但他只抽这种便宜的烟。

我们聊天的时候，经常碰撞出思想火花、语言火花，我就第一时间把这些话记下来。比如“靠城吃城”，“为城里人服务，掏城里人腰包”，这样有点儿俏皮又十分生动的语言，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大丰富了我的采访。

我一直在考察，在和他讨论，在消化吸收他的思想。那时候不像现在用电脑写作速度这么快，当时我都是在大稿纸上写，反复修改，最终成稿是5300多字，《人民日报》当年刊用2100多字。

那个时候的《人民日报》版面远没有现在多，一共8个版，中央的时政、报道、社评，还有国内外大事占很多版面。在这样的头号大报上，登一个县2100多字的文章，确实不算少。虽然刊出的文章骨架是完整的，但很多具体事例被删掉了，总觉得有些遗憾。后来，我自己出作品选的时候，就把5300多字的原稿

收进书中。我没想到31年后，《人民日报》又披露了《正定翻身记》的全文版。

采访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您现在虽然不在新闻报道一线了，却始终关注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变化。您作为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有什么感想？

赵德润：十八大以来的种种施政、种种变化，最终都是落实到维护人民利益上，这也是习近平同志从年轻时一直到现在的不懈追求。我还记得，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讲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点，实际上和他在正定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很简单、很朴实，就是追求人民的福祉，就是强调领导干部对人民的责任。

习近平同志当年是正定县委书记，如今是我们党的总书记。30多年过去了，他的人民情结，他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是始终不变的。这一点与他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1969年，15岁的少年习近平到陕北插队，在梁家河这个黄土高原上封闭的小山村一待就是7年，吃了那么多苦，别的知青都走了，他还留在那里，一边和农民一起生活、一起劳动，打成一片，一边读自己带去的两箱子书，读能够借到的书，对人生、对国家前途命运有了自己独立深入的思考。这一段经历，是他成长中非常重要的过程。从那时起，他不仅从书本上了解了世界，也从现实中了解了农民，了解了人民的疾苦、期望和感情。

正定，则是他从政的起点。在这里，他把过去的积累，把对人民的深厚感情运用到工作当中去。自此以后，他从正定到福建，再到浙江，到上海，一直到中央工作，他始终都记着人民，他讲到“人民”二字的时候，感情非常深。在习近平同志眼里，“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人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最高的。正定的朋友贾大山病了，他从福建赶去探望；当年的同事吕玉兰去世了，他深情地写文章悼念。他是个讲感情、不忘旧，重情重义的人。

采访组：采写《正定翻身记》的过程，也是习近平同志与您建立友谊、成为朋友的过程。你们后来还有交往吗？

赵德润：1984年我采访习近平同志的时候，他31岁，我38岁。面对这个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县委书记，我对他的感觉确实是很不一般。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在正定履行我的职责，忠实地记录这座古城的沧桑巨变，记录那里可爱的、奋进中的人民，也记录习近平同志在正定锐意改革、执政为民的历史。习近平同志后来历任重要的领导岗位，但他对正定一直念念不忘。在我的内心，也一直珍藏着这份君子之交。

后来，他到福建工作，给河北的同志写信还打听我的情况。再后来，我在河南分社当了十几年的社长，逢年过节我们通过贺卡互致问候。我的一个朋友调到浙江分社任社长，习近平同志看了他的简历，就问他：“认识赵德润吧？”“认识，那是我们的社长。”后来，这位朋友告诉我：“习书记很关心你，还打听你的

情况。”

在2006年，我们在杭州有一次深谈。当时，我在《光明日报》任副总编辑，到浙江记者站考察，他刚从温州台风救灾现场回来。那天，我们在西湖边长谈了一次，他详细谈了他从河北到福建，再到浙江这一路走来的经历和非同一般的心路历程。他有顺利的时候，也有不顺利的时候，并非一帆风顺。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地锤炼自己，让自己能够倾听各种意见，能够团结各种不同意见的人，甚至包括伤害过自己的人，他也会真诚地去团结他们。

这次谈话，我们谈得非常真诚。10多年过去了，其中有些内容也比较模糊了，但那份感动、那种影响，一直对我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习近平同志是一个有思想有作为有担当的人，而他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他同时又是坦率和真诚的人。有些领导干部一旦官做大了，架子就大了，就变得高深莫测了，而习近平同志仍然那么平实、随和，实在难能可贵。

十八大以后，我和习近平同志没有见过面，交往主要通过信件。他太忙了，不宜再去打扰他，不能干扰他的工作，他的时间太宝贵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新闻工作，提出了包括转变文风等方面的一系列具体要求。作为一名资深新闻工作者，您如何理解他的这些要求?

赵德润：习近平同志要求新闻工作者转作风、改文风，讲得很有针对性。随着科技发展，人们获取信息更方便了，记者的工作也更加便利了。但再怎么便利，也不能代替记者到一线去深入实际观察体验，那样的新闻才更有质感，更有价值。他提倡文章“短、实、新”，我感触尤深。我们现在在文风上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翻开报纸，打开电视，仍然可以看到和听到很多套话、空话，这和脱离实际是有一定关系的。领导干部也好，新闻记者也好，文风还是要追求准确、鲜明、生动。习近平同志讲话、写文章就很有特点，朴实无华，很接地气。1984年我采访他的时候，就发现他讲话不搞“穿靴戴帽”，没有官话、套话，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怎么想、怎么干，“正定县”怎么做、有什么效果，简明扼要，深入浅出。

我们经常讲新闻理想，其实，新闻理想和我们国家、民族的理想是一致的，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就是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严治党治国治军，我们重拾了党心，振奋了军心，赢得了民心。现在回头一看，四年多时间，我们党经历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斗争，做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事情，确实令人惊叹！短短几年好像过了好多年，国家各方面的变化之大、进步之大，都是以往不可想象的！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新闻工作者大有可为。

『近平把战略眼光和务实精神结合起来，很了不起』

习近平跟我谈他为什么离开北京到基层来工作的初衷。在当时，我认为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身体力行地做实事、影响人，能改变一点是一点，能起多大作用起多大作用。

采访对象：周伟思，1952年生。曾当过知青、工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北青年》杂志社工作。1984年，采访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撰写报告文学《“而立”之年》。2014年退休。

采 访 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3月24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周伟思同志，您好！1984年，您在《河北青年》杂志社工作期间，采访习近平同志并撰写了一篇反映他主政正定期间真抓实干、锐意改革、积极进取的报告文学——《“而立”之年》。请您讲讲采访的起因，以及到正定后与他初次见面的情况。

周伟思：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北团省委，继而到《河北青年》杂志社工作。领导看了我在上学期间发表过的一些作品，让我跨过实习阶段直接做主力记者，把很多重大采访任务交给我。时间不长，还让我当了一编室主任。这个编辑室主要负责正面典型、先进事迹及重大活动的采编。

1984年春节期间，老乡同学中有两人跟我提到习近平。他们说正定县有个年轻的县委书记，从北京来的，很能干，很有闯劲，并建议我去采访他。

第三个跟我提到习近平的，是我在赵县插队时的知青办主任李遵英，他当时在石家庄地委宣传部工作。他说：“我给你推荐一个人，正定县的书记习近平，你应该去写写他。他是自己要求下基层的，他来了以后，正定有很多新变化、新气象。”

到杂志社工作以来，不断有人给我推荐采访线索。但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推荐同一个采访对象，这还是我从未遇到过的。

我不由得对此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当时，与南方沿海地区相比，河北的改革氛围可以说较为沉闷。各级干部的思想观念、工作作风与河北所处的“直隶”地理位置并不匹配，人们思想解放的意识明显不足。在这样的大背景

中，习近平这位县委书记能够带领正定县领导班子大刀阔斧搞改革，显然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于是，我就请李遵英帮我联系一下正定方面。

3月中旬，李遵英打电话说："伟思，已经联系好习近平了。他确实很忙，但还是同意你采访。找个合适的时间我陪你过去。"

3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我们俩到了正定县委办公室。两位同志和我聊了一会儿，习近平就过来了，我们握手问好之后，他说："我正在开会，你先去招待所休息一下，下午两点我过去，咱们再聊。"

下午两点，习近平准时到我房间来，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来正定两年，没做多少事情。你既然来了，咱们还是交流一下。你觉得有意义就继续，如果价值不大，就当聊聊天吧。"

习近平这番话，给我的感觉是这个人很随和，说话也实在，这样采访起来就比较轻松。

交谈中，我们作为同龄人，很快就找到了许多共同点。

我比习近平大6个月，都刚过而立之年，同一年上的初中，都是"老初一"；都有知青经历；他插队7年，我下乡干农活5年，时间也不短；他是最后一个离开梁家河的，我在湖北那个村子，也是知青中最后一个走的。

后来，我们甚至还发现有共同的朋友。

就这样，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自然而然地，我们俩已经不像是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而是像朋友一样在随意漫谈了。

我虽然预先拟了采访提纲，但写什么、怎么写，事先并没有

一个明确想法。其实，我首先是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这位主动申请从京城下基层的年轻人，跟大家传说中的是一回事吗？

那天下午，我们说起各自插队时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我们下乡分别在北方和南方的农村，虽然地理环境不同，但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理解和感受是基本一致的。

我原来觉得自己的下乡生活够苦的了，没想到他在陕北梁家河的日子比我还要艰苦得多。

采访组：你们聊的时候，习近平同志有没有谈到他当时为什么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地方来工作？他主动做出这个转变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周伟思：这是我问习近平的第一个问题。我说，你从清华毕业，穿上军装，到军委办公厅工作，一下就站到了很高的起点上，应该说前途无量，这些简直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可你为什么放弃这么好的条件，主动申请到一个小县城做基层工作呢？你的初衷是什么？

按照那个时代的语言特点，人们可能会回答“为了深入基层锻炼”“更直接地为人民服务”等等。但他并没有说那些绝对正确、随口就来的套话。

习近平对我说，他回到北京后，在清华上学期间也好，到军委办公厅工作后也好，节假日偶尔会参加一些同学、朋友的聚会。这些聚会，也多是知青“插友”的重逢，当年大家是一起下去的。他那些发小和同学基本都是高干子弟。“文化大革命”结

束，这些人的父母平反或升迁后，他们也陆续从各地回到北京，生活条件一下跃升回来。这样，许多人对自己在运动中、在插队时所遭受的“苦难”，或多或少都产生了一种“补偿心理”。不少人这样想：我本不该受那么多罪，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弥补的机会，应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就会有意无意地注重物质享受，安于现状。

对于这类现象，习近平开始倒没觉得什么，也还能理解这样的心理变化。但时间稍长，这种氛围让他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他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这代人就应该用这样的方式补回失去的青春吗？

7年的插队生活，使他忘不了农民的艰辛和农村的一切。即使他回到北京，从此生活优越，工作稳定，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他内心深处始终牵挂着远方贫困的沟壑与山岭。

习近平觉得，如果我们一直在北京生活，没有多年的农村生活，每天心安理得、按部就班还算说得过去。既然亲身经历让我们深知老百姓有多苦，国家还那么贫困，我们如果还这样麻木不仁，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

此外，他还讲了一个内心深层的动因，就是基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再反思。

他想，“文化大革命”中，在那种人与人轮番争斗，忽视生产、经济停滞的混乱时期，我们目睹了残酷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深切感受了这场浩劫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我们要尽力避免这样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怎么才能避免呢？如果我们

这些亲历了这段历史，深知它有多么可怕的人，回避现实，不思进取，不去努力改变它，又由谁来担此重任呢？如果任由那些糊里糊涂的，甚至极左的人去掌权当政，中国的前途将是怎样？会不会重蹈覆辙？在百废待兴、改革初起的当下，我们这些有了觉悟的人，就必须站出来身体力行，投身于改革开放的第一线，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改变多少就改变多少。如果大多数人都这么想、这么做，这个国家的未来就大有希望了。

他欲奔赴“前线”的想法愈发清晰坚定，并渴望自己的同学朋友能和他志同道合，但他没法说服每一个人，只能同那些与他有相似感悟的朋友去交换意见。

在大机关上班，他平时工作勤奋，接触信息也广，加上自己用心，很多全局性的东西他都格外关注。但他仍然觉得，接触底层社会太浅，和老百姓离得太远，总觉得很“不接地气”，老有种使不上劲的感觉。同时，他也认识到，如果真正要做一些实事，像现在这样只是看文件、写文字，做例行公务，很难和人民群众直接沟通，也难以对具体事情产生作用。

渐渐地，他下基层工作的愿望变得愈发强烈，还向父母和一些长辈谈及自己的想法，征求他们的意见，表示自己“还是想到基层去锻炼，能为老百姓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最终，他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以上这些，大致上就是习近平跟我谈他为什么离开北京到基层来工作的初衷。今天，我们可以评价当年的习近平“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或者说他“把理想付诸实践”，等等，这实际上都是

基于他的今天而言的。在当时，我认为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身体力行地做实事、影响人，能改变一点是一点，能起多大作用起多大作用。

那天，我们谈了很久，从两点钟一直谈到吃晚饭的时候。这一下午的交流，让我初步认识了习近平这个人，他有当时年轻人新潮的东西，却比我这类同龄人成熟不少，沉稳得多。他说话实在，信息量不少。

我们一起吃完晚饭，习近平掏出两张电影票，请我一起去看电影。去电影院的路上，我们边走边聊，那天的电影是《游侠传奇》，美国的一个西部片。我记得看完电影，大约是9点半的样子，习近平送我回招待所，我们又坐下聊了一会儿。关于这次采访，我也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不是主题非常集中的访谈，也不是那种通常的新闻报道。我们先以漫谈的方式展开交流，回头再看以什么样的体裁和内容更合适。习近平点点头说，这样好，这样好。然后他向我告辞，又回办公室加班去了。

那天晚上，我在想，习近平这个人很平和，也颇具特色，有种吸引我的人格魅力。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初次相识后，是否也开始调研，比如收集材料、与县里其他领导干部交谈、下乡调研等等?

周伟思：是的，有这么一个过程。外围采访，收集材料是必需的。

给我帮助最多的是县委办公室的张银耀同志。我请他把习近

平这两年的批示、讲话等帮我找来看看，还有县委书记在正定做过的具体事情，在哪个乡、哪个企业讲过什么，解决过什么问题，什么地方有较大的变化，等等，也请他帮我尽量多地介绍。我下乡村地头采访，张银耀有时候也陪我去。

习近平刚来正定时任县委副书记，当时的县委书记叫冯国强，这位老同志我也拜访了。还有一位姓宋的老书记、纪检书记张五普，以及县经委主任、政研室的同志等，我都与他们进行了交谈。这期间，我还跟习近平一起骑自行车下乡调研过。

当年，记者的装备相当落后，我也不习惯使用录音机、照相机之类的东西。无论采访谁，都是拿一个本子，用笔速记。在正定县采访期间，我记了满满两本笔记。可惜的是，因为我后来工作流动性大，这两本笔记本都找不到了。

后来的日子，我和习近平断断续续的访谈交流大多是利用晚上的时间。一般都在九十点钟以后，我到他办公室去找他。他的办公室面积15平方米左右，四白落地，陈旧的办公桌椅。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个小套间就是他的宿舍，大约10平方米吧，里面放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摆着水杯、瓷碗、热水瓶等。看得出来，他个人生活极其简单，完全没有什么讲究。

采访期间，我短不了离开正定回石家庄，有时开会，有时编稿，忙上几天。这期间，习近平到市里来办事，我还到招待所跟他见上一面，一起吃个便餐，聊聊天。

整个采访过程持续了两个多月。在我的记者生涯中，周期拉这么长的采访，还真是绝无仅有。

采访组：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写的那篇报告文学《“而立”之年》的主要内容吧。

周伟思：这篇文章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主要历史背景，用全方位的视角描述了一位年轻县委书记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以及他成长的心路历程。

文中以我耳闻目睹的真实事例，介绍了习近平自觉提高前瞻性战略思维，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及勇于改革创新的开拓精神。

写作中，我力图用平行的视线，再现这位酷爱学习、宽厚包容、勤于思考、敏于行动的同龄人，试图能让读者从中得到有益的借鉴与启发。

《“而立”之年》是这样结尾的：“是啊，只有当一个人的能力受到最大限度的挑战时，我们才能充分地衡量和评价他。而他，随时准备接受最大限度的挑战。一切，刚刚开始。”

采访组：采访当中，习近平同志有没有向您谈起他抓正定工作的整体思路?

周伟思：习近平说，正定靠近省会城市，有这么好的地理位置，如果只知道在地里种粮食，就把我们的生产力束缚住了。他刚到这里时，工副业占GDP的比例才只有30%，农业仍占到70%。这种情况怎么得了？经济发展的速度离中央提出的“翻两番”、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相距太遥远了！他和同志们商量，必

须要将正定发展的思路进行战略大调整，必须要下决心把上面这个比例颠倒过来，让工副业、旅游业等占到总产值的70%，让农业占到30%。唯有这样，正定的经济发展才能腾飞。

他还说，正定现有的土地和人口规模，有10万劳动力种地已经足够，其他的劳动力，应该更多地投到工业、副业、服务业上面去。正定原来是北方第一个粮食亩产“跨长江”的高产县，但这却成了一个包袱。说起来很光荣，但农民的收入却不高，甚至吃不饱饭，这怎么能行呢？在那种高征购的束缚下，整个县经济发展的步伐很慢，在高征购减下来以后，县委、县政府该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经济上的开放搞活，只有抓住这一点不放手，正定的经济发展才能腾飞。

习近平深深知道，要实现这种理念上的巨大转变，他一个人再怎么强调也是作用不大的，他要将此作为振兴正定的战略思想开展工作，首先提高整个领导班子的认识，并在全县各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一场大讨论。既要让人们弄清楚这些道理，展示出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又要有一步步切实可行的阶段目标。

他每天马不停蹄，经常到乡村去调研，现场办公。他发现乡镇干部每天最繁重的工作就是出席会议、看各种文件、接待上级部门的各种视察检查。而且，下来的领导不管事情大小，都是要找乡镇的“一把手”，这种情况下，基层干部还有多少时间做正事、务实事呢？

这类问题实在太影响效率了。他迅速反应，跟各部门约法三章：除了县委、县政府、公安局外，其他部门一律不许发定期简

报；各行政单位每周必须保证2到3天的“无会日”；必要的工作考核和检查，必须轻装简从、对口接待。

“无会日”执行起来很难。虽然要求很明确，大多数部门开始执行，但还是有实在憋不住的悄悄突破。少数部门仍旧按期发简报。习近平警告他们说：你们要再这么搞，处分相关负责人，没收打字机，就是要让你们难受难受，养成新的习惯！

习近平通过各种方式，终于把基层干部从繁琐的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有时间实打实地去抓生产、抓经济、抓群众生活改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刚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时，教育就是他分管的工作之一，后来他逐步推进吸纳人才和人才培养等工作。请您谈一谈他在教育和人才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

周伟思：关于习近平对正定的教育和人才所做的具体工作，应该分为三个层面来谈。

第一个层面，就是通过教育，优化正定县的“上层建筑”，改变干部的传统思维模式。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虽然沿海地区势头猛、发展快，但内地很多地方，比如正定，依旧很“平稳”，不紧不慢，安于现状，干部的思想不够开放。前面提到，习近平提出翻转农业和工业比例的问题，也有反对声音：一个农业大县怎么能搞70%的工副业，这不是不务正业吗？

习近平认识到，干部观念的转变是当务之急。正定距省会石

家庄这么近，离北京也不远，但对一些新观念、新信息的接受却远远不够，落后的陈旧观念一直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所以，他在各种场合给大家讲沿海地区发展现状、国外的先进模式和改革开放的一些新理念。

同时，他也大力抓干部的素质教育。习近平参加省、地、市的县委书记政治、经济知识统考回来后，马上要求县直机关干部们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等。他亲自出题，把一些新的知识、新的思想、与改革相关的一些问题，结合本地实际进行考试，并亲自监考。通过这些，让干部们加强学习、转变观念。后来，县机关两名电大学员的几门科目年终考试分数竟然高于北京的学员，习近平得知这个消息，开心地说：“应当好好庆贺！”在他的提议下，县里为党政机关一些干部开办了初高中文化补习班。

正定县委政研室的同志们对此作了概括：正定县教育干部，促使队伍素质提高，把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后备干部培养起来。县委书记对此紧抓不放，因为这是正定县经济起飞的基础。人才战略，是一切战略的战略。

第二个层面，就是抓教育的同时，也抓人才的引进。县委、县政府的大门边破天荒地挂了一块人才技术开发公司的牌子。县里还登报求贤，列出优惠条件招聘需要的各类能工巧匠，由这些“外来和尚”带动本地人才的创新思维和技能更新。

那时候，正定的中学教学水平已经算不错的了，高考升学率也比较高。习近平给分布全国各地的正定籍大学生写了一封信，

信上说：“国家需要你们，正定的各项建设事业同样需要你们，家乡四十五万人民热忱地期待着你们，殷切地希冀你们为正定繁荣出力献策。”他表示，如果毕业以后在外地工作，希望他们能尽量想办法和家乡挂钩，为家乡作贡献。如果能回家乡工作，政府将尽可能地为他们创造好的工作条件，各方面予以支持。

当时，正定县各行各业都需要发展，一时间找不到那么多相对应的人才。习近平想尽办法，把很多专家学者请到正定来，请他们当顾问、作辅导，让他们为正定的发展出谋划策。同时，他还请了很多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人才，让他们到正定来指导企业、开办公司，有的人还是带着项目来的。他们确实为正定的商品经济发展作了贡献，同时也带动了正定本土人才的成长。

习近平对于人才的态度，可以从一件小事上看出来。

有天晚上，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进门，见他手上拿着两页纸，在窗前边看边踱步，我说：“忙着呢？”

他神色兴奋地跟我说：“这是村里一个小青年写的信，把我给骂了一顿。他认为县委抓商品生产雷声大雨点小，说我要花架子。他还从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习近平把信递给我看。我大致看了一遍，问他：“怎么答复？”

“这小子好像有点水平，想法也基本对头，闹不好还是个人才呢。”他笑了，“这样，我派人去考察一下，如果这个青年果真不错，我们就请他出来抓村里的商品生产。”

之后，习近平被叫去接电话了。我坐在那里吸烟，心想：他

作为一个县委书记，接到一位农村青年指责他的来信，第一反应是发现人才的兴奋，是对这位农村青年的赏识。30岁的习近平能有这样的胸怀，很是让我钦佩。由此也能看出，为了发展正定，他对人才的渴望是何等强烈。

第三个层面，就是重视基础教育。还是举一个我亲眼见到的例子。

有一次，我跟他和县里两位同志一起下乡，去检查基层办教育的情况。我们先去看了一个村里的小学。一进学校，习近平就皱起了眉头。

太不像样了，一条马车、拖拉机来回乱跑的大道就算是操场，嘈杂而且危险。十来间教室的窗户，没有一片玻璃是完整的，窗户上蒙着的破旧塑料布在风中“哆嗦”。“育红班”的孩子们乱糟糟地挤满一屋子，凳子不够，有的孩子只好坐在地上。

习近平问校长：“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么破败的学校，你们怎么看得下去呢？”

校长一时语塞，无言以对。习近平严厉批评他说：“这个学校，让人看了痛心！这些孩子到了21世纪就要成为村里的顶梁柱，可现在给他们提供的是什么成长环境呢？学习的课桌是水泥板的，比凳子还低，你去趴半天试试？这样子不但培养不出人才，倒是先要出一批驼背、近视眼！你们怎么能这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村主任赶过来了，赶紧向习近平作解释：“村里并不算穷困，一年大约有十来万元收入，但对学校的改善一直没顾上，不

够重视，到时候……”

“到什么时候？你说得清吗？”习近平脸色愈发严肃：“你们今晚就开会落实整改，下星期去县教育局报计划。至少先要有窗户玻璃，有木头的课桌板凳。就你们村的条件，不应该把小学搞成这个样子，你们完全有条件改善好。如果你们还不行动，就要撤你的职！这件事还要告诉乡里，乡党委也要督促过问，否则，他们要负‘连坐’责任！”

村主任连连答应。习近平临走时对他们说：“你们呀，对不起你们的子弟。”后来有人对我说，这是习近平来正定后的第一次发火。

习近平对教育的重视，从他刚来到正定当县委副书记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了。我跟习近平在正定的一个好朋友——贾大山也有过几次接触。他跟我说：“习近平刚来到正定的时候，他主管的工作就包括文化、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等内容。他抓文化、抓教育很上心。而且，他尊重文化人，有文化底蕴。他来的时间不长，对正定的历史和人文掌故等就能参与深入交流，他的阅读量和他吸取新知识的能力让当地的一些老‘秀才’、老‘笔杆子’都很吃惊。”

采访组：从您的讲述中，我们感觉您当时已经和习近平同志成为联系较多的朋友了。除了谈工作外，你们还聊过其他话题吗？

周伟思：在当时，也可以说是工作加朋友关系吧。采访之

初，他给我讲了他的知青经历、来正定的初衷等等，我也讲了一些我的过往及感受，两人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三观”比较接近吧。后来相处时，我们之间很快就变得自然而随意了。

我们平时所聊的内容，也就不仅限于工作了。我们不仅年龄相同，经历有些相仿，而且，我在正定这里可以算是个“局外人”，他跟我聊天可能会放松许多，我们曾聊到共同看过的书，谈中外历史，评价历史人物，有时还涉及社会传闻、各地风俗习惯、个人生活等等。

有个星期天，在他那间小宿舍，我俩一边喝点小酒一边聊天，吃的是花生米、猪头肉，不知不觉到了凌晨3点钟。近平说：“太晚了，外面还下着雨，你就别回去了，在这儿凑合躺一会儿算了。”于是，我们俩就和衣而卧，侧身挤到那张小床上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7点半吧，我听见门嘎吱一声就醒了，只见习近平从食堂买了个馒头回来。他说：“咱俩就不喝粥了，都还有事，咱们喝点咖啡，精神一点。”

他拿出一罐咖啡，可能是北京朋友给带来的。那时候在那个地方这东西还是个稀罕物。我们两个用喝粥的碗冲了咖啡，一边喝，一边吃咸菜、馒头。这顿土洋结合的早餐，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有很多次谈到自己看过的书。插队时，我和他一样，都是想尽办法找书看。在当时的那种政治氛围下，本来可看的书就很少，那些古代和外国的名著差不多都属于禁区，即使冒险犯禁“偷窥”，能弄到手的还是非常有限。有时实在闹书荒了，甚至见到有字的东西都“饥不择食”，过期报纸，残缺杂志，甚至连

《赤脚医生手册》都一页页翻完。

习近平的情况则不同，他从北京去陕北的时候就带了两箱子书，他和他同伴们的“书源”比一般人还是要多一些。所以，两相比较，他的阅读范围比我要宽广不少。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共同看过的书，比如中国古代四大名著，苏联、法国的一些小说，但他看的那些涉及哲学、经济、政治方面的书籍，很多都是我望尘莫及的。

我们这一共同爱好都一直保持下来了，但由于工作岗位的不同，我们的阅读方向仍然各有侧重。

有件事应该能说明问题。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们那届“老初一”，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报名参加的勇气，因为我们初一还没放暑假，“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就再没上过课了。现在有了机会，但底子实在太薄太空。正在工厂当学徒工的我，仗着读书较多，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要尝试一把——当然只能选择文科，靠语文、政治、历史、地理拿分，数学没学过，干脆忽略不计。这样，在正常上班外，其余时间全部像魔鬼训练般地疯狂复习。

考试结果出来，我数学得了7分，但其他各科成绩都是全省比较靠前的，于是我侥幸成为了78级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

现在我在想，如果习近平当年没有被推荐上清华，如果1978年他和我一起参加高考，他的成绩应该比我还要好。

在他正定的办公室和宿舍，书架里、办公桌上、床边，都是触手可及的各类书籍。我印象中有《大趋势》《决策学》《棉花栽培技术》《走向未来》丛书等等。

此外，我们还谈到过老电影、老歌曲等等这些知青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习近平爱好比我更为广泛，我从小对体育方面兴趣不大，而他非常喜欢足球，还有篮球、拳击和摔跤等等。此外，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美国的西部片等等他也兴趣不小。记得有一次我说我对武侠片不太感冒，他说："工作多、脑子乱的时候，偶尔作为一种消遣，可以帮助缓解一下压力，放松放松。"

有时候，他北京的朋友来正定看他，我也参加他们的聚会，大家无拘无束地谈天说地，带来很多新鲜空气。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是否也从外地来的朋友身上获取了一些改革的信息和创新的思路呢？

周伟思：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的这些朋友，有的是给正定介绍合作项目的，有的是来推荐技术人才的，有的是给他送书的，还有的是专门来看他的。在与他们的交流当中，习近平获得了很多重要信息。

当时不像现在互联网时代，上世纪80年代初，电视机还没普及，人们除了通过报刊、广播了解外面的世界，再就是当面交流传递信息。

习近平与朋友相聚时，说话不多，总是面带微笑认真听着大家七嘴八舌，有时也会针对性提问或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在一旁还观察到，不管他的朋友发言是有条有理的，还是咋咋呼呼的，他都能不动声色地听他们把话说完，不会轻易去打断别人的兴头。

他善于通过各种机会，时时刻刻吸纳新东西，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各种变化，尤其注重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向。虽然是业余时间闲谈，但他关心的东西还是和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相关的。

习近平当年在正定所做的很多事情，如开发旅游项目，力推工副业、服务业的扩展，现在看起来好像不算什么，但在当年当地确实需要很大勇气和知识储备才可能去做。

在那个阶段，正定县上上下下开展的发展战略大讨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当然是习近平本人。不过，他对自己的评价倒有点“见真佛只谈家常”的味道：“我常常务点虚，讲新产业革命，讲第三次浪潮，讲80年代的领导方法。我只是想起一点酵母的作用。”

习近平不止一次给县委、县政府一班人，还有县机关的工作人员、乡村干部说过这样一件事：一群根正苗红的参观者到近两年商品生产取得长足发展的广东省南海县观摩考察，他们看到农民穿了西装、打了领带，甚至穿了牛仔裤、花衬衫，贸易市场上的大小“财东”比高级干部还阔气，街头的茶座里飘着他们听不懂的音乐。一到晚间，霓虹灯光怪陆离，他们眼花了、头晕了，不禁抱头痛哭：“我们辛辛苦苦搞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没想到资本主义这么快就复辟了！”

每当习近平讲到这里，不同的听众都会哈哈大笑起来。其实，习近平就是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慢慢转变干部的思想观念。

习近平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毕竟有过几年大队支书的实践，对农村的人际关系、农村亟须解决的问题，包括生产技术、水利建设、生活条件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很清楚。陕北和河北，同处北方，农作物品种相差无几。如果换另外一个常年在机关工作的人下来担此责任，指导农村工作，恐怕会很吃力。在农村一些相对复杂的问题上，下面反映给他的难题，甚至有乡党委书记跟他请示一件麻烦事，他很快就会给出一个想法，告诉该怎么解决。有些乡党委书记和他相比，可能还没有他的基层工作时间长呢！

同时，他还有一种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战略眼光和务实精神这两点结合起来，很了不起。当年，他虽然只是个县委书记，但他的眼光并不只是放在县里的大事小情上，他实际上是把正定作为中国农村的一个试验点，通过在正定，把他心里的想法付诸实践。他还在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专家的帮助下，搞了一个农村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就设在一个村子里，人员都是兼职的，他们通过认真探讨、研究，就“三农”方面做了很多小范围的试验，其中包括分配制度、土地制度、村级选举，还有具体到经济作物的选择、新品种的选育、新的农业技术推广、农业设备的分配、农村基本建设、乡村的房子、环境、公共设施配套等等，为农村发展中的很多具体问题开辟了“试验田”。习近平还把一些国外乡村发展的新模式，也放在这个研究所里进行实验，全方位地去寻找中国农村未来的发展道路。这个研究所做了很多非常有益的探索和实践，给正定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1983年8月，习近平（右一）到河北省河间县考察棉花生产。

很显然，花精力和成本搞这种着眼于长远、难见短期效益、失败风险不小的探索实验，对于某些急功近利的地方领导干部来说，肯定是提不起兴趣的。

我和他同样当过知青，我也短期当过生产队长，但我那时打心里不愿在农村扎根，只想尽快跳出“农门”，在对农村的理解、对农民的感情等方面，他都值得我学习。习近平在梁家河与正定时期，都要比我在农村时用心许多，别的不讲，他对老百姓那种发自内心的亲切与关心，我是亲眼见过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农民和农村的感情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您能举个您亲眼见到的具体例子吗？

周伟思：好的。一天傍晚，我和他在他办公室正说一件乡镇企业的事，一个农村大娘推门就进来了，嗓门很大：“习书记，你要为我做主啊！”接着就诉开了冤情。她口音较重，我听不太清，好像是在说她和村里人的纠纷。

当时我想：怎么这样？正定全县几十万人，如果谁有事就直接找县委书记，那还了得！但习近平显得一点儿也不着急。他请老太太坐下，给她倒了杯水，让她慢慢说。

我随他下村时，他很自然地和农民一起坐在地上、石头上，和他们聊庄稼活，拉家常。去农户家，老百姓拿个饭碗给习近平端水，他接过来就喝，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和嫌弃。

采访组：经过采访和调研后，您为什么确定用报告文学这种

体裁呢？

周伟思：关于怎么写，我是采访过半后才开始考虑的。如果用通讯、特写之类的形式，我觉得不足以展现他的内心精神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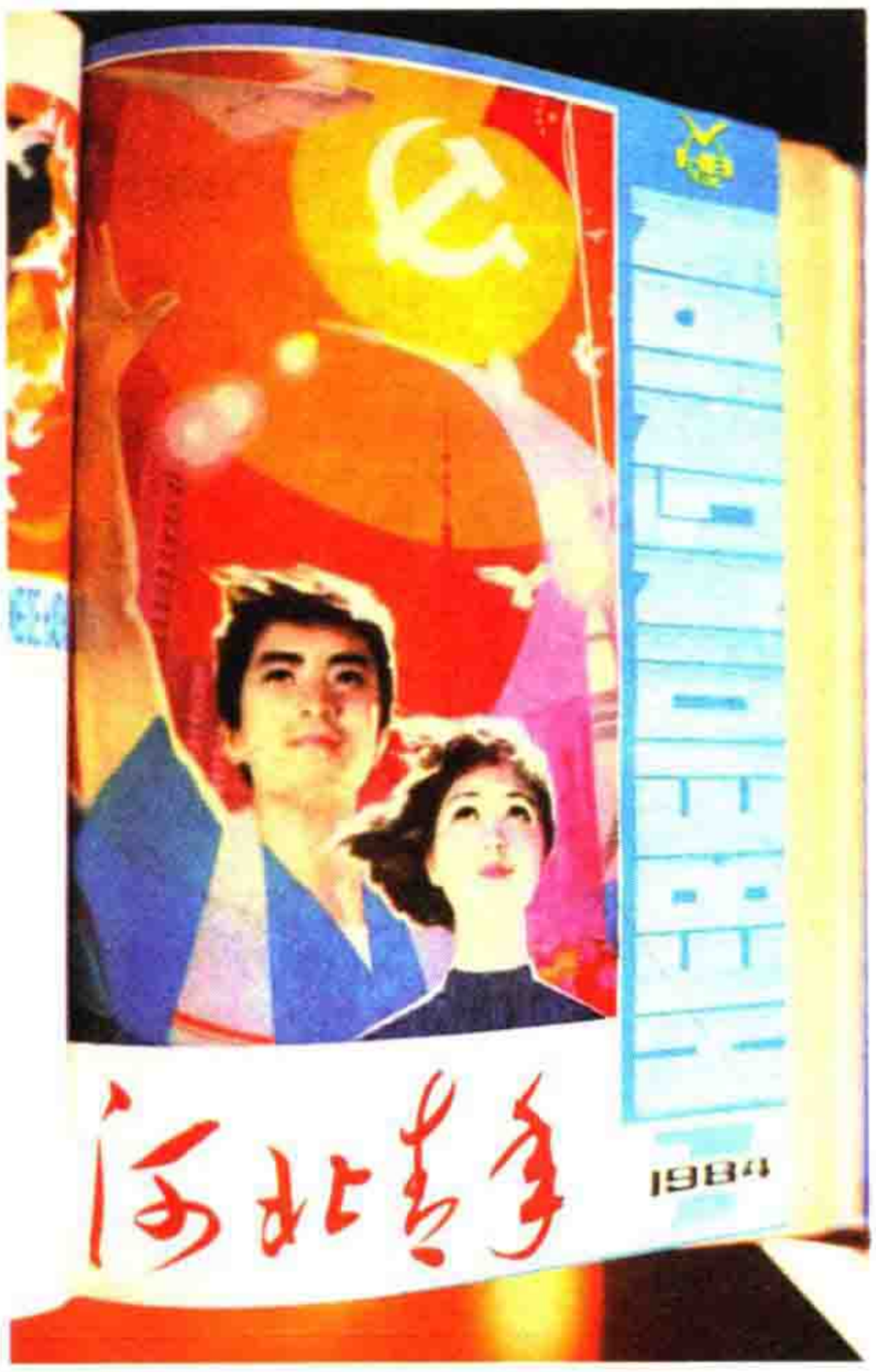
我跟他说：“近平，你的经历，你现在的工作生活都让我觉得新鲜，别有意味。现实生活里，年轻人中，有不乏高谈阔论的，也有闷头自我奋斗的，像你这样既目标明确，又全身心投入实践的，对年轻人很有启迪意义。这次我不想用通讯之类推出一个模范干部典型，我打算用小报告文学的形式来写你，这样，便于将你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作较详尽的叙述，尽量用全方位的视角给读者介绍一个可亲可信、有血有肉的年轻干部。”

他微微一笑，“这样也好，《中国青年》上不是正在争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吗？你实事求是地写写我的实践与体会，就算我从基层青年干部的角度发个言吧。”

我又补充说：“我不会去强调你的政绩，也不搞数字罗列、前后对比之类。多讲具体事例，尽可能还原真实。描述一些你成长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就像与读者交流交流对时代的认识、对人生的感悟。”

他点头认可了。

就这样，我们基本敲定了这个稿子的写法和基调，我便回石家庄开始动笔起草那篇《“而立”之年》了。初稿出来后，我特地去正定让近平同志提修改意见，他让我尽量删掉溢美之词，同时提出，对他们发展正定经济的有关设想方案先不要写。



一步实际行动胜于一打纲领

保罗。

"这只自行车，是我们的吗？"当我们在学校门口看到这辆崭新的自行车时，我们都禁不住问起来。

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我们学校的经费一直很困难，教师的工资也很低，大家都过着清贫的生活。

"这只能是别人借给他的。"

"不，是他自己的。"

"他哪来的钱？"

"他爸爸给的。"

"他爸爸的钱，不是也很少吗？"

"大概已经下乡插队了。"

"也不像，应该，是他。"

"他？"

"是他。"

"他爸爸给的？

采访组：稿子发表后，你们在工作上不再有那么多接触了，后来是否还有联系呢?

周伟思：有联系，偶尔还见见面。

有一次，石家庄的一帮湖北老乡，约我周末到正定去玩，因为正定素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之称，古迹较多。

我跟他们说：“正定的书记跟我算朋友呢，要不，让他请咱们吃顿饭？”

大家当然想见见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我给习近平打电话说明原委，他说：“行啊，周末我正好在，你们来吧。”

星期日，我们上午游览了隆兴寺等古迹，中午就到县招待所去了。

我们到招待所时，习近平正好也来了。他自掏腰包，用几盘农家土菜招待客人。席间，我给他一一介绍，老乡中有机关干部，有工程师，还有部队的同志。近平热情地和大家聊开了家常，还时不时请教相关专业知识。

后来，我还向他推荐过一些新出版的书籍。有一次，我看到一本叫《夜与昼》的长篇小说，描写了当代中国自上而下发生的巨大变化，内容主要是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涉及范围较广、较深。我就给近平打了电话，建议他抽空看看。他问了主要内容后说：“好，我马上去找。”

不久之后，我见到他。他说：“你知不知道《夜与昼》又出了第二部？”我说：“不知道啊。”他说：“叫《衰与荣》，我已看

过了。”

采访组：您记得真清楚啊！

周伟思：是啊。这一晃30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对习近平的采访，应该是我新闻工作生涯中，印象很深、收获很大的一次经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后，你们之间还有交往吗？

周伟思：他在调往福建临动身的前一天，特地到石家庄跟朋友们相聚话别，那天大概去了20多人，我也在被邀请之列。

习近平到厦门后给我来过一封短信，告诉我他的电话，说有机会欢迎去厦门见面。

1986年元旦刚过，我去杭州参加一个笔会。我事先给他打电话，说会后顺道去厦门会会他。他说，好呀，欢迎你来。

1月19日，我坐火车到了厦门。那天，我是下午4点左右到的。我一进宾馆房间就跟他联系，他说：“你把房退了吧，马上到我宿舍来，离得很近。”

我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住的小区，是三楼一个不大的单元房，所谓“客厅”只是个过道，里面有两间卧室。

坐下后，他说：“真不巧，我明天有公务要去北京，是明天早上的飞机。你今晚就住我这里，留两天在厦门走走看看吧。”

我说：“厦门我来过的，这次是专门来看你的啊。这样吧，我明早跟你去机场，如能补上机票，正好跟你一起飞北京，再回

石家庄就方便了。”

我们俩出去吃了晚饭，边散步边聊天回到他家，到家后又谈了一会儿各自的近况和其他话题。

第二天一早，我俩起来做早餐，他说：“你去烤几片面包，我煮牛奶。”我看了一眼那个烤面包的小铁盒，赶紧说：“不会用这玩意儿啊，我煮牛奶，你烤面包吧。”

就这样，习近平烤了几片面包，让我从冰箱里拿出两个咸鸭蛋——我们在一起又吃了顿土洋结合的早餐。

后来，我们俩几次迁徙，调动工作，联系就渐渐少了。

采访组：您与习近平同志这些交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我们非常感动。请您谈谈对他的总体印象。

周伟思：第一，他有着非常强烈的使命感，始终有自己清晰的奋斗目标。

第二，他意志坚定，而且脚踏实地、低调务实，善于学习，特别沉得住气，看问题不过激、不偏颇，对事物能全方位地理解和把握。

第三，他包容性很强，待人诚恳厚道，能主动吸取各方面的信息和建议，能与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交朋友。

第四，他非常了解国情，从大队支书到总书记、国家主席中间那么多阶梯，除了乡镇这一级外，其他则一步没少。

从黄土高原到东海之滨，从山村窑洞到繁华都市，他通过亲历或了解，对各个阶层各种环境的理解程度，是一般人无法比

拟的。

还有一点，就是习近平非常有大局观和创新精神。在不同时期，他始终能洞悉和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

因此，在当代，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位立足本土并具有全球视野的优秀领导人。

『习书记制定「人才九条」的过程，也是正定解放思想、促进改革的过程』

习书记这种为了党的事业敢于担当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回想34年前，习书记招贤纳士博揽群才、焕发正定勃勃生机的这段历史，至今令人难以忘怀。是他，打开了正定改革开放的大门，吹响了富民强县奔小康的号角，这浓彩重笔的光辉一页，将永载正定发展史册！

采访对象：李乃毅，曾任河北日报社记者。1983年3月，采访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撰写以“人才九条”为主要内容的《正定县为有志之士敞开大门》一文，《河北日报》3月29日头版头条刊发。后任石家庄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采 访 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2月27日

采访地点：石家庄市翠屏山迎宾馆

采访组：李乃毅同志，您好！1983年3月29日，您在《河北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正定县为有志之士敞开大门》的报道，在全省乃至全国引起很大反响。特别是著名的“人才九条”举措，对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吸引人才到正定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请您详细谈一谈这篇报道产生的过程。

李乃毅：我1977年到河北日报社编辑部工作。1983年3月初的一天，正定县委宣传部报道组的同志找到我说：“我们正定为了把经济搞上去，实现‘翻两番’目标，县委要面向全国招贤纳士，准备出台一些举措吸引人才，习书记想和你谈一谈。”

因为我在政教部分管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新闻采编工作，同时也写过一些这方面的报道，便欣然应邀前往。习书记热情接待了我，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一张办公桌，对面放着旧书柜，有两把帆布折椅，还有两个板凳支的木床，上面铺着带补丁的褥子。就在这样一个简陋的办公室兼卧室里，我俩面对面，打开了话匣子。

习书记首先告诉我县委为什么要出台政策招聘人才。他说，正定是一个产粮大县，每年上缴粮食7600万斤，对国家贡献很大；又是一个“高产穷县”，老百姓生活困难，县财政资金拮据，城建、医疗、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欠账很多。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改变这种状况，否则“翻两番”目标无法实现。具体来说：一是农业不能“单打一”，不能只种粮食，还要发展多种经营。二是要发展企业，创新项目，引进技术，尽快把工业搞上

去。可是正定的工业基础薄弱，现有国营企业管理水平不高，产品销路不畅，有的经营困难，有的面临倒闭。要搞活企业，最重要的是要有优秀的企业领军人物，县里恰恰缺乏这方面的人才，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怎么把人才引进来。

习书记说，打算出台一些吸引人才的政策，希望通过省报宣传出去，面向全省、全国，把那些懂经营、会管理、有技术的各路人才请过来，帮助正定加快发展。同时，这些人才也可以找到施展才能的舞台。

听了这番话，我觉得习书记的想法非常好。一是他看准了发展战略的支撑点——人才依托；二是找到了市场经济的制高点——人才竞争；三是抓住了聚集要素的关键点——人才政策。我对习书记说：“您的想法很好，我完全赞成，我会尽我所能写好报道宣传出去。但关键还是要看县委出台的政策是否具有吸引力、感召力，只有政策打动了人才的心，他们才会从四面八方奔正定而来。”

习书记谦虚诚恳，耐心地听取了我的建议。我把在报社采访实践中所接触到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人员的处境、困难、顾虑、期盼以及具体人物事例，向他作了详细介绍。他认真倾听，一一记在本上。在以后的时间里，习书记又在忙碌的工作中，抽出3个半天时间与我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习书记从政治态度、工作环境、利益分配、奖励机制、调动手续、生活待遇、家属安排、来去自由等九个方面，大胆突破，有针对性地提出独到的优惠政策。大到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河北日報
HEBEI RIBAO
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点，招贤纳士，博揽群才
正定县为有志之士敞开大门
加速绿化的一个重要
三千多育苗重点户为绿化
李锋同志检查省会义务植树
小鲤林场防护林带重新形成
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点，招贤纳士，博揽群才

正定县为有志之士敞开大门

本报讯　中共正定县委和县政府认为：人才是国家兴旺发达之本。没有人才，县不能富，县不能强，富州富无从谈起。为此，县委、县政府三月二十三日决定采取九条措施，招贤纳士，博揽群才，加速发展正定经济建设。

一，热烈欢迎外地各种科技人员来正定帮助发展县、社、队企业。对搞成的每个项目，只要产品有销路，其利润由双方商定比例分成，或给一次性总付酬；贡献突出者，县委将予以记功、记大功、晋级、晋职。在农村的家属户口优先转吃商品粮，并给家属、子女安排适当工作。

二，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点，凡有技术专长者一律接收。其中包括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过去犯过错误已经改正的；曾被当做“资本主义”典型批判至今仍不被重视的；由于社会上的偏见，使其科研工作遭到压制的；没有学历而自学成才的。

三，工作调动由县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办理。若一时办不齐手续，可先来后办，原工资照发，粮食定量不变（全部细粮），工龄连续计算。今后根据贡献大小另行确定工资数额。对不能调入我县工作者，可短期应聘或兼任我县某方面的经济技术顾问。

四，凡为全国各地技术人员提供试制新产品，推广新技术所需要的工作、生活条件。新产品一旦投本县采用，即付重奖；收到经济效益后，利润按比例分成，或给一次性总付酬。同时也允许研究项目失败，不追究责任，工资报酬、往返车费照付。

五，调入的人才，由县委、县政府统一安排使用。出现问题，县委、县政府领导亲自加以解决。

六，兴建“人才楼”、“招贤馆”，设立人才服务处，对人才统一管理，配备助手、车辆，做到随叫到屋，送稿到户，解决生活上的后顾之忧。

七，成立技术开发公司，吸收人才，接受新产品、新技术；对科研人员和自学成才青年正在业余研究的有前途的科研项目，若愿意给予本公司，将尽力协助解决经费困难。

八，积极鼓励、扶持城乡团体和个人自筹资金和外地大、中专院校签订联学、代培合同，定向培养人才。教授、学者、工程师及有技术专长者应聘来县讲学，指导企业经营管理，车接车送，免费招待，并发津贴费。

九，实行人才流动，调入该县的科技人员来去自由。本人一旦感到自己的技术专长不能有效发挥时，可以调到所向往单位，县委、县政府不加阻拦，并给予提供出走方便。

目前，正定县九条措施开始实施。据悉，已有外地科技人员前往洽谈调动或技术转让事宜。

（本报记者　李万敏）

1983年3月29日，《河北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正定县为有志之士敞开大门》的报道。

放开经营自主权、入股分配、奖励机制、家属“农转非”、建“人才楼”、设人才服务处，小到生活上提供“全部细粮”、送粮到家、搬煤到户，习书记逐条认真思考，逐句仔细斟酌，逐字反复推敲。我不过是按照他的思路和要求，写成报道文稿罢了。所以说，习书记制定“人才九条”的过程，就是这篇报道产生的过程。虽然报道署名是我，但“人才九条”是主体内容，所以它的真正作者不是我，而是习书记。

采访组：“人才九条”突破当时有关政策的制约，都遇到了哪些困难？

李乃毅：“人才九条”文字不长，不过千字，内容却事关各方。利润提成涉及分配制度，人才流动涉及人事体制，细粮供应涉及粮食政策，农转非又涉及户籍管理。比如人事调动，当时政策是不允许各省市间自由流动的。30多年前和今天不一样，工厂管理者、科技人员属于国家干部，不能自主选择供职单位，一切都由组织分配安排。你想调走，除非所在单位同意，否则你走不了。因为档案是每个干部职工所有的证明文件，你非要走，档案不给你，你的党籍、公职、工龄、工资在新单位接不上，你的户籍在异地落不了，你的口粮在粮店买不到，生活都成了问题。所以，档案关系转不到正定是不行的。针对这种情况，习书记大胆提出，凡是正定急需人才，派人员与原单位友好协商，以最大的诚意争取理解支持；本人决意到正定工作，原单位坚持不放，档案不给，县委、县政府责成组织人事部门重新建档接续关系。这

一做法，突破了人才工作调动的瓶颈。尽管困难很多，但经过各方共同努力还是做到了，这确实是需要眼光、胆识和勇气的。

采访组：当时除了工作调动，引进人才还有哪些阻力？

李乃毅：阻力很多，尤其是在思想观念上。1983年，改革开放还不久，我们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间不长，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没有从“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还有很多人对知识分子存有偏见。比如，“给人才提供全部细粮”这一条，就有人不理解。那个时候，包括习书记在内所有干部、职工，都是吃60%的粗粮、40%的细粮，这是国家的规定。给引进的人才供应100%细粮，当时有的人不理解，为什么让他们吃100%的细粮，而我们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就要吃粗粮？在分配方面，也有人激烈反对。我们干部职工每个月工资才几十元，他们一张纸上写个配方，技术转让费就要几万块，有了利润还要提成，凭什么呀？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对知识、对人才、对先进生产力的认知程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给引进人才这么多优惠条件，一些人确实难以接受。怎么办呢？习书记首先统一县委一班人的思想认识。他亲自带队到南方改革开放前沿地区考察，然后召开全县干部动员大会，讲形势、谈发展、绘蓝图、论人才，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通过相互交流，形成全县共识。可以说，习书记制定“人才九条”的过程，也是正定解放思想、促进改革的过程。

采访组：“人才九条”定稿后，《河北日报》是什么态度？是怎样决定发表的？

李乃毅：稿子写好后，我送给习书记审阅。过了几天，习书记对我说，县委已经研究同意了，你可以拿去发表了。那时正定县属石家庄地区领导，我建议先把稿子送到地委机关报《建设日报》刊登，以示尊重。习书记表示同意，就请县长程宝怀把稿子送到了《建设日报》。几天后，习书记又找到我说，《建设日报》把稿子退回来了，看你们省报能不能发吧。习书记没有跟我说《建设日报》不给发表的原因，也没有任何不满和埋怨。当时我想，“人才九条”确实突破了一些现有政策的制约，可能是地区的同志拿不准、不敢发。于是，我把稿子直接送到了河北日报社总编辑林放同志手里。他是一名老新闻工作者，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地记者，政治思想理论水平很高。他看了稿子以后，给予充分肯定。他认为“人才九条”思想解放、观念创新，完全符合中央精神，应该尽快发出去，决定第二天在二版头条位置刊载。那时候，中央、省委的活动报道很多，一般都占头版头条。像县委一级的报道，要想上头版头条很难，即便是很有分量的稿件也要等。我建议宁可等几天，还是上头版头条为好。林放同志采纳了我的意见，5天后，也就是1983年3月29日，“人才九条”终于在头版头条发表。眉题是“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点，招贤纳士，博揽群才”，正题是“正定县为有志之士敞开大门”，并且加了花边，以示重要，这是很少有的。

采访组：《河北日报》发表这篇报道之后，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和效应？

李乃毅：“人才九条”发表后，省内外媒体（包括《建设日报》）纷纷转载报道，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教育家潘承孝等50多名高级专家学者，应聘参加了习书记组织的经济顾问团。于光远和数十名顾问先后到正定讲学，为正定发展出谋划策。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00多名科技人员来函咨询、提供项目、联系工作调动，许多人是拿着报纸找到正定县政府的。习书记带领县委、县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乡镇干部，用心落实“人才九条”，热情接待应聘人员，认真解决实际问题。仅一年多时间，一大批优秀人才和好项目就在正定安家落户。长期亏损的工厂扭亏为盈了，库存积压的产品畅销全国了。195型柴油机、精细化工“碱性玫瑰精”、“三露”（今日的“大宝”）化妆品、优种“冀棉2号”等一批优质产品投产。有的填补了我省空白，有的获得了省市“科技进步奖”，并且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不仅如此，县委、县政府还依照“人才九条”精神，积极挖掘本地人才，组织人事部门对全县各界人才进行普查，登记造册，建立“人才账”。不论身份，唯才是举，择其专长，量才使用。同时，通过讲习进修、脱产培训，提升干部素质，展开经联协作。先后与全国32所学校、21家科研单位建立协作关系，引进人才和项目，并以此为突破口，创办了131家乡镇企业，扩大了村民就业，增加了经济收入，提高了群众生活水平。

很快，人才效应就反映到县里工作的其他方面。习书记刚来正定的时候去学校调研，他看到透风漏雨的危房教室，趴在土台上写字的孩子，半年多拿不到工资仍坚持教学的老师，心情沉重，非常难过。他多么想给老师、孩子们改善一下教学条件，可是拿不出钱来啊！如今县财政收入增加了，他可以做以前难以办成的事情了。县委决定，教师工资开支列入县财政预算，每月与干部同时发放。县里筹措187万元资金改善办学条件，对1020间教室危房进行维修或拆除新建，给孩子们购置木课桌椅3000余套，16个村新建了教学楼。13个公社建立了文化站，45个村成立了俱乐部。不仅如此，对县城的主要街道重新规划建设，对重点文物古寺楼塔进行修缮保护。建起荣国府，带动旅游发展。同时开展“五讲四美”精神文明建设，改变陋习，治理环境，清洁街道，美化县容，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主持制定的“人才九条”，使正定的人才机制更加开放和包容，大大促进了正定发展。请您谈一谈习近平同志在正定重视人才、尊重人才的具体事例。

李乃毅：我在与习书记接触中感受到，他确实爱才，可以说，他遇才起敬，得才欣喜。“人才九条”出台后，他为了把石家庄市的一位新产品发明人请到正定办厂，晚上亲自到桥东区谈固小区登门拜访。小区楼房很多，不知住在哪个楼，习书记便用双手作喇叭扯起嗓子高喊那个人的名字，边走边喊，终于找到了他的家。当习书记了解到发明人在研制新产品过程中，他的儿子误

服试剂导致再生障碍性贫血时，立刻答应把技术转让费再提高一些，以便给孩子治病。这位工程师深受感动，很快在新城铺乡办起了日化厂，当年盈利39万元。这对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乡办企业来说，已经是相当可观的数字了。

正定有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叫贾大山，为人正派，性格耿直，说话直来直去。习书记刚到正定工作时不满29岁，贾大山不屑地说："来了个嘴上没毛的人管我们。"这话传到习书记耳中，他不但没有生气，而且还主动去贾大山家拜访，请教如何才能把正定的事情办好。习书记在与贾大山交往中发现，贾大山这个人德才兼备，坦诚务实，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于是打破非党人士只能担任副职的惯例，把他直接提拔为县文化局局长。贾大山当局长后，各项工作干得很好，受到人们称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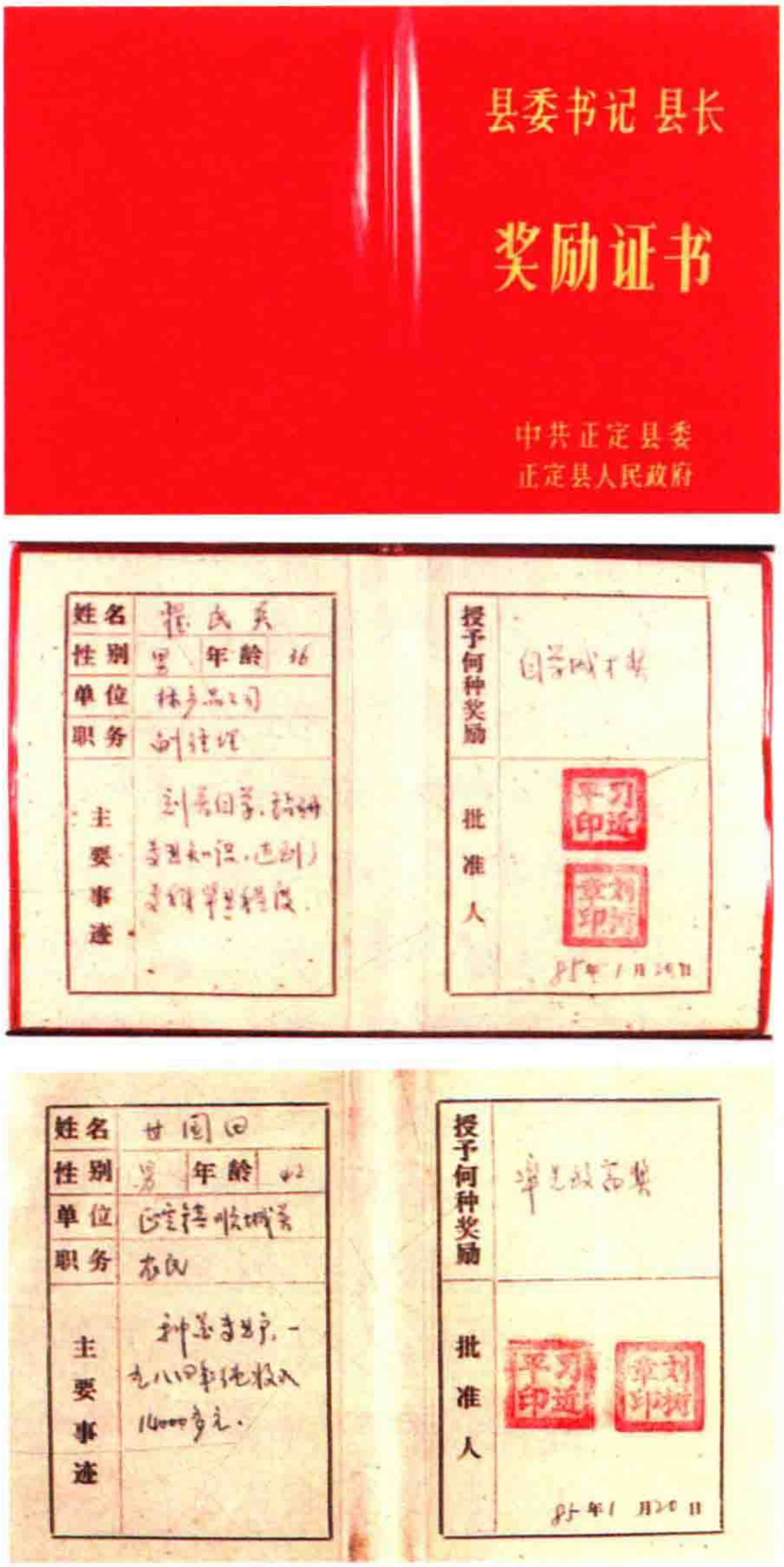
这仅是两个事例，像这样的事还有许多。在"人才九条"中，可以处处体现出习书记思人之苦、谅人之难、成人之善、容人之量。像"允许研究项目失败，不追究责任，工资报酬、往返车费照付"，"一旦感到自己的技术专长不能有效发挥时，可以申请调到所向往单位，县委、县政府不加阻拦，并给予提供出走方便"，等等。我想，正是习书记这种善政为民、厚德待人、求贤若渴、敬士如宾的人格力量，使有志之士心甘情愿会集到正定，凝聚在他的周围，为共同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采访组：您通过采写报道习近平同志制定的"人才九条"，都有哪些比较深的感触？

李乃毅：主要有三条。一是习书记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思想作风。“人才九条”发表后，据我所知，有一些同志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既有赞成支持的，也有怀疑反对的。有的说“行不通”，有的说“拿不准”，有的嘲讽“出风头”，还有的叫嚷“瞎胡闹”。一时间在本地、本省引起一场大讨论，甚至波及全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习书记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但他心静如水，坦然面对。因为习书记不拘一格博揽群才的目的是富民强县，他衡量正确与否的标准是看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是不是对人民有利。所以习书记不惧非议，继续一步一个脚印去做，全面落实各项承诺，用事实证明“人才九条”是正确的，最终赢得了人们的理解、支持、拥护。

二是习书记运用创新思维，革旧除弊，解决发展中主要矛盾的工作方法。习书记来到正定之后，通过调研深深感到，造成正定“高产穷县”的主要原因是农业大、工业弱，产业结构不合理，尤其是企业基础薄弱，没有叫得响的产品，缺少懂市场、会管理、能研发的人才。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将第二产业做大做强，就必须把优秀的管理、科研人才引进来，把好的项目拿过来。习书记紧紧抓住引进人才这个“牛鼻子”，积极面对市场经济要素聚集与原有计划经济政策间的矛盾，主动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大胆冲破旧有体制条条框框的束缚，积极运用务实政策导向，吸引大批人才、项目在正定落地，使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三是习书记为了党的事业敢于负责的担当精神。“人才九条”



习近平任正定县委书记期间，重视发挥人才作用。上图为1985年为优秀人才颁发的“自学成才奖”“率先致富奖”，鼓励人才钻研专业知识，率先致富。

里面的某些条款，在当时不仅招致非议，而且是要承担政治风险的。如第二条中“大胆起用和广泛接受各种人才。其中包括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过去犯过错误已经改正的；曾当作‘资本主义’典型批判至今仍不被重视的；由于社会上的偏见，使其科研遭受压制的；没有学历而自学成才的”。这在当时都是“犯忌”的，很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或犯过错误、挨过批斗、没有组织结论的人，即便再有才干，也不能重用。现在正定要把这样的人当作“香饽饽”引进来，不少同志心存疑惑，顾虑重重。有海外关系的人里通外国怎么办？犯过错误的人再捅娄子咋处理？新产品研制失败损失谁负责？拿到科研经费跑了哪儿去找？一句话，就是认为这些人政治上不可靠，对他们不放心。习书记说：“大家光说缺少人才，可又不相信人才，这怎么行啊？只要摘掉‘左’的眼镜，优秀人才就站在你的面前了。我们要诚心诚意地赶快把人才引进来、用起来。发生了什么问题，有什么责任，由我和县委负责。”习书记就是这样，面对风险挑战，敢于承担责任。因为他知道，推出“人才九条”不是头脑发热，而是实现“翻两番”目标的必由之路；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确实需要各方人才为正定的发展献策出力；不是为了捞取个人好处，而是要让40多万老百姓早日富起来，快点过上好日子。习书记这种为了党的事业敢于担当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回想34年前，习书记招贤纳士博揽群才、焕发正定勃勃生机的这段历史，至今令人难以忘怀。是他，打开了正定改革开放的大门，吹响了富民强县奔小康的号角，这浓彩重笔的光辉一页，将永载正定发展史册！

『习书记对人民群众有一颗赤子之心』

从1982年我与习书记结识之初，我就感到他这个人对不正之风有着天生的免疫力，与歪门邪道水火不容。可以这样说，习书记就是毛主席所说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种评价，实事求是，绝没有一点高估，他就是这样的人。

采访对象： 高培琦，1942年8月生，主任记者。1982年后曾任正定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组长、宣传部副部长，县广播电视局局长兼县电视台台长。2002年退休。

采 访 组：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 2017年4月15日

采访地点： 正定县高培琦家中

采访组：高培琦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当年来正定工作时，您在县委宣传部任通讯组组长，和他在工作上有很多交集。请您讲讲和他一起工作时的点点滴滴。

高培琦：关于习书记在正定工作的情况，媒体上已发表过一些文章，介绍了一些情况。今天，我想以我亲眼看到的、亲自经历的、亲身感受的一些事情为依据来讲一讲，可以说我今天给你们讲的是“独家新闻”。

现在，30多年过去了，习书记由一名县级干部成长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这个变化是非常巨大的，也是我们期盼的。我有时候仔细想一想，这个过程又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

习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我当时是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的组长，主要负责对外宣传，给上级新闻媒体撰写稿件。我经常采访他，也经常在他指导下撰写关于正定县各项工作的通讯稿，因此，平时工作中和他的接触非常多。

我经常回忆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日子，回想起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虽然这些在我的印象中都是一些平平常常的工作和生活，但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这些事情也都能折射出他崇高的品质、忘我的精神、亲民的情怀和务实的作风。

采访组：那就先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当年在正定工作期间的工作作风吧。

高培琦：习书记是从中央机关下来的，但他从没有因此表现

出任何优越感。从他身上，我们看不到一丁点儿高傲和跋扈之气。他对任何人都很热情、友善、谦和，都很真诚、亲切、厚道。我们这些县委机关的普通工作人员和老百姓，只要一和他接触，很快就忘记了他的出身背景和领导职务，会和他成为朋友。

我记得，习书记到正定不久，他第一次和我们县委办公室的几位同志一起到三角村下乡。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当我们赶到三角村村西的棉花试验田时，看到全县闻名的种棉能手冯玉明正在棉花地里忙碌。那个时候冯玉明已经上岁数了，习书记把自行车一支，就朝他走过去，冯玉明也从棉花地里走出来迎接。

29岁的习书记一把握住冯玉明的手，谦虚而又诚恳地说：“冯伯伯，您好，我今天是来跟您学习种棉花的！”

一个县委副书记对一个农民这么称呼，让冯玉明有点措手不及。他说：“别别别，你是领导，可不能这样。”

后来，习书记确实跟着冯玉明学习种棉花的技术，他们也成了忘年交。不久之后，习书记在全县推广种棉花的经验，使全县棉花产量有了新的提高，让绝大部分种棉花的农民都受了益。

习书记在县委也有着非常好的人缘，他的平易近人，他的和蔼可亲，在我们县委、县政府大院里是出了名的。习书记年轻力壮，精力充沛，晚上经常加班工作。他夜里把工作完成以后，有时候还约一起加班的同事们到他办公室聊天。

因为他知识渊博，聊天的时候除了说县里一些情况，古今中外、人文历史，海阔天空什么都聊，什么都讲。大多数时候，都是他讲，我们听。有时候，我们也会参加讨论，每次都聊得很尽

兴，很热闹。

有时候，他把从北京拿回来的罐头、糖果分给我们吃，大家一边吃一边聊，非常过瘾。每当这个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把他当成县委书记，当成一个了不起的“官儿”，都是把他当成伙伴，当成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畅所欲言的知己好友。

他不但和县里的干部、工作人员都有着很好的关系，对县委大院看大门的门卫、伙房的炊事员、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县招待所的服务员、做勤杂活的临时工也都很亲切。他很尊重人，很热情，所以大家见到他都愿意跟他打招呼。他每次一到招待所，工人和服务员都会大声喊他：“习书记！”就像喊自己的朋友一样热情，一点儿也不拘谨。习书记每次也都是微笑着答应，点头回应。

采访组：请谈谈他对你们通讯组工作的要求和对你们的影响。

高培琦：习书记一来就对通讯组的工作很重视，来后不久就找我们谈了一次话。他说：“宣传部通讯组，应该是县委和县政府的耳目和喉舌，是领导的参谋和助手。”

他还说，改革开放是各项工作的核心。以后，你们也要参加县里重要的会议，也要经常下乡调研，及时总结经验，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做工作。每位同志都要顶上事、使上劲、出大力、立大功，推动改革开放各项工作的发展。

那次谈话，我们发现习书记思维很清晰，思路很清楚，讲话很有深度，提的要求也很明确，很看重我们通讯组的工作。我们下来以后，就严格按照习书记的要求开展工作。

以前，正定县的通讯工作很平淡，循规蹈矩，各方面都很一般，没什么特点。习书记鼓励了我们，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干劲就上来了。为了干好工作，我们自己给自己加了很多任务。以我为例，平时我有什么工作上的事情，经常找习书记去请示汇报，但我又觉得他工作太忙，总去打扰他不太合适。习书记打消了我的顾虑，直接给了我一些“特殊待遇”。他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工作上有事，就可以找我，别管我多么忙，我都帮你们解决。”习书记指导我们工作从来没有嫌麻烦，从来没有“我现在忙”“顾不上”“等等再说”之类的话，每次都是放下手里的事，千方百计给我指导、给我解释、给我说清楚。

因为我们之前的工作一直没有什么创新，都是应付差事，所以平时缺乏锻炼，工作水平离习书记的要求有很大距离。针对这个情况，习书记对我们就不仅限于原则上的要求，还经常提出很多具体的指导。再一个，他来了以后主抓的各项工作，创新的内容都比较多，我们一时无法领会的，也需要他进行具体指导。

写通讯稿，可不仅仅是文笔好、会遣词造句就可以的，需要有思想，需要创新的工作态度。习书记有胆识、有谋略、有智慧，在他指导下，我们的通讯报道就好写多了。加上详细的调查了解，我们的通讯稿一写出来就是好文章。这些文章，才是真正从实际当中来的，也真正回答了一些改革当中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对通讯组的工作都有哪些具体指导？你们根据他的指导，又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高培琦：有一次，习书记和我们通讯组的同志专门开了一个会。他对我们说，当前通讯报道的作用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造好舆论，为改革的新生事物撑腰杆。第二，搞好调研，为改革当中发生的问题找答案。第三，总结经验，使改革中产生的诸多新生事物日趋完善。

我先举个例子讲讲“造好舆论，为改革的新生事物撑腰杆”。

当时，我们县里有一个油泵油嘴厂，1000多人，是正定县最大的企业，一度濒临倒闭。习书记为了解决这个厂的问题，花费了很多精力和心血。他到无锡市考察期间，从当地一家企业聘请了一位叫邱斌昌的同志到正定来管理这个厂。邱斌昌同志很能干，很有管理才干和业务能力，他把无锡的经验带过来，兢兢业业地工作，很快就让这个厂起死回生了。但这个厂子里有些人却不停地闹事，不断告状，反映邱斌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就想把这个事深入调查一下，了解清楚原委。

我之前对邱斌昌并不熟悉，经过了解，知道他原来是无锡某国营工厂的一名经理。习书记把他从无锡聘请到正定来，他告别了家乡和亲人，做出的牺牲很大。这些人一给他闹事、告状，给他的压力很大，他就想打退堂鼓，回无锡老家去。

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其实那些人告的状全都是瞎编的，邱斌昌并没有任何违纪行为，做人也一直规规矩矩，工作一直兢兢业业。有人告他的状，原因是他一来正定，就当了这个厂的领导，

导致以前管理无方的那些领导下了台，再加上厂子里排外情绪作怪，就对他进行一些无端的攻击。

我们根据这个情况，写了一篇文章《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还有一篇通讯《无私的奉献》。通讯后面还有评论《营造宽松环境，当改革靠山》。这些稿子宣传了邱斌昌同志为正定奉献、爱岗敬业、作出杰出贡献的诸多事迹。我们写好了文章，经过习书记同意，就拿到厂里去宣传，同时也在报纸上刊登了。

我们所写的文章、通讯和评论，明确地表明了县委和县政府的态度，让很多谣言不攻自破，也使对邱斌昌不利的局面一下子扭转过来了，给他继续推进厂里的工作以强有力的支持。这种情况下，邱斌昌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情绪也高了，干得更出色了。后来，县里还表彰他，把他评为“优秀企业家”。从那以后，厂里少数捣乱的人也偃旗息鼓了，工厂不仅生产始终保持正常，也恢复了堂堂的正气。

按照习书记的要求，我们通讯组第二个方面的工作，就是“搞好调研，为改革开放当中发生的问题找答案”。

在1984年春节前后，县里按照上级要求，对村级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调整。经过调整，干部平均年龄下来了，队伍更为年轻化。但我们的具体做法还是“老中选青”，原来班子里的这些干部，大多数还是“粮棉干部”，只会抓农业，对工副业等产业一点经验都没有。结果是，全县调整班子力度倒是挺大，表面上做到了干部年轻化，但工作却没有什么起色，老百姓对此很不满意。

习书记说：“既然老百姓不满意，咱们就下去搞搞调查。咱们县有222个村，看看搞得好的班子是怎么搞的。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调查研究，并搞一个方案出来。总体来说，选干部，不应‘老中选青’，而应‘青中选优’，应该把那些懂技术、有能力的人选上来，让他们主持工作。”

习书记这个意见，县里很认可。后来，经过细致的调研，汇集了各种问题，发现并树立了一些做得好的典型。根据调研结果，县里又搞了一次班子调整，把握的原则是：谁能带领群众致富，谁上台。这次调整，使班子成员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对推动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

这件事自始至终，我们通讯组不仅参与了调研，而且在第二次班子调整之后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青中选优”，后来发表在1984年10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还配发了评论文章《赞“青中选优”》。

习书记要求通讯组做好的第三个方面的工作，是“总结经验，使改革中产生的诸多新生事物日趋完善”。这也是极具针对性的。改革有它的生命力，有它的创新优势，但自然也有它幼稚、不太成熟和不够完善的地方。逐步在实践中总结、深化、完善，这就需要我们在不断遇到的问题当中做好总结工作，时时刻刻端正方向。

我们县里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把正定北面、东面、南面三面环石家庄的地理特点充分考虑进去了。经过习书记和其他县领导讨论研究，“半城郊型”经济就成为我们县一个工作方向。

习书记曾经形象而风趣地说：“根据市民不断提高的生活方面的需求，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商品，既为他们服务，又‘掏他们腰包’，这符合正定的实际情况。”

按这个思路搞了以后，效果很好，工副业发展有方向、有目标了，产品也有销路了。但我们在调查当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生产总是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上，只生产一些生活上常用的东西，档次比较低，价格又便宜，所以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就总是上不去。我们将这些情况向习书记作了汇报，习书记经过认真思考，深入调研，提出进一步拓宽和发展“半城郊型”经济，把产品的附加值搞上去，逐渐调整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加大科技含量，使商品生产有了质的飞跃。也正是从习书记主政那个时期，正定的乡镇企业才开始把“调结构”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也奠定了今天良好发展的基础。

习书记来了以后，我们通讯组把握上面这三个要点，扎扎实实开展工作，使正定的通讯报道工作突飞猛进。再加上习书记的人格魅力，记者们也喜欢来采访他，这样我们的劲头就更高了。当时，我们发稿的数量和质量在全省都是第一名。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河北省内的媒体已经不够我们“折腾”了，我们的稿子经常在大报上发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等全国性大报纸都发过我们的文章。我统计了一下，习书记在正定那几年，我们前前后后在大报上发表了30多篇文章。

研究农村问题　勾画最美图画

我国第一个农村研究所在正定成立

本报讯　为研究和解决农村中的问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四月五日，我国第一个农村研究所在我省正定县成立。

怎样从实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目前我国还没有这样一个专门研究机构。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今年被聘为正定县顾问后，在深入农村广泛考察的基础上，拟定了建立农村研究所的建议。正定县委、县政府认为这个建议很好，经过积极筹备，正定县农村研究所很快应运而生。该所是地方性质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任务是为当地农村建设服务，主要研究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发展战略和发展措施，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如何在农村中贯彻落实，农村的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生产、交换和分配方面的经济生活和经济活动，以及农村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及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各种运用社会科学、社会技术知识取得精神财富的实验，做各种运用自然科学、自然技术知识取得物质成果的试验。

研究所设在离石家庄市较近、工作基础较好的水安村。配备了三名正副所长，并选调了四名有大中专文化水平、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同志担任研究员，并计划从省内外聘请有关方面专业研究人员和学者、专家以及一定数量的农民，做为兼职研究人员。

建立农村研究所，是我国科研体制改革的重要尝试。这个研究所办好了，对我国农村建设将有积极意义。

（高培琦、彭同泉）

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高培琦发表的相关通讯报道。

河北日报

悬着的心落了地

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向社员宣讲中央一号文件，农民听了——

本报讯 一月二十二日，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来到西柏棠大队宣讲中央一九八四年一号文件。露天会场，寒风刺骨，可五百多名男女社员却秩序井然，越听越提神，越听越愿听。

去年，西柏棠大队实行了大包干，生产大发展。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五百一十二斤，棉花一百九十四斤，分别比一九八二年增一百零七斤和八十六斤。粮食总产增二十七万斤，棉花总产增六万七千斤，人均收入由一九八二年的二百五十三元增到五百多元，翻了一番。大家齐赞党的富民政策好。可也有一些干部、群众心里“敲小鼓”，怕政策变，再吃“大锅饭”。大队在与社员订五年不变的土地承包合同时，就写上了“上级不变咱也不变”，说这样才有主动权。许多农户往地里施化肥多，施有机肥少，不愿搞农田建设，怕政策变了吃亏。有的重点户、专业户怕露富；有的宁愿“小打小闹”，不敢放手大干。听了中央今年一号文件，大家拍手叫好，喜上眉梢，悬着的心落了地。在讨论中，人们兴高采烈地畅谈自己的深切感受，交流生产规划措施，憧憬来年的丰收美景。大队党支部书记王臭货说：“过去对‘两户’既不敢放手支持，又不敢自己去搞。一号文件给了我力量，决心做全村勤劳致富的带头人。”屠宰专业户刘惠仁，前些年妻子病逝，儿女拖累，负债千元。一九八二年操起父辈旧业，开了个肉铺。几个月还清了外债，两年富了起来，添置了缝纫机、锁边机、电视机、录音机，全家五口人，六块手表，四辆自行车，一辆摩托轻骑，还备好了二千多元盖房材料。不久前，他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胆子有点小了。听了中央一号文件他说：“中央政策变不了，再不听那些流言传语，今后就放心大胆地干吧。”社员们听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延长土地承包期，纷纷制订多施农家肥、整修土地、改良土壤、增加投资、培养地力的计划。

（高培琦）

不是发表文章多就行了，习书记对我们文章的质量要求也很严格。特别是那些往大报送的重要稿件，第一时间都会交给他看，请他修改把关。他经常给我们提的一条要求就是：新闻报道稿子里面，千万不要说大话、空话，千万不要炫耀，更不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来写这些东西，该怎样就是怎样，不要形容，不要粉饰。习书记对这一条要求特别严格，卡得比较紧。按他的话说：“不要说‘过头话’，‘沽名钓誉’要不得。”再一个，他还要求有关数字一定要核实准确，错误的和虚假的东西绝对不能出现。

后来，我们因为通讯报道长期在全省领先，被评为河北省、石家庄市的通讯报道先进县，得到上级领导充分肯定。在我们县里，习书记还亲自奖励我，授予我“县委书记县长特别奖”。

虽然一年到头很紧张、很累，但我们在工作和奉献中得到成就感、得到乐趣，心里就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反而感到很充实。这也是我在习书记那里学到的一种品质。

采访组：据了解，你们当时作为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的工作人员，每逢报社记者下来采访，都要作为“东家”配合其工作。当时，习近平同志对你们接待记者的工作有什么要求？

高培琦：接待记者，首先是配合他们的采访工作，其次是解决他们住和吃的问题。我们是本地人，对正定的实情比较了解，配合他们的采访工作不成问题。住的话，记者来了就只能住在县招待所，那时候没有什么酒店、宾馆，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住。吃

饭的问题，这在当时还是有一点儿麻烦的。因为随着正定的名气越来越大，来的记者越来越多。

习书记来正定之前，正定哪有这么大的名气？来的记者自然也不多。习书记领导正定人民做的几件大事，效果好、有深度、影响大，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新闻媒体纷至沓来，应接不暇。特别是《正定翻身记》刊登出来以后，各级报纸都来采访，像新华社、人民日报都来过多次，河北日报、建设日报还有很多其他报纸的记者更是经常来。

这种情况下，对记者招待这一块，就成了县里的一个问题。按规定，县里是不允许用公款招待客人的。后来，记者来得多了，吃饭问题就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人家来采访，来做工作，中午得吃饭，难道还让人家自己去找饭吃？这个问题反映给习书记之后，他就和大家商议，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他说：“咱之前的那种做法，恐怕是错误的。记者确实是‘客人’，这没错，但他们下来可是干工作的。一是给我们传递各种信息，帮我们总结经验；二是给咱们县出力来了，是来宣传我们的。应该让他们吃顿便饭。”

大家觉得习书记说得有道理，都点头表示同意。习书记又规定了三条招待准则：第一，礼貌待人。第二，不能浪费。第三，工作餐只允许一人陪客，其他领导干部、工作人员，谁也不能陪同。从此以后，我这个通讯组就开始招待记者吃饭了。因为有明确规定，我们也名正言顺，一开头就是请记者吃水饺，一人吃一碗水饺。后来又改为吃正定的一些小吃，像饸饹面、豆腐脑、

烧饼等，既便宜又可口，记者们吃了觉得好，还顺便给我们做宣传了。

这第三条规定，习书记不仅要求大家遵守，他自己更是严格遵守。无论哪个报纸的记者来了，习书记只是会见，接受采访，和他们谈工作，从不陪同他们一起吃这顿“工作餐”。

习书记一贯是这样的：如果他陪同外面来的客人吃饭，连他自己那份，带客人那份，全都是他掏钱，而且不要还不行。他为了办好公家的事，可以自掏腰包，这是常有的事，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该公家出的钱，他向来是“斤斤计较”，从不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习书记对来我们这里的记者都非常重视，而且一视同仁。不管记者职位高低，也不管是中央大报还是地方小报，他对记者都是一样尊重，从来没有高低之分。

每当记者来采访他，无论他有多忙，都会挤出时间来接待，给记者的工作尽可能提供方便。下乡采访的时候，习书记把县委的吉普车让给记者坐。他说：“记者时间紧、任务重，跑的地方多，跑的路也远，而且他们又不认识路，汽车一定要优先给记者用。”而他自己则骑自行车外出。晚上，他还经常到招待所看望记者，嘘寒问暖，听取意见。

对此，记者们都挺感动。他们私下里对我说：“你们习书记，真是了不起！”记者们见多识广，大多也了解习书记的名声和背景，他们见习书记待人这么热情，也都感到他这个人很亲切、很厚道，心里很是敬重。所以，记者写我们正定的稿子，就

格外认真，也格外用心。

我一直很注意观察习书记的为人处世和工作方法，并且努力向他学习。我想，县委书记都能把工作做到这么细致，待人这么真诚，我做具体工作的，当然更要做好。所以，我对记者也很热情，在工作上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我多做一点，就给习书记减轻一点负担。这就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

凡是来正定的记者，都跟习书记成了朋友，有的成了知己，还有的成了莫逆之交，和他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来往不断。

采访组：新华社记者赵德润当年采访正定，写了一篇《正定翻身记》。您一定熟悉这篇文章的创作过程，请您具体讲讲。

高培琦：《正定翻身记》这篇稿子，详细而又客观地记述了正定这个"高产穷县"在粮食减征购等一系列措施实行前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正定是一个平原县，也是传统的农业县，农业生产条件好，农民种的庄稼多，给国家交的公粮也多，就成为了著名的"高产穷县"。老百姓因为高征购的压力和体制上的各种束缚，一直很穷，甚至吃不饱肚子，经常到隔壁的无极县买山药干吃。

习书记来了之后，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总结出几个原因：一是征购压力太大，产量高，交得多，老百姓负担太重；二是因为征购压力过重，正定没有土地也没有精力搞多种经营，只种粮食，既费力又收入少；三是公社化的农业生产制度落后，"大锅饭"导致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挫，群众出工不出力，也导

致产量不能进一步提高。

面对上述几个问题，习书记逐条进行解决。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把高征购减下来。在当时“以粮为纲”的年代，减征购是大忌——地方为国家作贡献，必须越来越多，哪有越来越少的道理？别人都提高，你还能往下减？这就是你领导干部的政绩不好了。但习书记敢于担当，敢于说实话。他觉得，老百姓都吃不饱了，还不敢实事求是？应该往上报，如实反映。习书记把正定的实际情况给地委打了报告，并向省委和中央反映，上面对这件事情很重视，派人下来调查，减低了粮食征购额，使正定群众的负担大幅降低。

减征购以后，积极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大搞种植、养殖等副业，这也面临比较大的阻力。一直以来，正定领导班子受到“左”的思想束缚比较重，总认为社会主义的“老集体”一旦被“瓦解”，就会走回资本主义的老路。

实际上，改革开放就是要充分解放生产力。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道路，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道路，就是正确的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习书记顶住压力，跟县长程宝怀在里双店公社搞“大包干”试点，包产到户，打破“大锅饭”。谁家的地谁管，粮食打多了，自己剩的就多，种植、养殖业的比例自然也就提高了。

这个事，确实是一搞就灵，农民的积极性一下子就提高了，不仅精耕细作提高产量，而且多种经营也搞起来了，收入也增加了。这是习书记敢于担当的一个事例。可以说，他当时冒着不小

的政治风险。

习书记当了县委书记以后，多种经营就有规划、有计划地在正定全面铺开了。在沙滩地多种果树、蔬菜，提高农副产品生产的比例，使正定的农民收入上了一个大台阶。

在省里开的一个会上，有关领导提到了正定县这段时间的可喜变化。赵德润当时是新华社河北分社的记者，他参加了这个会，觉得正定县这个重大变化非常有典型意义，值得深入报道。他站在全国层面上，分析思考这个问题，认为正定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道路应该怎么走，怎样从“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样一个大问题。

赵德润觉得这个选题很好，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想到正定采访。我说：“行，欢迎你来！”他来了之后，先跟习书记简单谈了谈，习书记把面上的情况给他简单介绍了一下，建议他还是首先下去看看、走走，调查一下。随后，我领着赵德润把全县的乡镇、企业、农村，有特点的地方跑了很多，调查和采访得挺扎实深入。

调查之后，赵德润又和习书记深入谈了一次，之后就开始动笔写。怎么写稿，如何构思，如何确定主题，如何选材，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俩进行了反复研究、推敲，尤其是赵德润，他花费了很多精力，绞尽了脑汁，最终把大体框架定下来了。

赵德润住在招待所的时候，习书记也经常过来，和我们聊天，加入我们的讨论。讨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高产穷县”的原因找到找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最初的采访，说的都

是些浮于表面的现象，如果抓不出现象后面的本质，找不到起决定性作用的那个“根”，就写不出正定之所以“翻身”的核心原因。

习书记跟我们讲，所谓“翻身”，就是正定从“高产穷县”成为“高产富县”。要分析这个名称变化背后的原因，搞清楚正定当初为什么“穷”，把这个“根”找到了，写作目标也就明确了，写出来的东西就能够做到言之有物。

赵德润在正定前后待了两个月的时间，除了一开始的调研，晚上还与习书记和我3个人一起讨论，前后也好几次详细采访习书记。在这些材料支撑下，他写出了非常出色的《正定翻身记》。

采访组：有一张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县街头搞民意调查的照片。照片上，有个白发老大娘正在和他说悄悄话。听说那张照片是您拍摄的，请您讲讲当时的民意调查是怎么回事。

高培琦：那张照片是我拍的。当时习书记搞民意调查，有一种形式就是赶在县城大集的时候，和同志们在主要街道上摆上桌子和椅子，发调查表，请老百姓给县委、县政府提意见和要求，同时也调查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习书记每次都带头参加，以此来向老百姓表示诚意。村里的“张老头”“王老太”都来和他聊天，习书记通过这些具体工作，直接听取民意。

这样的民意调查，我都参加了，写文章、拍照片的工作也都做过。可惜的是，这些照片的底片，在我离开县委宣传部以后，因为没有妥善保存，好多都没有了。好在，因为当时照片已经公

之于众，广泛传播，现在网上也随处都能找到这张照片。

采访组：正定是习近平同志从政的起点。他在正定做了许多抓改革、促发展的工作。对此您有什么感受呢？

高培琦：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很多治国理政思想和理论，和他在正定步入政坛之初的很多探索是息息相通的。如果我们从正定看到福建、看到浙江、看到上海，再看到北京，可以看到一条很明显的脉络。

当年，习书记提出正定发展的目标，是要建设成为华北平原一颗璀璨的明珠；今天，他提出的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正定，他提出的是“六项规定”；今天，他提出“八项规定”，并且一以贯之地执行。

在正定，他提出领导干部要带头廉洁奉公；今天，他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以及“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在正定，他提出真抓实干；现在，他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转变作风，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言必信、行必果。

在正定，他谈到要时刻牢记革命先烈的遗志；现在，他提出长征永远在路上，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这样对比的内容还可以列出很多。他现在的很多思想做法、施政理念，可以说是他在正定时形成的一些思想的升华和延伸。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后，您和他还有哪些联系？

高培琦：1990年我去过一次福州。那一年，我调到县广电局工作，10月我到福州去找习书记。他那天正忙，由他的秘书先来接待我。

他的秘书知道我跟习书记多年的交情，我们两个也比较聊得来，很快就熟悉了。闲谈当中，说到习书记平时的生活，他偶然跟我谈到了这么一件事。

他说："高局长，我跟你说，习书记的工资都是由我支取的，支了以后就在我这儿放着，习书记从来没有花过一分钱。"

我感到有点儿奇怪，就问："那习书记的这些工资都干什么用了？"

他说："大部分都捐了！有时候什么地方闹灾了，就让我支援灾区，寄些钱过去；有时候捐给革命烈士家属、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小学；还有时候，他拿钱接济那些他当年下乡插队的乡亲们，给梁家河的老乡看病、做手术，解决生活困难、往返路费等等。凡是因病因事找他的，他都拿出自己的钱，给他们花。"

我说："那他一年的工资够用吗？"

他说："当然不够了。一年下来，他的工资全都花光了不说，还得跟我借个八九千块钱。每到年底，他给我还账的时候，都是拿家里的钱还的。"

说到这里，他的秘书有点激动："是啊，所以说，习书记他是贴着工钱的干部。"

第二天，我见到习书记，跟他核实这个事。他只是微微一笑，说：“秘书是我的债主，我每年都得借他的钱。”

我们这次谈话，还提到了领导干部腐败问题。谈到这里，习书记特别气愤，他对那些欺压百姓、贪污受贿的干部深恶痛绝。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将来有一天习书记能成为国家领导人，他一定会严惩腐败，绝不手软，给我们这个国家打造一个清正廉洁的政治环境，给我们老百姓出这一口恶气。我相信，这一点他一定会做到的。

从1982年我与习书记结识之初，我就感到他这个人对不正之风有着天生的免疫力，与歪门邪道水火不容。可以这样说，习书记就是毛主席所说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种评价，实事求是，绝没有一点高估，他就是这样的人。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1991年回过正定一次。那次你们见面了吗?

高培琦：那次见了，还有点戏剧性。1991年大年初一，上午9点钟，我家电话响了。电话那头问：“你好，你是高局长吗？”我说：“是我。”那头说：“我是县委办公室。今天中午11点，请你到县委书记王玉廷家做客，吃中午饭。”我说：“开什么玩笑?大年初一，请我上县委书记家吃饭？”对方一听我不信，有点急了：“高局长，不是开玩笑，习书记来了，他让通知你的。”听他这么一说，我才信了。

我按时赶到王书记家，进门一看，有习书记和彭丽媛老师，其他在座的领导，全都是县里的“大官”。有县委老书记冯国强，地区副专员、老县长程宝怀，县委书记王玉廷，等等。我给大家拜了个年，就想退出来。

习书记说：“培琦，你坐下吧。”他指着一把空椅子说：“这个位子是专门留给你的。”

我推辞不过，就坐下了。我一坐下，外面就开始上菜，大家边吃边谈。习书记离开正定有五六年时间了，这是他第一次回来，大家都非常想念他，餐桌上欢声笑语不断，气氛挺热闹，也挺喜庆的。

采访组：我们还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当市委书记时，组织过一次正定干部到福州挂职锻炼。您是否了解详情?

高培琦：习书记对正定很有感情，非常关心正定的发展变化。1993年，习书记在福州当市委书记，他为了让正定尽快发展繁荣起来，让正定的基层干部进一步学到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先进经验，由他提议并安排，搞了一个“正定基层干部到长乐县挂职锻炼”的活动。我当时是这个活动的联络员，协助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刘福祥组织和安排这个事。

到了福州以后，习书记在市委会议室接见了全体同志。一见到正定的同志，习书记特别高兴，他跟我们一一握手，一一问寒问暖，我们每一个人，他都能叫上名字来。随后，他讲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话，让我们很受鼓舞。

在我们来之前，习书记已经把挂职锻炼的具体工作给大家安排好了。比如，正定的副乡长，在长乐县也任某个乡的副乡长，在这里接触具体工作，跟当地基层干部学真本事，“取真经”。实话实说，在当时，我们和福建相比，确实比较封闭落后，这个挂职锻炼确实是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大家的学习热情也非常高。

长乐人对我们非常热情，他们认为：“习书记家乡来的人，我们绝不能让他们白来一趟，空手回去。”所以，他们拿出十二分的热情，手把手教我们，传“真经”给我们。这次挂职锻炼，对于进一步提高正定干部的素质和水平，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

采访组：后来你们还有联系吗？

高培琦：1996年，福州有一个生产电视设备的公司副总经理联系到我，他说，公司打算捐赠给正定县广电局三套电视设备。后来我去福州联系这件事，还和习书记见了面。

那个时候，我心里在考虑一个计划：在正定的老百姓心目当中，对习书记的评价一直很高，这么多年不见，老百姓也一直都惦记着他，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习书记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应该借此机会采访一下习书记，录一段视频，拿回去播给正定人民。

于是我跟习书记说：“习书记，你离开正定这么多年了，老百姓都挺想你。我想拍一个采访你的专题片，行不行？”

习书记很痛快地答应了：“行，没问题。”

我们就找了个地方进行现场采访。习书记亲切地向正定人民问好，他谈了这些年他从政的经历，也谈了他对正定人民的殷切

希望，鼓励大家把家乡建设好。

我把这段视频拿回正定播出以后，反响非常强烈。大家高兴地表示，我们一定不辜负习书记的期望，把他的第二故乡建设好！

现在，习书记离开正定已经30多年了，他从福建到浙江，到上海，再到北京，一步一步成长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对正定这块沃土的眷恋与厚爱，对正定父老乡亲的思念与关怀，从来没有减少过一分。他把正定视为第二故乡，前后6次“回家探亲”。因为他在正定和正定人民共同拼搏奋斗的这段经历，已经深深融入了他的精神和血液之中，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正定记挂在心里，也经常提到正定。

习书记对正定的热爱，对他过去上山下乡插队的梁家河的热爱，就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热爱的一个反映。一个干部有着对祖国和人民发自内心的热爱，他才会对自己工作过的地方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前几年出了一本书叫《知之深　爱之切》，收录了习书记在正定的一些讲话、文稿和报道，书名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他对正定的感情。

『习书记三十多年前就做好以身许国的思想准备了』

习书记就要求下到县里，为基层的老百姓做一些实实在的事情，虽然辛苦，却也心甘情愿。讲到这里，他对我说：『只想着过舒适的生活，是平庸的追求。我是准备入「苦海」的。』

采访对象：李亚平，1954 年 11 月生。1979 年到正定县委办公室工作，1983 年 12 月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1985 年 4 月任县经委主任兼党委书记。2014 年退休。

采 访 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 年 4 月 14 日

采访地点：正定县李亚平家中

采访组：李亚平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您一直在他身边工作。请讲讲当时的情况。

李亚平：和习书记一起工作的那几年，我主要是在正定县委办公室当干事，工作内容上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文秘，主要管文件、工作报告、开会的发言等等，经常起草一些东西。那几年，我跟他之间的工作联系非常紧密，可以说是他“手把手”指导我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受他的影响非常大。虽然之前我有多年的文字工作经历，起草过不少文件和材料，但从跟习书记工作那几年开始，我才真正明白了如何才能做好这项工作。

以前，我协助县委领导写一些材料和报告，都是以秘书的心态和角度在写，我也想写得好，但因为我这样的心态，就导致站位比较低。习书记来了以后，通过他对我的严格要求，我才发现过去那样写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合格的。我写的材料只是达到了基本要求，领会了领导的意图，把该说的话说出来了，但还达不到“好”的标准。写的讲话稿没有什么特点，也缺乏说服力，让与会人员听得昏昏欲睡，那是不行的。

我为了提升自己，达到习书记的要求，就开始进行一些研究和思考。我发现，习书记平时看书很多，喜欢把看到的内容分享给大家，所以他讲话比较喜欢引经据典。于是我写东西的时候也开始学着引用一些马列理论和古代先贤的话，但这些内容我是没法像习书记那样都记在脑子里信手拈来的，所以就要靠自己不断学习，不断增长知识。

我还发现，习书记不喜欢在材料和稿子里出现官话、套话。这当然很好，但无疑是加大了文稿起草的难度。过去，我们写东西可省事了，能抄就行，起草文件就是照着石家庄地委的文件和省委的文件抄，还有《人民日报》等这些官方的东西看熟了就行。这种照本宣科的材料，在习书记这里完全通不过，甚至和他本身讲话的特点格格不入，因为他的思想和具体部署，都会结合正定县的实际情况来进行。

因为习书记的要求比较高，需要动大量脑筋，有的人就没办法给他写东西了。如果不领会他的思想，不尽量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真就不知道该如何下笔。我这个人愿意把材料写好，比较喜欢钻研文稿写作。我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我想，我应该换位思考，假设我就是他，是正定县委书记，那么我所管的这个县，哪儿有什么问题、什么事情？我应该怎么去处理、去解决呢？慢慢地，我觉得，关上门写材料的时候，我就是“正定县委书记”；打开门，我就是县委办公室的干事。

所以，习书记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点，就是引导我、锻炼我经常要学会换位思考，按照角色要求进行思维、开展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更多地留意具体的工作。

一开始，我觉得完成一篇在习书记那里能够通过的稿子，还是挺难的。但随着他对我的严格要求，随着我自己的不断努力，我逐渐掌握了要领，后来反而觉得很轻松，对自己所做的这项工作也越来越有兴趣，越来越有成就感，也就不觉得累了。

另一个我感到工作越来越轻松的原因是，每次写稿之前，习

书记都会事先跟我进行细致的交代，把稿子的内容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坦率地说，习书记跟以前的几位书记都不一样，他文化水平高，更具有战略眼光，肚子里真有货，对每一篇稿子的要点和思路都谈得很清楚，胸有成竹。

有一次，他开会前需要一个讲稿，事先把要讲的内容给我谈得清清楚楚，我甚至觉得，他说的这些内容直接放到会上去讲，就已经很精彩了。那次，他跟我谈完稿子以后，我趁热打铁，7000多字的稿子一气呵成。后来，他拿着我的稿子到会上去，但基本上是脱稿讲的，而且把很多要点又展开讲了。

那时习书记还有一个特点：只要你写的稿子言之有物，有创新，有具体内容，不讲套话空话，不照本宣科，他就不会去计较，不让我们返工。他讲的时候，往往是脱稿讲，讲话稿中有些不顺当的地方也就自然调整过来了。我的观察是，习书记一开始走上县委领导岗位时，讲话用稿子的时候多一些，越到后来，用稿子就越少了，稿子放在那里只是一个提纲、一个概要，他讲起话来已经是驾轻就熟、自由挥洒了。

习书记来之前，老实说，我工作很散漫，写稿都是应付。习书记刚来时，要求高而且严格，我觉得压力很大，觉得以前那么舒适，那么清闲，现在不行了。但到了后来，我发现自己跟着他提升得非常快，从原来应付稿子到后来很自主地去创作稿子，工作体验很不一样了，自己不知不觉就提升了。那时候我就感到，之前看似舒适、清闲，其实时间都被浪费掉了，我进步最快的几年，还是跟他一起工作的那段时间。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中特别注重调研，请您讲一讲他当时调研都有哪些方式。

李亚平：习书记确实非常注重调研。他来正定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研。最初的3个月，他对工作基本没有什么表态，因为他不了解实际情况。他那段时间，集中精力到各个乡镇走走、看看、问问，熟悉正定的实际情况。有时候，我也跟他一起下乡调研。

他调研的方法比较特殊，一般是不打招呼，不让人家事先准备，而是直接下乡、下厂、入户。他调研有的时候有主题，有的时候没有主题。带工作人员也很随机，有时候带我，有时候看到谁，抓上就去了，而且工作量非常大。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有一天调研工业企业情况，一天下来他连续看了6家企业。

习书记交了很多朋友，他有个“草根”朋友叫贾大山。贾大山是我们正定的一位作家，特别善于从农民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他不是党员，也不受官方的影响，从他眼里看到的、写出来的老百姓，是非常纯粹的现实主义手法，非常接地气，乡土味儿极浓。习书记主动拜访贾大山，和他一见如故，每次聊天都很投机。贾大山给习书记讲故事，讲正定的历史、风土人情；习书记给贾大山讲他插队的经历，讲陕北穷苦的父老乡亲，讲他生活过、劳动过、当过大队支书的小山村梁家河。他们俩的谈话，我还参加过两次，有时候他们讲到古今中外的文学，我也是听得津津有味。

习书记还与一些农民交往。他和许多有一技之长的农民交朋友，比如我们正定有一位农民科学爱好者叫张新立，是农村里常说的那种“能人”“致富能手”，他喜欢搞无线电，后来又开了个工厂搞声控灯光设备。习书记到他的工厂看了他的产品，觉得这个设备效果很好，这种发明也填补了当时国内市场的空白，前景非常好。习书记就积极帮他联络北京的文艺团体采购他的设备，后来一些文工团，包括中央电视台都买了张新立的设备。有一年过年，习书记还和我骑着自行车到张新立家里去看他，我们还在他家吃了一顿饭。习书记一方面是调研，和他交朋友，帮助他开拓市场，实际上他也在观察张新立怎么做企业，吸收了一些他的经验。

我们县某个村，当时有一位种棉花的能手，亩产很高，虫害很少，能培养新的种子。习书记跟他接触了两次以后，经常跟他聊天，慢慢就成了朋友。

习书记那时候总说：“走，我们去跟谁聊聊。”他能接触三教九流的能人，这也是他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的一种方式。

习书记也经常搞问卷调查。这个在正定还是很稀罕的事，以前没有人搞过，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不知如何下手。习书记说：“你们不知道怎么弄，不会学吗？”我说：“我们主要是不知道问题该怎么设计。”习书记说：“设计问题，应该主要围绕老百姓对县委和县政府工作的反映和评价，还有就是老百姓目前对多种经营有什么样的认识，自己打算搞哪些多种经营，等等。”

这种问卷调查，比较类似于现在的社情民意调查。当然现在

习近平带领县委工作人员在正定街头发放《民意调查表》。

主要依靠网络，采集的样本也更多，数据覆盖范围也更大。而那个时候，受条件所限，调查的方式比较原始，就是习书记带着我们县委的干部、工作人员，特别选在正定县城大集的时候，在大街上摆上桌子，来赶集的老百姓一从我们这里经过，我们就主动递给他们纸条，纸条上的内容就是调查问卷。递纸条的时候我们会说："老乡，大爷，大娘，县委正在搞调查，麻烦来填填吧。"

一开始我们去拉人、发问卷，老百姓不知道我们要干嘛，要调查啥，还有点不太接受。后来，老百姓了解了情况，就主动到我们摆的"摊儿"前面来给我们反映问题。他们有的说种地遇到了这个问题，有的说搞养殖遇到了那个困难，说的都是一些特别具体、特别实际的事情。

这样的大规模调查问卷，仅我记得的，习书记就搞过五六次。这也是他调研的基本方法之一。

还有就是到经济发达的省份去考察学习。比如，我跟他一起去过江苏省，当时我们是个5人团，由他带队，有一个常务副县长，有一个研究室主任，还有一个管经济协作的副主任，再加上我。我们当时把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地都走到了，这些地区的乡镇企业特别发达，起步比杭州还要早。我们那一次考察的范围也比较广，包括怎样招聘人才、行政机构怎样改革、乡镇企业怎样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如何开展等等，都进行了详细调查。

那次外出调研，看先进、找差距、思改进、谋良策，对正定县的发展影响非常大。我们回到正定以后，就召开了全县的三级

1984年5月，习近平（右二）带队赴江苏考察时在南京长江大桥合影。

干部会。这也是一次正定县的改革开放动员大会。当时对我们触动最大的，是在很多改革开放的观念上，我们正定差得太远了，扶持乡镇企业的各种政策措施非常不足，而且正定的企业大多是与农业相关的或者国有工商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乡镇企业很少。我们意识到了差距，正定的改革开放才真正走上了正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在正定推行人才战略，您是否也参与了这方面工作?

李亚平：是的。人才战略正式推行以后，我们经常和习书记一起商讨实施当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

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听完《通史》课后，就到习书记屋里坐了一会儿。当时，县委办公室的张银耀也在，我们正好一起商量一些人才招揽方面的事情。

那天晚上，习书记兴致勃勃地谈起省生物研究所一个发明了“花生蛋白乳”的人才，说想把这个人请到正定来。由此，他又谈到县委最近提出并在报上公布的招贤纳士九条措施，让我谈谈看法。我当时建议，应该适当了解本县知识分子有什么反映，县委近期可以组织一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大检查，声势大一些，有问题要解决，以免让人产生县委只看重“外来和尚”的印象，挫伤本县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习书记对我的建议很赞同，他说：“我这几天也在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只是事情多，还没有来得及落实。”

采访组：您当时与习近平同志接触那么多，一定对他日常工作生活很熟悉。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包括您和他平时生活中的交往。

李亚平：好的，我说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件事。

有一天上午，我在习书记那里闲谈时，管接待的行政组长王新友敲门进来了，跟习书记说了两句话，准备告辞。这时候习书记叫住他，并拿出了10元钱说："新友，一会儿你去招待所，顺便把我在招待所吃过的几次饭都结算清，如果其他常委也有没结的饭账，也都付清了。"王新友说："习书记，算了吧，之前的饭账，办公室已经垫付了。"习书记很严肃地说："以后不要这样，谁吃饭谁付钱，再遇到这类问题都照此办理。"

当时，我联想到习书记头年夏天穿的满是窟窿的"花背心"。当年春天帮他搬家的时候，见到他的褥子竟然是旧衣服和布头拼接起来的。可见，他一贯严于律己，从来没有那些高干子弟的纨绔之气。我平时还总认为自己在生活上比较平民化，但与习书记的艰苦朴素比起来，还是自愧不如。

还有一件小事。国庆节放假期间，有一天下午，我随习书记去大佛寺，看看寺管会新班子上任后的工作情况。

晚上，回到县委，习书记拿出10元钱请客，想要请晚上值班的人员一块儿聊聊。我拿了习书记的钱出去买了些菜，哪知道回来的时候一看，一位值班人员早准备了不少菜，他还让我把钱退给习书记。我当时没过脑子，拿了钱就去退。那位值班人员过来解释说："习书记，今天晚饭的钱由办公室卖报纸的钱来开支，

就不用您个人破费了。”

习书记严肃地说：“个人吃喝怎么能用公款报账？即使是卖报纸的钱，也是大伙的，也不能随便用。”

这顿饭所有的开销，后来都由习书记个人掏腰包支付。那些卖报纸的钱，从哪里来的，还是规规矩矩地回到哪里去了。今天，我们施行的“八项规定”，与习书记当年对自己、对我们的要求是一以贯之的。

县委办公室有一台电视机，习书记每天下班后会看看新闻。那个时候，电视机是稀罕物件，街上的老百姓经常过来看电视。有时候，到了晚上，会有几十个老百姓聚在这里。别的机关和部门的人，也会来看。除了看新闻以外，习书记偶尔也会看看足球。这时候，习书记就换了身份，仿佛不是县委书记，而是一个爱激动的球迷。他喜欢的球队进攻特别是进球以后，他会大喊大叫：“好球！”进攻失败或者被人灌进一个球，他会从椅子上跳起来喊：“臭球！太臭了！”

我们当时的思想比较保守，因为看惯了老干部四平八稳、不声不响地坐着看球，觉得习书记这么激动，有点“惊世骇俗”。所以，后来只要他一到办公室看足球，我们就不让别人进来了，甚至连大门都关了。习书记虽然年轻，但他毕竟是整个县的县委书记，让人们看到他大喊大叫的，不怎么好。后来，我们虽然没给他提出来，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还说：“最近怎么没人来看电视了？”以后，他再看球也就不那么激动了。

采访组：那您当时和习近平同志一定关系很密切了？

李亚平：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们可以说几乎每天都在一起。我比他小一岁，有很多共同语言，为他做服务和配合的工作也很好，所以我们的关系也很密切。我们平时聊天最多的，还是工作上的事情。除了工作上的交流，我们还会经常在一起谈谈个人的经历，谈一些国内外大事，有时候也会谈谈读过的书。通过聊天，我了解到习书记书读得特别多，什么都懂，好像是百事通、百科全书、活字典。我们虽然年纪相仿，但他博览群书、知识广博，这实在是我望尘莫及的。

习书记也曾经到我家里做过客。他第一次到我家来，是我们有一次下乡回来，机关食堂也没人了。我就说：“到我们家做饭吃吧！”到了我家，加上我爱人，我们3个人一起包饺子。那时候，我儿子四五岁，就在旁边玩耍。习书记这人待人很亲切，很和善，我儿子很喜欢他，就不住地和他聊天。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看过了《三国演义》的小人书，他就说：“习伯伯，我考你几个问题。”习书记说：“好啊，你考吧！”他就根据《三国演义》里的情节给习书记提问题，结果连续考了八九个题，习书记全都对答如流。我儿子赞叹说：“呵！习伯伯，你还不简单呢！”

后来，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聊天，习书记说，他小时候父母亲对他要求非常严格，上小学时就开始要求他读文学名著，像《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等在小学阶段就已经基本上读完了。他到陕北下乡，一开始有好多知青对未来很迷茫，大家也都很颓废。习书记觉得自己也没别的出路，可能要在农村当

一辈子农民。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些精神食粮，他就拼命读书。他插队的文安驿公社，附近能找到的书，他全都找来读了。所以，后来他当县委书记，写材料经常引经据典，就是他那个时候打的底，算是“童子功”。

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俩一起吃饭，习书记跟我提起他从军委办公厅来正定的缘由。从梁家河回到北京以后，习书记从陕西的穷山沟到了国内顶级学府——清华大学，之后又到国办、军办工作。那时候，他父亲也已经“解放”了，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没有什么令人烦恼的事情了。本来，习书记可以享受这种生活，衣食无忧，工作稳定。但他说自己在这种安逸的生活里，总觉得“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种荒谬和残酷虽然已经过去了，却并不遥远，这个国家百废待兴，仍然需要变革，仍然需要有担当的人负起责任来。唯有如此，“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日子才不会重演。所以，习书记就要求下到县里，为基层的老百姓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虽然辛苦，却也心甘情愿。讲到这里，他对我说：“只想着过舒适的生活，是平庸的追求。我是准备入‘苦海’的。”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他所取得的成就绝非偶然：在30多年前，他就已经有了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国家和人民、“以身许国”的思想准备了。

『近平同志办公室挂着一幅书法作品「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这是近平同志非常欣赏的一条格言，也将其视为做人处事的原则。这也确实是一位领导干部必须要有的胸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做不了大官，也做不了好官。『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虽然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是相当不简单的一件事。

采访对象：张银耀，1952 年 5 月生。1980 年 1 月调正定县委办公室工作。后任县档案局副局长、县政协学习宣传文史科科长、文史委主任。2012 年退休。

采 访 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 年 2 月 25 日

采访地点：正定县张银耀家中

采访组：张银耀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当年到正定的时候，您已经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了，是吧？

张银耀：是的。我1980年到正定县委办公室工作，最开始把我分配到资料组，负责给领导写讲话稿，还有各种报告。1982年，近平同志过来当副书记，一年多以后当书记。近平同志来了以后，我主要的任务就是配合他的工作，为他服务。除了帮他写一些日常的报告、讲话外，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一些事情主要是由我协助他处理，前后一共3年多时间。

第一次见到近平同志，是1982年3月他来正定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他拿了一个行李包，还有一个塑料网兜，里面装着洗脸盆等生活用品。

第二天，办公室主任找我谈话，跟我说："习近平同志家在北京，他过来当副书记，在工作上你来配合他，搞调研、检查，你都要跟在身边。在生活上，你也要多帮助照顾一些。"

我和近平同志第一次见面，谈话很简单。我是部队复员的，他那时刚从军办出来，都是当过兵的人，感觉比较亲切。当时，我们都很年轻，我还比他大1岁，我30岁，他不满29岁。我是16岁就当兵，18岁入党，当了7年兵，复员回了农村，2个月后到人民公社当通讯员，待了1年。1976年我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上中专，那时候近平同志读大学。我们的经历有相似之处。

近平同志到正定不久，大概一周多的样子，他得知我的毛笔字写得不错，就让我给他办公室写两幅字装饰一下。其中一幅，

“近平同志办公室挂着一幅书法作品‘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他让我写的是：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这八个大字，就挂在他椅子后面。他办公室的前面还有一块地方，挂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在那里，他让我写了一副对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这两句话出自《论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出了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线，做人处事的两个方向。“周”就是善于团结周围的人，“比”就是拉帮结派、拉山头。君子“周而不比”，就是君子善于团结自己周围的人，但不拉帮结派。“和而不同”，就是君子能够求大同存小异，争取最大的团结，又允许不同的意见存在，能听进不同的意见。为了一团和气，你好我好，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样是不行的。

这是近平同志非常欣赏的一条格言，也将其视为做人处事的原则。这也确实是一位领导干部必须要有的胸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做不了大官，也做不了好官。“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虽然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是相当不简单的一件事。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这本是郑板桥的书斋联，讲的是艺术追求。郑板桥认为，艺术上尽量要追求简洁，不要蔓生枝节，这样的画才有意境。近平同志借鉴到工作方法上来，尽量把繁杂的东西变得简单，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抓大事，抓重点。“领异标新”，有创新的意思在里面。创新，就像农历二月的花一样，欣欣向荣，充满着朝气。我们现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是打头的一个。

当时，近平同志有什么活动，比如下乡调研、外出考察，我大多时候都跟着走。我作为资料组成员，算个“笔杆子”，协助近平同志工作后，做了很多文案的事情，经常要根据他的意思写一些东西。那时我就发现了他一个特点，就是对工作上的事记忆力很惊人。他很少做记录，但只要是接触过的数字，都记得很清楚。

还有一项工作就是，社会各界写给近平同志的信件，也都由我来处理。近平同志非常平易近人，老百姓给他写信的很多，有当兵的，有大学生，也有普通农民，所有来信近平同志都会看，并以适当方式回复。

上世纪80年代初的群众来信，有那个时代的特点。那个时候，真正反映问题的并不多。有的工人给近平同志写信，是表达自己希望为国家作贡献的热情；有的学生写信，是表示自己一定努力学习，学成之后报效国家；还有当兵的写信，表示自己复员后一定要回家乡，为家乡作贡献；还有一些普通群众给近平同志写信，是赞赏他、鼓励他，希望他在县委书记的位置上好好干，为正定人民作出更大贡献。这些来信的群众，不管什么身份，从事什么行业，他们都表达了对习书记的赞赏、支持和信任。

采访组：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正定是华北平原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县城，硬件设施及各方面条件应该是比较简陋的吧？他到正定县委以后，吃住条件怎么样？

张银耀：近平同志刚来正定的时候，生活各方面条件特别艰

苦。县委办公室都是平房，一间屋也就是十几平方米，大约三米宽五六米长这样的规格。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过来的时候，床板都不够用，而且都很窄，一米左右宽的床板，就算是比较宽的了。把床板在两个木凳子或者砖垛上一架，上面铺好垫子，这就是一张床了。

近平同志的床就是这样的：一床棉垫子，一块窄床板，下面用两个木凳子一架。铺盖是他自己带来的：一条褥子，一条军被。床上就这么点东西。褥子是他母亲给他做的，因为用久了，上面有很多补丁。

近平同志生活非常简朴。他在正定3年多时间里，冬天穿军大衣，夏天穿绿军装，基本上就没有别的衣服了。去北京开会，就穿个中山服，穿个布鞋或胶鞋，有时穿个布棉鞋。他那几年唯一穿了一次西装，就是1985年3月他率领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玉米加工考察团去美国考察的时候，那次是我送他到的北京。他去的是美国的艾奥瓦州，这个州位于美国中部，是美国最大的玉米、大豆和猪肉产地，食品加工、精密工业、生物科技和金融产业相当发达。1985年河北同这个州结为友好省州。近平同志他们去，主要是去考察当地农业和畜牧业，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对外交流的需要。

平时，近平同志吃的非常简单。当时我们县委都是吃机关大食堂，大家吃什么，近平也吃什么，没有小灶。县领导经常晚上开会到很晚才散，12点以前都不回家。那个时候事情比较多，会议也比较多，一说开会就特别急，今天晚上定了，明天就要开

1985 年，习近平访问美国时留影。

会。我们搞材料的人特别辛苦，需要连夜加班把讲话稿写出来。我们下乡也多，搞调研，有的时候能在乡里吃顿饭，有时候顾不上吃饭，饿着肚子就回来了。回来晚了，食堂的饭就没有了。运气好的时候，食堂有点剩的凉饭，热一热，能填饱肚子。运气不好的时候，连凉饭都没有，只能饿肚子，啥也吃不上。

平时吃饭、打饭，不管是干部还是职工，我们大伙在食堂都一块儿排队。那时候吃饭的条件也很简陋，没有像样的地方坐下来吃。有时候打了饭回办公室吃，有时候就在外面院子里吃。县委院里有个砖垛子架起来的水泥板，旁边有木板钉的长条凳子，我们就经常用这个当餐桌，一起吃饭，一起说笑。近平同志虽然是县委领导，但他也是年轻人，平时从来不像有些领导那样板着脸，一本正经的。他一直都很平易近人，很善于也很愿意和群众打成一片。

因为工作忙，他也经常来不及到食堂吃饭，有时候食堂关门了，就到外边买一点儿。那个时候经济不发达，街上饭店很少，也就能买个油条、烧麦包回来。如果是冬天，拿回来也就凉了。由于工作紧张，再就是经常吃凉饭、剩饭，长期下来，近平同志就得了胃病。他有一天胃里很不舒服，疼得难以忍受，便连夜上二五六医院检查。医生检查之后，说他这个情况必须得住院。那次一共住了4天院。住院期间，近平同志也没休息，在病房里开会、安排工作。那几天，我一直在那儿陪着他。

为了让近平同志能够吃得好一点，我们买了一个煤油炉和一个小锅，这样我就可以给他煮挂面，放点葱花，放点香菜，再卧

个鸡蛋，又热乎又有营养。鸡蛋平时不是那么好买的，我就找了供销社，买了一些鸡蛋备着。后来光吃挂面也腻了，我就试着做扁豆焖面，把面条下到开水里煮，半生不熟的时候捞出来，再用猪油或者羊油把那些豆芽、白菜炒一炒，再放面条焖一会儿。做这些饭，都是花的我们自己的钱，没有花过公家一分钱。

煤油炉黑烟太大，煤油味儿也重。后来条件逐渐好一点了，县委机关总务室给我俩配了个煤气罐，又有了一个炒锅，一个焖米饭的锅。这样就方便多了。煮挂面不成问题了，烙个饼，炒个菜，也能做到了。冬天的时候炖白菜、萝卜、土豆，能够吃得更丰富一点，生活上也有所改善。那个时候，一个星期就休息一天，近平同志经常是两三个月才回次北京，他周末有时到我家里吃饭。我家就住在县委后面，走路就五六分钟的样子。他喜欢吃饺子、烧麦这种包馅儿的面食，喜欢吃白菜馅。但是光吃白菜馅也太素了，放点肉才香。那个时候，工资普遍比较低，我当时是40多块钱，老吃肉也吃不起。于是我就用肥肉熬油剩下的油渣，跟白菜或韭菜调成馅包饺子吃。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您家里吃饭，您有没有在饭桌上托他办什么事？

张银耀：我还真托他办过事，但不是在饭桌上。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和我爱人结婚时间不长，有一个小孩。我爱人工作很忙，在工厂里三班倒。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也忙，没白天没黑夜的。这样我们谁也回不了家，孩子也管不了，这成了我们家的

老大难问题。为这个事，我就跟近平同志说：“我想把我爱人调到机关来工作。”

他说：“这事还得按规定办。”

碰了壁，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但我转念一想，近平同志没给任何人办过不符合规定的事，如果给我开了这个先例，他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做呢？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期间就酷爱读书学习。他到正定后工作更忙了，这个习惯是否还保持着？请您讲讲他平时的读书生活，还有他工作以外有什么爱好？

张银耀：近平同志在工作上特别勤奋，每天工作铁定要超过10个小时，甚至十二三个小时。他晚上睡得特别晚，处理完公务，12点以后还要读书。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的。有时候他在晚上10点到11点就把当天的公务处理完了，这还是属于比较早的情况。如果没有来访的或需要接待的，他就可以开始读书了，一般都会读到夜里两三点。

近平同志读的书范围很广，包括工作方面的，社会方面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等。他记忆力超群，看过的书，里面的重点内容，他都能记得很清楚。

他来正定大概半年多的时候，我们到一位同事家里去吃饭，这位同事的儿子四五岁，天资聪颖，小小年纪就知道很多三国和水浒的故事。小孩子就对近平同志说：“习伯伯，我问问你，三国有一段，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小男孩平时听父亲说习伯伯

很爱读书，所以提的问题有考一考他的意思，看能不能难住他。

近平同志对小孩子的问题对答如流，之后笑着摸摸他的头，鼓励他说："想要难住我，你还要好好学习啊。"

近平同志经常这样熬夜读书，还不怎么活动，我们就担心他的身体健康，有段时间就督促他运动。我爱打篮球，程宝怀县长也爱打篮球，我们就经常拉着他打篮球。有时候我们晚上也出去转一圈，散散步。

近平同志还是很喜欢体育的，就是因为平时工作太忙，也很少有时间关注体育。机关那时有一台黑白电视，下班以后，他有空的时候，一听说有足球、篮球比赛什么的，就会抽空看看。他特别喜欢足球，我们在一块儿看足球比赛挺过瘾，该进的球没进，他就惋惜地拍大腿说："哎！太臭了！"进了球，我们跳起来，他也跳起来欢呼。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和群众打交道很多，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他和群众交往的事情？

张银耀：你们可能看过一张照片，就是近平同志坐在一张桌子前听一位老大娘倾诉。这是实际情况，不是摆拍。他经常在正定县大街上放个办公桌，接待群众，现场做信访工作，让群众有什么事情，直接向他反映。这在正定县过去是没有的，他是第一个这么做的。这样做才能听到老百姓真实的声音，也是联系群众的一种好方式。

而且，近平同志的工作效率很高，老百姓有什么冤情，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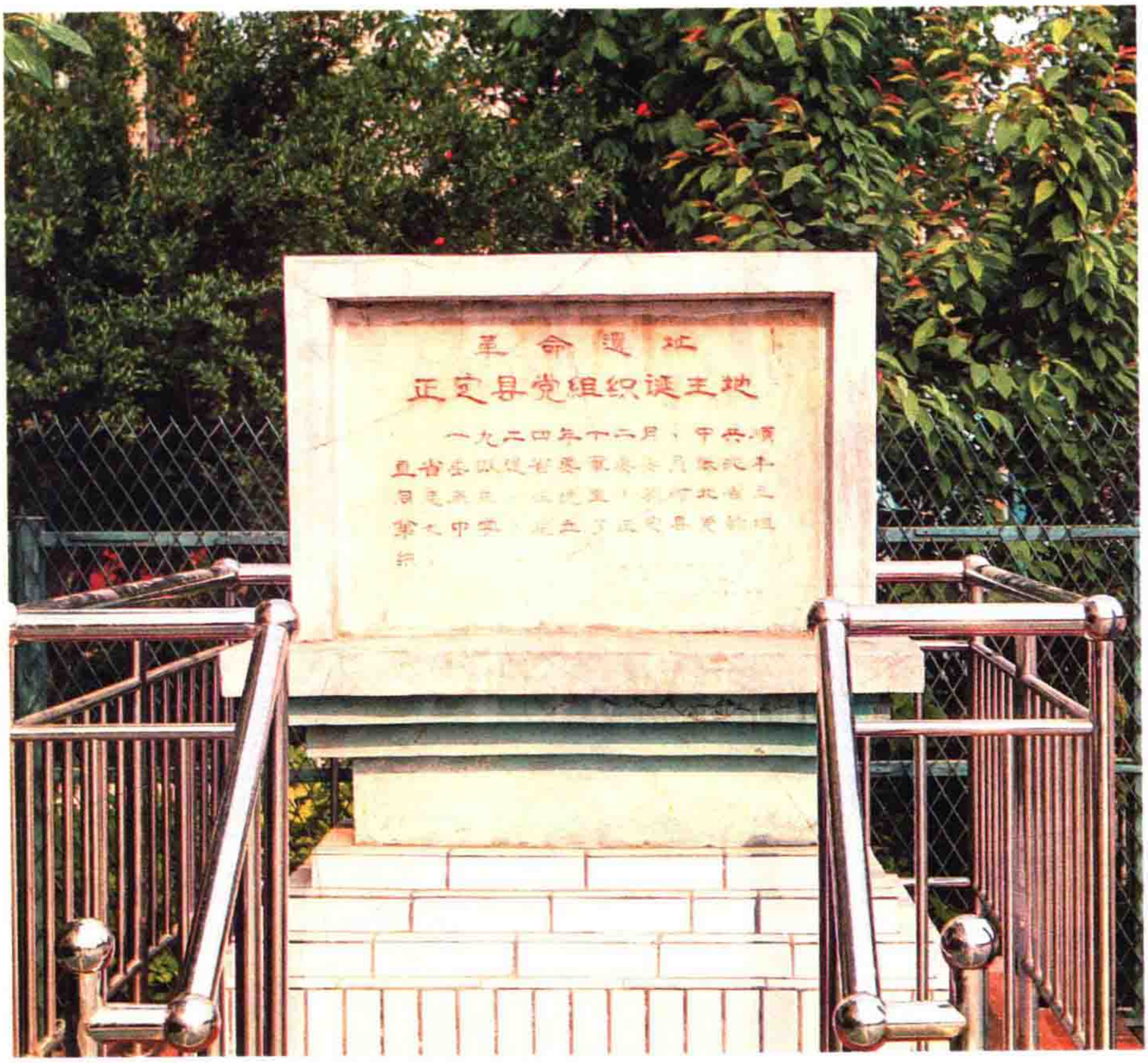
什么问题，他都是当场就拍板，立刻安排相关部门去处理。正定县现在也经常搞现场接访工作，这个好传统就是从他那时候开始的。

近平同志平时工作中也非常实在，非常接地气。平时县委领导班子开会，我兼任常委会的记录员。他讲话，处理工作，都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办，尤其是民主发挥得特别充分。在会上，常委会的同志人人都要发表意见，有什么看法都要当面提出来。最后近平同志作为书记再把大家的意见汇总、做结论。所以不管是民主还是集中，这两个环节他都做得非常好，非常到位。他讲话没有虚话、假话、套话、大话，做事也是办实事，注重实效。

正定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长期作为河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重镇，文化遗存丰富，素以“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楼”著称。近平同志来正定不久，就把县城大街小巷都看遍了，熟悉了环境和风土人情。对什么地方有什么文物，文物是什么情况，文物的保护措施做得怎么样，都了解得清清楚楚。这种情况下，他再做相关决定，就很到位。

过去正定的古塔，都没有围墙，缺乏保护。还有很多古建筑，任由风吹雨打，无人管理，无人看护。他把这些问题逐一都解决了，那些孤立的古塔，都用围墙圈起来，保护起来。还有县政府门前的两棵古树，也都用栏杆围起来，并且让我们考察清楚树龄，挂上古树保护的标牌。近平同志在正定期间，对正定的文物做了比较大规模的调查和保护工作，包括很多古建的刷漆、彩绘、维修，现在这些古建都很好地保存了下来。

郝清玉烈士纪念碑。1984年4月，习近平主持了纪念碑扩建落成仪式。



正定县党组织诞生地纪念碑。1984年5月30日，习近平主持了揭碑仪式。

正定岸下惨案纪念碑。1984 年 5 月 30 日，习近平主持了揭碑仪式。

正定县还有很多过去的革命遗迹，很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纪念地，该立碑的立碑，该挂牌子的挂牌子，都是在近平同志指示下一一搞起来的。

现在正定城区中心的常山公园，过去是个很大的臭水坑，在近平同志建议下，改建成了公园，现在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还有很多基础设施，比如现在的常山影剧院，过去是个破戏院，也是在近平同志领导和关注下新建的，并亲自请林默涵题的字。荣国府，是近平同志定下来，并经他的努力促成的，但真正建好、开放，并给正定县带来巨大收益，是在他离开正定以后。

这些文物古迹，还有这些文化场所，很大程度上承载了一个城市的文化记忆。难得的是，近平同志在当时就有这个意识。在他任上，正定的文物古迹不仅没有被破坏，而且能恢复的、能保护的，全都搞好了，这为正定后来建设旅游文化名城、靠旅游发展经济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近平同志平易近人，不是表面文章，而是时时刻刻都这么做的。有的领导平时上班的时候，把门一闭，很多事都是秘书来解决。近平同志的办公室，谁来找他都可以进。我的办公室在他外面，门随时敞开着，正对着楼道，谁一上楼我都能看得见。一般情况下，乡长、村书记，还有像贾大山这样的作家来找他，就跟串门一样，直接就来了，跟我打声招呼就进去了。

近平同志交往的人多，对于普通人他也能记得住。我记得是1998年，那时候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我们有三四十个干部去那里挂职学习。当时，他已经离开正定十三四年了，但还是一眼认

出了我们县委的一个机要员。他说：“杨兰发，你来了这么长时间也不跟我打招呼！”一下就叫出名字来了。

那个年代，办公条件较差，小汽车也少，为了照顾班子里的老同志，为了节省汽油，也为了能更贴近群众，近平同志一般情况下都是骑自行车下乡，除非有时候赶时间才会坐吉普车。有一次，他坐吉普车调研回来进了县城，刚进小北门，突然一个人往车前面一站，就把车拦住了，司机没办法，就停了车。当时，我坐在副驾驶位置，跟司机并排，近平同志自己坐在后排。这个人直接拉开后排车门，就坐在近平同志旁边了。原来，这人是跟司机认识的一个便衣警察，他上了车就开始大声说笑。司机说：“你赶紧下去！”这位干警一看司机这么严肃，可能也感觉到旁边坐的这位年轻人是领导，他就赶紧拉开门，下车走了。近平同志后来也没有批评司机，也没有追究这位干警，只是说，有必要跟公安局说一下，要加强对干警的教育，不能搞特权。

我哥和嫂子都是画画的。1980年，我哥在县城画画，在白纸上画山水，我嫂子画花鸟，有时候我也帮他们写个对联，他们拿到集市上去摆地摊出售，卖几张算几张，一天能卖个三块五块的，就挺不错了。

近平同志到我哥的画摊上一看，见我哥风餐露宿地卖画，很苦，大冬天那么冷还站在街头上，就很同情。我哥后来办了一个美术学校，招收一些小孩来学画，近平同志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2004年，美术学校成立20周年，近平同志还专门给我哥来了一封贺信，祝愿美术学校越办越好。

张银耀

“近平同志办公室挂着一幅书法作品‘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采访组：请您具体谈一谈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颁布的“六项规定”。

张银耀：“六项规定”是近平同志当了县委书记以后做的一项重要决定。当时，他清楚地意识到干部作风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有的干部有比较严重的官僚主义，有的缺乏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拍脑袋决策，还有的不深入基层，爱说假话、大话、空话。另外，就是会议多，三挤两占的，落实干工作的时间就没有多少了。

近平同志当了县委书记以后，一方面抓干部作风问题，另一方面就大量地削减文山会海，规定一星期至少两天是“无会议日”。他给四大机关和各个领导写了一封信，提出和推广这个观念。

为解决存在的问题，近平同志和我们工作人员一起，一条一条地研究，并交代我们多琢磨琢磨，然后拿出来再商量。我们根据他的意思反复进行推敲，拿出来以后提交会议讨论。后来常委会定了，就由县委正式颁布出台了“六项规定”。

总的看，“六项规定”要求具体，操作性强，针对当时突出的作风积弊，为领导干部定下了规矩，形成了制度。规定出来之后，近平同志着力抓好落实，正定干部作风有了很大转变。现在很多人说，当年的“六项规定”和现在的“八项规定”如出一辙，这是很有道理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以后，和正定还有哪些接触？您本人还和他见过几次面？留下了什么深刻印象？

张银耀：近平同志离开正定以后到福建工作，包括后来在浙江，正定人只要过去，想见他，他都见。

最典型的一件事，是我们县的一个农村青年，创办了一个电器元件厂，边研究边生产，近平同志视察这家工厂的时候，和他认识了。近平同志调到福州以后，这个青年有一次到福州办事，找到了他的电话，就给他打过去，联系上了，想去看看他。近平同志很痛快地答应了。两个人见了面，叙叙旧，聊得很好。近平同志对群众一贯都是很热情的。

但是我要是直接去找他，做“不速之客”，都是会挨训的。他批评我说：“你也不打电话，也不说一声，就直接跑过来了，不知道我忙啊？”我说：“我给你打电话，你总说这忙那忙，我还能见到你呀？我只能搞突然袭击。”我多次去看望他，前后大约有十几次。到福州去看他有六七次，在浙江也有几次，在上海有过联系，但没见上。我见到他，他都会问正定的情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要我简要说一说。在浙江的时候，他还给省委办公厅的同志介绍我，表扬我说：“你们要向他学习，当了20多年科长，从没给我提过任何要求。”

近平同志离开正定后，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第一个变化，就是服装变了。

在正定的时候，近平同志无论春夏秋冬都是以军装为主，我们就算到别的省去考察，他也还是这套穿戴着装。但是到了1984

张银耀

"近平同志办公室挂着一幅书法作品'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年，他鼓励我们几个工作人员说："你们要带头穿西服，以此来带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当时，穿西服还不时兴，西服也很贵，衣服质量也不好。我说："我还真不习惯穿这西服。"近平同志说："大家还不懂，你先带头穿起来嘛。"后来，我们办公室资料组的几个年轻人，在他的鼓励下率先穿起了西服，从那以后，机关里面慢慢地也穿西服了。再往后，女同志慢慢也穿花衣服了。

后来社会上流行跳交际舞。近平同志鼓励机关干部下班以后也可以练一练，找老师教一教，大家都可以跳，接受新生事物。

1986年，我和继任的县委书记到厦门去看近平同志。一见到他，嘿！穿一身笔挺的西服，皮鞋也是锃亮，简直和在正定的时候判若两人。我说："习书记，你在正定的时候，让我们穿西服，你自己穿得土里吧唧的，现在可是大不一样了！"他说："到哪儿说哪儿吧，这里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我要是再穿棉大衣、土布鞋，谁还敢跟我谈项目？"说到这里，大家都开怀大笑起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正定的老同志们，各界群众，还是一直对近平同志念念不忘。他在正定工作就短短的3年多时间，给正定带来的巨大变化，给群众生活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进步，群众都看得清清楚楚，体会得真真切切。

近平同志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我有幸与他朝夕相处，一起工作，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优秀品质，受益终身。

我们有过很多交流，至今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近平同志多次跟我说过的一句话："我早已是以身许国了。"这是我们在一块的

时候，他对我说的掏心窝子的话。那个时候，他年轻，我也年轻，我觉得我听到的是一个热血青年带有强烈理想主义的话语。现在，30多年过去了，我们都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和分量。

『近平同志对正定的历史文化传承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近平同志对正定的文物特别关心，有一次在隆兴寺院西侧，他看到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撰写的名碑『上沽满泥土，缺乏保护，他平时看书很多，对历史很有兴趣，知道这是一个珍贵文物，当即找到主管领导，并提出严肃批评，一我们对文物保管不好，就是罪人，就会愧对后人。』——近平同志说：

采访对象：石文生，1956 年 9 月生。1984 年调到正定县委办公室资料组工作。现任河北省委第五巡视组组长。

采 访 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 年 4 月 14 日

采访地点：河北省委石文生办公室

采访组：石文生同志，您好！您的年龄比习近平同志小一些，和他算是同龄人。您当时在正定从事什么工作？

石文生：1982年，我从正定县教育局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工作，负责文化教育方面的资料整理，经常跟县领导一起下乡调研。县委和县政府是前后院，我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两年。1982年3月，近平同志到正定工作时，县委办公室有专门的资料组，有时需要县政府提供文化教育方面的资料，由我负责整理初稿。在其他方面，我和近平同志接触不多。

近平同志接任县委书记后，县委制定了“内引外招”政策，1984年把我调到县委办公室资料组，负责领导讲话、县委文件的起草工作。调到县委办公室后，我和近平同志都住单身宿舍，接触就多了起来。近平同志非常平易近人，不分年龄大小，职务高低，他都十分和气。当时我在县委办公室年龄最小，近平同志经常带我下乡，一路上讲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知识。写材料一般在晚上，他都提前交代得明白透彻。我在那里既是工作，也是学习，感到十分开心，工作进步也很快。

近平同志抓工作非常认真。他工作很忙，每天睡觉都很晚。我经常是睡了一觉，起夜上厕所的时候，看到他房间还亮着灯，甚至有时候我早晨起床了，他还没睡，和北京来的专家、顾问谈话，谈个通宵，也不睡觉，直接就吃早饭了。我就跟他建议说：“习书记，你老这样不好好休息，对身体可不好啊。”习书记笑着说：“好的，我以后注意。”但真到忙起来，他还是顾不上休息。

采访组：说来你们既是“邻居”，又是同事，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吧。

石文生：我们在一层楼，办公室挨得很近。近平同志因为工作太忙，平时吃饭睡觉都没有什么规律，经常是赶不上饭点，吃不上热乎饭，睡不了一个囫囵觉。但是他并不在意，他平时的生活也非常简朴，穿衣服很普通，出行基本上都骑自行车，县委当时有一辆吉普车，但他自己基本不坐，主要留给老干部使用。他那年30岁，觉得自己年轻力壮，骑骑自行车挺好，锻炼了身体，还节省了汽油，而且下乡搞调研的时候，和老百姓更容易接近。

当时正定县有25个乡镇、222个村，近平同志骑着自行车跑了不止一遍。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我跟着他到永安乡三角村调研，那次调研就是一次常规的走访，他主要是想和老百姓聊一聊，看看老百姓眼下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对县领导有什么期望和要求。

进了村，我们看到有个60岁上下的老太太，穿得很脏很破，在路边坐着，一脸苦相。近平同志当时就下了自行车，走到老太太近前，俯下身来和她打招呼。老太太听力不好，神志也不太清晰，搞不清楚近平同志在说什么。旁边有村民就说：“这老太太，无儿无女，身体也不好，生活可苦啦。”近平同志当时就从身上掏出20块钱交到老太太手里。老太太虽然糊涂，话也说不清，但知道给自己钱的是好心人。她很激动，流下了眼泪，向近平同志表示感谢。这20块钱，放在今天不算啥，但20世纪80年

代初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当时在县委办公室工作，工资一个月不到30块钱。近平同志作为县委书记，工资是50块钱左右。他能拿出小半个月的工资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村老太太，这让我很感动。

我们告别了老太太，接下来准备到村里找几位大队干部谈谈。因近平同志下乡从来不提前通知，大队部关着门，一问村里人，说可能到地里劳动去了。近平同志说："这是好现象，咱们今天也不在这里等了，到村外田地里看一看，哪里人多咱们就到哪里去。"我们骑着自行车走到村外的田边，当时有几十个人正在锄地、间苗，农民干这些活自然是很熟练，把草锄掉，把不好的苗锄掉，留下好的苗，手法很熟练，速度也很快。当时田头还放着几把锄头和锄地拐，近平同志说："来，咱们先跟他们锄地！"

我们从田头随手拿起锄头和锄地拐，因为当时地里的禾苗刚半尺高，穿着长袖衬衫不方便，他说，干这活得把袖子撸起来。我们撸起袖子就干了起来，他的手法和老农一样熟练，当时我就吃了一惊。我就紧跟在他后面一起干。当然，我是农村孩子，农活自然也不在话下。老百姓一看，来了两个陌生的年轻人一起干，很高兴，干得更是热火朝天。

近平同志对农民的生活特别了解，他干农活挺厉害，那手法，那熟练程度，比起我们农村长大的孩子，毫不逊色。他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说"撸起袖子加油干"，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熟悉，脑子里呈现出来的就是他当年带着我在三角村

帮农民干活时撸起袖子的画面。他这样的生活积淀非常深厚。他现在说的很多话，都是来源于老百姓的生活，通俗易懂，让人觉得很亲切。如果他一直没有接触过老百姓的生活，就不可能说出这些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又寓意很深的话。

这些农民不知道我们是从县委来的，干完了活，近平同志擦了把汗，才跟生产队长说明了来意：“我们是从县里来向大家征求意见的，现在歇晌的时间，咱们一起开个会吧。”于是，大家围坐在一起，抽烟的抽烟，喝水的喝水，近平同志就向大家征求对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的意见和要求。当时谈的时间比较长，我记得主要谈的内容是涉及个人生活和生产队粮食提留问题，还有其他问题也提了一些。

另一方面，近平同志还让大家谈谈正定县的未来发展怎么做才好。这就是问计于民。三角村在正定是个比较先进的村，也是我们正定一个“农业学大寨”典型村，粮食产量比较高，每年交的提留比较多，但这样一来老百姓的生活就比较苦。近平同志当时就表态说：“这个问题我们会认真研究，我们这个村是先进村，本身为县里、为国家作了很大贡献，决不能让老百姓受苦。”

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近平同志当时要着手调查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当时交提留是按基数来计算的，基数越多，交的越高，老百姓个人留的就越少。为了追求产量，其他经济作物就种得很少。而粮食价格很低，当时是一毛一一斤。三角村离县城很近，种点儿经济作物供给县城，不是更好吗？回来以后，近平同志就研究这个事，后来一条一条都落实了。

1982年冬，习近平在县劳模大会上讲话。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在主政正定期间，内引外招，大力推动人才建设。您当时是亲历者，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事情。

石文生：内引外招，大力推动人才建设，我不仅是亲历者，还是受益者。我到县委办公室工作，就是因为当时文学创作上的成绩被“内引”的，后来还获了“书记县长文学奖”，盖有县委书记习近平、县长程宝怀印章的奖励证书，我现在还保存着。

我们县委办管文字的主任朱博华，就是公文写作方面不可多得的人才，也是我进入县委办公室工作的导师。近平同志对朱博华很尊重，风趣地管他叫“朱子”，意思是说他像宋代思想家朱熹那样有才。有一次，朱博华同志让我给近平同志报了个材料，第一页写了几句说明，是用毛笔写的，因为写得比较潦草，近平同志风趣地说：“朱子大草，我看不清！”我就给近平同志口述了一遍。回到朱博华主任办公室，我将这些情况进行了反馈，朱博华说，习近平有能耐，批评人还能让你高兴。

经近平同志提议，要对县里的人才建设进行全面总结，给省委写一个报告，交代我起草初稿。我写的报告初稿题目是“正定内外全面招揽人才为发展经济服务”。朱博华同志把这个标题改成了七个字“正定念好人才经”。这个题目简明扼要，又吸引人，效果很好，经近平同志审阅后，很快被省委的专刊采用，并向全省推广，正定念“人才经”这一说法就由此传开了。

近平同志当时虽然年轻，但是他请来的人才可是经验丰富，他从全国招揽了一批专家学者当正定的顾问。这个“智囊团”成

员都是在各个领域大名鼎鼎的专家学者，我记得有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等。有这些大专家给正定当顾问，对正定这么一个冀中平原的县来说是个很大提升。

举个例子。当时，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在三角村搞了一个“循环经济”，他把当时的传统农业从空间上分成几层一起搞。比如，一块土地，上面种葡萄，葡萄藤下挖池子养鱼，鱼池周边养鸡，葡萄剪下来的叶子包括一些害虫，鸡可以吃，鸡粪可以做葡萄的肥料，也可以做鱼饲料。当时，全国好多人来参观这个“循环经济”试点，这在当时是轰动全国的。此外，正定县在医学、文化方面的发展，这些专家都起了很大作用。

这些专家每3个月来正定开一次全体会，他们对正定的发展提出很多意见建议，每个月给他们每人发5元钱津贴。近平同志说，这些钱虽然少，却体现了我们敬才用才之风，也表达了我们正定人民的一点点心意。

采访组：《正定古今》这本书的创作凝聚着习近平同志当年的心血，据说是您执笔编写完成的。请您介绍一下这本书诞生的过程。

石文生：《正定古今》这本书是以县委的名义写的，凝聚着很多人的心血，近平同志贡献最大。他在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明确提出了改革兴县、工业兴县、科技兴县、人才兴县、文化兴县、旅游兴县的新思路，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把挖掘历史文化、实施旅游兴县作为一项重要战略措施。通古博今的近平

同志被正定丰富的古建筑群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吸引，他熟读县志、史料，走街串巷，勘察古迹，细品文化，对正定的历史和文化钻研得很透。他曾经在一次全县青年干部大会上做过一个十分精彩的讲话，讲到正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过去1600年间一直是郡、州、路、府、县治所，曾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五代后唐时设为北都，后汉契丹时升为中京。他的讲话把正定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旁征博引，慷慨激昂，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正定人，听起来都十分新鲜，羡慕他知道的那么多。

近平同志对正定的历史非常感兴趣，对正定的未来也充满信心。他说：“正定的历史文化这么悠久，咱们应该把县城好好整治一下、修缮一下。”他刚来时，正定县城的很多城墙都破坏了，因为老百姓缺乏保护意识，把城墙砖拆回家修房子、垒猪圈、建厕所。县志里记载的“九楼四塔八大寺”，只剩下大佛寺，还有4个塔，而且年久失修，一塌糊涂，旁边堆着很多垃圾和柴火。

近平同志对正定的文物特别关心，有一次在隆兴寺院西侧，他看到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撰写的名碑“本命长生祝延碑”上沾满泥土，缺乏保护，他平时看书很多，对历史很有兴趣，知道这是一个珍贵文物，当即找到主管领导，并提出严肃批评。近平同志说：“我们对文物保管不好，就是罪人，就会愧对后人。”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近平同志常说，正定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非常值得研究。时间不长，县委召开常委会，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是由近平同志

提议，编写一本关于正定的书，并提出编写这本书的指导思想。当时书名还没有想好，只是把谋划起草的任务交给县委办公室，让我负责先整理出一个整体框架和目录。我只上过两年中专，文化根基不深。不过，我原来爱好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小说，还写了一些表现改革开放的作品，我在工作之余创作了反映改革开放新青年的小说《黑牛和他的妻子》，由正定作家贾大山推荐，被铁凝选用在《莲池》文学期刊发表，所以对写作是有兴趣的。任务派给我之后，我就收集民间的东西、历代名人与正定的关系等资料。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查资料很不方便，加上“文化大革命”中好多文字资料都被毁了。我到处去找，也没找到什么。当时挺犯愁的：“这书我可怎么编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为此，我就和办公室主任一起找近平同志。没想到，近平同志却是胸有成竹，他说：“我手头有一整套《真定府志》，还有一套《正定县志》，对正定的历史，都有详细记载。”这些古籍，一共有8本，他好像是从国家博物馆或者省博物馆得到的一份复印件，当时复印技术不行，印出来的字模模糊糊的，但好在还能确定是什么字，不至于出错。这已经非常难得了。

按照领导要求，1个月后，我整理出这本书的基本框架和目录，设计全书共13章，39节，书名暂定《美好的正定》，报近平同志审定。近平同志说，总体不错，就是有点虚的感觉，这可能与你过去写文学作品有关。比如第二章第二节，写改革开放春风吹，人民欢呼赞县委，不能这样写，要用写实手法，用事实和数据说明。原来定的3部分可分为3个篇目，风格和写作手法可有

所不同。正定的历史沿革可放在书的最前面，叫做概述。书名不一定叫《美好的正定》，美好不美好还要听人民评价，可用写实的手法叫《正定古今》，古代的事、今天的事都写清楚了，就达到了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

按照这一要求，又经过一周的修改，形成了新的书稿目录，书名叫《正定古今》，共分上、中、下3篇，上篇主要写建制沿革、自然概况、经济概观；中篇主要写历史名人、名胜古迹、文学发展和民间习俗；下篇主要包括风物传说、古代诗歌和当代文论，全书共3篇、16章、50节、119个条目。最后报近平同志审阅后交由县委常委会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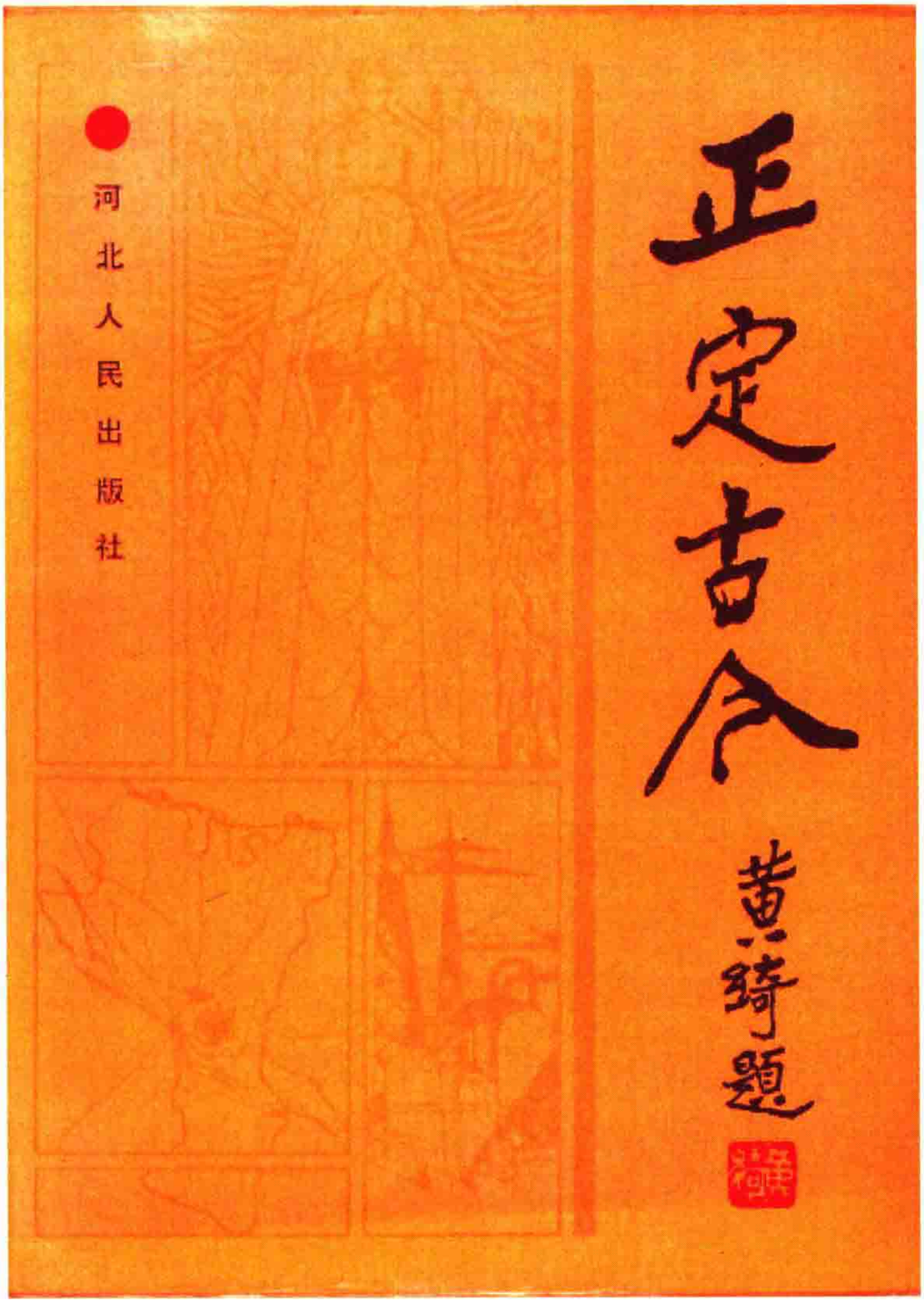
书的基本框架和目录形成后，正式的写作班子便提上日程。经县委研究，成立了《正定古今》编写组，由县委办公室主任总负责，我具体负责，从县直单位、有关乡镇抽调18名同志负责编写，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将所有章、节和条目分别分配到每一个同志名下。当时写作条件非常艰苦，编写组的同志在招待所租了3间房子，每间房子6个人，每人一张木板床，一个学生课桌，一个小木凳，2本稿纸。负责写上篇内容的同志有相关县直单位提供的一些资料；写名胜古迹、文学发展和民间习俗的，只有到民间、乡下去采风。当时我负责整部书的总策划和历史沿革、风物传说、古代诗歌和当代文论部分，在通读《真定府志》的基础上，把有关内容摘记在笔记本上，再誊写在稿纸上。8000多字的历代建制沿革，分原始部落、黄帝子孙、先秦封邑、汉魏常山、北齐移郡、唐宋变迁、金元改制、明清发展、民国以后的

变化9个部分，每部分都要查阅大量资料。由于《真定府志》是文言文，且历代建制沿革资料散落各个方面，工作起来难度就更大。近平同志知识渊博，虽然到正定时间不长，却是真正的“正定通”，对写这部分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经过近平同志的关怀指导和编写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1985年2月15日，写出《正定古今》初稿，全稿约45万字，写了满满3000页稿纸，找人用“四通”打字机打印出样本，报近平同志审阅。他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既有原则性意见，又有十分具体的意见，并明确提出，《正定古今》是一本综合性的书，要向各方面人士反复征求意见，特别要征求贾大山同志意见，同时还要力所能及补充一些照片资料，使这本书既有史料价值，又有可读性。《正定古今》出版时，按出版社要求要有主编、副主编、编委。我们建议由近平同志当主编。他说：“那样不太合适，主编就是主要负责编写的同志，其他参与编写的同志都很辛苦，要写篇后记进行说明，我写篇序还是可以的。”

近平同志为《正定古今》写的序影响很大。序的开篇写道：“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勤劳的人民。我爱自己的故乡，更想了解这里的一切……”这段话，是近平同志的真实感受和肺腑之言。

“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这句话他在正定工作时曾多次说过，但写在书稿中，落实在文字上，是在这篇序中首次出现。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生活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与正定人民朝夕相处，为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呕心沥血，他用心血和汗水，在正



1987年5月，习近平为《正定古今》一书作序。

定大地上书写出了一部青春无悔的感人诗篇。实践证明，他爱自己的第二故乡，爱这里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勤劳的人民。知之深，爱之切，一直延续到现在。

离开正定后，他的心还和正定干部群众紧紧连在一起。不管是在厦门、宁德、福州，还是在浙江、上海、北京，近平同志不忘正定的建设与发展，不忘正定人民的幸福与安康，曾先后6次“回故乡探亲”。

《正定古今》序共1500多字，篇幅虽然不长，但字里行间洋溢着近平同志对正定的深厚感情。他在序中对这本书予以肯定，“这是在新形势下用新的体例写成的一本新书……是半个世纪以来第一部系统介绍本县情况的书”。他概括了正定源远流长的历史、瑰玮灿烂的文化古迹和风格独特的名胜古刹，高度赞扬正定出生的三国名将赵子龙等英雄豪杰和文学大家，回忆了自强不息、勇敢奋斗、百折不挠、可歌可泣的名人义士和气壮山河的革命斗争，回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定人民取得的丰硕成果，最后写了自己的感慨：“回忆往事，热血沸腾；展望未来，豪情满怀。正定人民具有刚强智慧的素质，勤劳朴实的传统，更有不甘现状，勇于开拓、发奋图强的雄心。”他从自己渊博的历史知识中总结，“正定，有一个值得自豪的历史”。他从一个政治家的高度呼唤，“正定，将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近平同志在生活上「习以为常」，工作上「勤以为苦」』

大院的晚上，最后灭灯的总是他那扇窗户。要下乡了，一辆半旧的二八自行车，就成了他使用率最高的交通工具。下村里调研，和群众聊天谈话，往往就在田间地头进行，没有那种繁文缛节和刻意安排。县委常委会议事，很多时候都是选择大家下基层调研回来后的晚上时间。

采访对象：朱博华（左），1933 年生。1964 年起在正定县革委会办公室任职，后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1994 年从县政协退休。王志敏（右），1944 年生。1983 年到正定县委办公室任资料组长、县委办副主任，后任县委研究室主任。2004 年从县教育局退休。

采 访 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 年 2 月 25 日

采访地点：正定县王志敏家中

采访组：朱老，王老，你们好！请你们讲一讲最初是如何与习近平同志认识的。

朱博华：近平同志在正定县工作的时候，我任正定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分管文字工作。我们是因为工作关系认识的。

王志敏：近平同志来的时候，我还没到县委办公室工作，是后来近平同志把我点将调过去的。我之前是县政协的资料员，因为写了一篇《杨谦与太平菜籽店》的文章，引起近平同志注意。之后就决定把我调到县委办公室。我是1983年冬过去的，在朱主任手下工作。到县委办公室后，做文字工作，就和近平同志互相认识了。

采访组：上世纪80年代初的正定，是农业大县，也是穷县。当时，习近平同志离开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工作岗位来到正定，你们怎样看待他的这个选择？

朱博华：1982年3月，近平同志离开军办的工作岗位，来到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这次下来，是他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的，这是他人生轨迹的重要转折点。当年他29岁。

报效国家，方式可以多种多样，近平同志选择了下基层。在他的理解里，机关是上层，离群众远了些，离鲜活的社会生活远了些。基层，才离群众最近，才最接地气，才最能感受社会的脉搏，才最能认知社会。

下基层选择正定，这是组织的安排，但对于他和正定来说，

都是一种机缘。正定历史的厚重和现实的贫穷，有点像那个时代中国的影子。正是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选择，让正定成为近平同志作为领导干部起步的第一步阶梯，正定也因之成为他至今牵挂的一块热土。

在正定3年多时间，让他完成了从中央国家机关到基层的转变，也完成了从一般干部到领导干部的擢升。三十而立于年，三载而立于事。这期间，他和正定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全县干部群众，开创了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局面。在百里之域、一县之治的这块热土上，留下了他呕心沥血、求索实践的历史足迹。

采访组：热爱学习、刻苦学习、善于学习，是很多受访者对习近平同志形成的深刻印象。请你们谈谈他在正定期间读书学习的情况吧。

王志敏：学富于年，是当年近平同志给我们留下的极为强烈的印象。作为一名青年领导干部，近平同志知识的广博和丰富，他的思想和见地，明显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在工作和接触中，随时随处可以感受到他孜孜不辍于学和问的学子禀赋。

到了正定，走上领导岗位，面对独当一面的重要担负，他自觉把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为自己规划了四个方面的学习任务：向书本学习知识，向实践学习真知，向历史学习经验，向群众学习智慧。学习让他感到一种充实，一种升华，一种底气。无论是全局工作的决策，还是具体举

措的部署，都能让人明显感觉到坚持不懈学习对他的帮助作用。

近平同志从军办到正定，这本身就是“从头学起”。走路要从第一步迈起，工作也应该从基层做起，基层工作对领导干部成长的锻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在“勤”和“俭”这两个方面是如何做的？

朱博华：先说说“俭”吧。初到正定，近平同志给大家留下的是这样的印象：一身半旧的绿军装，还有一条半旧的军被，一条打了多处补丁的褥子。这条褥子成了他不离不弃的“伙伴”。苦以励志，俭以养德，当时正定县委机关简朴的办公条件，正好为他提供了磨砺的环境。

十多平米的一间平房，一张三屉桌、一个文件柜、两条凳子，一张床板、一个脸盆架、一个暖水瓶、一个电灯泡，这便是他办公室兼宿舍的全部装备。到了冬天，只是多出一个取暖的炉子和一个烧水的铁壶。

吃饭，一日三餐在机关食堂，一样的排队打饭，一样的三五一群打地摊。来晚了就没菜了，一样的两个馒头一块卤豆腐，县委书记也同样待遇。

大院的晚上，最后灭灯的总是他那扇窗户。要下乡了，一辆半旧的二八自行车，就成了他使用率最高的交通工具。下村里调研，和群众聊天谈话，往往就在田间地头进行，没有那种繁文缛节和刻意安排。县委常委会议事，很多时候都是选择大家下基层

调研回来后的晚上时间。

他的作风非常朴实。下乡吃饭一定要在乡镇食堂，而且粮票、饭费一定要如数交纳。他的客人他自己掏腰包接待，常常是几段香肠、一碟花生米、一瓶老酒。公务接待，是以缸炉烧饼、猪头肉为主打的便餐，或者干脆就是饭菜合一的一盘饺子。

采访组：我们采访这几天总能听人谈起习近平同志的“正定战略”，请你们从各自了解的角度讲一讲，他是如何让正定这个“高产穷县”打了翻身仗的？

王志敏：正定是一座很有名气的古城，也是一个很有名气的“高产穷县”。在计划经济年代，正定粮食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在全国出了大名，被树为一面高产红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年代，传统的模式明显适应不了全新的形势。正定新的发展路子怎么走，对于近平同志来说是一个亟须解决的现实课题。

处在改革开放的三岔路口，是抱残守缺还是更新观念，是小打小闹还是大刀阔斧，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是进行统揽全局的战略设计，在这一系列问题面前，近平同志作为正定的领航掌舵者，从战略思维的高度，明确而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为了从时间、空间、地域三个维度上理清情况，近平同志在工作之余，连续几个月查古史、摸实情，对于正定千年之史、百里之域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个总体了解。

在此基础上，他和县委、县政府领导，通过下基层解剖典

型，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借鉴先进经验，对全县工作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分析，弄清了正定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症结，看准了主要矛盾，在工作实施上坚持做到了谋之于本、谋之于重、谋之于宏、谋之于远。

谋之于本，就是谋经济社会发展之本。当时正定县的情况是，经济无强力，民不富；文化无活力，城不名；社会无发展，业不达。有的只是虚火和浮名，离真正的强县富民差了十万八千里。守着金碗却没饭吃，成为正定元气不足的症结所在。谋其本，就是谋正定问题的根本，发展的根本，敢于从软肋开刀，从痼疾下手，找到能够让正定活起来、强起来、富起来的路子。正因为明确了这种思路，才有了全局性的方向探索、道路研讨、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蓝图，才有了正定经济从根本上培植元气的规划和部署。

谋之于重，就是谋经济支撑之重。正定的传统农业，一直是金鸡独立状态，没有坚挺的脊梁。突破传统，更新观念，大力发展工副业，才有了农业经济与副业经营两条腿走路。县乡工业的逐步壮大，才有了县域经济农、工、副的三足鼎立。内贸外贸发展起来了，才有了农、工、副、贸的四足方鼎。经济支撑由一而为四，架构比较完整了，筋骨日益强壮，血肉日益丰盈。在3年多时间里，全县上下共同奋斗，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4亿元，比1982年翻了一番还多，卓有成效地开始从农业传统模式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轨。

谋之于宏，就是谋发展大势之宏。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思想

偏于保守的正定来说，缺乏大视野、大方向，借外势、造内势、迎趋势，成为全县工作的重中之重。于是，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就步调一致地带领干部群众，在全县形成了不落人后、敢领潮流的大干快上局面。思想观念的突破，自然成了正定改革开放的先导。

谋之于远，就是谋持续发展之远。在当时，虽然还没有可持续发展这样明确的提法，但在全局工作谋划中，已经实际地关注到持续发展、长远发展这个层面了。从产业结构上说，明确提出要摆布好三个产业的关系，稳定发展第一产业，努力发展第二产业，积极开发第三产业。从两个文明建设上，强调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齐步走，不能形成跛脚，跛脚走路是走不好也走不远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谋经济发展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既看重经济发展的实际利益，更看重保护环境的长远利益。就这样，正定初步形成了三个产业协调发展、“两个文明”和谐发展的可喜局面，有了教育、文化、旅游等多项成果的收获，特别是省会水资源地选址正定，更是为当年的环境保护做出权威鉴定。

因为秉持战略思维，让正定发展从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大思路、大格局，对当时来说这是一个好开端，对于后来则是奠定了一个好基础。这是正定赢得未来的宝贵思想条件。

采访组：引进人才是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期间大力推动的一个举措。请你们谈谈当时正定的人才政策，以及他和县委班子都做

了哪些具体工作。

朱博华：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领导县委班子在人才问题上有很大的作为，营造出了一个大气象。

经济发展，关键在人才。近平同志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看到，各地发展路子不同，有的念“山海经”，有的念“草木经”，正定没有特别之经，就是缺人才。于是他们就把人才和发展联系起来，在正定这块土地上念起了“人才经”。

这本经，还真是让近平同志和县里的领导念大了。从县内到县外，经过反复计议、谋划，通过内用、外招、上请、下挖、近补、远育6个渠道，用大气力解决人才问题。在实施层次上，则展现为三部曲。

第一部曲，领导班子自己先念“人才经”。聘请高端人才成立县顾问团，借专家学者的大脑，为正定的发展出谋划策。

登门拜访，真诚邀请，在北京工作的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医学专家张晓楼、食品专家杜子端，在河北工作的教育专家潘承孝、科学家邹仁钧、作家尧山壁、画家田辛圃等几十位高端人才，都成为正定县顾问团成员。几年中，他们都亲自来正定，与县委、县政府领导一起交流，给正定以信息输送、科学咨询、决策指导和实际工作支持帮助。全国第一家农村研究所，石家庄地区第一家标杆医院，就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搞起来的。由于顾问团的建立，由于这些大专家、大学者对正定的支持和关心，极大提高了正定的知名度，抬升了正定的人气。全国26所大专院校、21个科研单位、76个重点厂家和正定挂了钩，正定从

借脑借智的高点，转化为举国关注的热点，又转化为各项事业发展的亮点。顾问团，确实给正定顾了问、帮了忙，让正定沾了光。

第二部曲，全县念“人才经”，解决各方面的人才问题。

“人才经”，首先在于人才大观念，在于如何看待人才，人才在你的心目中是个什么位置。县委、县政府以正式文件出台关于招贤纳士、广揽群才的正定九条。这正定九条，情之殷殷，意之切切，借助现代媒体的传播力，来了一个广而告之于天下。英雄不问出身，无论五湖四海，来正定就欢迎。“上”至国家级专家，“下”至乡镇企业的技术能人，“红”至科研单位人员、大专院校毕业生，“黑”至戴帽右派、争议人物，只要真正有一技之长，能为正定的经济起飞助一把力，县委、县政府都一律开门相迎、真诚以待，用其所长而不求全责备，扬长避短知人善任，为他们提供用武之地。应招来正定工作的机械、电子、纺织、化工等各行业技术人才，就在古城大显身手。外来人才之外，县内也涌现出不少人才，仅仅是依靠社会力量多种形式的70多个培训班，就有结业人才1.3万名，正定有了自己的“人才供应处”。能够一视同仁、不拘一格地用人才，这在当年无疑是很大的观念突破和思想解放。

我们想想看，对于外来人才，且不说工作安排人岗相适、各展其长，就连生活照顾的细致，包括送粮入户、搬煤入屋都写进了规定里。客至如归，温暖如家，为人才考虑到这样的程度，谁还会不被这样的诚心感动呢？

感动是一种力量，化作巨大的能量转换和释放效应，数以百

计的各方面专业人才，掏出看家本事，让正定迎来县办工业崛地而起、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的局面。

第三部曲，倾力投入发展教育，以解决人才的未来之需。

近平同志很清楚，人才引进只能解一时之渴，教育发展起来才是解决正定人才长远之需的源头活水，才是正定经济、科技乃至社会发展的最深厚底气。近平同志从最紧迫的问题入手，解决农村小学危房，解决民办教师待遇，改善办学条件，改变了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的窘困状况。在资金投入、教师培训、教学质量提高、教育改革等方面全力推进，逐项落实，为教育事业长远发展搭起了架子，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一部“人才经”，念出了正定的蒸蒸人气、勃勃生气。

采访组：长期以来，习近平同志都把人民的利益、群众的冷暖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请你们讲一讲，他在正定工作时是如何为民谋利、为民服务的？

王志敏：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大意是说，谦逊温仁地亲民爱民，人民就会拥戴你。领导干部就应该这样，遵从人民的意志，勤恳恭谨地为人民服务，踏踏实实地落实中央的大政方针。近平同志在工作实践中，就是这样做的。

近平同志主持召开转变作风的专题常委会，统一县委班子的思想，下决心解决浮在上面的老毛病，开启沉到基层的新风气。继之，又以县委文件形式下发《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

对每个常委都明确要求，每年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基层，要有自己的联系点、联系户，每人都要亲自或主持写出两篇以上调研报告。为了进一步增强转变作风的紧迫感，他又给四机关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大家“调查要一下到底，亲自摸情况，直接听反映，寻求源头活水”，并把形成的意见直接告诉他。一会、一文、一信，犹如长征火箭的三级助推，让县委机关作风焕然一新，“衙门”里坐不住了，下基层成了如同日课一样的工作习惯。

干部下到底了，问题也就摸透了，主攻方向也就明确了。在近平同志带领下，县委、县政府解决了一系列带有突破性的大问题。

突破观念束缚，让正定找到一条发展新路。正定是传统农业县，改革开放让正定有了从单一农业向农、工、多（多种经营）的调整，但调整后的效益局限还是让正定跳不出“农”和“穷”的圈子。从对穷村和富村的调研中发现，富村无一例外的都是破了“单农”，脱了“固穷”，冲出县域以多种渠道和城市需求挂上了钩。于是，以典型引路为突破，近平同志因时就势明确提出了“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在实践中，摸索出以城市为依托，“搞配套、补缺口、钻空档、抓冷门”的经验，总结了“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的二十字方针。虽然还只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总算开始自觉关注对岸所在的方向了。

当年，正定突破旧的生产关系，较早实行了“大包干”。在河北省和石家庄地区尚未部署的情况下，正定担着“枪打出头

正定县委大院1985年的面貌。

鸟”的风险。这种风险，在县委、县政府领导脑子里也有反映，常委班子意见也不尽一致。但从对党的政策的深入理解中，从对正定农业发展的分析中，从群众意愿的反映中，近平同志和县委、县政府还是认定“大包干”是解放生产力的方向所在。因此就放手在全省全地区率先推出里双店公社试点，一年下来，农业产值和人均生活水平都翻了一番。里双店试点的成功不但带动了全县，而且外县外省参观取经的人也络绎不绝。

“大包干”普遍推开，还连带唤醒了几十年休眠的河滩地。正定北部有三大沙荒河滩地14万多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27%。在抓点的基础上，全县推开改造工程。统一规划，50亩为一方，每方打机井一眼，四围种植防护林带。然后下放给农户承包，种植自主权、继承权30年不变。经过农户舍得工夫和投入的改造，沙滩地也像好地一样种植花生、红薯、小杂粮，变成了农户的“小粮仓”。

突破政策框框，减少了不合理的高征购指标。正定是高产县，由于历史原因粮食征购指标十几年居高不下，交了征购县里就所剩无几了，而粮食种植本身也效益有限，这就成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正定高产而贫穷的症结。县委、县政府议定，要实事求是地向上级部门反映这个问题。近平同志和吕玉兰副书记亲自跑地区、跑省里、跑北京，多次反映这一问题。在国务院派人实地调查之后，终于获得解决。征购指标一下子减掉2800万斤，减幅36.8%，这一下子让正定从高征购重压下解放出来，老百姓终于可以喘口气了。群众说，县里为民请命，真是为咱老百姓办了一

件大好事。

在大的问题上是这样，在其他事情上也是这样，凡是有益于群众的事情无不在近平同志和县委、县政府议事日程之内。诸如开通正定至石家庄的201路公共汽车，让滹沱河不再是“楚河汉界”的天堑；诸如常山公园的修建，让县里人也可以享受一番大城市一样的园林风景；诸如留村体校的搬迁进城，后来成为世界冠军摇篮的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诸如荣国府的谋划建设，让群众有了直面红楼梦的形象解读，让正定有了最早起步的影视拍摄基地……这些大事小事，实事好事，让广大群众感受到了惠民政策像春天的和煦阳光，给大家带来了温暖和福祉。

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3年多，从思想修养到行为遵循，从工作作风到群众关系，他都不折不扣地履行了作为领导干部的职责，做到做人唯正、做官唯民、做事唯实、思想观念唯新。“四唯”成为他交出为人民服务满意答卷的思想准则和工作准则。

做人唯正，是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的道德基石。近平同志严于律己，勤政廉洁，并和县委一班人首先从自己做起，认真落实关于思想作风建设的“县委六条”，守正于道德规范，守正于党性原则，守正于理论指导，守正于方针政策，谋正道、干正事、树正风、扬正气，为干部队伍立起了标杆。领导班子自身做好了，其身正，不令而行，就自然地释放出正能量，机关内外、全县上下也就自然形成正风正气，成为主导和推动全县工作的正能量。

做官唯民，是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的根本宗旨。3年多时间里，近平同志和县委班子关心群众冷暖，做好百姓呼声最高、企

盼最切、休戚相关的急事，而不是旁骛于不干痛痒之事。注重于长远发展，抓准牵动国计民生全局的大事，举纲张目，而不是旁骛于无补群众根本利益的杂事冗务。倾心倾力一心为民，始终注意群众意愿、舆论褒贬，对工作适时进行调整或修正，而不是习惯于个人拍脑袋，失于主观片面。这期间，经济建设、文化发展所成就的几件大事，都是这一宗旨原则的产物。这样的实践说明，唯民不是口号、空话，而是实事、实干。

做事唯实，是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的实践检验。近平同志和正定县委一班人，在思想、作风、工作上都紧扣一个“实”字。思想上求实，不唯本本，只唯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上接“天气”，下接“地气”，融“两气”于一体。作风上求实，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亲笔书信四机关领导，要大家每年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下基层、跑乡村，寻求“源头活水”。工作上求实，强调结果之实，不摆花架子，不练虚功夫，不唱过场戏，一切工作务见实效。正是唯实当头，从正定毗邻省会的实际出发而有了“半城郊型”经济发展的路子，而有了短短3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的快速发展，而有了老百姓的肚子饱了、腰包鼓了、日子好过了。

思想观念唯新，是领导工作与时俱进的可靠保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中华文化的优秀思想，是中华文明五千年长盛不衰的推进器。不保守，观念新，体现在县委、县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如果说变革种植模式、经济结构、探索“半城郊型”发展之路，释放出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那么念“人才

经”、请顾问团和学习取经，则获得了借石攻玉的外源助力。如果说农、工、商发展解读了经济概念的传统含义，那么旅游兴城则谱出了与时俱进的崭新音符。如果说经济发展、旅游带动只是物质文明的解读，那么正定古城、文化遗存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则是文明全息的深邃解读。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正定超常速度的发展正是这样闯出来的，一开新面的“人才经”正是这样念出来的，人文旅游的“正定模式”正是这样创出来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刚到正定时，还是一位不满29岁的年轻人，而当时正定的县委班子主要成员几乎都比他年纪大很多。据你们所知，他是如何与大家处理好关系、共同团结奋斗的？

朱博华：“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灵魂。“礼之用，和为贵”，这在近平同志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作为领导班子的班长，他做到了“和以带班”。他知道，每一位县委常委都是县委领导班子的一员，都是在县委领导下工作。如果说自己和班子领导成员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自己要做得更好。合力才能出智慧、有力量。作为年轻干部，他从内心里尊敬老同志。对县领导班子的老领导，他用心地向他们学传统、学作风、学经验。作为班子“一把手”，他一言一行严格要求自己，要求大家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而且要做得最好。以其身正带动一班人不令而行。他和一班人在一起，一门心思都在想工作、为工作，凡事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当然，领导班子也难免出现矛盾，甚至争执不下，但有一

条，就是不搞小动作。谁和谁有了点意见隔阂或工作分歧，一个实事求是，一个求同存异，一次谈心交流的生活会就化解了。在这样一个和谐氛围里工作，大家都是一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感觉。有的同志说，还真有点儿像革命年代。

作为正定全县45万人民的带头人，近平同志做到了“和以率众”。县委领导群众干什么？就是团结带领群众一起建设正定，为民致富、为民造福。为此，就要围绕群众脱贫致富做文章，使之成为经济大合唱的主旋律和最强音。针对群众中普遍存在的怕冒尖不敢富、没技术不会富、没家底不能富几个问题，县里采取发展专业村、扶持专业户、培树万元户等措施，让广大群众少了顾虑、多了底气、有了门路。村看村，户看户，全县看干部。有了县委、县政府一马当先，不用强制，不用命令，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群众的万马奔腾。

作为正定县的当家人和代表，近平同志做到了“和以结缘”。改革开放初期，正定亟待冲破传统农业发展路子。如果说破旧是内在观念的突破，那立新则离不开倚重环境和借助外力了。借助当时尚无隶属关系的石家庄市的外力，是近水楼台。1984年，通过多方工作，石家庄市向正定提供了94个协作项目，在新上项目中安排农村劳力2000多人。在河北省第一个县级“技术信息交流交易大会”7天会期中，正定获得外地提供的专利项目和科技成果1500多项。正定顾问团的建立，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热线联系，与石家庄市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乃至于北上霸州、南下江南先进地区的考察、取经及友好往来，都为

正定实现大发展添加了新动力。

采访组：正定有悠久的历史，习近平同志在正定的文化和文物保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王志敏：正定是一座古城，历史是这座城市的脊梁，文化是这座城市的魂魄。近平同志到这座古城工作，让他的文化情怀和这座城市包容厚重的文化底蕴产生了交集。

来正定之前他就从各方面对正定有所了解。真的来了，正定历史的厚重、文化的灿烂、遗存的辉煌乃至风俗的淳朴，让他感触更强烈，让他从心里对这座城市、这块土地、这里的人民产生一种亲切的感情。正是有了这样一种情感，在对这座古城文物的保护上，他投入很大心血和精力。县里部署对全县文物进行了大普查，让古建、遗址家底有了一册明细账，并且立起了统一标志、区划出保护范围、纳入城市规划。保护古树，让古槐、古松、古柏都登记造册，享受了围栏以护的待遇。编写出版和传播《正定古今》，让正定古城更好走出去、传开来。任命能文能政的著名作家贾大山担任文化局长，让文化系统有了一个叫得响的领军人物，文化事业得以更上一层楼。总之，凡有涉古城、有涉文化的事情，都无一遗落地列入正定发展的工作日程。其实何止于此，遇有繁难问题，他还要亲赴亲为。为解决天王殿、弥陀殿、戒坛文物修缮的资金短缺问题，他不知往省委、省政府跑了多少趟！

对于历史文化，若说他是根植于心，对于革命传统则可说他

隆兴寺今貌。

是脉衍于情了。革命成功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在正定，这不易之情化作了传统教育的载体与课堂。在他提议下，第一个党组织诞生地、岸下惨案发生地、赵生明烈士牺牲地等革命遗址，都以县委、县政府名义立了碑碣、置了匾额，以培树不忘国耻、弘扬传统的正气，激励同仇敌忾、强我中华的精神。

1982年春，近平同志刚到正定，看到县委大院的两棵苍郁古槐，感慨由生，专门嘱托办公室同志核实树龄，护以围栏，树以标牌，述以文字，因而有了古槐春秋之文字，立于两槐之址。通过这件事，他的文化情怀、文物情结，可得一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正定的牵挂一直延续到今天。请你们谈一谈，他赴福建工作后直到现在，与正定还有什么联系？

王志敏：1985年5月，近平同志离开工作3年多时间的正定，赴任厦门。正定，是他离开中直机关下基层工作的第一站，在他一路走来的记录里，正定成为他真正从政的始发地、真正当领导干部的起点。其实，他的正定情怀绝非只是因为始发地和起点，更是因为这块土地和这里的父老乡亲，因为他以心以血辛劳耕耘的那份感情，为正定的一草一木打上了相知相亲的乡情印记。

2013年7月11日，近平同志在河北视察工作期间重回正定。在看望30多年前县委班子一起工作的老同事时，他饱含深情地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在正定工作3年，离开正定28年，这个过程就成了我人生永久的一种联系，实际上我离开正定以后，跟正定一时一刻都没有脱离联系。这就回到一个宗旨上。我们干的是

党和国家的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宗旨是什么？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以人民为中心，这种联系就是天经地义的、顺其自然的……所以，跟你们在一起，我感到很亲切，很自如，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是连在一起的。”

这就是乡情，息息相通的乡情。离开正定后，他6次回到这里，为他第二故乡的浓郁乡情作了解读。息息相通的乡情，岂止是一地一域之情。在他来正定之前插队的梁家河，在他离开正定之后的工作地福建、浙江、上海，在他足迹所至、牵挂于怀的九域之地，他对哪里不是怀有息息相通之情呢？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一切感情都升华为大爱无疆的报国之情、爱民之情。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回正定那次，我和朱主任特别有感触，当时即兴作诗《念奴娇·乡情》以记之。

京都来客，正定地，巷尾街头热议。

三载躬耕洒汗雨，人去政声心宇。

寝则板床，行则单骑，肺腑唯民意。

情深鱼水，田头宅院留忆。

折柳十里长亭，滹沱解语，春水咏别绪。

北海南溟千万里，怎忘月明古邑。

故土几回，脉接地气，合力生同济。

征程路远，声声珍重遥寄。

『习书记既抓大事，又重细节』

习书记干工作，大事要抓，细节也要抓，宏观上有大的谋略，微观上也很注意细节。有一次，习书记和我一起散步，发现了一块石碑，外面有个栅栏拦着，但是因为栅栏缝隙比较大，小孩都能钻过去玩。习书记仔细看了这块石碑，发现这是唐代遗留下来的文物。他立即指示办公室，把这块石碑保护起来。

采访对象： 刘成君，1950 年生。1984 年到正定县委办公室工作。2010 年从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岗位上退休。

采 访 组：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 2017 年 4 月 17 日

采访地点： 正定县刘成君家中

采访组：刘成君同志，您好！您1984年调到正定县委办公室工作，请您讲讲当时主要的工作内容。

刘成君：1984年，我调到县委办公室资料组当干事、资料员。起草文件、写讲话稿是我们工作的一项内容，还有就是写给地委的简报、信息等。习书记经常给我们资料组的人员讲材料。

我们工作的方式是这样的。如果起草一个习书记在干部会上的讲话，习书记就跟我们一起聊，把他的思想、思路谈一谈，几个要点都谈得清清楚楚，我们用笔记本记录下来，这叫“讲材料”。接下来，我们“趁热”就把领导谈的内容进行消化，第一时间写出稿子来，这叫“写材料”。之后再由资料组组长和办公室主任，同习书记在一块梳理和研究稿子的内容，进行增删和修改，这叫“改材料”。经过这三个阶段，一份讲话才算是完成。习书记在开干部会的时候，就以这个稿子为基础来讲话。当然，实际讲话的时候，习书记几乎都要随时脱稿，进行很多补充和发挥。

采访组：大家都说习近平同志是个亲切、平易近人的领导干部。您的体会是怎样的？

刘成君：习书记确实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好干部。那个时候人手不够，资料任务多，工作很忙，所以我们工作人员当时都在机关住，白天一堆日常事务，全靠晚上加班写材料。我和张银耀一个办公室，就在习书记隔壁。习书记和大家一样也是每天晚上加

班到很晚。

每天，习书记都在食堂和大伙一样排队吃饭。吃完晚饭，习书记就到办公室去看看电视新闻。看完新闻，他有时候就直接回办公室加班了，有时候也会叫我们一起去散散步。

我们只是一般工作人员，习书记对待我们像兄弟、朋友一样。早上我们谁起得早，谁就叫其他人起来，有时候我起得早，就把隔壁门一敲：“习书记，走！咱们锻炼去！”有时候他起得早，就来敲我的门：“成君，咱们散步去！”我们散步之后，一起回来吃饭、上班。

习书记这个人很平易近人。我刚到县委办公室工作的时候，我爱人去县委找我，她在楼道里碰见习书记，她当时不认识他，就向他打听我在哪个办公室。习书记说了我在哪间屋，看我爱人还有点含含糊糊，干脆就一直带着她到我办公室来了。

习书记走了之后，我跟我爱人说：“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咱们的县委书记。”

我爱人大吃一惊，她说：“哎呀嗬！真不知道，他还亲自带我过来。”

采访组：据您的了解，习近平同志当时工作中都有哪些特点？

刘成君：习书记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他经常骑自行车下乡，随时发现问题。习书记经常带着资料室主任王志敏和其他一些同志下去调研，我也跟他去调研

过。有一次，我陪他去西南街，他和基层干部开座谈会，座谈如何让老百姓致富、如何发展、如何改变面貌，我就跟着他记录一些情况。

下面的干部都喜欢听习书记讲话。他讲话干脆利落，要讲的内容特别明确，而且讲得很实，让人听着不枯燥。他的讲话，能够给人们一些启示，让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坦率地说，长期以来，正定的思想观念比较落后。习书记是从中央来的，他站得高，看得远，知道的东西多，眼界宽，见识广。他开启了正定解放思想的大门，促进了正定干部的思想转变，由此推动了正定的发展。回过头来看，他在正定3年多时间，对正定的改变和提升是很显著的。

那时候，县委有个《正定快报》，就是他提议办的。刊物不定期，有了内容就发，有时候一天发一期，有时候几天发一期。报纸主要刊登全县的大事、领导活动、新的动态等，让全县人民能随时了解正定的情况。县委、人大、政府、政协都有这个报纸，每个领导也都有一份。

报纸这种媒体，后来承载了很多娱乐的功能，但在过去，它更多的是一种学习工具，而且是与时事、要闻、最新政策连接最紧密的一种学习工具。

有一次，习书记正在屋里看报纸，有位普通工作人员从他门口过，跟他打个招呼，说：“习书记，你没事了？”习书记笑笑说：“我学习呢，这是很重要的事呀！”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推动修缮大佛寺、兴建荣国府等工作，请问您是否还了解他当年在正定为保护文物古迹和振兴文化事业所做的其他一些工作？

刘成君：有的。在习书记倡导下，我们兴建了常山影剧院。正定县原来只有电影院，没有影剧院，常山影剧院是我们第一个县级影剧院。剧院的名字还是习书记找中国文联原党组书记林默涵给题的字。影剧院的设施很好，功能很齐全，可以看电影，也可以唱戏，还可以开大会。有了常山影剧院之后，我们经常请外地的剧团来唱戏，丰富正定人民的文化生活，也为传播传统艺术尽一点力。

习书记干工作，大事要抓，细节也要抓，宏观上有大的谋略，微观上也很注意细节。有一次，习书记和我一起散步，发现了一块石碑，外面有个栅栏拦着，但是因为栅栏缝隙比较大，小孩都能钻过去玩。习书记仔细看了这块石碑，发现这是唐代遗留下来的文物。他立即指示办公室，把这块石碑保护起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1985年离开正定后，您与他还有联系吗？

刘成君：习书记离开正定以后，过年还给我们办公室的人寄挂历。那时候时兴挂历，习书记过年的时候给王志敏寄来一大包，由他来给每个人分一本。最后由王志敏统一回复，向习书记表达感谢。习书记走到那么高的位置，多少年一直都没有忘记我们这些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普通工作人员，这真让我们感动，

唐朝石碑。

因为做到这样真不容易。

1993年，习书记回正定来看望了大家。王志敏通知了我，我就去见他了，还和很多同志陪他在大佛寺转了转。那天，习书记穿着一件皮夹克，还是那么亲切，那么平易近人。那次，我和习书记还一起合了影。

1995年，我在县委办公室当副主任，到福州去考察。到的那天晚上，我给习书记写了封信：“习书记，我知道您很忙，如果有时间，我们几位同志想和您见一面。”很快，习书记就和我们4个人见面了，见面很亲切，谈得很好。他对我说，他很想念正定人民，也让我回去给同志们带好。他还与我们4个人合了影。

我一生当中，遇到的领导很多，习书记在我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最深。他从中央国家机关下来，从首都北京下来，来到我们小县城，来到最接地气、最贴近群众的地方，也是来到最能够和中国的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的地方，这是需要勇气的，需要意志的。

后来，我也了解到他作为知青下乡的一些经历。正是这些和老百姓在一起同甘共苦的日子，奠定了他心中为民、亲民、爱民的情怀，奠定了他治国理政的根基。

『习书记那几年县委班子空前团结』

以习书记为代表的几位县委班子『干将』，都非常利落，非常果断。他们几个人头脑敏锐，做事踏实，同时他们也很『单纯』，脑子里想的就是工作。可以说，习书记他们那个时候的县委班子，是空前的团结，凝聚力很强，战斗力很强。他们没有别的想法，就是一门心思干劲十足地抓工作、上经济，为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采访对象：贾俊华，1949 年 12 月生。1981 年到正定县委办公室资料组工作，后任正定县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2004 年退休。

采 访 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 年 4 月 17 日

采访地点：正定县贾俊华家中

采访组：贾俊华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那段时间，您在正定县委办公室工作。请问习近平同志当年给您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

贾俊华：习书记是1982年初春到正定来的，我那时候想：北京下来的干部，应该穿得很气派，官架子不小，派头十足吧。但是我见到习书记，发现自己猜错了。他穿着一身半旧的绿军装，脚上穿一双黑布鞋，很朴素，面相很憨厚，跟人说话很亲切，跟咱们一般老百姓没多大区别。这就是习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刚到正定时，各方面情况都不很了解，而且和县委班子成员也有一个从不熟悉到熟悉的过程。请根据您了解的情况讲讲当时县委领导班子是如何搞好团结的。

贾俊华：习书记来正定，一开始是担任县委副书记。他很尊重老书记冯国强同志，与县委班子成员非常团结，在工作上配合得非常好，冯书记对习书记也很爱护。

当时的县长程宝怀同志，思想比较解放。县委副书记吕玉兰同志原来是河北省委书记（当时省委设有第一书记），曾任中共中央委员，视野开阔，站得高、看得远。所以，程县长、玉兰书记他们两个和习书记，在改革开放方面思路都很清晰，也都很有冲劲，很多时候他们三个人在工作上是一拍即合。

上世纪80年代初，从全国来说，不光是经济上百废待兴，“十年浩劫”也把人民的思想禁锢住了。那时，家里养几只鸡、

1985 年，正定县城鸟瞰图。

养头猪、养几只鸭子，都不允许，都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策逐步放开了，人们胆子还是小一些，不敢搞规模家庭养殖。习书记为了鼓励农民发展养殖、多种经营，到村里培养专业户，并定向扶持。玉兰书记也亲自到村里去宣传政策。

我也曾经跟习书记调查过乡镇企业。南牛乡树路村有一个花盆制造厂，我们到那里搞调研，看他们的生产过程，就是用机器把泥胎加工成各种形状，然后放在炉子里烧。习书记对工艺流程问得很仔细。我们走的时候，厂领导要送给习书记花盆，习书记谢绝了。

以习书记为代表的几位县委班子“干将”，都非常利落，非常果断。他们几个人头脑敏锐，做事踏实，同时他们也很“单纯”，脑子里想的就是工作。可以说，习书记他们那个时候的县委班子，是空前的团结，凝聚力很强，战斗力很强。他们没有别的想法，就是一门心思干劲十足地抓工作、上经济，为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当年和正定县委班子是怎样“抓工作、上经济”的。当时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如何？

贾俊华：我们正定著名的作家贾大山，和习书记交往比较深。贾大山对习书记的评价是“不穿西装的改革家”。

习书记担任正定县委副书记的时候，下大力气调查研究，筹划和推进了很多事情，比如农业实行“大包干”，当时正定县在

整个石家庄地区都是领先的。他当县委书记以后，领着县委班子全面推进各项工作，短短两三年时间就为正定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当时习书记为了发展旅游业，要兴建荣国府，县里钱不够，好多人在观望，存有畏难情绪。这事到底行不行？荣国府投资需要300多万，建好以后能收回投资吗？当时，大佛寺的门票是5分钱，荣国府的门票价格能定到多高？定低了，猴年马月才能收回投资？定高了，会有游客愿意来吗？正当县委班子难以决策的时候，玉兰书记回来了，给了习书记很大支持。

玉兰书记说：“习书记带领咱们正定县发展旅游业，这是一条新路，也是一条正道。咱们县本身就是农业高产县，但是农业有它的客观规律，高产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再往后，增产的幅度肯定是越来越小，农业上我们只靠种粮食，不能再突破多少了。我们只有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旅游业才行。现在有了兴建荣国府这个机会，习书记给咱们抓住了，咱们一定要支持。咱们有四塔，还有大佛寺等文物古迹，和荣国府搭配起来，景点多了，可以搞一日游、二日游，留住游客，让他们游在正定，吃在正定，住在正定，给正定增加经济效益，效果一定很好。我本人全力支持习书记，这事保险错不了！”

习书记制定的“人才九条”，是为了把外头的“大树”搬到咱正定来，好让当地的“小树”在绿荫下茁壮成长。“人才九条”的制定，玉兰书记在班子里也是和习书记一拍即合。后来，这些专家、顾问和人才确实为正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县里安排我联络潘承孝等几位专家，也曾给他们写信汇报正定的工

作，并征求他们对正定发展的意见，他们确实很真诚地给我们出主意、想办法。

在习书记领导下，正定各方面的事业都得到振兴。农业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只要老百姓能挣到钱，就因地制宜地发展，不搞“一刀切”，更不搞形式主义。比如农民可以种“春棒子”，将嫩棒子掰下来拉到城里去卖，香嫩可口，很受欢迎，收益比成熟后干玉米粒还要高。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吕玉兰同志当时除了工作上和习近平同志大力配合，也在生活上对他多有关照。请您讲讲这方面情况。

贾俊华：习书记那个时候不怎么回家，一心一意就是想着把正定的各项工作搞好。他经常下乡，回来赶不上食堂吃饭。晚上批改文件，熬夜加班，睡也睡不好，吃了很多苦。玉兰书记比习书记大十几岁，对他比较关心，就像姐姐一样，给他拎点水果、点心，有时候从家里给他拿点鸡蛋、挂面，让他深夜饿了点补点补，还嘱咐他注意饮食和休息规律，经常锻炼身体。以上事情有的是我听玉兰书记讲过，有的是玉兰书记去世后习书记回忆文章中谈到的。

有一次，玉兰书记对习书记说：“近平，你这个被子和褥子，是不是该拆拆洗洗了？”不等习书记回答，玉兰书记就让人把他的被褥拆洗了，又重新做好了。习书记铺的褥子有很多年头了，那是他在梁家河插队时用的褥子。他把这褥子从陕北带到北京，又带到河北正定，一直用了10多年，还舍不得扔。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当年在火车上救助过两个“落难”小女孩。这件事情，您清楚吗？

贾俊华：是的，我见证了这件事。

习书记到正定来的第二年，也就是1983年的秋天，有一次，在从石家庄到北京的火车上，他看到两个十六七岁的小妮儿，坐在车上哭。他就问她们：“你们为啥哭？”

原来，这两个小妮儿是湖北人，她们到唐山去投亲戚，找工作，却扑了个空。人没有找到，身上带的钱也花光了。习书记当时就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给了她们。两个小妮儿很感动，再三追问这位好心人的姓名和工作单位，表示以后要报答。习书记推托不过，只好告诉她们：“我姓习，在正定县委办公室工作。”

回到正定以后，习书记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没想到，过了不长时间，这两个小妮儿从湖北到正定来找他了。她们先是到了县委办公室，说要找“大乖”，管接待的行政组长王新友同志问她们：“你们有嘛事儿？”两个小妮儿就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表示要面见这位“大乖”并表示感谢。

王新友同志说：“县委里姓习的，没有别人啊，就是我们县委书记习近平。”于是，带着这两个小妮儿去见习书记，他们又见面了。两个小妮儿一方面是对习书记表示感谢，谢谢他在紧要关头帮助了她们，要把钱还给习书记；另一方面，这两个小妮儿也很聪明，她们一看习书记是县委书记，果然是个“大乖”，表示愿意来正定工作，希望习书记能给安排。

习书记没有要她们还钱，对她们求职的事也好言解释。他说：“我也是刚来正定，对这里的情况不是特别熟悉。而且，正定本地还有好多待业青年，你们还是依靠当地政府解决工作问题吧。”随后将她们安排到县招待所食宿。次日派我送她们到石家庄坐火车返乡。我带着她们在地摊上吃了馄饨、烧饼，还给了她们几块零花钱，将她们送上了火车。

习书记1985年到厦门工作，1988年我就到县人大工作了。习书记给我来了一封信，还提到这两个小妮儿的事情。信上说：“那个时候，是你经手办的这件事，我还关注着这件事的发展情况。她们现在怎么样了？如果你有消息，请回信告诉我一下。”

我随即翻找笔记本，那上面记着两个小妮儿的地址和姓名，但因多次搬家，我个人也不经心，笔记本丢失了。我对地址印象较深，是湖北省黄石市某个村，姓名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我问当时管接待的行政组长王新友同志，他也记不得了。这俩小妮儿后来也没和我们县里联系。我向湖北省黄石市有关单位去信，还求助过新闻媒体，但是都没有回音，我猜想，是因为没有具体姓名，查找难度大的缘故吧。后来，我给习书记回了一封信，说道：“习书记，我正在想办法打听，待我打听好了再给你回信。”此后，事情一直没有进展，我也就没能给习书记汇报这件事情。虽然习书记从来没有责备过我，但从1988年到现在，这个事始终让我觉得挺愧疚。是我工作粗心、工作不到位，习书记交给我的任务没完成，但我至今仍在努力，不放弃。

习书记于2013年夏来正定，接见了原县级部分老领导及一起

工作过的人员。那晚中央电视台播放相关新闻，我看了两遍，心情很激动。之后见到了被接见的原县委办副主任王志敏同志，我说：“真羡慕你们！”王主任说：“习书记问你来着，说怎么看不见小贾呢？”我羞愧地说：“习书记那么忙，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全见到我们，即使要见我们，我也不敢见他，因为我还欠他的账。”

采访组：您觉得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3年多时间，对地方发展起到了哪些作用？他离开正定以后，你们还有哪些联系？

贾俊华：习书记离开正定是1985年6月，他在正定待了3年多。这3年多，也是我们正定县发展的黄金时期。他是从北京来的干部，更了解党中央的精神，更了解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趋势，他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带到正定，把改革的春风吹到正定，给正定的老百姓造了福。我很庆幸，曾与习书记一起工作过。

习书记这个人很重感情，他离开正定以后还经常给我们写信。每逢年节，还经常给我们寄挂历和贺年卡，统一寄给我们县委办副主任王志敏同志，然后再分别发给我们。

习书记一直对老干部特别好。他主政期间，正定的老干部工作可以说在全国都是先进典型。习书记给老干部解决个人住房问题，给老干部局配了会议室、活动室，配了专车，还开设了老干部门诊。更重要的是，习书记与他们情感上有着充分交流，坚持家访，促膝谈心，他从内心深处对他们尊重和关爱，让这些老干部非常感动。得知习书记要离开正定，有的老干部都流泪了。他们对习书记感情很深，真是舍不得他走啊。

『习书记在生活上跟基层干部没啥区别』

有一年，县委和县政府联合搞了一个『小灶』，其实就是腾出一间空房，摆上桌子椅子，让领导们在屋里吃饭，让服务员把饭菜给他们端过来。习书记去了一次，吃了一顿，后来就再也没去，以后还都在食堂吃，拿饭票和大家一起排队。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小灶』吃了，他也没说啥『不搞特殊化』之类的道理，只是淡淡地说：『咱们都是一起工作的同志，我为什么非要到那儿去吃。』

采访对象：崔时欣，1943 年生。1974 年到正定县委办公室资料组工作。1996 年提前退休。

采 访 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 年 4 月 17 日

采访地点：正定县崔时欣家中

采访组：崔时欣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1982年刚来正定县的时候，您是最早见到他的工作人员之一，请您讲一讲当时的情景。

崔时欣：习书记是1982年春天到的正定县。当时，我们新建的县委办公楼正在施工，还没盖好，县委还在一排老旧的平房办公。那排平房一共7间，第一间是值班室，后面6间是办公室，供县领导办公用。

那天，我正好在县委办公室值班，习书记坐的车开进院里来，我是第一个见到他的。车一停，一位省委办公厅的同志和习书记就下车了。我一看，习书记穿着挺旧的一件衣服，但人很年轻，很精神。

省委的同志问我："书记在吗？"

我说："在呢，你们先进屋坐一会儿，我去叫冯书记。"

冯国强书记在那排平房的最西头办公，我就把他叫出来了。

冯书记跟他们见了面，谈了一会儿话，随后就找到我，跟我安排说："习近平同志到咱们县来当县委副书记，你给腾出一间房子来让他办公吧！"

我就在那一排平房当中找了一间闲置的屋子，帮他收拾。那个房间里有一张两条板凳搭成的床，两个黄色的木质办公桌。因为这间办公室长期没人用，里边都是尘土。我把习书记的行李从车上搬下来，屋里收拾干净，东西都放好。这个过程中，习书记也一直没闲着，和我们一起干。收拾好了，屋里利落多了：一张

床，一个桌子，一个书橱，还有脸盆、暖壶啥的。随后，我又给他找来两把椅子。这样，如果办公的时候有人来访，三两个人也能坐得下了。

采访组：您和县委的同志当时知道他父亲是习仲勋同志吗？

崔时欣：一开始并不知道。后来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县委的同志有了一些传言，说习书记是高干子弟，来正定之前是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

时间长了，跟习书记熟了，我上看下看左看右看，怎么看他都不像个高干子弟。他跟我们普通工作人员关系都特别融洽，我们大多都抽烟，他抽烟不多，但平时看文件或者谈事情的时候也抽。有的时候，一起开会或者谈事情，他拿出烟来，经常分给大家抽。有时候他自己没烟了，也管我们要：“老崔，来根烟！”

我们那时候都抽特别便宜的烟，一开始还不好意思给他。我说：“我这烟不强，你抽得惯吗？”习书记从来不挑，他说：“我平时也是抽这个，不强我也抽。”

我就想，高干子弟能抽这烟吗？他们怎么也得抽“中华”吧？习书记跟我们抽这种几分钱一包的烟，他能是高干子弟吗？我慢慢觉得，他应该不是什么大官的儿子，在生活上跟我们老百姓，跟我们基层干部，没啥区别。

我们县委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有一次，我们工作之余在办公室看电视，正好新闻上有中央一个会议的报道，习仲勋同志出现在画面上了。

这时，有个人就问习书记：“老爷子身体怎么样？”

习书记笑而不答。

旁边的赵建军同志直接问：“习书记，人们都说你是习老的儿子，你到底是不是？”

习书记笑笑说：“这个事，我不否认。”

这一下，大家就都知道了，原来习书记就是习仲勋同志的儿子。但从那以后，我们县委的普通工作人员非但没有因此和他疏远，反而关系更亲近了，而且亲近当中还更佩服他了：你看，人家一个副国级领导人的孩子，从中央国家机关下到我们小县城，工作那么兢兢业业，和我们普通人的关系这么好，生活这么简朴，真不愧是老革命的后代。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艰苦朴素的作风当年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请您从衣、食、住、行几个方面谈一谈。

崔时欣：先说说他穿的衣服吧。习书记在正定期间，平时穿的最多的就是一件绿色的旧军装。他稍微“像样”一点的衣服，就是一件灰色的西装，也挺旧了，平时很少穿。有时候他回北京探亲，也会换件衣服。他平时很少戴帽子，冬天冷或春秋刮大风的时候，戴一顶很平常的军便帽。至于裤子和鞋，也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可以说，习书记穿的戴的，没有一件是“高级货”，他什么时候都是和我们老百姓一样的穿着打扮。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平时吃饭都吃些什么？都在县委食堂吃

吗？食堂的伙食怎么样？

崔时欣：我们县委和政府分开办公以后，食堂也分成了两个，但相距不过100米，不仅浪费地方，人工、燃料、食材都造成不小的浪费。所以没过多长时间，县委和县政府协商了一下，还是把食堂合并在一起了。

习书记基本上一日三餐都靠这个食堂来解决，所以他每顿饭必须要在食堂开伙的时候来吃，否则就只能饿肚子了。他刚来的时候，为了熟悉情况，每天骑自行车奔波于各个乡镇，有时候下乡回来晚了，到食堂去，赶上饭点了，就能吃口热乎饭，错过饭点了，饿肚子也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我正好也有些事拖住了，来食堂也比较晚，所幸还有温乎的馒头和菜。等我快吃完的时候，习书记才刚从乡下赶回来，那个时候，食堂还剩一点菜，馒头也彻底凉了，也没有汤了。

我说：“习书记，你咋才回来？都没啥吃的了。”

他说：“是啊，回来晚了。”

习书记打了一个菜和两个馒头，都是凉的，就坐在那儿吃了起来。

我说：“习书记，我给你弄点热乎汤吧。”

结果我一看，汤也没有了。习书记说：“没事，这有热水，我自己做个汤。”然后，他倒了一大碗热水，往里面放了一点点酱油，就做成了一碗“汤”。

我说：“习书记，你可真能将就！”

习书记经常下乡，所以他总是吃不上热乎饭，有时候还要饿

肚子。一次两次的还没啥，时间长了他就得了胃病，还住了院。后来县委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给他弄了个煤油炉，还有一口小锅，吃不上饭的时候，张银耀就可以给他煮个挂面，卧个鸡蛋，有时候他自己也煮挂面。

有一次，我跟他闲聊说："习书记，你怎么成天光吃挂面呀？你也弄点别的吃嘛！"

他毫不在意地说："咳，没事儿！随便吃点儿，不饿就得了。"他这话带着浓重的北京口音，我听着觉得特别好玩，印象很深，至今好像还在耳边。

有一年，县委和县政府联合搞了一个"小灶"，其实就是腾出一间空房，摆上桌子椅子，让领导们在屋里吃饭，让服务员把饭菜给他们端过来。习书记去了一次，吃了一顿，后来就再也没去，以后还都在食堂吃，拿饭票和大家一起排队。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小灶"吃了，他也没说啥"不搞特殊化"之类的道理，只是淡淡地说："咱们都是一起工作的同志，我为什么非要到那儿去吃。"

有时候他下乡调研，中午赶不回来，就在乡镇吃饭，去近的乡镇都是骑自行车，去比较远的会坐县里的吉普车。有一次，司机跟我说了这样一件事。

他开车拉着习书记去一个比较远的乡镇调研，中午在那里吃饭，桌子摆好以后，乡领导给上了好几个"硬菜"，很丰盛地摆了一桌子。习书记就说："怎么搞这个？不要搞这个，我吃顿便饭就行了。"乡干部说："习书记，给你都准备好了，你就吃吧。"

习书记说：“不行，不能搞这个，我就吃家常便饭。”

有了习书记的以身作则，“下乡吃饭要节俭”，在正定县领导班子里慢慢就形成了共识和习惯。以后县领导到乡镇视察、调研，都和习书记一样，在乡镇食堂吃便饭，或者到老百姓家里吃派饭，一律交钱、交粮票。和群众吃一样的饭，不搞特殊化，该给钱就给钱。

习书记来正定工作后，他北京的朋友经常过来看他。他们来了，习书记很少到招待所请他们吃饭，即使有也都是自己掏钱。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买几个罐头和菜在他办公室招待这些朋友。如果赶上周末，还会和朋友喝两杯酒。那时候的菜也便宜，十来块钱能买四五个菜，虽然没有多高级，但也挺可口，还挺不错。也有的时候，他朋友来了，他就上食堂打两个菜，都是自掏腰包。

有一次，习书记北京的朋友来看他，他就让服务员去一家回民饭店买牛蹄筋。过了一会儿，服务员买回来了牛蹄筋，是切的大块，用纸包的。习书记跟服务员说：“你下次再去这家饭店，给他们提点儿建议，这牛蹄筋吃着挺好，但是切成大块，顾客吃着不方便，要是切得薄一点，顾客吃着就会方便一些。还有，牛蹄筋可以炒，可以烩，做的花样多一点，价钱也能卖上去。”后来，这家回民饭店的牛蹄筋果然有了更多做法，现在还能吃到他们炒的和烩的牛蹄筋，味道很好。

习书记回北京探亲，带的东西通常有两样，一样是我们正定的缸炉烧饼，还有一样是卤鸡，他家里人都很爱吃，习老也夸赞说真好吃。习书记也给卖这两样东西的饭店提建议：“你们做得

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不去北京开店？”他们后来去没去，我不太清楚，但习书记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中总是这样，心里总是想着老百姓，想着让他们的生意做得更好，开拓更大的市场，挣更多的钱。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期间，是一直住在县委办公室里吗？

崔时欣：是的。习书记刚来正定的时候，就住在我们给他收拾出来的那间屋里，后来县委办公楼盖好了，他的家具几乎也没有什么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一个书橱变成两个书橱了。他屋里什么现代化的办公设备都没有，电话也没有。当时我们县委就各部门有一台摇把电话，县领导都没有独立电话。

习书记住的地方，也就是他办公的地方。服务员一天给他打一壶热水，但有的时候，我看习书记早上自己去水房打水。我就跟服务员说：“打水是你们的工作，哪能叫书记自己打水去？”服务员说：“有时候我们还没上班呢，书记就自己去打水了。”

还有一次，习书记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按照类别一叠一叠分开摆放好，准备分开处理。结果服务员进去给他收拾房间，把文件全都摞在一起，整整齐齐码起来。习书记回到办公室一看，沮丧地说：“得，我白忙活了。”服务员吃了一惊，说：“对不起啊，习书记。”习书记一点也没生气，对服务员和气地说：“没关系，你也不知道嘛。以后文件就不用收拾了，擦擦桌子就行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时经常下乡调研，请您谈谈他出行方面的情况。

崔时欣：习书记刚来时，我们县委就两辆吉普车。领导又多，这个上这儿，那个上那儿，车根本不够用，没办法就跟别的单位借车，但是各局办的车也少。习书记平时都是骑一辆挺旧的二八自行车下乡，除非去远的地方，他才会偶尔坐一下汽车。有一次，习书记坐车到一个比较远的乡镇调研，结果车坏在半道了。我跟习书记说：“咱再买一辆车吧，现在就一辆，不够大家用的。”习书记说：“不要太浪费，有一辆车，只要不耽误要紧事就行了，反正我大部分时间都骑自行车。”

后来，我们找了河北省政府的杨副秘书长，到北京买那种旧车，修好了，开回来一样用。习书记的意思是，不管老的还是新的，能跑、有车用就行了。我们派人去北京，找了两辆看着还不错的车，检查它有什么问题，再用其他车能用的零件给它换上，最后修好了，开了回来。

这两台车看着都快报废了，不能正常使用了，但到了我们手里，拾掇好了，又开了很多年，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习书记把这两辆车奖励给了下面发展好的两个乡镇。

采访组：衣、食、住、行都谈完了，请您再谈谈他平时的工作吧。我们听说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期间工作非常繁忙，经常熬夜，具体情况请您讲一讲。

崔时欣：在工作方面，习书记一向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对

别人则是尽量多加体谅。每天吃完晚饭，他就到我们办公室来看看电视，看完新闻，就回去批阅文件，他每天要批阅的文件特别多。上班时间弄不完，下班以后至少还要弄三四个小时，多的时候批到半夜也是经常的事。

习书记任县委书记后，要批的文件就更多了。大部分文件基本都会过我的手，所以我知道这个工作量有多大。我的工作内容是，先大致浏览内容，看是需要哪个部门去办的，就给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各发一份，比如涉及公安的，就有公安一份。光干这个活，我铆足了劲干，一天至少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完成，何况习书记还要一份一份仔细看，还要思考，考虑好了还要批意见。意见有的在文件上直接批，有的写的比较长，文件上写不下还要另附纸。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白天的时间，习书记有时候下乡调研，有时候和他请来的专家、顾问谈事情。最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就是接待上访的群众，习书记总是耐心地去了解上访群众的问题，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或者劝解他们。有的人觉得“打发”上访群众特别费事，但是习书记从来不是“打发”，而是真给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习书记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很晚。每天的文件不批完，他是不会睡觉的。事情如果拖着，他也睡不好觉。但他对我们普通工作人员倒是非常关心，经常嘱咐我们要多注意休息。

有时候到了晚上，我们在加班，他在办公室工作累了，出来转一圈，看见我们的办公室亮着灯，忙着做事，他就说：“你们

别太累了，早点休息吧。不要看我这儿亮着灯，你们就不走，该休息就休息。”转了一圈，他回去还继续工作。

除了批阅文件，他从外地请来的顾问、专家、各方面的人才，也经常和他“秉烛夜谈”。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1985年曾作为县委书记到美国考察，他有没有和您谈起过到美国的见闻、经历？

崔时欣：1985年，习书记去美国考察回来后跟我聊天说，他在美国找了一些留学生，和他们开座谈会，座谈会实际上也是比较轻松的谈心。他问留学生：“你们毕业以后打算怎么办？”对这个问题，怎么回答的都有。有的学生表示：“中国现在改革开放了，需要人才，大学毕业以后，有回国的打算。”还有的学生说：“目前还没考虑好，会根据自己专业在哪里有更好的前景来决定。”但还有学生说：“美国给我提供了助学金，毕业以后，我得为美国人民服务！”

我说：“那您是怎么跟他们说的？”

习书记说：“我就跟这些学生讲道理。我说，‘你是中国人，你父母也是中国人，你为啥不为中国服务呢？有可能你有签好的工作合同约束，3年、5年，那你就按照合同办事。但是合同到期了，请一定回到祖国去，为中国人民服务！’”

『习书记讲话特别能打动青年干部』

我们这一批年轻干部，受到习书记很深刻的影响。从我个人讲，当时作为团干部，从心里受到习书记一言一行的感召，可以说对我一生的影响特别深刻。

采访对象：王勋涛，1983 年前后任正定县西柏棠乡团委书记，后任团县委副书记等职，现任石家庄广播电视台台长。

采 访 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 年 4 月 19 日

采访地点：石家庄市王勋涛同志办公室

1982 年 5 月 26 日，习近平在共青团正定县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采访组：王勋涛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当年在正定工作期间，您先后在西柏棠乡团委和团县委工作。请您谈谈这段时期他与团组织和年轻干部交往交流的情况。

王勋涛：1983年前后，我在正定县西柏棠乡做团组织工作。那时习书记是分管共青团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我到县里参加共青团工作会，经常能见到习书记，听到习书记讲话。习书记非常关心团的工作，非常重视青年干部培养，担任了县委书记仍然如此。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几次。记得那年的五四青年节，习书记在常山影剧院礼堂给我们团干部和优秀团员开会讲话。那天，我坐在靠前的位置。习书记主要讲了到正定来工作以后这段时间，他对正定县方方面面情况的了解，特别是正定县璀璨的历史文化，以及所处的重要位置，同时还表达了对正定县未来发展的设想和憧憬。习书记把正定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整个讲话传递和表达了他对正定朴素真诚的情感，更对建设正定美好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激情，引发我们台下1000多名青年人的强烈共鸣。

习书记那时也就30岁，很年轻，很有朝气。他的讲话方式和语气特别能打动我们这些青年干部。那次讲话，让我们特别受鼓舞，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家乡的热爱。其实，我们这些正定本地人之前都没有踏下心来好好研究过自己家乡的历史文化，知道的事情也没有这么多。我们这是头一次听到从北京来的习书记，充满深情地把我们家乡的闪光点讲出来，所以大家都特别感动。习书记这篇演讲，在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后来，我

把这个杂志收起来，一直保存着。

1983年，我被确定为县里青年干部的中远期培养对象，属于“第三梯队”，参加了县委党校的青年后备干部培训班。培训班结业时，习书记亲自给我们讲话。他给我们提要求，告诉我们以后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年轻干部。从那时到现在，好多年过去了，我早已不是年轻干部了，但习书记当年那一番讲话，我现在还记忆犹新。一方面他站得高、看得远，讲话充满了哲理；另一方面，他很务实，讲的话很接地气，非常激励人。

我们这一批年轻干部，受到习书记很深刻的影响。从我个人讲，当时作为团干部，从心里受到习书记一言一行的感召，可以说对我一生的影响特别深刻。习书记虽然比我们大几岁，但当时也还是个青年人。随着我们后来对他了解越来越深，很自然就把他当成了我们青年人的表率，学习他严于律己、兢兢业业、拼命为党工作的坚强党性。习书记对我们青年干部的影响，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是长期持续的，是非常深刻的。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青年干部受到了习近平同志哪些深刻影响？

王勋涛：习书记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对青年干部的影响就很大。举个例子来说，1984年我调到团县委工作，这样在日常工作中我们也能够经常见到他。当时团县委是在县委办公楼后面第一排瓦房，习书记在县委二楼办公。我们共用一个食堂，所有县委大院的人都到那个食堂打饭。习书记到食堂去吃饭，都要从我们

办公室旁边的一条路经过。到了饭点，我经常能看到习书记从那里过。他总是穿着一身绿色旧军装，有时候他去得很晚，经常是我们吃完饭回来了，他才去。食堂吃饭的人多时，他就不声不响地在后边排队。

当时的条件比较简陋，食堂没有大餐厅。我们打了饭，就在房前的小凳子和水泥板子上吃饭。习书记也经常在那个水泥板子上吃饭，而且和同志们有说有笑。我们对习书记的印象都非常好。大家都说，别看习书记这么年轻，但言行举止稳稳当当，工作兢兢业业，衣食住行艰苦朴素，不仅不像北京高干子弟，甚至都没有一般城市青年那么讲究。

县委办公室的同志和我们团委的同志都是好朋友，他们经常和我们讲起跟习书记一起骑自行车下乡的事。习书记每次下乡调研，所到之处肯定是在乡镇吃食堂，吃家常便饭，严格要求自己。这些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口口相传，大家都知道，不是什么秘密。

习书记非常爱学习，读书很多。我去他的办公室送过几次文件，他的办公桌和床头上都是书。他一个人住在办公室，晚上基本上就是研究工作和读书。习书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虚心好学，善于从多方面汲取营养。他到正定后很快和县里各方面的优秀人才联系，加强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其中习书记和作家贾大山的深厚友谊已成为广为传颂的佳话。这一点对我们影响也非常大。

习书记思想解放又特别务实。他虽然很年轻，但抓工作很稳

健很务实，推动工作很有力度，看准了的事情就义无反顾抓到底。1983年，习书记主持开展了整顿基层团组织工作。当时，他除了给我们讲意义，还着重教给我们工作方法。我们听了习书记的讲话后，认识提高了，目标明确了，思路更加清楚了，最终取得了可喜成效。习书记在正定工作的几年间，正定的变化非常大。在他严格要求下，干部作风有了很大改观，全县经济增长很快，老百姓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再就是他对正定文化的发掘，对文化界人士的尊重，对文物古迹的保护，特别是大力发展旅游这个思路取得了成功。比如建设“荣国府”这件事，在当时正定县老百姓当中产生的那种兴奋、激动、自豪，是非正定人所不能体会的。这些变化，这些工作，最终给正定干部和群众带来了自豪和自信。我们青年干部都自觉以习书记为榜样，立志为家乡的发展而努力学习，扎实工作，无私奉献。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划片“包村”包的是塔元庄，我们了解到您也做过塔元庄的“包村”干部，请讲讲您知道的情况。

王勋涛：当时县委领导都划片“包村”，西柏棠乡塔元庄村就是习书记“包”的村。因为我当时是乡里的干部，也和其他乡干部“包”了这个村，常去塔元庄。我发现，塔元庄村干部和群众对习书记的感情特别深——习书记啥时候上塔元庄来的，他在塔元庄查看了什么地方，跟村里男女老少聊了啥，在谁家吃的粗茶淡饭，为村里办了啥事——这些点点滴滴，直到今天，30多年过去了，他们都记忆犹新。

2013年7月，习总书记在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又回到了塔元庄，看望父老乡亲们。长期以来，塔元庄村不但是正定县，也是石家庄发展得比较好的一个村，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习总书记回到村里，乡亲们都又高兴又激动地叫他老书记，习总书记也十分高兴。群众的这种感情真的是发自肺腑的。

习书记离开正定后，最初几年经常在春节期间回来看望大家。习书记每次回到正定来，我们都奔走相告。老百姓和习书记特别亲，他走了以后大家都很想他，这种感情的传递，我们每一个人都切身体会到了。后来，他工作更忙了，关注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回来自然也就少了，但他对正定人民的那种真情，包括我们对他的深厚感情，越来越浓了。

当年习书记留给我的珍贵记忆是我毕生的精神财富，更是我为党工作的强大动力。

『习书记鼓动我把体校搬到县城』

回想起来，习书记确实很有眼光。我们还是小小的村体校的时候，他就看到了我们未来的前景，推动我们搬到县城来办学。当初搬家确实是搬对了，是我们基地能够取得今天成绩的决定性环节。不搬就没有今天的基地，更没有国际培训中心。

采访对象：王庆广，1934 年 6 月生，河北正定人。1970 年组建留村小学乒乓球运动队。1974 年创办留村乒乓球业余体校。1986 年创办留村体校正定城关镇分校。1992 年筹建河北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曾任河北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主任、中国乒协正定国际培训中心主任。2018 年 6 月 17 日去世。

采 访 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 年 2 月 25 日

采访地点：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

采访组：王庆广同志，您好！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和您创办的留村体校。习近平同志当年在正定工作时，您创办的留村体校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王庆广：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参加工作后成为农村小学的一名体育老师。1974年，我在留村中心小学组建了乒乓球运动队，这个运动队后来发展成为留村乒乓球业余体校，也就是现在的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的前身。

乒乓球体校建成后，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全县都比较出名，后来在省里的影响也比较大。习书记1982年到正定工作时，正是我们体校逐渐出成绩的时候。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作为县委领导，对留村体校都有哪些关心和帮助？

王庆广：习书记到正定任职后，曾多次来体校调研、视察工作。我们体校离留村公社仅有100米，也就是两个电线杆的距离。当时，张五普同志是公社书记，他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县里来了领导，他就经常把领导带到我们体校来看看打球，并向领导介绍我们体校的情况。

1982年，习书记到正定后不久，到留村公社检查工作时，张五普书记也把他带到我们体校来。那一次，习书记是骑自行车来的，穿着一身半旧的绿军装，人很精神，很有劲头。这也是他第一次到体校视察我们打球训练的情况。

后来，习书记又多次到体校视察，来了以后看看教室、看看伙房、看看打球。有一次，他向我问起学生的来源。我对他介绍说，学生主要是从留村招收的，也有西兆通和附近村的孩子。他很关心体校，又问了问其他方面的情况。

习书记任县委书记后，有一次到宋营公社下乡，从留村路过的时候顺便到体校来看看。那天，他是上午10点多到的，学生们正在上文化课，他看了看场馆、校办工厂，之后就到我的办公室来谈工作。他挺热爱体育的，全国乒坛的情况他都熟悉，还跟我谈到了李富荣这一批老一辈乒乓人的事情。

后来，我们谈到体校具体的工作，当时我们体校的樊建欣刚被选入国家队，我把这件事跟习书记说了以后，他很高兴，他问我：“现在体校有多少教练？有多少学生？办学当中有没有什么困难？”我就把当时的情况如实向他介绍了一番。

最后，说到了教练问题。他说：“在村里办乒乓球体校，教练可是个大问题，你们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困难？”

习书记一下就说到点子上了。当时，我们的教练是土生土长的，都是自己培养的学生。教练很缺，我们就想培养自己的教练。但教练的工资太低，我想跟习书记提这个困难，一开始不好意思说，怕给领导添麻烦。但是习书记直截了当地问到了具体事情上，我自然也就不用藏着掖着了。

我说：“我们体校有个教练叫王素梅，是我们第一批的学生，现在正在省体院带职进修，工作很出色，也很负责任，选入国家队的樊建欣，就是她教出来的学生。她白天在体院上学，晚

上和星期日回来训练，每天往返20多里路，很辛苦。但她工资很低，希望组织上能根据她的情况，帮她解决一些困难。”

习书记听后，让我把王素梅的情况写下来，我就让体校的焦宏斌老师赶紧把王素梅的情况写成了材料，交给习书记。

那天，习书记拿了材料，是11点多离开留村的。走之前，我说：“习书记，不要走了，中午在这吃饭吧。”

他说：“不用啦，我一会儿就到家。”

下午3点钟，县人事局就给我打来电话说：“县里给你们体校的王素梅批了一级工资，你来办手续吧！”

我当时大吃一惊：“哎呀，真是快！”

我到了县人事局，拿到了批文，上面写的第一句话是“为了鼓励青年努力学习”。

王素梅涨了一级工资，她也很高兴。当时，给教练涨工资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教练员的工资在那个时候非常低，有时候教练是贴着钱在干工作，涨工资对留村体校来说，确实是一件大事。

习书记非常重视人才，他后来给公社和村里的民办教师陆续解决了工资待遇问题。这大大鼓舞了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的干劲。后来，王素梅又当选了全国优秀教练员。

这件事过去几十年了，我一直念念不忘。那时候，习书记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非常令人难忘的。他特别平易近人，跟平常人一样。有时候，咱老百姓说县委书记来了，觉得是个挺大的官，管着几十万人，事情那么多，所以就不愿意给领导添麻烦。

但习书记为群众办事，就不怕麻烦，他到你这儿视察，不是走过场，而是想给你办实事。

每次，习书记到体校视察，都是说：“有什么事儿？我给你办办。”这说明，习书记确实是个办实事儿的官，就算你不想给领导添麻烦，他也能探出你心里的话来，能说出你心里的事儿来，帮你解决实际困难。这一点，一般人做不到，好多领导都做不到。一般人，谁愿意没事找事、自找麻烦呢！

采访组：请您讲一下习近平同志当年任命您为正定县体委副主任的经过。

王庆广：当时，我们留村体校在全县比赛、石家庄地区比赛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并且向国家队输送了樊建欣、成红霞两名队员，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能向国家队输送两名队员，这在当时真是个奇迹，轰动了全县。

县里决定任命我当体委副主任，习书记在县招待所宣布的任命书。但我个人觉得，自己不适合当领导，也不会做行政工作。我还是喜欢干些具体事儿，喜欢创业，一心就想搞好乒乓球训练，也舍不得离开体校。我和县里说明我的意思后，县里就同意了我的要求，我到体委报到，但主要还是以体校的工作为主。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留村体校当年是在习近平同志积极推动下从留村搬到县城的。他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体校搬到县城后效果如何？

王庆广：习书记多次到留村体校视察，和我有很多交流，他积极鼓动我把留村体校搬到县城办学。他这个人很敏锐，发现留村体校在地理位置上有很大局限。比较突出的有两点：一是体校几乎只招收留村的学生，生源面窄，以后要面向全县、全省甚至全国招生才能得到更好发展，如果要这么做，至少要依托配套设施比较完善的正定县城才可以办到。二是体校名声在外，有很多举办大型活动的机会，但受到条件限制，很多事情都办不好。

这第一点，是关于未来发展的，我那个时候并没有切身的体会，也预见不到。但这第二点，习书记考虑到了，我确实也感同身受。在留村，曾经举办过两届河北省业余体校乒乓球比赛，每届都有200多人来村里吃、住。那时，村里条件太有限了，我们在操场临时搭帐篷当食堂，在教室里把桌子并起来当宿舍，给孩子们买了200多个小蚊帐，一人一个支起来。我们还从县招待所拉来杯子、盘子、碗和桌子。吃、住、比赛，都要一样一样去经管，即使这样仍然搞不好，因为村里条件实在太艰苦、太简陋，我们忙了半天，孩子们的条件也没多大改善。

不能顺利举办类似的活动，体校的发展自然就受到很大限制。后来在习书记推动下，体校搬到县城，一下子发展得很快很好。体校如果还在留村，生源受限制，举办活动受限制，学校发展受限制，也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今天的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

事实上，习书记在1982年刚刚来正定当副书记的时候，就着手推动把体校搬到县城去。我当时思想保守，舍不得离开留村那块地。公社领导给我传达了县里的决定，又给我做思想工作，劝

我搬到县城，说那样有利于学校发展。后来我才慢慢认识到学校搬迁的重要意义。

我积极按照县里的决定，到县城搞学校建设。县里当时给了体校4亩多地，但给的经费比较少，我就向留村老百姓借钱，白天在城里盖房子，晚上回村里向大家借钱，后来等省里和市里财政拨款下来，才把老百姓的钱还上。学校建成以后，根据县里意见，也为了照顾留村老百姓依依不舍的情绪，一步一步逐渐把体校搬了过来。搬进县城以后，发展很好，体校也越办越大。

从1984年开始筹备搬迁、征地、盖房子，一直到1986年初，学生全部过来，搬迁工作前后经历了两年左右的时间。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1985年就到福建工作了，体校正式搬迁到县城的时候，他已经不在正定工作了。

王庆广：是这样的。但习书记走了之后，也一直关心基地的发展。1993年，他在福州工作期间，回到正定一次。那次，由市委书记李海峰陪同，习书记专门到基地来看了。他很满意，高兴地对我说：“王校长，现在和留村那时候比起来，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8年，习书记又来到正定，到基地视察过一次。多年不见了，我们见面以后，我主要向习书记汇报了基地的发展情况。我说：“习书记，现在有11个国家、100多个国外队员在基地训练，每天收入很多！”

习书记听了以后，微笑着对我说：“一个县就有这么多国外

留村体校搬到正定县城，并逐步发展为河北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

队员来学习交流，你不能光看经济效益，还要看到社会影响。”

回来后，我们专门召开了领导班子会，学习领会习书记的指示。从十八大以后到现在，基地这一批年轻的班子干得很好，兢兢业业，大胆创新。现在，我们已经办成了乒乓球职业学校，学生从小学、初中到中专，毕业后升入大学。

这个平台，这种办学模式，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生来我们学校学习、训练。这几年，我们的升学率都达到100%，很多学生都考上了重点大学，像北大、北体、山东大学、武汉大学等等。现在，基地已经被国际乒联批准为“国际精英培训中心”，以后来的国外队员还会更多。

回想起来，习书记确实很有眼光。我们还是小小的村体校的时候，他就看到了我们未来的前景，推动我们搬到县城来办学。当初搬家确实是搬对了，是我们基地能够取得今天成绩的决定性环节。不搬就没有今天的基地，更没有国际培训中心。

现在，基地正在搞建设、盖房子。房子好盖，但是道路走错了可不行，走的道路如果不对，房子盖得再好也不顶事儿。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工作方法上对您有什么影响？

王庆广：习书记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非常重视人才、关心人才。他在《河北日报》发表“人才九条”，招揽了很多优秀人才，使我们县的工作迅速发展了起来，这一点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也学习了他这个方法。

我就很注重招聘高水平的教练。没有好的教练是不行的。有

了高水平教练，才能培养出高水平运动员。我的两个学生，一个是成红光，原来在日本国家青年队当教练；还有一个是张树杉，在上海七宝重点中学担任乒乓球队教练。我以特殊人才引进的方式，把他俩招回来了，现在他们都在基地当教练。这就是我跟习书记学的，一定要注重招聘优秀人才。

还有就是要切实关心人才，关心同事和职工，这样才能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习书记给王素梅涨工资的事，让我很感动，这也极大调动了教练们的工作热情。

现在我每天坚持看《新闻联播》。在电视上看到习总书记，我都感到很亲切，他的那些理念、想法和作风对我做好本职工作帮助很大，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

『习书记帮了我们春光电器厂的大忙』

习书记这个人很有『长性』，他不像有些领导，到厂子转一圈，听听汇报，就完成任务了。习书记不仅来我们厂里几次，帮助我们，指导我们，而且一直关注和关心着我们厂子的发展。这样的领导，这样认真做工作，我们群众对他就是一个字——服！

采访对象：张新立（左），1957 年 3 月生。1983 年开办春光电器设备厂。1985 年转成国家干部，历任正定县科协干部，电子元件分厂厂长、总厂副厂长等职。陆树棠（右），1948 年生。1983 年到春光电器设备厂工作。

采 访 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 年 4 月 15 日

采访地点：正定县张新立家中

采访组：张新立同志，您好！请您谈谈当年在正定筹办春光电器设备厂的起因。

张新立：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正定县广播站工作。那时我是个科技爱好者，平时喜欢钻研一些无线电技术，搞一些技术革新和改造。习书记在正定时，经济环境、政策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人们思想更活跃了，县里也更支持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了。我因为在广播站一直转不成正式职工，干得也不是很顺心，后来就干脆出来，于1983年开办了春光电器厂。这个厂生产一些电器元件，同时也由我主导研制一种新型舞台灯光设备。这套设备在当时国内舞台灯光领域属于比较领先的产品，可以根据舞台音乐的变化自动识别音调，给舞台投放各种灯光色彩，渲染舞台氛围的效果很好。

1984年，我把这种设备研制成功了，在省科委立了项。那个时候，习书记主政下的正定县，非常重视人才，重视科技成果，重视新产品研发，他本人对这个领域发生的事情特别敏感。有位同志就把我们厂的事汇报给习书记，他马上就到我们厂来视察，并且认认真真看了我们这套设备的演示效果。看过之后，他非常高兴，主动问我们厂有什么困难，还需要什么支持。从那次以后，习书记多次来我们厂视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习书记这几次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很低调，很接地气。我们看他穿的衣服，看他讲话时亲切随和的态度，觉得他就和我们老百姓一样。如果没有人告诉我们他是北京来的，而且在大机关里

工作过，谁也不会想到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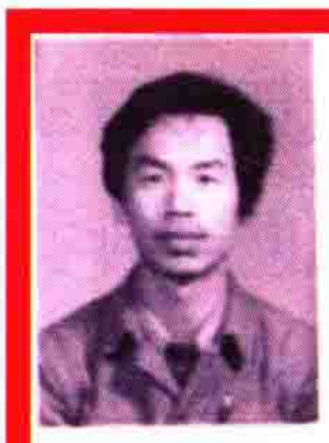
后来，真正把这个产品推向市场，还真是多亏了习书记亲自从北京帮我们找人，为产品打开了销路。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是如何帮你们打开销路的?

张新立：习书记帮我给北京的文艺家活动中心一位同志打了电话，并且跟他打好了招呼，让他接待我。之后，他就安排我去北京。临行前，习书记嘱咐我说：“新立，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你这次去北京找的那个人，他跟文艺界的联系非常多。关键是，他和一些单位的舞台灯光设计人员很熟悉。通过他，可以把你们厂的产品推出去。”

我到北京以后，很顺利地联系上了那位同志。他在文艺家活动中心组织了一个“彩色灯光声控器研讨会”。当时，他把很多单位的灯光舞美师都请去了，我就在这个研讨会上给这些单位演示我们的产品，效果非常好。而且，那一年有一个很好的契机，建国35周年大庆就要到了，我们这个灯光设备对增强演出效果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后来，参加研讨会的单位，很多都订了我们这个产品。

那一年，在建国35周年大庆的很多舞台上，我们的产品发挥了很大作用，也得到了媒体的关注。人们议论说：“正定县的几个农民，在舞台灯光控制方面搞出了这么重大的发明，在国内首家推出这样的设备，真是了不起啊。”后来，为了鼓励我，习书记还亲自给我颁发了一个自学成才奖。



张新立	
男	年龄 27
晋光电器设备厂	
职务	
主要事迹	研制成功"彩色灯光声控器"二代产品列为省科研计划。

授予何种奖励	自学成才奖
批准人	习近平印 章刘印树 85年1月20日

1985年1月20日，习近平为张新立颁发了"自学成才奖"，鼓励他自主创新。

但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怀疑和不理解。比如有两个北京的单位知道这个产品以后，打算采购，拿了产品说明书之后，就派人到我们厂来调研，他们看了我们简陋的厂房，觉得我们这种条件不可能生产出这么好的产品。然后，他们又到深圳、上海转了一大圈，哪里都没有和我们类似的产品，后来还是回到正定，在我们厂采购。厂房看着简陋，但我们确实是国内第一个研制和生产声控灯光技术的厂家，从产品的电路、结构、外形到说明书全部出自我们自己的手。

当时我们的硬件、营销等方面根本没有实力，就是有这么一个产品。说实话，也多亏了习书记花了很大力气帮助我们，我们的产品才能推向社会、发挥作用，工厂也得到了发展。

采访组：请问您是哪一年转为干部的？后来在岗位上又和习近平同志有什么交集？

张新立：1985年，我因为办厂的一些贡献和取得的一些成绩，转成了国家干部，到正定县科协工作。同时，我和陆树棠还一起办了一个业务员培训班。办这个培训班的初衷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干部和群众对商品经济的知识还比较贫乏，培训班主要是帮助大家学习一些常识。后来，我们把培训课程汇编成了一套工具书，不是长篇大论地讲理论，而是搞成了一本比较通俗易懂的业务员培训手册。

为了增加教材的社会影响力，我们就和习书记说：“能不能请于光远先生写个序？”习书记说：“你们先给于光远的秘书打

个电话，把书稿提供给他们。”我们没有联系上于光远先生。后来，习书记又想办法再次帮助我们联系。因为种种原因，后来写序的事情没有办成。

采访组：1985年，习近平同志调到厦门工作。临行前，您去送他了吗？

张新立：是的。1985年，习书记调到福建厦门工作。他走的那天早上，我到县委去，一敲他办公室的门，张银耀把门打开了一个小缝，对我说：“习书记正在吃饭，等一会儿吧。”我刚要离开，正在吃饭的习书记一抬头，从门缝里看到了我，就说：“新立，进来，进来！”

我进了屋，习书记一边吃饭一边和我聊天，说了一会儿话。几分钟以后，习书记吃完饭了，县里领导和县委办公室的一些同志也都来送他了。大家帮他把装书的箱子搬上车，跟他告别。

1987年，我去厦门找过他一次。头两天，习书记去调研，我就在住处等他，到了第三天，习书记回来了，抽出时间来见我。我跟他汇报了一下这两年工作的情况，又和他拉了拉家常。之后，我又在厦门待了两天。回来的时候，习书记自己出钱给我买了机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一路上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非常兴奋。我还清楚记得，那张机票是210块钱。

习书记后来到福州市任市委书记。我后来调到电子元件厂工作，李亚平是厂长，我是副厂长。那期间，李亚平到福州去看望习书记。习书记跟李亚平说：“你捎个信给张新立，请于光远

先生给他编的书写序的那件事，后来一直也没办好，我感到很抱歉。”

听到李亚平带来的这句话，我心里百感交集：如果习书记不提，这件事情我早就忘了。这本就是一件小事，只能是随缘，能办得成就办，办不成也很正常。但习书记把对我这个民间朋友的承诺看得如此之重，这么多年过去了，竟然一直记在心里，念念不忘。这是让我最感动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守信重诺，他把承诺放在心中，念念不忘。

张新立：确实如此。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件事，可以诠释他的这种品格。

1985年春节，习书记带着李亚平到东权城村来看望我和陆树棠。习书记到我们家里来，一方面是表示对我们事业的支持和重视，给我们指示工作，一方面也是跟我们交朋友。习书记鼓励我们，工作上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希望我们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那次，我跟习书记谈心，也谈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心路历程。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名无线电爱好者，在正定县广播系统干了几年，因为我是农业户口，身份一直转不过来，只能当合同工，也就是临时工。干活时我干在最前面，干得最多，最努力，但待遇跟正式工差很多。每逢年节，正式工都给发2斤红糖，我就没有，心里很不舒服。什么时候能转成国家正式职工，我咋也

看不到头。

这些不公平待遇，都是因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差别。这个鸿沟在那个年代非常大。作为农民，更别提招干的事，一听是农民身份，就一票否决。后来，我办了春光电器设备厂，就不再吃这碗饭了。

讲到这里，我有点激动，就跟习书记说："习书记！将来，如果有一天能把户口这个界限给去掉就好了！"

习书记微笑着朝我点点头，说："嗯，这个要慢慢来。"

30多年过去了，那天年轻的习书记朝我微笑和点头的情景，至今仍然牢牢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知道他那是表示赞同我的想法，重视我们农民的呼声。

2013年，习书记当了国家主席。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这个《意见》的发布，宣告中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那个时候，我虽然早已不是农业户口，并且转成了国家干部，但看到户籍制度改革的消息，我的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

采访组：陆树棠同志，请您也讲讲当年和习近平同志的交往情况。

陆树棠：习书记刚来正定县时，任县委副书记，我当时是东

权城公社的文化站站长、电影放映员。习书记来我们公社检查工作，来前没通知，是直接来的。他到公社的时候，公社的干部正好下乡去了。习书记和身边工作人员、司机还有几位公社的同志，几个人就站在院里的大养鱼池边聊天。

有一位同志说：“这养鱼池的水也太浑了，你们怎么不把它弄清亮一点？”

我就解释说：“水太清了，缺乏养分也不好，不是有句古话是这么说的嘛——水至清则无鱼。”

习书记笑着接了下半句：“人至察则无徒。”

这就是我和习书记的第一次见面。那时候我就觉得，习书记是个很有文化底蕴的人。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写诗歌、杂文之类，所以对有文化的人感到特别亲切，也特别敬重。后来我才知道，对上这句格言对习书记来说不算什么，他的文化比我可要高得多了。

采访组：您是通过什么事情了解到习近平同志的文化素养的？

陆树棠：我担任春光电器厂副厂长期间，记得一次有机会听习书记谈到俄国文学。谈到俄国文学，大家自然就会提到托尔斯泰。

习书记说：“哪个托尔斯泰？”

听他这么一问，我愣了一下，心里想，习书记这么有学问，难道不知道托尔斯泰的大名？

习书记接着说："俄国有两个托尔斯泰。一个是列夫·托尔斯泰，写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我读过。还有一个是阿·托尔斯泰，他是剧作家和诗人，我读过他的《苦难的历程》。"

和习书记的交流，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浅薄，这些我都没听说过，习书记都已经读过了，最后弄得我有点不敢说话了。"知耻而后勇"，受习书记的影响，我认真读了诸子百家、史学、哲学、经济学著作和一些外国文学。

采访组：1983年，您到春光电器设备厂工作。从那以后，习近平同志也几次来厂里调研，您有没有见过他？

陆树棠：见过。习书记到我们厂来视察的那天，我记得很清楚。他和我们一起吃厂里食堂的馒头、家常饭，吃完还交了饭费。

不久之后，习书记帮我们厂把产品推广到北京的很多文艺团体。他可帮了我们的大忙，可以说，没有他的帮助，我们这个厂子、这个产品以后是个什么结果，就很难说了。再好的发明，如果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采购，也是白费。

习书记这个人很有"长性"，他不像有些领导，到厂子转一圈，听听汇报，就完成任务了。习书记不仅来我们厂里几次，帮助我们，指导我们，而且一直关注和关心着我们厂子的发展。这样的领导，这样认真做工作，我们群众对他就是一个字——服！

『习书记关心塔元庄村的发展变化』

习近平同志还讲到，他原来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到了一个村党支部办公室，发现办公室很脏很乱，桌子上面一层灰尘，村支书就用大棉袄的袖子把桌子一抹。现在，咱们村的办公室环境很好、很干净，他看了很欣慰。

采访对象：尹小平（左），2000 年 1 月至今任正定县正定镇塔元庄村（原属西柏棠公社）党支部书记。赵桂林（右），1955 年生，1975 年任塔元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984 年任村党支部书记，2000 年 1 月至今任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主任。

采 访 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 年 2 月 26 日

采访地点：正定县塔元庄村村委会

采访组：尹书记，您好！上世纪80年代初，习近平同志任正定县委书记时，曾骑着自行车到塔元庄下乡。2008年初，他到中央工作后来正定视察工作，曾到塔元庄调研，这也是他20多年后的“故地重游”。请您谈谈他来那天的情况吧。

尹小平：习近平同志是2008年1月12日回来的。那一次，他到村委会转了一圈，看了治保会、警卫室、财务室，把各个办公室都转了。那时候，村里正在搞旧村改造，要把平房拆掉盖成楼房，因为正在建设时期，唯一的一条路还不是很畅通。

习近平同志鼓励我们说：“村里搞保安，比较好。”他还看了旧村改造楼房图纸的展示，当时是刚刚有了方案，还没正式开始。

看了图纸之后，我向他介绍说，我从2000年开始干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就开始搞“财富积累”。我们村的旧村改造，具体方式就是把闲置土地、旧办公房、厂房集中起来，创造价值。我们的“财富积累”一直坚持了下来，现在的收入是1年1000万元，给老百姓搞了很多福利。我介绍了具体给老百姓办了哪些实事。

习近平同志从财务室出来后，到“两委”办公室视察，一个是支委会，一个是村委会。我们把两套班子合在一起，工作上不发生分歧，开会布置工作也不会出现扯皮。他看了我们各个组织机构的组成，说：“你们组织机构搞得不错，很全。”

接下来，我又把两张图纸——一个旧村改造、一个盖楼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问我：“农民要是住楼，方便不方便？”

2008年1月12日，习近平到塔元庄村调研，与当地村民亲切握手。

我回答说："现在农业机械化程度高了，不用太多劳动力，家家都没有机械，种地工具也很少。农民把工具放到楼房地下室就行。"

习近平同志说："这也可以。"但他同时又提了两条意见："第一，一定要征求老百姓意见，得到大部分人的同意才行；第二，一定要规划好，严格按照图纸施工，不要随意改变。"后来旧村改造启动的时候，我们按照他的指示办，组织老百姓到其他旧村改造效果比较好的地方去参观，回来以后又组织家家户户征求意见、填表。

接下来，我们和习近平同志就到会议室去座谈，座谈的主题是基层组织建设。他问我："你们现在怎么培养党员？"

我向他汇报说："我们培养党员，一是选年轻的，二是选有能力的，推选以后能当支书或村主任的人入党。"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培养党员的标准很满意，因为他对农村的情况比较了解。过去，一般情况下农村发展党员，都选那些老实巴交的，对能力不太注重。这样对党组织和村里的发展都非常不利。我本身是搞企业的，深知任何岗位都应该谁有能力让谁干。我是1995年在企业入的党，当时已经30多岁了。我回来之后，村里培养了十几个党员。在这些党员中，我们以后要培养村干部，他们当中能干的人以后会来接替我们。

习近平同志看到我们现在的变化，鼓励说："你们发展党员的事做得很好。离了年轻人是不行的。"

他说话很朴实，对农村工作很了解，对正定、对我们这个村

的过去也很了解。他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时候，我们村边的这条滹沱河，当时也没有桥，河里都是泥沙，他到我们村里来调研的时候，骑自行车过不去河，推着也走不动，他就把自行车扛起来过河。他说："我那个时候就想治理这个滹沱河，想防汛、修坝。你们现在开始治理了，我很满意。"

县里领导给他汇报了治理滹沱河的计划。习近平同志提出，现在的治理标准偏低，标准还应该提高，要科学改造河道，形成完善的防洪系统。还要节省土地，改造河两岸的环境，绿化好，搞成公园，让老百姓有休闲娱乐的地方。

习近平同志还讲到，他原来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到了一个村党支部办公室，发现办公室很脏很乱，桌子上面一层灰尘，村支书就用大棉袄的袖子把桌子一抹。现在，咱们村的办公室环境很好、很干净，他看了很欣慰。

最后又回到旧村改造的话题，他说："改造好以后，大概三五年，我还要回来看看。"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果然在5年之后又来到塔元庄。这5年，村里一定发生了巨大变化。

尹小平：是的。2013年，习近平同志又来了。这次，他来到我们新的办公楼前，看到我们迎接他，他说："还是你们原班人马？"我说："是。"

他在院里站着看了看，说："这不是原来的办公室了。"我说："这是新的办公室，2012年建成，当年的7月1号搬过

来的。”

他又看了我们新建的大批楼房，高兴地说：“你们发展太快了，没想到发展这么快。”

他问我：“村民住的是哪些楼房？”

我指了指说：“这些高楼就是。”

习近平同志到我们办公室，在屋里转了转，看到每张介绍旧村改造过程的照片都很高兴、很满意。他又看了办公室的陈列，其中有些他很熟悉，上次来的时候见过。

他说：“你们搞得很好，一定要坚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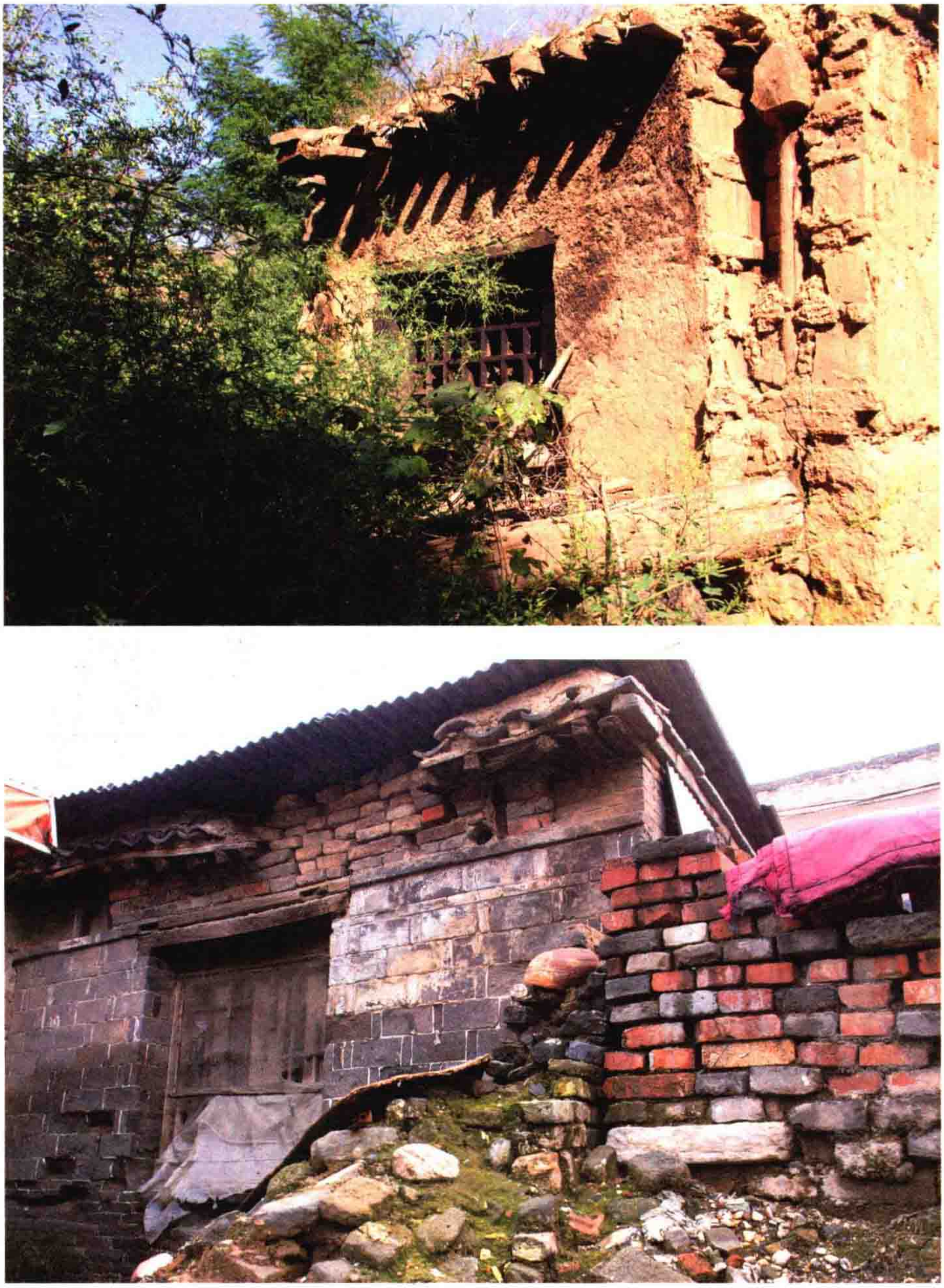
习近平同志了解了旧村改造的基本情况，到办公楼各个房间都转了转，又看了滹沱河改造的规划图纸，说了不少技术问题。

他看了我们村规划的图纸。我介绍说：“2012年，农业部给我们搞了规划，整体作了个设计。农业部包了我们村庄，我们成了对口单位。每年都会有一个副部长下来指导工作。”他听了之后说：“这个规划很好，就不要再动了。”我说：“好的，我们严格执行。”

我们一边走一边看，我们村里还有几处房子，农民不愿意拆，我们就没有拆。习近平同志说：“一定要留点旧房，即使留不下房子，也要留下照片，这是历史，农民要留下乡愁。”我说：“旧房大概还有五六处，能留下就留下。”

后来，他到办事大厅视察，和我们的办事人员一块交流。他问：“你们都给老百姓办什么事？”办事人员就向他介绍了给老百姓服务的那些事儿。我们当时有两个办事员，还有一个做记录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塔元庄的村民，村民们热烈地欢迎他。



20 世纪 80 年代，塔元庄的土房子和砖房子。

塔元庄今貌。

的，老百姓发生些什么事，就会找他们，打架了、生气了，他们给调解；此外，他们还给老百姓办事、跑腿。

我们从办事大厅出来以后，一边走一边说，顺着大街边走边看。习近平同志进了一户人家，和老百姓闲谈，他问："你们住楼，好不好？"还问了他们的收入情况，孩子上学的情况，以及家庭情况。之后，他来到一家超市，看了看超市里的商品，还和店主寒暄了几句。

习近平同志进老百姓的家、进超市，都是事先没有安排的，他直接就进去了。无论是我们这些村干部，还是老百姓，见了他，一点也不觉得紧张，反而觉得很亲切。

最后，习近平同志和我们开了座谈会，参加人员有县领导、村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一共二十几个人。他讲了他在正定工作时候的情况，村民代表也有几个发言的，介绍了农民的收入、生活情况，还有教育、医保、民生等情况。我也作了简单介绍。他总结说："现在，基础设施已经搞得很好了，你们要在全国提前进入小康，让农业实现产业化，让养老实现市场化，让旅游实现规模化。"

我说："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去做。"

采访组：从2013年到现在，又过去4年左右的时间，村里发展得怎么样？

尹小平：现在，养老的基础设施已经都做好了。我们都有第二套房，有的房子住不完，我们就把房子集中起来共同经营，建

设养老小区。我们有服务大厅，还有老年活动中心，需要什么服务，都可以“一键通”。家里一按按钮，工作人员就知道了，这种装置和服务我们在今年五六月份就会启动。村委会还留了100套房子，投入市场运作。养老基地，不是光服务我们这个村，而是面向全社会的。

农业产业化方面，我们进展得也很顺利。我们把农民的土地收回到集体，流转到合作社，共同经营。老百姓还可以在这些土地上劳动，但是以打工的形式，给他们开工资。就像工厂的运作，上班、种地、发工资。这样，合作社的租金是一份收入，再加上打工，就有了两份收入，如果再出去上班，又有工资。同时，农民在村的产业有股份，每年还可以分红。这样，农民就有多种收入渠道。

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健康食品品牌，并且在逐步发展壮大。我们种的小麦磨成的面粉，还有我们生产的花生油，每个月都给老百姓分。我们老百姓都吃我们村自己种的东西。

旅游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发展。我们村，在滹沱河两岸有大片土地。我们的河滩地多，这都是地理优势，可以做成很好的旅游项目。人们到这儿来玩，可以搞水上项目。我们建成了一条美食街，把全国的美食招商到这里来。目前，已经有几家来投资，山东的，宁夏的，还有东北的，四川的。我们现在经营的饭店，都用我们农业合作社的产品，自产自销，拉动第三产业。既保证质量，又能让老百姓增收。吃得健康，也放心。这样，以后吃的、住的、玩的都有了，就成了真正的农村旅游。

习近平同志鼓励我们，要提前进入小康。我很清楚，小康，可不仅仅是有钱就行了，小康的标准有几十个，我们要一条一条对标，达到标准了，才是真正的小康。很重要的方面，是我们老百姓的素质要提高，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这里面，教育是个大问题。现在，农村和城市差距仍然很大。比如，垃圾的问题，刚刚突击清理，又随手倒、随手扔，马上又会堆积如山。所以必须有长效机制，有严格的制度才能管好。用好的制度来管理，非常重要。这也就是以法律和制度治村的问题。

2016年2月12日，习近平同志到新华社视察。一个记者把我们村的照片给他看了，他说：“一定给塔元庄的村民捎个信，我看到他们很高兴！”

采访组：赵桂林同志，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时，您当过塔元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和书记，他曾多次到村里调研，请您讲讲当时的情形。

赵桂林：我第一次见到习书记是在1984年。当时，习书记和西柏棠公社党委书记赵建军骑着自行车到我们塔元庄村视察工作，查看刚刚实行的“大包干”情况，到老百姓的责任田里查看庄稼长势。他穿着一身绿军装，骑着二八型自行车，没有到村委会听汇报，而是直接到了田间地头。赵建军通知我，给我介绍了习书记。习书记给我摆摆手，详细问了村里的粮食种植情况。他一边听我介绍，一边从地里抓起一把土细细地查看土质。了解村里的情况之后，习书记又让我带着他到不同的田地去查看，他看

得很细，对土质、种植都很了解。看了半天，习书记就和赵建军骑着车子走了。我留他们在村里吃饭，他们说不吃了，还要到别的村子看一看。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又回到正定来，您见到他了吗？

赵桂林：2008年习书记来正定时，我有幸参加了座谈会。习书记让我发言，我说：“习书记，见到您倍感亲切，好比回到20多年前。当年，您在正定当县委书记，我是村支书，并且是县第九届人大代表、第四届党代会代表，经常参加会议听您作报告，那个时候您就把我们正定的蓝图规划出来了：给我们建了荣国府，我们现在发展为旅游大县；建了常山影剧院，我们现在发展为文化名县；您把石家庄市里的公交车与正定接通，带动了正定的经济发展，我们现在发展为经济强县。对我们村当时的规划，您给了很大支持，正定县人民不会忘记您，塔元庄村民不会忘记您。”

我说到这里，习书记点头说：“是呀，咱们还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呢！我过去在正定的时候，条件很艰苦，咱们县里就一辆吉普车，我经常骑自行车下乡去，印象很深的就是到河南[①]的5个乡镇下乡，要过滹沱河，非常难走，自行车骑不动，推不动，我就扛起自行车，一走一滑，走一步倒半步。那个时候，我就想，修个拦水坝，上面放上水，下面修修路。你们现在修的汊河挺好，

① 河南，指滹沱河的南边。

滹沱河修了之后会更好，实现了我当年的愿望。我记得到一个村里下乡去，办公条件很差，办公桌和椅子上一层尘土，没地方坐，当时村干部吹了一下，用袖子擦一擦，就往上一坐。当时的农村就是这样的条件，很艰苦。你们现在的办公条件很好。”后来又说：“当时农村两件工作很难做，一是计划生育，一是改造连茅圈，农村卫生条件很差，必须把厕所和猪圈隔开。当时群众不理解，阻力很大。”原计划40分钟的座谈会，结果开了2个小时。

2013年7月11日，习总书记再次来到塔元庄村视察。他看了村里的变化，高兴地说：“没想到你们变化这么大，没想到你们变化这么快！”他到村民家中时，刚上电梯，看到我在里面按电梯，一下就认出了我，笑着问我：“你怎么在这里开电梯？”我说：“我开电梯，您放心啊。”他幽默地说：“好呀，开电梯能上能下！”

『习书记多次到西兆通调研』

我们找了个技术员领习书记去农场，他也没让任何干部陪同。他到试验田，问了技术员很多问题，问种植技术，问田间管护，问疾病防治，问水肥施用，问棉花产量，方方面面问个『底儿掉』，考察得特别细致。考察完，他自己骑车就走了，也没在我们这里喝一口水，吃一口饭。

采访对象：西兆通干部群众

采 访 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 年 4 月 19 日

采访地点：石家庄市西兆通镇政府

“习书记调研问的都是内行话”

周田车，1957年3月生。1975年任西兆通大队革委会副主任。2001年任西兆通社区党委书记。现任西兆通社区党委副书记。

采访组：周田车同志，您好！您一直在西兆通做基层领导工作，当年同习近平同志见过面，请您讲讲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周田车：好的。我一共和习书记见过3次面。第一次见到他，大概是1982年9月。有一天，我到三角村去开棉花生产现场会。当时，习书记就在三角村主持这个会议，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穿着一身绿军装，裤子挺旧，背着一个绿色军挎包，脚穿一双黑布鞋。当时我不知道他具体什么职务，但是觉得这个县里新来的干部真年轻、真朴素，讲话办事有条不紊，真行。

当时，县委的史文山同志也在会议现场，他告诉我，习近平同志是我们的县委副书记。会议结束后，我找到史文山同志，跟他聊棉花种植的事。我说：“我们大队正在搞一个棉花新品种，

挺好的，你有时间能不能到我们那儿看看？”

习书记在旁边听到了，就主动过来跟我们聊天。他问史文山同志：“这位同志是哪儿的？”

史文山同志就向习书记介绍我：“他叫周田车，是西兆通大队的年轻干部。”

习书记接下来就问了我和我们大队的情况。他说：“你在你们大队是什么职务？”

我说：“我在我们大队当革委会副主任。”

习书记问：“你们在搞什么新品种？规模有多大？”

我说：“我们现在搞了60多亩的棉花试验田。”

习书记问：“现在情况怎么样？”

“现在基本成功了。习书记，您抽时间到我们那儿看看吧！”

习书记很高兴。他点点头，答应说：“好，行！我抽时间就去！”

采访组：他是什么时候到你们那儿考察的？

周田车：他平时工作很忙，估计是一时没有抽出空。他是第二年秋天来的，当时他已经是我们的县委书记了。那次，是我第二次见到习书记。

那是一个上午，我们大队全体干部还有一些党员、社员代表，共20多人，在大队的一间屋子里开会。

我们当时正在研究上马一个企业的事。那个时候体制束缚还挺厉害的，原则上不允许大队搞企业，但当时县委书记习近平同

志支持和鼓励我们办企业。我们就聚在一起商量这个事儿，正开着会呢，一看，门口站着个穿绿军装的小伙子。别人可能没见过他，但我认识他。我连忙走过去说：“习书记，你怎么来的？”

他说：“我从河滩过来的。”

我说：“你知道坐船的位置？”

习书记笑笑说：“我知道啊。”

我们大队支书一看，是县委书记来了，吃了一惊。因为习书记来，既没通知公社，也没告诉大队，骑个自行车就直接来了。大队支书赶忙迎上去，请习书记到屋里坐。

习书记说：“你们开会吧，我就不坐了，我到你们农场去看看。”

大队支书说：“习书记，我让主任领你去。”

习书记说：“不用。你们开会，找个人领我去就行。”

我们找了个技术员领习书记去农场，他也没让任何干部陪同。他到试验田，问了技术员很多问题，问种植技术，问田间管护，问疾病防治，问水肥施用，问棉花产量，方方面面问了个“底儿掉”，考察得特别细致。考察完，他自己骑车就走了，也没在我们这里喝一口水，吃一口饭。

技术员回来跟我们说：“你别看习书记是城里人，又那么年轻，他可是对棉花种植特别精通，问我的都是内行话，懂的不比我们技术员少。以前我开会，听过他几次讲话，对棉花特别懂。就要这样的人当干部才行！”

1993 年，习近平（前排中）与到福建挂职的正定基层干部合影留念。

采访组：您刚才说，一共和习近平同志见过3次面，请您讲讲第三次见到他的情景。

周田车：我第三次见到习书记时，他已经离开正定8年了。这8年当中，习书记虽然在福建工作，但他和正定的干部群众还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且有很多来往。他还组织了正定的基层干部到福建去挂职锻炼，学一学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先进经验。

1993年7月，我们正定县一个县委副书记带队，还有一个政协主席陪同，领着我们一批村干部20多人，到福建去了。习书记欢迎我们，大家一起合了影。照相后，副书记把我们挨个向他作了介绍。习书记一看到我就说：“这个小伙子，我认识！”

我说：“习书记，您还记得我呀？！”

他说：“记得呀。年轻人，好好干！”

之后，习书记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个简短讲话，主要是欢迎大家来福建，希望大家沉下去，好好学习。此外，他还给我们讲了福建的一些生活习惯。

我被安排到福州的一个村挂职锻炼，这个村和我们西兆通的区位条件比较相似，都是紧靠市里，工业发展得好，高速公路修得很先进。我在村里和当地人朝夕相处，有很多交流，当地人谈论起习书记，都是赞不绝口。

他们说：“习书记平易近人，经常过来看我们。”

他们还说：“习书记特别关心我们基层的工作。”

我在村里一个规模相当大的造纸企业参观，那位厂长也认识习书记。他说：“习书记把我们这些企业都跑遍了，他方方面面

的工作都抓得非常到位。”

在村里挂职了一段时间，有河北来的同志提议说：“咱们去市委看看习书记吧！”

福建当地的同志说：“千万别去，习书记太忙，他平时的工作安排得非常满，可以说每天都争分夺秒啊。”

我们一听，也觉得不好打扰他，就作罢了。我们在福建农村挂职的这3个月，确实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经验，挂职快结束的时候，我有些要紧事，大约提前10天回了河北。后来开的告别会我就没有参加，也就没有跟习书记见面。

后来，从福建回来的一位同志跟我说：“告别会上，习书记还打听你呢，问‘小周为啥没来’。”

我说：“那你得帮我跟习书记解释啊！”

他说：“放心吧，我给你说清楚了。”

我说：“习书记的记性真是好啊，这么多人，还有福建的同志坐在一起，谁来谁没来，他都很清楚。”

他说：“是啊。吃饭的时候，习书记一个桌一个桌都转到了，问我们的学习情况、考察情况。他这次组织咱们过去挂职，可不是走走形式，习书记要确保我们都取得真经，学到实实在在的东西。”

“习书记组织正定基层干部到福州农村挂职锻炼”

武贵生，1952年4月生。1976年任西兆通公社凌透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995年任凌透村党支部书记。2006年退休。

采访组：武贵生同志，您好！您是西兆通的基层干部，当年曾受习近平同志邀请和正定其他基层干部一起，到福建省福州市农村挂职锻炼和学习。请您谈谈到福建后的工作、学习过程，以及您的感受。

武贵生：1993年，习书记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虽然离开正定8年了，但还一直记挂着正定。为了提高正定县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也为了开阔大家的眼界，他组织我们到福州挂职锻炼和学习。县里当时派去的，主要是乡镇和村一级的干部，由两位县领导带队。

我们一行人到了福州，见到了习书记。在欢迎会上，他首先对我们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之后就直奔主题，给我们详细讲了都要到什么地方挂职、做什么工作、怎么做、学什么东西、怎么

学等等。

习书记还嘱咐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干工作、学经验。把这里的经验好好总结，回到正定以后充分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为家乡建设尽一份力。

3个月的挂职锻炼，确实给我们这些“土干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福建干部开放的态度、超前的意识，还有福建人民的活跃、勤奋、智慧、敢打敢拼的精神，都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具体的东西，比如开办乡镇企业的具体工作方法，如何根据城市的需要来发展农村经济，等等。

挂职锻炼结束时，习书记给我们送行。欢送会上，他给我们分享了他来福建这么多年的心路历程。他说，自己刚到福建厦门的时候任副市长，在这个沿海开放城市，工业、商业、金融等非常发达，和过去以农业为主的正定县有非常大的差别。所以，自己要一边干一边学，才能跟上形势。后来，到了宁德当地委书记，宁德是山区，当时相对比较贫困落后，情况也更复杂一些，和厦门这种发达的大城市有很大不同，在宁德这样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就要大力抓基础建设。

习书记说，我们到什么地方就要唱什么歌，一定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去做工作。你们现在在福建学到的经验，对你们应该是一种启发、一种借鉴，开拓你们的思路，但回到正定以后，处理具体工作决不能拿福建的做法生搬硬套，而是要把握正定的实际，把思路理清、关系理顺，实事求是、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

我认真回顾了福州3个月挂职锻炼的经历，花了一些时间深

入总结学到的知识和经验。习书记在欢送会上嘱咐我们的话，我也一直牢牢记着。回到凌透村以后，特别是我当了村党支部书记以后，根据习书记说的“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去做工作”，首先沿着滹沱河岸边治理几千亩沙地，当时我们领着群众在沙地上开垦了几百亩果园，还把过去疏于管理、感染病害的果树全部更新。这样，不仅有效地镇住了风沙，也优化了滹沱河的生态环境，同时农民也有了丰厚的经济收入。

我从福建3个月的挂职锻炼中学到了很多东西。那次福建之行的经历，和习书记嘱咐我们“到什么地方就要唱什么歌”的话，我都牢记在心。

“习书记周末骑车冒雨来西兆通调研”

李正，1952年生。1982年任西兆通公社党委委员、秘书。1984年任西兆通乡党委副书记。2012年退休。

采访组：李正同志，您好！您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是在西兆通公社任党委委员的时候吧？您当时接待了他，请讲讲那天的情况。

李正：1982年7月，玉米长到一米多高的时候，一个周末的下午，下着小雨。我在公社办公室，看到外边大厅里站着一位个子高高的小伙子，好像在找人，我就出去了。

我还没开口问，他就先跟我说话了：“李正，今天是你值班？”

我说：“是。”

这个小伙子说：“我今天不走了，在这住一天，搞调研。”

我定睛一看，认出来了，原来是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在

县里开会的时候，我和他见过面，没想到他还记得我的名字。

我说：“那这么着吧，你先上我办公室等一下，我给你安排一下地方。”

习书记说：“好办。你给我准备一间屋，有脸盆、毛巾、香皂就行了。然后，你把你们公社这几个大队的年报找出来，我今天晚上看一下。”

我答应着，就连忙去办了。很快，我把二楼西北角的一个房间准备出来了，让习书记先进屋洗把脸，休息一下。然后，我又找到了习书记要的资料，给他送过去。

接下来，我就给习书记安排晚饭。因为这天是周末，我们单位食堂做饭的厨师吕师傅已经收拾好准备下班了。

我说：“吕师傅，县委的习书记来了，今天不走了，在咱们这搞调研。你给他弄点吃的吧！”

吕师傅刚要出门买菜的时候，他哥哥吕正兴正好来了，跟我们在大厅碰了个面对面。吕正兴在县科委工作，和习书记认识，听我们说习书记来调研，食堂也没有饭菜了，他就说：“那就别张罗饭菜了，到我家吃饭吧！”

于是，我去叫上习书记，我们几个都骑着自行车，到了吕正兴家。我和吕正兴给习书记简单聊了聊大队的基本情况。当时，我们聊到东兆通有一个玻璃厂，那个厂不算景气，经营得不太好。我主要谈了谈大队现在是怎么办的，怎么解决问题的。习书记听得很认真。

谈了一会儿，吕师傅炒好了四五个菜，饭也做好了，我们就

吃饭。习书记一边吃一边跟我们聊，问了其他乡镇企业经营的情况。

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从干部到群众思想都不太统一，“左”的思想还很有市场。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很大束缚。我们十里堡有个玛钢厂，主要生产钢窗、建筑、建材，这是一个小厂子，其他上规模的工厂就没有了。

习书记把这些厂子的情况比较详细地问了一下，问到了这些乡镇企业的规模、经营的效益、人员的构成、工人的技术水准等等。我因为来的时间不长，不到一年，所以当时掌握的情况也不是很多，说得也不多，就是把我了解的一些基本情况都跟习书记讲了。

习书记就说起集中发展个体经济、乡镇企业的好处，而且提出不但要放心大胆地搞，还要上规模。他还说，咱们应该走出去，多看看沿海、南方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后来，我们又谈到了农业。我们当时的农业生产比较单一，主要就是小麦、玉米，习书记说：“农业只靠这些也不行，要搞现代农业，要大力发展深加工、养殖、肉蛋奶，供应城市，抓准城市的需求来发展农村经济，这样才能让老百姓的生活好起来。”

我们一边吃着饭，一边听习书记讲，这个把小时真是充实。他确实讲得好，我们一边听着，心里面暗自佩服——别看习书记这么年轻，真是有思想、有水平。

那天晚上，习书记熬夜把我们公社1979年到1981年这3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年报全都看完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看他，他把年报还给我，说：“这些年报我都看完了，你收起来吧。”

我说：“习书记，你一晚上看这么多资料，够辛苦的。”

接下来，习书记跟我告别，骑自行车赶路回县城了。本来周末可以好好休息的，他还冒着小雨骑车到我们这里来搞调研，真是不容易。

采访组：从那次以后，习近平同志再来到西兆通公社，您和他又见过面吗？

李正：又见过一次，是在1983年春夏之交。那次，他也是来我们公社搞调研，但不是我接待的他。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在公社后面的食堂遇见了他。当时他正在和公社的同志们一起排队打饭。打好了饭，他就坐在食堂外面的水泥凳子上，和大家一起在用水泥废楼板搭的“饭桌”上吃饭。一边吃，一边和我们聊天，很轻松也很愉快。

习书记的人才战略有效实施以后，大量的专家和学者到正定来，为正定的发展出谋划策。1984年，他请了一位香港的经济学家做我们正定的经济发展顾问，到我们这里来考察。这位香港顾问，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经验，也提供了很多“走出去、请进来、谈项目”的办法，给我们出了很多有用的主意，做了不少事。

也是这一年，习书记在正定召开三级干部会。会上，他动员人们解放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希望我们能够到南方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多学习先

进经验。

根据习书记建议，这一年我们就到浙江温州去考察了一次。那里乡镇企业快速发展，让我们非常震惊，大大开拓了我们的思路，我们也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第二年，我们一下就上了20多个项目，而且大部分项目都运行得很顺利，我们的乡镇企业就稳稳当当地发展起来了。

“习书记脑子里想的都是让老百姓赶快富起来”

孙树栋，1955年1月生。1980年8月到西兆通公社当司机。

采访组：孙师傅，您好！请您谈一谈当年见到习近平同志的情景。

孙树栋：1982年7月，习书记骑着自行车到我们西兆通调研。那时候，李正同志是公社秘书，负责接待习书记。我是司机，算个见证人。习书记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见到他，觉得他很年轻、很朴素，穿个绿军装，也没人跟着，骑着“二八”大链盒自行车就来了，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没啥两样，所以给老百姓的印象特别好。

那天下午，习书记一来就看我们公社几个大队的年报，然后到我们食堂大师傅吕浪创的哥哥吕正兴家里去吃的饭。吕正兴在正定县科委工作，之前和习书记就认识，他们工作上有交往，彼此也熟悉。他在城里没房子，每天都是下班就回村。那天他听说

习书记来了，就把习书记请到家里去吃饭。习书记吃完饭回到住处，继续看年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第二次到公社来，您又见到他了吧？

孙树栋：是的。1983年春夏之交，我又见到了习书记。那天，他到我们公社来调研，在我们食堂吃了个便饭，他和我们公社的同志一样，排队打饭。然后在食堂外面大杨树下的水泥板上吃饭，和大家边吃边聊。我当时也在习书记旁边一起吃饭，听到他跟李正同志聊了很多农村的问题，问老百姓的生活、生产队的经营等等这些工作上的事情。习书记这个人，无论吃饭还是聊天的时候，注意力都始终放在工作上，无论啥时候，他脑子里想的都是咋样才能让老百姓赶快富起来，腰包怎么才能鼓起来。他比我们自己还上心，想得还多哩！

采访组：我们看到您提供的一张轿车的照片，这辆轿车是什么来历？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吧。

孙树栋：这是国产的老上海牌汽车，1984年县里给了西兆通一辆，还给了永安乡一辆。这种车，是咱们中国自己产的第一代轿车。那个年代，我们农村基层单位有这样一辆轿车，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了。我们西兆通在正定是经济发展最好的乡镇，习书记给我们这辆车，一方面是鼓励我们，一方面也是支持我们的工作。这么好的车，习书记自己不用，却给我们用，真是了不起！

习书记离开正定以后，我也一直开这个车。我把这车保养得

很仔细，每天擦得很干净。虽然它来的时候就是一辆旧车，但我一直好好伺候它，性能一直也没什么问题，我们一直开了好多年。

1984 年，为了鼓励和支持当地的发展，县里给了西兆通一辆老上海牌汽车。

ISBN 978-7-5035-6539-7

9 787503 565397

定价：66.00 元